



---

# 中共党史人物传

---

## 第九卷

---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中共党史人物传

## 第九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九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125 插页8 字数  
250,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平) 30,000

统一书号: 11094·100 定价: (平)1.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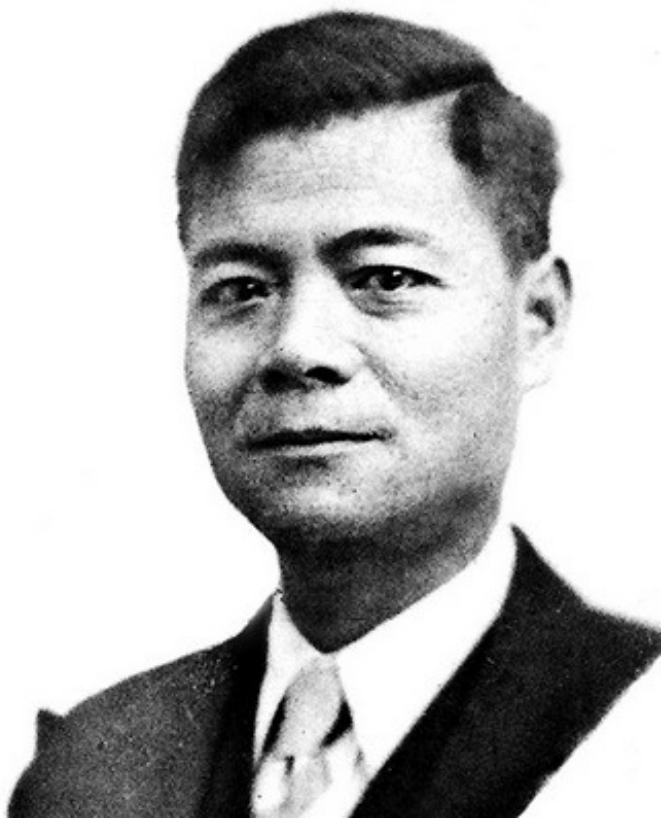
 网站编辑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会 长：何长工      副会长：李 新 胡 华

主 编：胡 华      副主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成员：胡 华 彭 明 陈志凌 南 岗  
郭洛夫 李育安 刘富恒 房成祥 廖鑫初  
刘勉玉 高 军 陈天绶 任武雄 郭雨邨

责任编辑：郭洛夫



陈 潭 秋



毛 泽 民



林 基 路



顾 正  
红



熊 雄



邓 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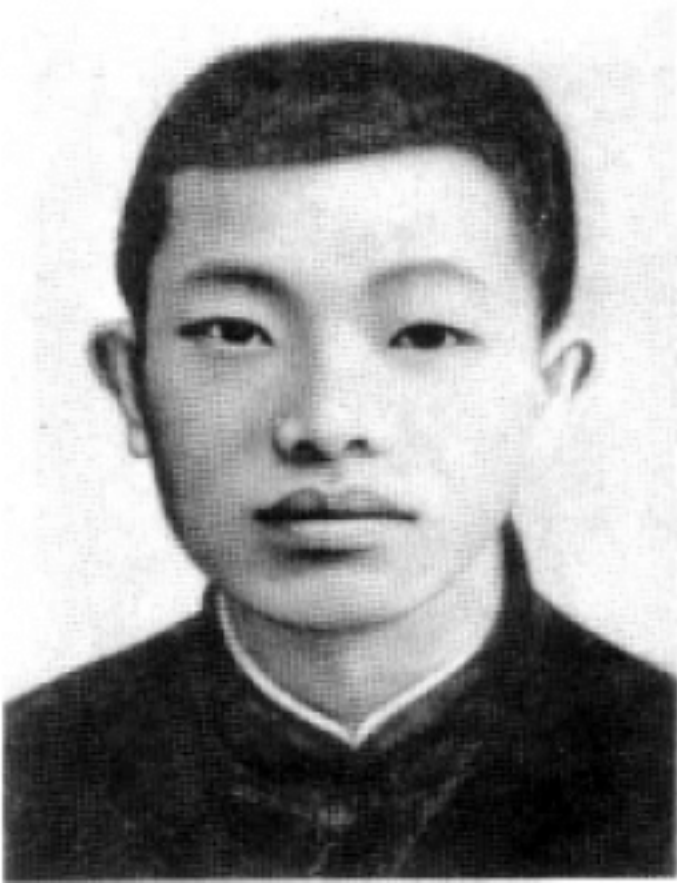


张 秋 人



郝 清 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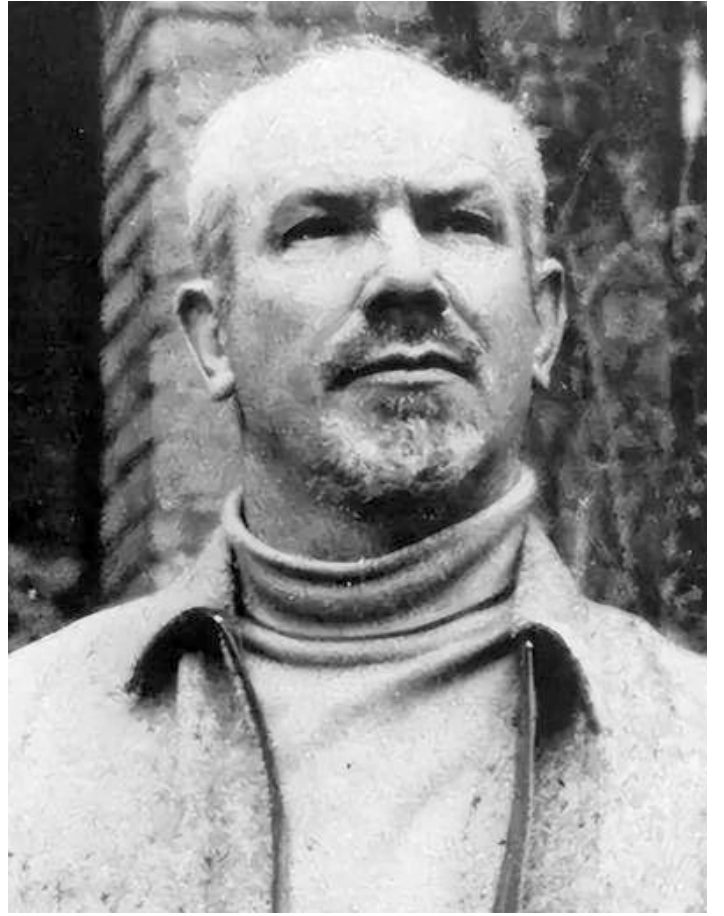
夏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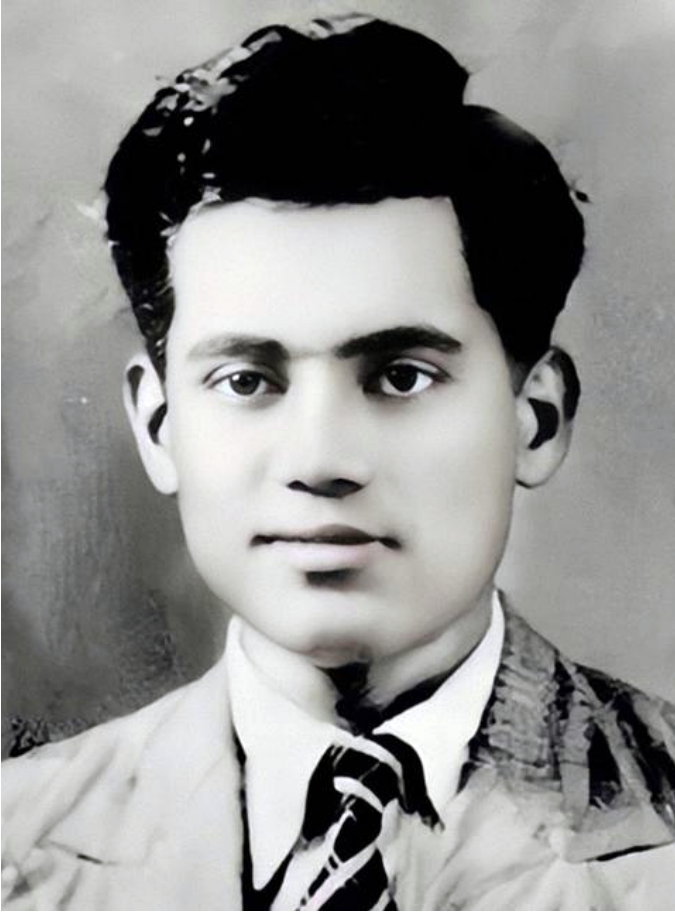
王凌波



宋 绮 云



白 求 恩



柯 棣 华

## 目 录

陈潭秋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新疆大学	《陈潭秋》编写组	( 1 )
毛泽民	新疆大学 韶山陈列馆	《毛泽民》编写组	( 47 )
林基路	关继廉	张宝裕 尼加提 ( 维族 )	何伦志 郭雨邨 ( 76 )
顾正红			张 铨 ( 107 )
熊 雄			熊巢生 ( 120 )
邓 培	姜华宣	肖 甦	姜珽玉 ( 136 )
张秋人			叶炳南 ( 162 )
郝清玉		佩 军	梅 芳 ( 192 )
夏 曦		刘晴波	雷 子 ( 208 )
王凌波			邹秋龙 ( 247 )
宋绮云	江 山	胡民新	黄朝章 ( 258 )
白求恩		贺洪中	吴振录 ( 282 )
柯棣华		方一星	盛贤功 ( 327 )

# 陈 潭 秋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新疆大学 《陈潭秋》编写组\*

## (一)

陈潭秋，原名陈澄，字潭秋，一八九六年一月四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陈宅楼。祖父陈畴，是清末举人，终生在乡间教书。父亲陈厚佑，一生守田躬耕；母亲龚莲馨，操持家务。潭秋兄弟姐妹共十人，八男二女，他排行第七。由于父亲多病，兄弟姐妹多在上学，所以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到他和八弟荫林大学毕业时，家中田地已所剩无几了。

陈潭秋的童年，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清朝政府媚外残民，全国城乡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陈宅楼村和全国农村一样，一遇天灾人祸，贫苦农民卖儿鬻女，背乡离井，逃荒度难。陈潭秋目睹人民的悲惨遭遇，深感旧社会的罪恶，愤恨不已。

陈潭秋的五哥陈树三，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后不幸去世。他生前很关

---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万志方、刘友焕、刘跃光、关继廉、许海生、杨美君、张安庆、张宝裕、陈乃宣、胡云秋。

心潭秋的学业和成长，亲手将潭秋头上的长辫子剪去，送潭秋到族办的聚星学校读书，并且再三教育弟弟，不要死读书，要善观察，勤思考。陈树三常给潭秋讲些革命的故事，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朝政府压榨人民的罪行，讲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和革命志士的斗争生涯，使陈潭秋从小就受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萌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他还对弟弟说：“你的名字叫陈澄，就是要澄清浑浊世界的意思，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

陈潭秋自小读书勤奋，文思敏捷，在小学就一直是优等生，为本班同学所赞许。濮阳孙啸千在聚星任教时，对潭秋和荫林奖励备至。这位先生次年离开聚星时，还将潭秋、荫林兄弟带到自己家乡的学校，免费就读。

一九一二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入省立一中读书。一九一四年，又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并于一九一六年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学习。

陈潭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对接触到的一些进步书刊，都能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并广泛结交有志青年，一起议论时政。他酷爱文学，又对体育活动有浓厚兴趣。青年时代的陈潭秋既是足球场上的一员勇士，又是长跑征途的一名闯将。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陈潭秋尽心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登载的文章，眼界大为开阔。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陈潭秋毅然投入战斗。五月九日游行示威时，他带领英语部同学，走在高师队伍的最前面。他还同当时正在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的恽代英等学生领袖

一起，积极地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五月十二日成立了武昌学生团，五月十七日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接着学联代表到省署请愿，次日在武昌阅马场开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的口号声，震撼武汉上空；“还我山东”、“誓雪国耻”、“灭除国贼”等标语，贴满武昌街头。学生们在沿途散发传单，并在通衢要道搭台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演讲时，陈潭秋等在台上慷慨陈辞，台下各界听众潸然泪下，怒火满腔。许多市民送茶送果，慰问学生。学生们激动地说：“救国属于国民天职，只要大家齐力进行，胜过茶果。”一位人力车工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呼：“学生万岁！”<sup>①</sup>

学生们的爱国义举，吓坏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湖北督军王占元。他扬言对游行、讲演、罢课的学生，“捉到即枪毙，拚着一个督军，一定要办到格杀勿论的地步！”<sup>②</sup>他还严令各校采取开除、停伙、提前放假等卑劣手段破坏运动。但在陈潭秋等的领导下，学生们无所畏惧，举行总同盟罢课，组织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六月六日，陈潭秋带领高师同学，不顾校长的阻挠，冲出校门，与兄弟学校及各界群众汇合，再次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

正当学校以“提前放假”来破坏学生运动的时候，一九一九年夏天，陈潭秋毅然邀约同乡林育南、肖人鹄、刘艺祖等人，带着传单和演出道具，回到家乡进行宣传、演出。五四爱

---

<sup>①</sup>1919年5月20日《大汉报》。

<sup>②</sup>《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国运动的星火，播撒到黄冈陈宅楼、八斗湾、杨鹰岭一带的广大农村。整整一个月，陈潭秋和同伴们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巴水河畔，烽火山麓，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二）

一九一九年盛夏，陈潭秋在武昌高师毕业之际，作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随武汉学生参观团赴上海，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加强各地学联的联系。他在上海访问了许多学校，参加了上海学生的集会。经高师同班同学倪季端的介绍，他在上海结识了董必武。他们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开怀畅谈救国救民的抱负，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董必武总结参加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过去革命工作不依靠工农群众方向不对头，要从头来”，“必须唤起民众”<sup>①</sup>。陈潭秋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以及参加五四运动的实际斗争中，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们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共同决心，商讨了救国大计，决定回湖北后以“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sup>②</sup>。陈潭秋和董必武的这次会见，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此，他们为共同的革命目标并肩战斗。

从上海返回武汉后，陈潭秋从武昌高师英语部毕业，乃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以记者身份，走街串巷，深入工人住宅

---

① 《董老的嘱咐》，1956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

② 《董老忆潭秋》，《楚晖》第1期，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区，进行社会调查和新闻报道。

一九一九年秋，董必武回武汉后，邀请陈潭秋、张国恩、倪季端等筹办武汉中学。一九二〇年春武汉中学正式开学，陈潭秋担任英语教员兼乙班班主任老师。他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努力下，这所学校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师生中很多人后来参加了党、团组织，有的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陈潭秋、董必武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接着，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同时，上海发起组又让途经上海回武汉的刘芬（伯垂）到汉后筹建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陈潭秋、刘芬等经过多次交换意见，认真商讨，决定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九二〇年秋的一天，董必武、陈潭秋、刘芬、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里秘密举行会议，成立了武汉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次会上，讨论了上海发起组拟订的党纲草案，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研究了发展组织的问题，选举包惠僧为小组负责人，陈潭秋分管组织，并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五号为小组机关，门口挂“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作掩护。

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后，以小组成员为骨干，团结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二十多人。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带领下，还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即 S. Y. ），

吸收大中学校的先进青年二十多人参加，由陈潭秋负责。他以团员为骨干，在各校建立了读书会，组织师生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入门》等书刊。在这些组织每周一次的集体活动会上，陈潭秋经常作报告，进行辅导，传播马克思主义。正如董必武所说的：为创办武汉中学，“潭秋出了很大的力”<sup>①</sup>，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后，“潭秋一参加党就拼命干。湖北党的工作主要是他负责。”<sup>②</sup>

一九二一年二月，陈潭秋、恽代英、黄负生等人发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由黄负生、刘子通、李伯刚先后任主编，每逢星期六出版。《武汉星期评论》以改造教育和社会为宗旨，反对尊孔读经，倡导民主和科学，宣传妇女解放，鼓吹劳工运动。陈潭秋的重要文章《读公平先生通讯的感言》、《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五一”底略史》等，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这一年，他还和倪季端等共同创办了共进中学，并在该校兼职。此外，他还先后在湖北女子师范和高师附小兼课。由于陈潭秋努力工作，“所以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sup>③</sup>。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会上，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英语讲话时，陈潭秋听得很出神，并不时给坐在旁边的董必武转译讲话的内容。在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纲党章以及发展组织等问题时，陈潭秋都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

---

①②③ 《董老忆潭秋》，《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 页。

见。他每次的发言虽然不长，但意见都比较中肯。他主张坚持与军阀政府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对待孙中山的态度问题时，代表们发生了争论，陈潭秋主张应将北洋军阀政府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区别对待。多数代表赞同他的见解，会议确定了如下的方针：“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有批评的有区别的对待。但他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sup>①</sup>会议期间，陈潭秋还同各地代表联系，交换意见。他认为：“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更为重要，更为深入。”

大会结束后，陈潭秋回到武汉，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革命斗争。

### （三）

一九二一年冬，中共武汉区委正式成立，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从事学生运动。

当时湖北教育界被封建守旧的“两湖派”和“经心派”所把持，极力主张尊孔读经，严禁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湖北女师就是一个封建堡垒。这个学校的校长王式玉是一个封建学究。他不准学生外出，规定学生放假回家和返校必须家长接送，禁止学生剪短发、读新书报、自由通信，更不准学生过问社会、政治问题，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活象一个修女院。

---

<sup>①</sup>陈潭秋：《回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到女师任教后，在课堂上选讲《向导》、《新青年》上的重要文章和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新文学作品，启发学生的思想；帮助进步同学组织妇女读书会和妇女运动大同盟，广泛吸收女校学生和中小学女教师参加。陈潭秋经常给这些团体讲课、辅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说：“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十月革命，就等于瞎子、聋子，找不到出路！”<sup>①</sup>他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强调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革命理论。在女师的一次读书会上，他针对有人脱离实际去死扣名词概念的倾向说：“一个革命党人，他应该掌握革命的理论。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才来学习理论的。我们学习它，是为了要用它，用它来救我们的国家，来救受压迫的劳动人民。”<sup>②</sup>由于陈潭秋等的耐心教育和引导，女师学生中涌现了徐全直、夏之栩、袁溥之等一批敢于读新书、剪短发、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的进步学生。校长王式玉气急败坏地向湖北督军肖耀南告状，污蔑进步学生是什么“仇父非孝之言忍心倡导，共产公妻之说信口聾谈。”并公然解聘刘子通，而以增加钟点的聘约企图拉拢陈潭秋。对此，陈潭秋十分愤慨地对学生们说：“我不在乎多教四点钟的英文，甚至我不在女师教书也行。刘子通被无理解聘，我们不能不据理力争。刘子通如果解聘，就是否定了学生的正义要求，就是助长了黑暗统治的气焰，我们不能向反动统治屈服！”<sup>③</sup>

在陈潭秋鼓励下，徐全直、夏之栩等发动全校同学举行

---

①②中共中华路中学支部：《斗争业绩有光辉》，1978年12月28日《长江日报》。

③包惠僧：《回忆陈潭秋烈士》，《回忆陈潭秋》第27页。

请愿罢课，示威游行，并包围校长室，与王式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陈潭秋又发动武汉学联组织各校支援，震动武汉三镇的女师学潮爆发了。这场斗争持续了八个月，最后，反动当局不得不以“办学无方”将王式玉解职。至此，女师“学潮”就这样以王式玉被驱逐而宣告结束。“经心派”的这个顽固据点终被突破。

在女师学潮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省立一师、高师等校学生也先后赶走了反动、守旧的校长，使没落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陈潭秋在领导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同时，又积极参加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早在武汉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之前，陈潭秋就以记者身份经常深入工厂，调查工人疾苦，组织工人识字班，进行革命宣传；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第八期《新青年》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发表了《汉口苦力状况》、《武汉五局工人状况》两篇调查报告。武汉区委成立后，陈潭秋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并将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铁路工人多，又比较集中的江岸。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并且非常注意挑选和培养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带头人，著名工人领袖林祥谦就是他和当时武汉区委负责人包惠僧一起培养起来的。林祥谦是江岸机器厂的青年工人，苦大仇深，有正义感，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当陈潭秋从项德龙（项英）的汇报中了解了林祥谦的情况后，便多次找林祥谦促膝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很快把他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来。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林祥谦、项德龙等工人领袖的带动和组织下，江岸工人俱乐部在刘家庙正式成立，林祥谦被选为俱乐部五干事之一。同年秋，江岸工人俱乐部改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林祥谦被选为分工会委员长。

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是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陈潭秋参与领导了这次罢工斗争。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陈潭秋等率领武汉各界代表团及一个乐队前去参加。成立大会遭到了吴佩孚的无理阻挠与破坏。为了更好地与军阀吴佩孚的破坏作斗争，京汉铁路总工会移至江岸办公，于是江岸成为党领导京汉全线总罢工斗争的中心。中共武汉区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指派陈潭秋、林育南等参与领导和协助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公处的工作。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开始。陈潭秋等发动武汉的工团、大中学校学生以及新闻界、妇女界声援罢工斗争。各界代表组成慰问队，络绎不绝地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

二月六日，武汉十八个工团和学联的队伍在陈潭秋、林育南和许白昊等率领下，齐集江岸召开了声援罢工斗争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二月七日，军阀吴佩孚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反动军警围攻江岸俱乐部办公室时，陈潭秋机警果敢地指挥夏之栩等人巧妙地撤退到安全地带，他自己却一直坚持到深夜。

“二七”罢工失败后，陈潭秋等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为了保存力量，党把陈潭秋等一批已公开身份的干部调离武汉，派往安源等地。

一九二三年夏初，陈潭秋来到安源，同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从事安源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兼安源路矿俱乐部代理窿外主任和教育股副股长等职。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潭秋出席了党的“三大”，并在会上作了京汉铁路“二七”

惨案的报告，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他的报告对与会代表正确评价“二七”罢工的伟大意义和影响，对分析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对大会确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起了一定的作用。大会结束后，陈潭秋仍回安源。

陈潭秋十分重视对工人和工人子女的教育，并且认为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是党教育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好形式。他在安源任教育股副股长期间就狠抓了这方面的工作。不久，工人子弟学校便由三个增加到八个，学生由数百人增加到二千多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的工人也由六百人增加到一千多人，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密切了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为安源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为了教育工人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鼓舞工人的斗志，陈潭秋在一九二四年“五一”节前夕，编写了一首《五一纪念歌》，歌词是：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百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sup>①</sup>！

---

<sup>①</sup>转引自《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5页。

这首歌在安源的学生和工人中广为流传。这一年安源工人、学生在“五一”游行时，就是高唱着这首雄壮的《五一纪念歌》阔步前进的。

#### (四)

一九二四年秋，陈潭秋从安源回到武汉，组建中共武昌地委并担任委员长职务。这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中国大革命正走向高潮。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发表文章，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低估了农民的力量，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自愿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还错误地把国民党右派当成左派。针对陈独秀的右倾观点，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和陈潭秋等都先后著文，进行尖锐批评。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第五十九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陈潭秋撰写的《国民党底分析》一文。这篇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国民党的历史、现状和本质，指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本是各阶级联合组织的政党。因各阶级底经济背景不同，故其阶级性也必然不同，所以党内分出派别，是必然的现象”。他认为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派：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的左派，“最富于革命性”，他们“主张用民众底力量以实现国民革命，不与任何反动势力妥协”；代表中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中派，“最富于妥协性”，“他们也能看清革命的正当途径”，但却“屈服于右派包围之下，时与反动势力妥协”；代表



军阀、地主、买办阶级的右派，“最富于反革命性”，“他们大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的军阀以图存”。这样，陈潭秋就指明了应当依靠谁、争取谁和反对谁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错误。

一九二五年一月，陈潭秋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为贯彻党的“四大”精神，陈潭秋返回武汉后，一面用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来开展武汉地区的统战工作，一面加强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领导，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他协助董必武、宛希俨等创办了《楚光日报》，他自己也参加社论委员会工作，宣传党的主张，抨击反动军阀，发动工农斗争。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武汉的六月屠杀<sup>①</sup>，陈潭秋等多次组织罢课、讲演和游行示威，使“全埠震动，民气之盛，不可一世。”<sup>②</sup>在陈潭秋的协助下，湖北许多县、区相继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党部。一九二五年七月，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委员长，陈潭秋任组织部长，钱亦石（介盘）任宣传部长，陈荫林任农民部长。组织部在陈潭秋主持下，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到该年十月，湖北全省一千八百七十七名国民党员中，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就有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占总数的

---

<sup>①</sup>指 1925 年 6 月 11 日 英帝国主义分子在汉口用机枪扫射工人群众，当场死数十人，重伤 30 余人，轻伤不计其数。

<sup>②</sup>若愚：《汉口屠杀案之真相》，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85 页。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大多数县区党部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手中，为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主力出师北伐。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层革命民众巩固统一战线，采取各种方式支援北伐。为配合北伐进军培养地方干部，陈潭秋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在武昌秘密举办了北伐宣传训练班，他既是负责人，又是主要教员。八月，北伐军先头部队进抵湖南岳州（今岳阳），陈潭秋立即分派训练班学员到鄂南各县，进行发动农民组织自卫军，策动敌军归附北伐军等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军进抵武汉前，湖北成立了接应北伐军的特种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席，陈潭秋等人参加。当时董必武以国民党革命派面目公开在汉口等地活动，陈潭秋则在武昌坚持秘密斗争。

九月初，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包围了武昌。驻守武昌的北洋军阀陈嘉谟、刘玉春率部万余人，企图负隅顽抗。为避免革命力量遭受损失，陈潭秋及时地把许多同志转移到汉口，自己却和一部分党员留在武昌，作北伐军攻城的内应。北伐军围城达四十天，城内百姓粮食断绝；陈嘉谟等又指使匪兵疯狂捕杀革命党人，四处抢掠群众财物，搞得人心惶惶，恐怖异常。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陈潭秋坚守岗位，一面领导群众寻找各种代食品，以安定民心，鼓舞斗志；一面组织群众贴标语，散传单，揭露军阀罪行并策动敌军起义，为配合北伐军攻城，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担任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武汉地方党组织和陈潭秋这一时期的工作，曾作了热情的赞扬。周士第说：“董必武同志在汉口领

导对敌斗争，陈潭秋同志在武昌城内领导对敌斗争，对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武昌城里的敌军中有些士兵和军官愿做我军攻城的内应，给我军攻城创造了条件。”<sup>①</sup>

十月十日，北伐军对久围的武昌城发起总攻。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在通湘门附近架起梯子首先登上城头，冲向蛇山；城里的起义军也发动了向敌城防司令部的进攻。此时，陈潭秋发动群众，在大油桶内燃放鞭炮惊吓敌人。敌军在我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下土崩瓦解，北伐军胜利攻克武昌，陈嘉谟、刘玉春等万余人全部被俘，无一漏网。

北伐的胜利进军，使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武汉成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这时，陈潭秋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长。不久，由于江西方面工作的需要，陈潭秋于一九二七年一月调到南昌，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江西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除了抓紧统战工作外，并举办党员培训班，培养领导骨干；协助省农会秘书长方志敏，培养农运干部。同年四月，陈潭秋又被调回武汉，仍任湖北区委组织部长职务。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也日益严重。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潭秋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五月间，夏斗寅、许克祥等反动军官，相继在湖北、湖南发动叛乱，江西的朱培德也

---

<sup>①</sup>周士第：《北伐先锋》，《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84页。

趋向反动，在汪精卫集团控制下的国民党党政领导机关，则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担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既不记取党的“五大”对他所犯的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的批评，也不执行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指示，却完全接受国民党所颁布的“训令”，竟然诬蔑农民的革命行动是“过火”行动。在此紧急时刻，陈潭秋奔走呼号，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批评党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六月，他在国民党武昌市党部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演说。他说：“现在革命又到了生死关头，所以唯有更亲密的合作才有出路。近两日内，湖北农民被反动势力惨杀的不下数千人，他们的出路是希望革命党援助。如党袖手旁观，则民众将渐次离开党，而革命党前途毫无希望。所以，必须扶助民众力量，领导民众。”<sup>①</sup>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武昌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陈潭秋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词，以铁的事实驳斥国民党右派的所谓“农民运动搞糟了”的反革命论调。他指出：“自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大小军阀与土劣及一切反革命派勾结，到处屠杀农民”，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农工阶级利益的，中国自有农运以来，共产党即与之共生死。在这次农民被土豪劣绅大屠杀中，共产党员牺牲的不下三百余人，由此可见，共产党员是与农民共生死的。”<sup>②</sup>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畏缩，誓本革命初衷，与各农友携手前进，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sup>③</sup>陈潭秋的讲话，鼓舞了农民的斗争意志。大会发表宣言，庄严宣告：“此刻决不是退让的时

---

<sup>①</sup> 1927年6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

<sup>②③</sup> 1927年6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

候，而是要整齐我们的步伐，向敌人予以猛烈进攻！”<sup>①</sup>

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错误，革命危机更加严重。七月十日左右，张太雷、陈潭秋等主持召开了武汉地区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布置了应变措施，决定已公开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有的去苏联，有的去九江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留下坚持地下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地区进行疯狂的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面对血雨腥风的严重局面，陈潭秋无所畏惧，他机警沉着地安排好同志们撤退后，自己也安全撤出，根据党的指示前往江西，投入新的斗争。

## （五）

七月中旬，陈潭秋在武昌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之后，肩负着配合即将在江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的重任，同他的八弟陈荫林等一起，登上一只大木船顺江东下，去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路过团风镇时，陈潭秋与陈荫林上岸召集黄冈县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参加起义和转入地下斗争等事宜。当晚又与陈荫林和黄冈县委的干部陈学渭、胡亮寅等，继续乘船东下，直抵南昌。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江西新省委成立，由陈潭秋任书记。根据中央决定，新成立的江西省委不公开参加起义，以便坚持地下斗争。省委设在一个小酱园坊徐姓老夫妇的家里，徐老夫

---

<sup>①</sup>1927年6月22日《汉口国民日报》。

妇的儿子、儿媳都是共产党员。这时陈潭秋化名徐国栋，省委宣传部长宛希俨化名徐国梁，秘书徐全直等都扮作徐家眷属，以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sup>①</sup>。

八月一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八月五日，起义部队相继南下后，朱培德反动军队疯狂反扑，形势十分险恶。陈潭秋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大力恢复、整顿各级党组织，准备秋收暴动。他工作有条不紊，指挥得当，短短两个多月就收到了显著成效。到一九二七年年底，在九江、鄱阳、永修、吉安、临川、赣州、靖安、修水、余干等十余县成立了县委，在宁冈、弋阳、横峰、乐平、瑞昌等地建立了特别区委，党员发展到二千五百多人。省委还制定了专门工作计划，以加强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领导，使江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作也走上了正轨。

一九二八年春，陈潭秋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奉调到党中央工作。同年六月，党中央派陈潭秋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前往顺直检查工作。七月，陈潭秋到达天津后，召集了顺直省委常委、省委扩大会，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省委和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八月，陈潭秋圆满地完成了巡视任务离开天津返回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在顺直巡视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整顿北方党的组织，一九二八年十月，党中央派陈潭秋再次去天津。行前，“李立三交待说：‘六大’已经结束了，周恩来同志不久就会回国。由他来天津召开北方党的代

---

<sup>①</sup>黄慕兰：《潭秋同志在南昌起义前后》，见《回忆陈潭秋》第66—67页。

表会，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组织，你们先去筹备。”<sup>①</sup>陈潭秋与徐彬如等到达天津时，中央已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以“潭少连”名义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为了筹备顺直省委扩大会议，陈潭秋、刘少奇、徐彬如等先阅读了大量下面送来的工作报告；然后又分别深入保南、保北、唐山、北平等地了解情况，并在陈潭秋的主持下，创办了党内刊物《出路》。陈潭秋为《出路》创刊号写了发刊词，第二、三期仍有他的文章；周恩来（笔名伍豪）、刘少奇（笔名肇启）也都分别在《出路》上发表过重要文章<sup>②</sup>。这份刊物对北方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十二月，周恩来取道上海到天津。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传达“六大”精神。政治报告中吸收了陈潭秋肯定“北方党有基础”<sup>③</sup>等意见，通过了陈潭秋主持起草的《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等决议案，并组成了新的顺直省委（即北方局），韩连惠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为了贯彻会议精神，会后不久，陈潭秋等即分头下到基层工作。

一九二九年七月，陈潭秋被调回党中央。当时由于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青岛（包括山东）和满州（东北三省）等地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党中央决定派得力同志前去巡视，加强工作。陈潭秋又肩负重任，兼程北上。

八月十九日陈潭秋抵青岛时，设在青岛的山东省委已被破坏。反动当局连日实行特别戒严，省、市委的工作“一切都陷

---

<sup>①②③</sup> 徐彬如：《陈潭秋同志战斗在顺直省委》，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7、389页。

于停顿状态”<sup>①</sup>。陈潭秋日夜奔走，与市委取得联系，传达了中央指示；组成了临时省委并改组了市委，又向临时省委和改组后的市委传达了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策略和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党组织的恢复和中央指示的传达，为青岛和山东的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打下了基础。这期间陈潭秋由于劳累过度，脑病复发。二十五日下午参加市委会议时，陈潭秋就觉得头晕得厉害。他抱病坚持参加到底，而且在市委会议结束后，又连夜出席了临时省委会议，直到二十六日凌晨四点半钟。在这两个会议上，他边吃药边作报告和参加讨论，给到会同志很大鼓舞。就在二十六日那天，他又带着有病的身体离开青岛，登上开往大连的海轮，前往满洲巡视。

八月底，陈潭秋到达沈阳。这里的形势也十分险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等人已于八月二十二日被捕。陈潭秋不顾身体有病、旅途劳累和环境艰险，立即开展工作。他首先找省、市委传达了中央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决定和二中全会精神，接着亲自到哈尔滨市了解情况。陈潭秋与满洲省委派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的孟坚等一起组建了哈尔滨新市委，总结了前段工作，并且规定了哈尔滨市委的工作路线：加紧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抓住职工运动这个中心，把日常斗争与目前总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在党内一方面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取消观念的发展，同时也要防止急性病的倾向。九月二日，他向中央写了巡视满洲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在分析了满洲的政治形势之后，着重指出：帝国主义想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但它们首先争夺的是中

---

<sup>①</sup>陈潭秋给中央的《巡视青岛总报告》。（1929年10月18日）。



国的东北。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陈潭秋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途经大连返回上海。

陈潭秋回到上海后，被调到中央组织部接替恽代英任秘书，协助组织部长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中央组织部设在上海成都北路爱文义路小菜场旁边一个里弄内，任务是同各省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接谈，向他们传达中央指示；接待大革命失败后来自全国各地失去组织联系的同志，审查和解决他们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分配等等。陈潭秋到任后，不仅经常和部长一起研究问题，还和部里其他同志一起讨论工作。他帮助同志循循善诱，听取意见虚怀若谷，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还就党的组织和苏维埃运动等问题撰写文章，在党内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在《党与苏维埃的关系》一文中，陈潭秋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而“苏维埃是工农群众的政权机关”，“党不能代替苏维埃”，苏维埃的工作不能“由党命令或包办”<sup>①</sup>。正确阐述了党和苏维埃的关系，反对了党政不分和命令主义倾向。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陈潭秋也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八月底，陈潭秋被派往沈阳，任满洲总行委书记兼组织。这期间，他写的一些文章中，对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错误估计。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陈潭秋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

---

<sup>①</sup> 1930年5月《党的生活》第9期。

他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sup>①</sup>。会后，他返回满洲纠正“左”倾错误，开展党的工作。

十月初，陈潭秋化名孙杰到达沈阳，住在沈阳北市场烟厂附近的民房里。十一月十六日，他和原临时省委负责人林仲丹（即张浩）、杨一辰等一道，在奉天召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并作出了停止暴动的飞行集会，以及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满洲省委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满洲省委，由陈潭秋任书记，林仲丹任职工委员会书记，王鹤寿任团省委书记。

陈潭秋在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紧密联系实际，认真检查了自己在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一些错误言论。他带头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指出过去对满洲革命形势作了主观的估计，错误地认为满洲形势是“武装暴动的前夜”，或“十分迫近高潮的形势”，而忽视了满洲与中国南部的区别，以及满洲内部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在策略上犯了“左”的冒险的错误。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尤其使那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迅速克服了顶牛、恐惧情绪，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贯彻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危害，明确了满洲省委今后的方针，通过了《满洲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及工作路线》、《满洲政治讨论结论》两个重要文件。新的满洲省委在陈潭秋的带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便使遭到破坏的奉天市委、北满特委和延吉、磐石、柳河、清沅县委以及抚顺、大连、台安、长春特支等十多个地方组织得到恢复，并新建了四十多个地方组织，

---

<sup>①</sup> 《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79页。

党团员由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两千余人，从而使满洲地区的工作走上了正轨。

十二月初，陈潭秋偕同团省委书记王鹤寿到哈尔滨，了解北满工作情况，布置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的活动。十二月七日下午，陈潭秋、王鹤寿、孟坚、葛凤鸣等七人在北满特委书记孟用潜家开会时，被敌人发觉，包围了住宅。陈潭秋见已无法脱身，便沉着镇定地向同志们叮嘱道：“要坚持我们的立场！”

陈潭秋等人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被捕后，先关押在警察厅，不久又转到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敌人曾施用各种刑罚，但陈潭秋等坚贞不屈，没有一个人动摇。由于敌人在孟用潜家搜到了没有完全清理净尽的文件，所以尽管他们没有口供，仍被判了徒刑，孟用潜作为“房主”，判刑七年，陈潭秋、王鹤寿等判刑四年。

陈潭秋在狱中，“立场坚定，对党无限忠诚”<sup>①</sup>。他领导难友们，“通过各种途径与狱外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狱中的情况经常向党报告，狱外的情况党又经常派交通传送进来。”<sup>②</sup>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参加罗章龙“非常委员会”的唐宏景（一九二八年曾任满洲省委书记）被捕，同陈潭秋、王鹤寿等关押在一起。陈潭秋领导狱中同志，在批判罗章龙错误的同时，对唐宏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热情的帮助，使唐宏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立即退出“非常委员会”。

---

①②王鹤寿：《陈潭秋同志在东北狱中》，《回忆陈潭秋》，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8 页。

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买通了当时的哈尔滨伪军司令于琛激，陈潭秋等人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全部获释出狱。

陈潭秋出狱后，回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这时，轰轰烈烈的淞沪抗战已被蒋介石出卖。陈潭秋发现有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对形势认识不清，情绪低落，就引导他们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认清形势。他指出：“上海抗战是有成绩的，尤其是工人组织起来了，与十九路军配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日寇终究没有能够占领上海。教训是我们在军队里面的人少了，特别是在军队下层做工作的人太少，所以蒋介石一投降，我们的工作就支持不住。”<sup>①</sup>他还说：“今后我们的工作要转变到秘密状态，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继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要扩大统一战线，除了工人以外，职员、教员、学生都要联合，因为抗日要有广大的队伍。同时，斗争要注意策略，每次罢工在取得一定胜利时，就要适可而止。”<sup>②</sup>在陈潭秋等人的领导下，上海、苏州、无锡一带纱厂、丝厂的女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胜利的罢工斗争，上海党组织也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使抗日民主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在上海疯狂捕杀共产党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向中央苏区迁移，并决定陈潭秋等也到中央苏区工作。陈潭秋离去后，他的夫人徐全直在上海不幸被捕。徐全直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狱中受尽酷刑，但她坚贞不屈，翌年一月，壮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

<sup>①②</sup>帅孟奇：《在潭秋同志指导下的上海女工运动》，《回忆陈潭秋》第84页。

## （六）

一九三三年初夏，陈潭秋和谢觉哉结伴，扮成商人，乘船离开上海，取道广东汕头，前往中央苏区。这时候，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上遍设关卡。一天，他们行至广东大埔以北的粤闽两省交界处，被敌人的搜山队冲散了。谢觉哉在一个山洞里过了一夜，陈潭秋在一处悬崖下蹲了一宿。后来还是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才得以会合，进入苏区。

陈潭秋到苏区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校党委委员并兼任教员。那时，从上海迁入苏区不久、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的临时中央，排斥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在苏区大反所谓“右倾”，并借此撤换了一大批干部，把他们调到党校“学习”。这些学员思想不通，心情苦闷。陈潭秋就和他们一起散步谈心，引导他们想革命大局，给他们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sup>①</sup>。

不久，陈潭秋调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委当时设在长汀，管辖长汀、连城、龙岩等闽西十一县。陈潭秋到长汀后，主要任务是扩大红军，征集粮食，支援前线。他对这些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头戴蓝布帽，脚穿旧草鞋，深入在群众之中，检查、督促、指导基层工作，很少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

一九三三年十月，陈潭秋在汀州主持召开的福建省党代会

---

<sup>①</sup>罗明：《忆潭秋同志在瑞金中央党校》，见《回忆陈潭秋》第89页。

上，进一步强调了扩红和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在省委领导下，他集中抓了三次大的扩红运动，每次他都亲自深入县、区抓点，总结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头两次取得了显著成效，长汀、连城、兆征、代英等县踊跃参军的青年，整团整团地编入主力红军，开赴前线。最后一次由于根据地逐渐缩小，加上时近年关，没有能完成上级规定的扩红数字。陈潭秋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福建的情况，但却被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斥为“右倾”，并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将陈潭秋调离福建省委。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瑞金召开。陈潭秋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保证红军的粮食供应刻不容缓，粮食人民委员部正是为此而新设的。陈潭秋到职后，立即着手组织粮食部和各县、区粮食局，并紧急动员群众参加春季筹粮突击运动。经过陈潭秋和粮食工作人员的辛劳奔波，春季筹粮任务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为了支持反“围剿”战争，党和政府发起了筹集二十四万担粮食的运动。陈潭秋自始至终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先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为迅速完成二十四万担谷子而斗争》和《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等文章。在《为迅速完成二十四万担谷子而斗争》一文中，陈潭秋提出了筹粮运动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并号召：“战争是愈加紧张了，红军是空前扩大了，红军给养的保证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同志们！时间是迫促了，不能容许我们一刻犹豫了，千百倍的

努力为迅速完成与超过二十四万担粮食而斗争！”<sup>①</sup>由于陈潭秋领导有方和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革命战争，所以，到秋收以前，就超额完成了这次筹粮任务。陈潭秋在《二十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中称这是“我们粮食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征粮的同时，中央政府还号召干部节约粮食支援前线，在机关干部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运动。粮食部首先响应，陈潭秋以身作则，从自己每天十四两米（每斤十六两制的老秤）口粮中节约二两。每到开饭时，他还将自己的饭拨给饭量大的同志吃。陈潭秋以实际行动影响干部，使节粮支前运动收到很大成效。二十四万担粮食任务完成后，陈潭秋不失时机地提出秋收后收集一百万担粮食的战斗任务。在秋收后的筹粮运动中，由于领导得法，如长胜县在短短五六天中就收粮五万七千多担，瑞金县在十一天中就收粮六万四千多担。在征粮工作中，陈潭秋要求各级征粮机关建立严格的账目，防止贪污；制定细心保管、拉运，避免霉烂、老鼠偷吃和敌人抢粮等有力措施，使收集来的粮食，妥善地迅速地运送到红军作战前线，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而失利，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在主力红军转移前夕，要给部队准备五至七天的粮食。短时期内要筹集几十万斤谷子，并把它碾成米，困难很大。但陈潭秋带领群众夜以继日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安排这批已经筹集好的粮食时，他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解决红军长征要携带的粮食，同时也要给留下的部队准备好粮食，还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我们应有这

---

<sup>①</sup> 《红色中华》第214期，1934年7月14日。

个通盘考虑！”<sup>①</sup>照顾得十分周到。

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潭秋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 （七）

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分局，领导留下的四万多红军和地方部队继续坚持斗争。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等组成，项英任书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项英不采纳陈毅等向边界突围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中央根据地的县城全部陷落。遵义会议后，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苏区的问题，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作出了《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附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苏区中央分局收到了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后，立即开会研究。这次会议接受了陈毅、陈潭秋等的正确意见，决定兵分九路，突围到闽赣、闽西、闽南、赣南、湘南、赣粤、湘赣等边界山区进行游击战争。陈潭秋以中央分局特派员身份和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加强营，由瑞金西南向上杭西北突围到永定和张鼎丞部会合，在闽西南开展游击活动。

陈潭秋率领部队由瑞金出发，翻过武夷山，来到四都，会合了邓子恢部。接着向上杭、永定挺进。当时的闽西，敌人有九个师，加上地方反动武装，约十万人。部队一路上被敌人围追堵截，战斗异常激烈，营长光荣牺牲，陈潭秋跌下悬崖，头

---

<sup>①</sup>吴黎平：《人民的好粮食部长》，见《回忆陈潭秋》第103页。



部和右耳都负了伤。后来，部队分两路行军，在丛山峻岭里与敌人激战二十多天，才在永定境内重新会合。一天拂晓，部队驻地突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情况万分危急，有些同志惊慌失措。陈潭秋镇定地对大家说：“共产党人是铁打钢铸的，即使遇到天大困难，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一定要活着冲出去！”他和谭震林、邓子恢立即开会商量，决定由谭震林带领大部队突围，他带一个警卫班坚守阵地，进行掩护。战斗打响后，陈潭秋连发几枪，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敌人越逼越近，陈潭秋在崖石后来回指挥，坚持抵抗，直到警卫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我突围部队已经脱离险境，他才从悬崖上滚了下去，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敌人一无所获，只得退走。不久，陈潭秋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张鼎丞的部队，他们又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底，陈潭秋在福建省永定县上溪南区赤寨乡召开了闽西南地区党政军代表第一次会议。他代表中央分局，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分局的决定。在分析闽西南的形势和任务时他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对革命人民的猖狂反扑，并不说明敌人的强大，相反，只会更加激起广大工农群众对反动派的仇恨。只要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紧紧依靠苏区群众，开展全面游击战争，我们就一定能打垮反动派的进攻，使苏区逐渐恢复起来，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分局决定，结合闽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党在闽西南的基本任务：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和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和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的安全与团结；在有利时机到来的时候，从局部恢

复小片根据地到大面积恢复发展根据地，以开展新的局面。同时，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方针。最后，会议根据陈潭秋的提议，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闽西南党、政、军的领导。张鼎丞被推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一九三六年一月第二次会议后又被选为副主席），温仰春为秘书长。从此，闽西南的游击战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得到蓬勃发展<sup>①</sup>。

鉴于陈潭秋身负枪伤，久治不愈，组织决定他到上海医病。

一九三五年七月，陈潭秋到达上海不久，接到了党中央派他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八月初，他取道海参崴去莫斯科，同行的有陈云、杨之华等七八人。“从上海动身，秘密地乘一艘苏联客船到达海参崴。在海参崴登陆后，苏方为了掩护我们，由他们的公安人员持枪装着押送走私犯的样子，把我们押送到海参崴公安局。在公安局，我们都换上了西装。休息两天后，即乘火车赴莫斯科。”<sup>②</sup>

陈潭秋一行约八月二十日左右到达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而少共国际第六次大会正在举行。于是陈潭秋就参加了少共“六大”中国青年团领导小组的工作。会后，奉命留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sup>③</sup>。

---

①温仰春：《转战赣南闽西》，见《回忆陈潭秋》第117页。

②陈云：《回忆与陈潭秋同志同赴苏联》，见《回忆陈潭秋》第118页。

③孔原：《潭秋同志在莫斯科的日子里》，见《回忆陈潭秋》第119—120页。

在列宁学院研究班里，陈潭秋带病坚持学习。他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语，并与陈云等一起，给东方大学学员讲课。在讲中国革命史课程中，有时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受学员们欢迎。

陈潭秋是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经常参加代表团领导成员的会议。他旗帜鲜明，从不随意附和王明等人的错误意见。他待人热情，诚恳谦虚，平易近人，不象王明、康生那样，摆领导架子，装模作样。

一九三八年二月，任弼时来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陈潭秋协助任弼时做管理干部的工作。他对国内或苏联各地来莫斯科的所有中国同志，从学习、工作，到食宿、疾病治疗等，都十分关心，他还经常到“国际儿童院”去看望孩子们。

陈潭秋在莫斯科期间，还根据国际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撰写了许多文章，用徐杰或余杰的笔名发表在《救国时报》、《全民月刊》、《共产国际》等报刊上；也为苏联报刊撰写了一些介绍中国革命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七月，陈潭秋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撰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他以亲身的经历叙述了党诞生的经过，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伟大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引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中国共产党。”<sup>①</sup>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的一份珍贵文献。他还在莫斯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讲

---

<sup>①</sup>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见《楚晖》第1辑。

话，热情颂扬了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年的艰苦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胜利。他指出：“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为执行革命政策而奋斗的伟绩”<sup>①</sup>。陈潭秋还到东方大学“八部”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战员讲课，他收集了抗联的许多英雄事迹，并与人合写了《悼东北抗日烈士夏云杰、陈荣玖、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诸同志》的纪念文章，辞意激昂悲壮，感人肺腑，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

陈潭秋在莫斯科四年期间，一方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同时又大力宣传我党的光荣斗争历史，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受到我党许多同志的热烈称赞。

## （八）

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潭秋奉命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停留。七月，党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工作，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在新疆仍化名徐杰，人们叫他“徐先生”，住在迪化南梁第三招待所（即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从此，他肩负重任，投入了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

抗战初期的新疆，仍在地方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下。盛自一九三三年夺得新疆边防督办的大权以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

<sup>①</sup>陈潭秋：《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64—65页。

伪装进步，挂起了“亲苏”“拥共”的招牌，标榜所谓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藉以笼络人心，骗取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为了团结新疆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建设抗战大后方，保持新疆这条国际援华交通运输线的畅通，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并应盛世才的邀请，自一九三七年起，陆续派出一批干部和党员到新疆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黄火青任“反帝会”秘书长。哈密、和田、喀什等地的行政长（相当于专员），新疆日报社及一些分社的社长、编辑长等要职，也都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这些同志先后在我党代表陈云、邓发和陈潭秋的带领下，团结新疆各族人民，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整顿了财政金融，兴办了工矿企业，改善了公路交通，扩大了对内对外贸易，促进了农牧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我党党员通过《新疆日报》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全疆政治性群众组织“反帝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捐献运动，为前方募集寒衣。一九三八年九月，曾将捐款购买了“新疆号”战斗机多架送往抗日前线，并将皮毛、药品以及枪枝弹药等运往延安，支援八路军抗战。经过陈潭秋、毛泽民、黄火青和林基路等我党党员的辛勤工作，新疆的政治日益走向进步，经济、文化建设得到较大的发展，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内地的进步人士，知名学者，如杜重远、茅盾、张仲实和赵丹等人，也都千里迢迢来到新疆讲学、办报和开拓文艺事业。当时，人们称新疆为“第二延安”。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对此，

盛世才则感到十分恐惧。

陈潭秋来到新疆时，正当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嚣张一时，国内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投降活动不断发生。在新疆的盛世才集团也开始恶化了和我党的关系，从一九三九年起，就连续发生排斥、打击和陷害共产党人的事件。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新疆日报》在报道迪化女中话剧比赛的消息时，将督办的“辦”字误印为“辨”字，该报发现后，主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作了更正。而盛世才却借故大发雷霆，给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及编辑、校对等几名共产党员以记过罚薪的处分，妄图降低我党在新疆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在这种逆转的形势下，与盛世才这个“土皇帝”搞统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然而，陈潭秋遵照党中央指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机智勇敢地领导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为民族生存，为抗战大业，同盛世才进行了巧妙灵活的斗争。陈潭秋首先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抓紧“新兵营”的训练，为抗日前线输送人才；另一件是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增强我党的战斗力量。他到职之初，就背着自己简单的行李来到迪化东门外的“新兵营”。“新兵营”是由红四方面军与红五军等在长征中组织的西路军转战到新疆后留下来的四百多名红军指战员组成的。盛世才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同意我党要求，将西路军迎来迪化，但他又害怕红军影响的扩大，改名为“新兵营”。“新兵营”编为一个总队，下设干部支队和四个大队，分别学习语文、政治、炮兵、坦克、装甲、汽车、医务、无线电等科学技术。陈潭秋来到“新兵营”驻地后，就和邓发以及“新兵营”的总队长饶子健、参谋长苏进、

政治处主任曾三等一起，对野营训练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并亲自察看地形地物。他和“新兵营”里的战士们打成一片，在课堂上或救亡室（即俱乐部）里，在宿营地或练兵场上，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关心战士，经常与他们促膝谈心。他还经常深入伙房，帮助炊事员工作，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大家称他是“新兵营的老战士”。九月底，野营训练圆满结束，陈潭秋又立即组织“新兵营”全体指战员进行冬季营房学习，并亲自给他们上政治课、党课，讲党的历史。经过野营训练和冬季营房学习，指战员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得到很大提高。

在陈潭秋的带领下，“新兵营”恢复了政治部，十分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发扬军队内部民主，改进领导作风。一九四〇年初，除航空队等部分学员和干部留在新疆坚持学习与工作外，“新兵营”其余三百多名指战员，在陈潭秋的缜密计划与妥善安排下，胜利返回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一环。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分散在天山南北三十一个县，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联系十分困难。陈潭秋便指示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按地区分别成立党小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一九三九年七月，喀什地区的共产党员李云扬、高登榜等成立了党小组；十二月，库车地区的共产党员林基路等也成立了党小组；有的地区只有一、二名党员，就直接与党代表陈潭秋联系。在迪化，党员比较集中，陈潭秋则分别召集财政、报社、学校等部门的党员开会，过组织生活，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和工作。陈潭秋还要求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新疆各族人民。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陈潭秋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召开的纪念会上，讲述了我党二十年的奋斗历史，还给每个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这天，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祝中国共产党二十诞辰》的社论，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七月七日，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为纪念党的诞辰二十周年，在给党中央的贺电中表示：“全体同志一致坚决拥护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实现党的每一个决议与每一项指示而斗争。更加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一切服从党，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抗战的胜利与革命工作的利益。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为实现党的每一任务而奋斗。”

面对复杂的局势，陈潭秋机警、沉着，为维护和改善同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他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会见盛世才时，他总是反复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明只有团结抗日才有前途。他又经常告诫党员：“遇事谨慎，不给反动分子以挑拨的借口”，“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多做”。而对盛世才的投蒋反共，倒行逆施，排斥、打击我党的恶劣行径，则坚决予以揭露。

陈潭秋清醒地看到，新疆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他说：“新省地位无论对国际关系，对中国抗战及对我党都非常重要。”现在“新省政治陷在严重危机中，如不急于挽救，前途颇可危惧。”<sup>①</sup>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他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长达七千字的详细报告，全面分析了新疆政治、经济以及盛

---

<sup>①</sup>陈潭秋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对新省一年来政治情况概略报告》（1940年6月22日）。



世才的特务统治，盛世才制造的所谓“阴谋暴动”案等情况，并提出挽救新疆局势的七点意见<sup>①</sup>。针对盛世才到处制造摩擦，诬陷共产党员的事实，陈潭秋授意林基路，在《新疆日报》上发表文章：《论六出祁山》。这篇文章以事论理，借古喻今，它告诫盛世才，破坏统一战线决不会有好结果。后来，他又让马殊写了《众叛亲离》一文，警告盛世才已走到众叛亲离的边缘，如不悬崖勒马，只会落得象汪精卫那样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为加强对《新疆日报》的领导，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陈潭秋亲自动手修改重要的社论、文章和消息。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陈潭秋接到党中央的通知后，立即以新疆各界人民的名义，起草了抗议国民党反共的通电。他估计盛世才虽然日趋反动，但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还不敢公然撕下伪装，争取他同意发表是可能的。后经交涉，盛世才被迫同意陈潭秋的意见，通电由《新疆日报》发表。在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还根据陈潭秋的指导，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皖南事变经过的谈话》和《朱、彭、叶、项为抗议包围新四军的通电》。此外，对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新疆日报》也刊登了我党的宣言和文章。如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新疆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刊登了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了周恩来《太平洋

---

<sup>①</sup>陈潭秋 1941 年 11 月 6 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战争与世界战局》等文章。这些宣言和文章表明了我党的原则立场与政治主张，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和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

为了保存我党干部，在新疆局势日益恶化的形势下，陈潭秋陆续把我党一批干部送回延安。一九三九年冬，他从“新兵营”抽调了四十多人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一九四〇年夏，这批学员学习期满返回新疆后，陈潭秋即把他们送回延安。接着又将冯铨、曾三、张仲实、沈雁冰、黄火青等送走，使这些人免遭盛世才的迫害。当时有同志建议他也回延安，他说：“中央没来指示，我就不能走。我还是留在这里尽量争取局势向好的方面转化。”

## （九）

一九四二年，国内外形势急剧逆转。德国法西斯侵占了苏联大片国土；日本侵略者为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争基地，集中大部分侵华兵力向我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加紧反苏反共活动，调遣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配合日伪军包围封锁解放区。八路军的兵力减少了，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我解放区和苏联都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时，政治赌棍盛世才认为中共不行了，苏联也靠不住了，便加紧了反苏反共和投靠蒋介石的步伐。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盛世才竟将其亲苏拥共的弟弟、他的王牌军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骥暗杀在家中。六月八日，陈潭秋向党中央报告说：“老四（盛世骥排行第四——引者）做了反苏反共阴谋的第一个牺牲者”；“国民党图新日急，督办有对蒋妥协的可能”；

建议党中央“须作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新的可能的事变。”<sup>①</sup>

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陈潭秋从新华社的广播中知道消息后，就立即行动，领导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进行整风学习。六月，他召开干部会，认真学习整风文件，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精神和整风的办法。七月，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陈潭秋任主任。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有一百十七人，分成六个学习单位；每月出墙报两期，由林基路主编。

由于国民党图新日急，新疆政治形势继续逆转。盛世才派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与蒋介石进一步勾结。党中央对新疆局势十分关注。一九四二年四月，周恩来在重庆电告毛泽东：

“蒋三次召见张元夫，并派张去新疆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五月七日，任弼时将此情况电告陈潭秋，提醒他注意“提防蒋之阴谋”。当日，陈潭秋就给任弼时回电，报告张元夫来新，盛世才派其极端反动的五弟盛世骥代表他陪张同机飞往重庆，暗中缔结默契，蒋介石正加紧夺取新疆，进一步磋商讨价还价的谈判条件。五月八日，中央电示陈潭秋，同意他所提的对新疆和盛世才的方针，同意撤退一部分同志。中央电文指出：“在迪化同志一时既无法回延安，我们决定在迪化组织一调查研究分局，以你为主任。”<sup>②</sup>陈潭秋接中央指示后，对新疆政治、经济等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针对新疆事态的发展，五月二十七日，他向中央报告说：“这两次审判<sup>③</sup>，我们认为有严重的政治意义，是反苏反共阴谋的开始表面化，是扩大反苏反共的

---

①陈潭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去夏以来新疆情况》（1942年6月8日）。

②以上电报原件均存中央档案馆。

③指盛世才所捏造的用以铲除异己、打击进步力量的所谓“反政府阴谋”案和“阿山事件”案，于1941年2月进行“审讯”。

准备步骤。”<sup>①</sup>

鉴于新疆局势的急剧恶化，在整风学习中，陈潭秋特别注重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可能，天山戈壁，插翅难飞，每个同志均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他教育共产党员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革命意志，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郑重指出：“如果我们被捕了，我们要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为榜样，把敌人的法庭变作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讲坛，揭露敌人捏造谣言，诬陷共产党人的罪恶阴谋。”他要大家学习优秀共产党员夏明翰那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英雄气概。他还说：“古时候江西有个文天祥，在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歌中有‘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名句。我们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定然胜过文天祥十万八千倍。”通过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大大增强了在疆共产党员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争取斗争胜利的信心。

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到七月上旬，党中央几次复电给陈潭秋，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但因当时通往延安的交通已被国民党封锁，必须先撤退到苏联去。中央指示陈潭秋可直接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交涉，在苏联回复以前，要制定撤退计划，做好撤退的准备。根据中央的指示，陈潭秋经过周密考虑并和有关同志商量，制定了一个分三批撤退的计划：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一批走，老弱病残和家属、小孩第二批走，他自己和办事处少数工作人员最后走。马明方、吉合等同志不同意他

---

<sup>①</sup>陈潭秋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迪化近来两次审判案情形》（1942年5月27日）。

的这个方案，他们要求党代表第一批走。但陈潭秋坚决不同意，他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sup>①</sup>他还向办事处工作的同志说：“我们要坚守工作岗位到最后。”这是“时穷节乃见”啊！在陈潭秋的组织领导下，同志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有关撤退的准备工作<sup>②</sup>。

## (十)

一九四二年八月底，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飞迪，蒋、盛勾结反苏反共最后拍板成交。于是，盛世才公开撕下伪装，把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全部党员加以逮捕、软禁。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盛世才派军警包围了我党集中驻地八户梁。军警们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请”去，当天下午又把林基路、李宗林等二十多名我党在新疆较有影响的同志也“请”去了。同时又把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病残人员和家属小孩共一百六十余人，全部软禁起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疆事件”。

陈潭秋、毛泽民等第一批被捕的五同志，被软禁在“刘公馆”。第二天，他们的家属也被“请”来软禁在一起。当陈潭秋从妻子王韵雪口中知道了他走后所发生的一切时，气愤地骂道：“这头无耻的狼种猪！”他在打电话质问盛世才的同时，又给盛世才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明确指出：我们是接受你的

---

<sup>①②</sup>吉合：《潭秋同志二、三事》；王韵雪：《忆潭秋同志战斗在新疆》；见《回忆陈潭秋》第161—162、139—140页。

邀请来新疆帮助建设的。我们遵守我党统战政策，严守国法，认真执行“六大政策”，为抗战尽力，忠于国家民族，事实俱在。而你竟以“保护”为名，实行秘密软禁，特提出强烈抗议！望你速速醒悟，仍本着全国各抗日党派、无党派爱国志士仁人团结抗日的原则，将我党在新的全部人员释放，保证人身安全，送回延安。信送出几天了，音讯杳无，陈潭秋又写了一封措辞更加强烈的抗议信，仍然如石沉大海。

陈潭秋在软禁期间，还设法和外面的同志取得联系。他分别写信给张子意及航空队同志，说自己“尚健康”，只是“腿行动不便”，“望你们保持健康”。暗示他已失去自由，鼓励大家坚守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信中还指出“穴内有踪”，要大家提高警惕，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张子意等人得信后，立即改变了原定的组织系统和联络暗号，确定了团结对敌的办法。

不久，陈潭秋被秘密转移到“尤公馆”软禁。这里围墙高筑，戒备更为森严，连房顶也有人把守。他预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便对王韵雪说：“从目前情况看，男同志坐硬牢的可能性更大些。一旦我们入了狱，我估计盛世才对你们可能采取下列措施：（一）仍让你们出去工作，但你们绝不能去工作；（二）不排除也将你们逮捕入牢，如逮捕坐牢，你没有在外边工作过，绝不要暴露自己身份，更重要的是不能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要贞守党的立场；（三）万一释放了你们，你可千万不能去找苏联领事馆，无论如何想尽办法回到延安去，将我的情况和这儿你知道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sup>①</sup>一九

---

<sup>①</sup>王韵雪：《忆潭秋同志战斗在新疆》，见《回忆陈潭秋》第139页。

四三年二月六日，也就是陈潭秋被正式投入监狱的前一天，他乘王韵雪外出看病的机会，带信给张子意、方志纯等，信中说：盛世才不会把你们长期养着，要么叫你们去做苦役，要么软化你们去为他办事，你们决不要上当，一定要坚定斗志，争取集体回延安。以后，同志们在狱中，按照陈潭秋的指导，在“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战斗口号下，进行了顽强的、长期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盛世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抓进监狱，接着又把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其他同志也关进黑牢。陈潭秋、毛泽民等被关在迪化第二监狱。

当中共中央得知以陈潭秋为首的我党在新疆的一百多人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的消息后，便努力设法营救。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指示说：“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这些人是在重庆中央调整与新疆关系时被盛诬加罪名而加以拘捕的。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sup>①</sup>

陈潭秋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盛世才妄想使用其严刑逼供的惯伎使陈潭秋屈服。当盛威逼陈潭秋招供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内幕”时，陈潭秋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有这回事！”敌人又攻击共产党破坏抗战，陈潭秋慷慨陈词，历数我党在新疆坚持统一战线，执行“六大政策”，发展经济，进行建设，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生动事例，揭露敌人的诬陷。他气宇高昂地说：“我们在新疆做的事

---

<sup>①</sup>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都是光明正大的。”敌人对陈潭秋施以“坐飞机”、“压大杠”、“灌辣椒水”等酷刑，陈潭秋坚贞不屈，铁骨铮铮。敌人采用“车轮战术”，一连数十天对陈潭秋昼夜审讯，使他极度疲劳，稍一合眼，使用烈性阿母尼亚熏醒。敌人引诱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陈潭秋严词拒绝。敌人利用叛徒来“作证”劝降，陈潭秋严正指出：“他们说的话都是虚构！”并严厉斥责叛徒出卖灵魂的卑鄙行径。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盛世才发出了秘密处决的罪恶命令。当天深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狱中被秘密杀害，陈潭秋时年四十七岁。

当狱中的同志们得知陈潭秋等遇害的噩耗时，万分悲痛。他们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为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集体创作了一首《追悼歌》：

我们的兄弟，  
在前方为国把命拚；  
我们全部的力量，  
正在消灭民族敌人。  
我们光荣的同志，  
谁想得到在抗战辽远的大后方，  
还有丧心病狂的败类，  
含血喷人，  
暗害了你们宝贵的生命！  
你们临死不屈的意志，  
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中！  
瞑目吧，



光荣的同志！  
你们的血迹，  
揭露了民族败类的无耻！  
你们的牺牲，  
更显示了八路军伟大的精神！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陈潭秋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陈潭秋烈士的遗骨，解放后被安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南郊风景秀丽的烈士陵园中，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永远悼念。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者外，还有：

1. 编写组收集到的陈潭秋遗文、遗稿六十余篇。
2. 查阅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局、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江西省革命纪念馆、新疆“八办”纪念馆、上海“一大”纪念馆、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瑞金革命纪念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武汉市文物管理处、天津市博物馆、北京图书

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档案室、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新疆日报社、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上海市总工会、中共黄冈县委宣传部、中共监利县委宣传部、武汉市中华路中学、武汉中学等单位收藏的有关档案和文字资料。

3. 访问陈云、谭震林、李维汉、张子意、孔原、方志纯、徐彬如、高登榜、王韵雪、罗明、吴亮平、赵毅敏、王鹤寿、李握如、帅孟奇、杨一辰、师哲、吴克坚、卢竞如、魏文伯、温仰春、王学文、包惠僧、夏之栩、吉合、鄢以贞、郭述申、钱希钧、刘英、梁广、张祺、马殊、陈茵素、刘九峰、黄玠然、黄慕蓝、罗章龙、李云扬、谢江庭等的谈话记录。

4. 老同志撰写的有关回忆录一百余篇。

# 毛 泽 民

新疆大学  
韶山陈列馆 《毛泽民》编写组\*

## (一)

毛泽民，字润莲，毛泽东的大弟，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由于毛泽东很早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毛泽民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参加农业劳动。十多岁时学会了干一般农活，也能写会算。一九一九年十月至一九二〇年一月，父母亲相继去世后，他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学会了勤俭持家的本领。

一九二一年春，毛泽东回到家里，教育全家干革命。在哥哥的耐心帮助下，毛泽民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从韶山到长沙投入革命洪流。

毛泽民到长沙后，首先在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他为改善师生生活，不畏艰难，经常到外地采购廉价的肉食、蔬菜，还发动大

---

\*编写组成员有万志方、关继廉、陈秀玉、张宝裕、郎涛、郭雨婷、唐振南、高菊村。

家种菜、养猪，以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来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往往因此而辍学。毛泽民和主事商量后，改为分期缴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师生赞扬。

一九二一年秋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为党培训干部的湖南自修大学，第二年附设了补习学校。毛泽民转到自修大学任庶务，同时还兼任省学联的庶务。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是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每月四百元社务经费来办自修大学的。毛泽民处处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力求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得当。他还参加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通过课堂听讲和社会调查，自己研究和共同讨论，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懂得了工人农民为什么穷、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以及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改变现状等等革命道理；对于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九二二年十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担任该会秘书。他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笔业工人积极开展斗争。十月中旬的一天，三百多笔业工人在毛泽民等人的带领下，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前往省议会和长沙县署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但遭到省、县当局和资方蛮横无理的拒绝。工会乃决定罢工。毛泽民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动工人互济互助，妥善地解决了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吃饭问题。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四十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毛泽民自己也受到了教育，经受了锻炼。就在这一年冬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同年年底，毛

---

<sup>①</sup>见《辞海》《毛泽民》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0页。

泽民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派，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他先在工人夜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矿井、工棚，同工人谈心，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他对工友们说：“我们只有团结，与反动军阀、资本家斗到底，才有生路。对资本家不能抱任何幻想，要时常提防他们耍花招。”<sup>①</sup>

为了方便工人的生活，减轻中间剥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毛泽民是该社的负责人之一。他常到工人群众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或亲自去长沙、汉口等地购货。合作社出售的物品价格，比私商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工人们从合作社买到廉价的米和油、盐、酱、醋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非常高兴。他们深感合作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纷纷要求加入，并主动向合作社捐款，踊跃到合作社购货。工人消费合作社“规模虽不甚大，而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却已深深地印在工友们的脑筋中了，成为最受群众拥护的事业。”<sup>②</sup>

七月，合作社大整顿。“毛泽民专任营业主任，实行平价廉价，增高消费额”，“并收来新街合作社（分店）”<sup>③</sup>，发展为总社，毛泽民任总经理。合作社还代售一些革命书刊。它在出售《向导》周刊的广告上写道：“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sup>④</sup>此外，合作社还为我党筹集了一

---

①1969年访问肖劲光谈话记录。

②③毛泽民：《消费合作社报告》，见《安源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正太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祝词》，见《湖南现代史资料汇编》第1册。

笔活动经费，积累了开展工运和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经验。在安源工作中，毛泽民很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中的先进分子，青年矿工杨士杰就是经他培养和介绍入党的。杨士杰后来为革命牺牲了。

由于毛泽民等的努力，消费合作社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都说他们“大战了一场资本家，打破了一切工头制，建设了一个坚强的大营寨。”<sup>①</sup>

一九二四年深秋，毛泽民因患阑尾炎离安源到长沙住院。次年二月，毛泽东、杨开慧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他跟随兄嫂回韶山从事农运工作。四月，党组织派他赴广州，参加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sup>②</sup>。

## （二）

一九二五年，毛泽民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后，被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书店规模很大，在广州、潮州、汉口、长沙、湘潭、南昌、宁波、青岛、重庆、太原、安庆、香港、海参崴和法国巴黎等地都设了分店或代售处。

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印刷、发行任务更加繁重。党中央遂决定增开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

---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见“广州第五届农讲所学员名单”，载《中国农民》，人民出版社 1978 年影印本。

由毛泽民负责。他于一九二六年在上海新闻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毛泽民和工人一起干活，经常对他们进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工人们都喜欢他。一九二六年，他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毛泽民的活动和上海书店的营业情况，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有一次，毛泽民去店里时，四个暗探坐在对面茶馆里，书店营业员连忙向他作了个暗号，他才机智地从后门走脱了。

鉴于上海书店已经暴露，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长江书店。党中央批准后，长江书店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正式营业，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毛泽民通过长江轮船的水手、茶房，将上海书店所剩书刊巧妙地运到了汉口，保存了大批“火种”。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到了汉口，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该报实际上掌握在我党手里（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主笔是沈雁冰），宣传了我党的革命方针。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当他九月中旬返回长沙，得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时，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奔赴平江、浏阳。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年年底，毛泽民接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

刷厂工作，于是他又来到上海。印刷厂虽已停工，但没有被敌人破坏，他便利用原厂继续开业。

这时的上海，反动军警密布，特务横行，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环境十分险恶。毛泽民不畏艰险，坚持苦斗，使秘密印刷厂的机器终于转动起来，马列主义书刊和各种革命宣传品，又源源不断地印刷出来，送到了革命群众手中。

一九二九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现。毛泽民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妥善地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今唐山道）四十七号办起了华新印刷厂，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毛泽民任该厂经理。华新印刷厂对外公开承印发票、请柬、表格之类，对内印刷党的内部刊物、文件、传单以及顺直省委主办的《北方红旗》、《铁路工人》等，有时还翻印些马列主义书籍。

当时的天津，也笼罩在白色恐怖里。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毛泽民在小白楼先农里租了一套住房，作为机关。凡是要印制的刊物、文件、传单等，先送到这里，然后再由钱希钧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制。外人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事宜，必须先先在柜房接洽。如发现来人形迹可疑，就掀动办公桌下通往排印车间的暗铃。车间工人听到电铃响声，便迅速将党的文件收藏好，马上改印《马太福音》之类的东西。由于组织严密，一直未被敌特发觉，直到一九三一年毛泽民奉调离开天津，这个印刷厂的任务才胜利结束。

毛泽民在天津期间，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的“交通”，并兼管顺直省委的财务<sup>①</sup>。

---

<sup>①</sup> 《华新印刷厂——党中央过去在天津的秘密印刷厂》，见1962年9月30日《天津晚报》。



一九三一年初，毛泽民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这时，他得知嫂嫂杨开慧于先一年十一月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十分悲愤。经请示党组织同意，他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烈士的亲属设法摆脱敌特监视，按他所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大哥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护送到上海。三个侄儿在他们的外婆和舅母护送下到上海后，毛泽民悲喜交集。他和钱希钧给孩子们做了新衣服，并按照党的决定，将他们送往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还时常去看望他们<sup>①</sup>。

四月，在党中央负责保卫、交通和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使得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上海党的组织处境十分危险，部分机关遭到破坏。中央考虑到顾顺章不但认识毛泽民，且熟悉他的联络暗号和地点，所以，让毛泽民等人离开上海，到香港去开辟工作。毛泽民等人到香港不久，由于顾顺章也窜到了香港，党中央令他们立即离港，去中央根据地。毛泽民于是踏上了新的征途。

### （三）

一九三一年七月，毛泽民到达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后，又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

<sup>①</sup> 《毛主席一家六烈士》，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李静峰：《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央临时政府委派，筹建国家银行。一九三二年三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新成立的国家银行全部人员只有五名，即行长、记账员、出纳员、总务和会计。

当时，中央苏区的财政十分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根据地不但不断地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红白两区贸易往来几乎完全断绝。苏区的钨砂、木材、樟脑、纸张、茶叶、粮食等运不出去，需要的食盐、布匹、医药等运不进来。食盐的价格贵得惊人，一斤盐竟可换五只鸡。苏区军民的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红军战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金。就是这五分钱的菜金，也还“难乎为继”，全靠打土豪供给。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困难，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名义，向各级财政部门发出了“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与吴黎平为部长的经济部，邓子恢、林伯渠为部长的财政部密切合作，向困难开战。

国家银行成立后，毛泽民就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要统一财政，就必须把银行与金库统一起来，把金库从财政部接收过来。为此，毛泽民决定把接收金库作为银行工作的开端，将国家银行分设总行、分行和支行；国家金库也分设总金库、分金库和支金库，由国家银行分级接收和管理。为健全银行和金库管理制度，他经过几个月的摸索、研究，制定了金库条例和会计、预算、决算、审计等制度<sup>①</sup>，还举办了多期银行、金库、财会人员训练班。

---

<sup>①</sup>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统一财政还必须统一货币。根据毛泽东关于“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sup>①</sup>的指示，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开始印制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这种纸币的票面有一元、伍角、二角、一角、伍分五种；九十九元纸币可换一百元银元。年底，又利用两年前红军打长沙时缴获的制币机建立造币厂，铸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和铜币，供根据地人民使用。也造了一些可到白区流通的银元，以利与白区进行贸易。

统一财政，还必须把战争中的战利品都由银行统管。毛泽平常以中央财政特派员身份，深入前方，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并规定：凡属各级政治部、各直属队和新区所成立之革命委员会等一切财政之收入，必须“报总政治部及中央财政特派员，以便汇集具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财政统一”<sup>②</sup>。他又领导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了工作组。每次打完仗，就把缴获的东西收上来，由银行开给收据。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至一九三二年底，苏区的财政货币得到了统一。“这是毛泽民的一大功劳”<sup>③</sup>。

毛泽民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功劳，是发展苏区生产。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苏区军民严重缺盐的问

---

①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②访问邓子恢记录。

③《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题，毛泽民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去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子里带回来；又发动大家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白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还有把棺材改做双层，下层放盐，上层放一些臭猪肠，让一些人装作送葬，从白区把盐运回来……。毛泽民还特别注意利用苏区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在中央苏区赣南的安远、宁都、会昌三县附近，蕴藏着丰富的钨砂。一九三二年春，中央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钨矿公司，由毛泽民兼任公司总经理，负责恢复和发展钨砂生产，有计划地收购和组织钨矿的出口。起初，公司下辖只有盘古山和铁山垅两个矿场。一九三三年四月，毛泽民从这两处调集二三百人，又开发了小垅矿场。三处矿场年产钨砂约一千八百吨，其中盘古山矿场从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三四年秋，产值达二百多万银元。钨砂的大量出口，使苏区获得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换进了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sup>①</sup>。

此外，毛泽民还领导国家银行开展了储蓄运动。他在给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负责人刘少奇的信中写道：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而银行“活泼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sup>②</sup>从当时的实际效果来看，这项措施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在此期间，毛泽民还担任过闽赣省委常委、财政部长和省

---

<sup>①②</sup> 《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团副书记。他一贯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有一回，他气管炎发作了，咳嗽不止，一个本地战士从家里给他送来几个鸡蛋，他婉言谢绝了。这个战士又悄悄地把鸡蛋塞到他的抽屉里，他便把鸡蛋拿到厨房做成鸡蛋汤，与同志们一起吃。闽赣省委开会时，经常开到深夜，同志们早已饥肠辘辘。每逢此时，邵式平总爱开玩笑地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毛泽民也总是笑着答道：“不行啊，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sup>①</sup>

毛泽民在公事之余，常与同志们拉家常。他说，以前自己在家里是管家的，现在到了苏维埃政府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还是管家的。无论是持家，还是为国理财，都要勤俭办一切事业<sup>②</sup>。

#### （四）

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编入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委。遵义会议后，十五大队整编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任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任副部长。在整个长征中，他一直担任着管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

十五大队携带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一百六十多担，

---

<sup>①</sup>方志纯：《回忆毛泽民同志》，载《党的生活丛刊》1980年第3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sup>②</sup>郑亦胜的回忆材料，存韶山陈列馆。

并负责接收沿途抄没的土豪财物，因而行军的负担很重。一路上，毛泽民坚持做政治思想工作，讲述革命道理和故事。部队宿营前，他总是先赶到前而去，与当地群众联系，了解当地情况，热情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纪律，为部队找好宿营地；部队进入宿营地后，他又常向大家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政治情况和地理环境，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开拔时，他又亲自到各处检查，看住地是否打扫干净了，有无损坏群众的东西等等。有一次，部队在湖南打土豪时，错拿了群众一头猪。毛泽民知道后，立即亲自带钱去赔偿，并向老乡道歉。那位老乡感动地说：“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sup>①</sup>

红军经过广西山区时，驻地经常发生火灾，有人以为是战士疏忽失火，而毛泽民却提醒大家，要警惕敌人纵火。一天深夜，部队驻地附近的房子又燃起了冲天大火，幸亏被毛泽民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大损失。后经保卫部门侦察，确系敌人派来充当向导、挑夫的特务分子放的火。部队清除了这些奸细，就很少发生火灾了。

红军长征经过云南、贵州、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时，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他们的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之间的隔阂，使红军遇到严重缺粮的困难。毛泽民发动大家挖野菜、剥树皮以充饥肠，对少数民族的群众秋毫无犯。有时从土豪家弄来一些稻谷，但却找不到石臼无法脱壳。他发动大家用手搓谷，并且自己带头，每次除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要多搓出一

---

<sup>①</sup>王群：《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载《红旗飘飘》第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些米来，手磨破了仍然坚持干。在毛泽民模范行动的带动下，十五大队的后勤战士们都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同各种困难作斗争。

环境越是艰苦，毛泽民也越加爱护战士。四渡赤水后的一天，部队在一片松林里休息。由于做饭的烟火被敌机发现，顷刻遭到一场狂轰滥炸。毛泽民在指挥大家疏散的同时，发现熟睡在一棵大树下的三个战士，有两个已被敌机炸死，另一个被炸弹掀起的厚土掩埋。他不顾个人安危，冲到大树下，把那位战士从土中拉出来，救出了险区。过草地时，气候变化无常，经常遇到倾盆大雨。毛泽民和战士们手拉着手，拖着被泥水泡得紫黑肿胀的双脚，步履艰难地在泥沼烂草中相携前进。一次，有个战士突然陷进了泥沼里。毛泽民马上和警卫排的几个战士一起奔上前去，把这个战士拉了上来，还把自己的干衣服给他换上，又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他继续行军。毛泽民有一匹马，他虽然身体不好，但却很少骑，经常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一路上，他还帮助运输员挑担子，同其他干部一样到炊事班轮流顶班做饭。同志们见他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都劝他不要下炊事班顶班。他说：“你们能做，我怎么就不能做？难道我就不吃饭？”由于毛泽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他所在部队的炊事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全部胜利地到达了陕北<sup>①</sup>。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的一九三六年初，毛泽民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下辖农牧、工矿、财务等科和一个运输队，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

在当时的陕北，红军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时值寒冬，战士

---

<sup>①</sup>王群，〈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

们还穿着单衣。毛泽民提出派人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白区去采购布匹和棉花，以解决战士们的冬衣问题。采购人员出发前，毛泽民召集他们开会，研究并教给他们做买卖的经验与方法；采购员出发后，他又通过清涧县马花坪的红军部队，在阎锡山统治区设立了联络处，由联络处派人与敌营长打通关系。这样，采购员便在附近的中小城市里购得二万八千匹布和大量的棉花，陆续运回党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接着，毛泽民又通过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发动根据地妇女为红军纺纱织布，赶做棉衣。不多久，在毛泽民和广大群众的关心、支持下，几万红军都穿上了新棉衣。

毛泽民注意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在他的倡导下，兴办了一些作坊和合作社、收购店；发动男女老少纺纱、烧木炭、打铁、做木工；开展植树造林，试种水稻，大力养猪、牛、羊等生产活动。他还亲自带领三十多人到长城脚下的三边<sup>①</sup>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大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批物资。

一九三六年秋，很多国家的人民筹集了一大笔款子，由法国汇到上海。中央决定派毛泽民负责把这笔钱取回来。次年四月，他与钱之光等四人化装去上海。通过上海地下党，将这笔外汇分批兑换成法币，藏在特制皮箱的夹层里，再由几个同志装扮成大商人，躲过反动派的严密搜查，辗转数千里，将款运到西安。然后，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和叶剑英、陈赓等的亲自接送、掩护下，终于使这笔巨款安全地运到延安。

毛泽民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支气管

---

<sup>①</sup>三边，即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地区。



炎。重病之中，他仍坚持工作。针对经济部有些同事对实现经济计划缺乏信心的思想状况，他写信予以鼓励，信中说：“假使一个负责工作的干部对自己所‘定出’或上级有原则而依照‘定出的计划’失去‘自信力’，则这个计划等于虚设，并且于整个工作是有害的。”他强调：“我们是从困难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我们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我们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并且自己坚决的依靠计划去执行。”<sup>①</sup>在他的坚毅意志和模范行动鼓舞下，经济部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 （五）

一九三七年冬，毛泽民的病情日益恶化。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休养。一九三八年初，毛泽民启程去苏联，行至新疆时，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他便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sup>②</sup>。

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打出“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工作。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以促进新疆革命运动的发展，保证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安全，因此，从一九三七年起，陆续派遣了一百来名干部到新疆工作。盛世才曾

---

<sup>①</sup>毛泽民致蔡子伟、余建新的信（1938年1月7日），载《革命烈士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sup>②</sup>钱希若的回忆材料，存韶山陈列馆。

特别要求我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经。党中央鉴于毛泽民已抵迪化，遂决定将其留在新疆，与党代表邓发（一九三九年七月以后为陈潭秋）等人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职务，尔后又任民政厅长<sup>①</sup>。

那时的新疆，财政制度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市场上纸币充塞，物价一日数涨，“钞票一大把，只换烟一包”，买一个鸡蛋要五百两银票。加之货币不统一，除有省银票外，喀什地区又印发了喀票，市场上还有清朝铜板和洪宪银洋。盛世才不仅靠印发钞票来应付财政支出，而且还借了二千余万元的外债。毛泽民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毫不畏难，在我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整顿财政金融，在整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进行建设。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整顿财政机构，培训财政干部。过去，财政厅有二百人的编制，实际工作的只有几十个老弱病残。毛泽民到任后，将编制压缩为一百人，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专区）设立财政局，各县设立税务局，均受省财政厅的统一领导。此外，毛泽民还抓了省、地、县银行的整顿，建立了各级金库。这样，就从省到县建立起一整套财政金融机构。之后，毛泽民亲赴喀什，召开南疆各区、县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会议，研究和解决财政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办了财经学校，招收了八十名青年学员，开设簿记、会计、公工程

---

<sup>①</sup>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委任状》（1940年7月），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式、统计、财务管理等课程，并亲自给学员讲课。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新疆财经情况和我的工作情况与计划的报告》，请求中央“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党中央同意了他的工作计划，并满足了他提出的请求。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毛泽民说服盛世才，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废除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改行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并确定旧省票四千两兑换新币一元，喀什票一百六十两兑换新币一元。新币正式发行前，毛泽民撰写文章，举办基金展览会，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那时，盛世才手里有一批金银，却不肯拿出来展览。经过毛泽民多方做工作，终于迫使盛世才把金银拿了出来。一九三八年秋，毛泽民利用在省城召开新疆全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将银行储存的黄金、白银等基金拿出来进行展览，邀请代表们参观。大家看到银行储存金银甚多，更增强了对新币的信任。一九三九年初，新币正式发行，流通顺利，在短期内就统一了全省的币制。新纸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sup>①</sup>。

毛泽民对新币的发行量控制极严，以保证新币币值的稳定和信誉。当有些人主张多印些票子时，毛泽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滥发纸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也即等于饮鸩止渴。”<sup>②</sup>

---

<sup>①</sup>1939年1月20日《新疆日报》。

<sup>②</sup>刘德贺：《大力整顿财政，积极为各族人民服务》，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展览馆《资料汇编》。

为了增加银行的黄金储备，充实新币基金，保证新币的稳定和经济建设，毛泽民在迪化成立了金矿局，在伊犁、阿山成立了金矿分局。他号召与组织群众去阿山开采金矿，规定群众个人挖得的沙金，除缴纳课金外，余下的可卖给政府或换取货物。金矿局每年收到的黄金，要全部上交财政厅，作为财政收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毛泽民在财政厅主持修改了《新疆省限制现金银出境暂行办法》十二条<sup>①</sup>，改变了过去金银大量外流的情况。

毛泽民对财经制度极为重视，认为它是搞好财经工作的保证。他参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财经方面的规章制度，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银行、金库等方面切实可行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公务人员奖惩条例，从而堵塞了漏洞，一改过去混乱的局面，使新疆财经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防止以盛世才为首的新疆军阀、官僚、地主们继续横征暴敛，贪污浪费，争取尽快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毛泽民领导财政厅编制了收支总预算，制定了三年建设计划和财经制度条例。为了平衡预算，控制预算外的开支，还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他经常教育干部：“财政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因为财政是一切的命脉。”他自己更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对盛世才也不例外，使其再不能象过去那样，想要钱就到银行去拿，想要多少就拿多少了。一次，盛世才的岳父邱宗瀚让盛世才将和田街空地丈给人民群众，以这地皮收入作为市政金，给他自己建筑小别墅“明园”。毛泽民得知后，立即向盛世才提出质问，并强调政府应坚持财

---

<sup>①</sup>1939年11月16日《新疆日报》。

政统收统支，市政建设也应编制计划，和田街地皮费应上缴财政厅统一调度。使得“邱老爷”的如意算盘当时未能实现。

毛泽民在新疆整顿财政的过程中，不但要和盛世才进行斗争，还要和蒋介石政府进行斗争。原设在伊犁的航空学校，很多学员是蒋介石政府从内地派来的，他们带来大量法币，在新疆套购物资，造成市场紧张，物价波动，影响新币流通。毛泽民针对这种情况，断然决定新疆境内不通行法币，致使内地运来的大量法币变为废纸。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来电质问新疆当局：法币乃国币，新疆乃中国之新疆，为何在新疆不用法币？并电令恢复法币在新疆的流通。毛泽民巧妙地回驳道：第一，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维族人不认识汉字，且法币式样多，票面金额不等，上面无维文，少数民族使用起来有困难；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法币运入新疆，如通行法币，少数民族人民不辨真伪，将导致严重后果；第三，如必欲在新疆通行法币，应在法币上附加维文；第四，通行新疆币并不影响交易，凡由内地运来的法币，均可如数在新疆境内兑换使用，新疆币作为新疆币流通，国币仍为国币，二者并不矛盾。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在哈密设立兑换处。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法币套购新疆物资的现象，保证了新币的流通，使物价渐趋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地得到改善<sup>①</sup>。

在整顿财政中，毛泽民还提出并实现了税制改革。在改革税制中，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特别表现在税收上。在农牧业税方面，毛泽民提出要按羊的多寡来计税，大牧主的羊越多，

---

<sup>①</sup>刘德贺：《对革命先烈毛泽民同志有关整顿财政和在新疆工作时的回忆》，载1961年6月12日《新疆日报》。

税收就应越多，改变过去按户计税的不合理状况。在商业税方面，毛泽民主张对行商和坐贾都要征税，而且按资金和利润多少分等征收。盛世才不肯这样做，在召集各族头人开会时，竭力煽动他们反对。经过艰苦的斗争和细致的工作，毛泽民的办法终于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比如，林基路担任库车县县长时，取消了包税制，把税收项目从原来的二十种削减到七种，受到各族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整理财政金融的同时，毛泽民还大力支持了新疆工、农、牧、文教、卫生、交通、市政等项事业的建设。他为了发展农牧业，规定省银行和各地分行每年都要给贫苦农牧民发放贷款、贷籽种、贷耕马等。例如，一九三八年，财政厅就给贫苦农民发放了农业贷款四十万元，贷给籽种三万石；一九三九年，发放农业贷款四十七万五千元，贷籽种四万一千石。这两年中，财政厅还拨专款从苏联购买了各种农机具两万多件。

为了筹集建设资金，毛泽民将新疆省立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以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反对高利贷剥削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疆商业银行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该行理事会理事长。

在毛泽民的领导和各族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商业银行发展得很快。在业务范围方面，有汇兑、存款、贷款、保管等；在组织方面，除迪化总行外，在伊犁、塔城、阿山等区设了十五个分行，还在莎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于分行的设立，营业范围的扩大，营业额的增加，银行利润也大大增加。一九四〇年，银行纯利润总数为七十三万四千二百九十六元。商股获利

以后，在给股东大会的贺电中说：“我们在银行入股，不但得到了很优厚的股息红利，而且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建新的工作。”根据毛泽民的建议，商业银行还开展了“典当”业务，名为“公济当”，规定微利三分，当期一年，到期无力赎回，还可延期。从而抵制了旧当铺月息二十分的残酷剥削，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

为了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一九四一年，毛泽民主持发行了建设公债。为了使人民了解购买公债的意义，他除了联系在《新疆日报》开辟专栏进行宣传外，还经常表扬购买公债中的先进人物，并让报社“刊出其照片，以广宣传，藉资表扬”<sup>①</sup>。同时规定：购买建设公债，完全取决于自愿，绝对不加丝毫强迫或摊派<sup>②</sup>。由于毛泽民领导有方和财政厅、银行的工作人员工作出色，原计划只发行公债五百万元，不到两个月，就实际发行了六百七十余万元<sup>③</sup>。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和阻力。盛世才见新疆财政有了起色，便借筹集军费为名，企图将财政厅收入搜为己有，遭到毛泽民的坚决拒绝。毛泽民严正指出：新疆的财政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有求必应，日夜开动印钞机，无限制的开支，无限制的供给，这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紧缩开支，节约使用，量入为出，重点使用，使财政力量得到恰当的发挥，这才是一条活路<sup>④</sup>。

---

①毛泽民为《新疆日报》发行公债专用栏写的发刊词（1941年）。

②毛泽民在工商晚会上的讲话，载1941年《新疆日报·发行建设公债特刊》。

③1941年《新疆日报·发行建设公债特刊》。

④王蝶：《忆革命先烈毛泽民》，存韶山陈列馆。

毛泽民坚持财政制度的措施，严重地触犯了军阀盛世才等人的利益，被盛世才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把他“拔除”。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盛以周彬（即毛泽民）有病，不宜担任繁重工作为借口，把毛泽民调到民政厅任厅长。毛泽民的行动受到了更为严密的监视。

尽管环境恶劣，毛泽民仍始终如一地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利益，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他在《反帝战线》上发表文章，指责盛世才政府的黑暗腐朽，公开提出：“政府凡有施政，务必集思广益，绝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废除压迫人民的“农官乡约”等封建制度。他到民政厅后，制定了《新疆省区、乡制组织章程》和《区村选举法草案》，明文规定“在各村建立村代表制，每村由人民选举五至十一人任村代表，由区村代表会议来选举区村长”；区村长的人选，必须是“素孚众望，办事公正”之人。他还指出：“这不仅是新政府的民主制在区村基层的具体实施，而且是根绝过去农官乡约等贪污枉法分子遗留恶习的最好方法”。为了推行这一新的民主制，毛泽民在新疆各地普遍开办区村训练班，派遣共产党员参加训练，又亲自编写了一本《区村训练班讲义》<sup>①</sup>。在市政组织上，他也领导拟定了《街长选举办法》、《街长办事组织章程》，拟由群众自己选举街长。

年底，全疆各地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关于政务委员会的职权，毛泽民指出：“凡上级重要命令的执行方法，下级区村和民众建议，均须提交县政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使县政工作

---

<sup>①</sup> 《第一次全疆妇女代表大会纪念册》（1942年），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与民众要求相配合。”采取“这种有组织性的民主设施”的好处是，“一方面容易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积极参加，另一方面在整个工作中能够减少困难，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sup>①</sup>这种民主措施，在有共产党人领导的县政府开始实行，并取得了成绩；有些县政府，经常派员下乡视导；有的县长亲自出巡，指导民众开发水利、培植农田、修筑道路。

毛泽民为了改善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主张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他在民政厅任职不到一年，就创办医药速成学校一所，为新疆的卫生保健事业造就了一批骨干。在莎车、焉耆等地设立了医院，在库车、奇台、鄯善、温泉等地开设了诊疗所，在喀什、阿勒泰等地设立了药房，又在喀什、迪化、伊犁、塔城等地医院内设立了专科门诊部，为迪化的主要医院购买了X光机等先进的医疗设备。他曾经专为医药工作题词，要求医药干部切实担负起“对全疆民众的保健使命，以期在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保健事业更高的发展。”<sup>②</sup>

毛泽民还整顿和扩大了全疆救济院。原来新疆有少数几个救济院，而且弊端很多。毛泽民领导民政厅拟订了《救济院整理大纲》，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公布施行。大纲规定，全疆共设救济院十六所，收容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除政府发给他们每人每月三十斤面粉外，还组织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既改善入院者的生活，还有利于他们的健康<sup>③</sup>。根据这个大纲，新建和整顿的救济院办得都比较好，使三千多名鳏寡孤

---

① 《反帝战线》第7卷第4期。

② 毛泽民为全疆医药工作题词，存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③ 1941年10月31日《新疆日报》。

独得以免除沿街乞讨的痛苦，过上了有意义、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周厅长亚克西<sup>①</sup>。”

毛泽民在新疆，为党、为各族人民和抗战事业，呕心沥血，不畏艰险。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多次因过度疲劳而晕倒。有一次晕厥过去后，同志们送他回家休息。他一苏醒，又挣扎着坐起来，继续批阅文件。他曾深沉地对大家说：“我到新疆来，就是要为新疆人民多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最大的愉快。人民的事业，每一件都有时间性，不能因为个人的健康而受到延误。”<sup>②</sup>一九四二年夏天，恶性鼠疫、斑疹伤寒在新疆西部流行，许多人染病而死。毛泽民闻讯后，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亲自到疫区几个县来回奔波，指导和检查防治工作。由于操劳过度，引起血压上升，心脏病、支气管炎一齐复发。但他还在病榻上坚持起草了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信，提出当时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sup>③</sup>。

毛泽民在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常说：“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前方将士浴血疆场，我们后方民众虽然过着安静的生活，但不能高枕无忧，应当节衣缩食，踊跃输将，全力支援抗日前线。”<sup>④</sup>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九四一年秋，他因肠子刺痛复发，在水磨沟疗养了一个短时间。按照当时规定，专员级以上官员在疗

---

①亚克西，维吾尔语“好”的意思。

②③赛福鼎：《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载1962年3月17日《新疆日报》。

④《毛泽民烈士遗语择录》，见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简介材料。

养期间的一切生活费用，可以按交际费的名义报销，还允许带一两名工作人员帮助做杂务。毛泽民作为厅长，本可享受这种待遇。但他没有这样做，找了一个汽炉子，自己解决饮食问题。平时，他不抽烟，不喝酒，衣食住行十分节俭。他从内地来新疆时戴过的一顶旧皮帽，一直戴到入狱就义时。他每月的薪金，绝大部分交了党费。然而，他对身边同志却体贴入微，尽力帮助。财政厅秘书郑亦胜从迪化到南疆联系工作，来回走了几千里路，花销很大，按规定报销后，本人还亏空了一百三十多元。毛泽民知道后，便从自己薪金中拿出一百元钱，送给这位秘书<sup>①</sup>。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贯穿毛泽民一生。

## （六）

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成绩，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却使盛世才坐立不安。他想方设法，要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德国法西斯又进攻苏联，国际国内形势逆转。这时候，盛世才以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不行了，于是逐渐撕下了他“亲苏拥共”的假面具。一九四二年八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来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这样，盛世才就公开投靠国民党，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潭秋、毛泽民等建议党中央从新疆撤退共产党员。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退党员的计划。由于当时新疆通往

---

<sup>①</sup>郑亦胜的回忆材料，存韶山陈列馆。

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他们准备暂时撤退到苏联。在与苏联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前，毛泽民和陈潭秋一起，组织一百一十七名准备撤退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革命气节教育，要求他们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应付突然事变。

预料中的突然事变很快发生了。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一时，盛世才端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他派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住处包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逮捕软禁。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当众将盛世才手下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向盛世才请示，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盛世才吱吱唔唔，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毛泽民知道这家伙已无可救药，愤怒地把电话机砸烂<sup>①</sup>。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盛世才把被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四月十日起，敌人开始对毛泽民进行连续审讯。从保存下来的“刑讯记录”可以看出，毛泽民是怎样把敌人的法庭当作战场，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头一次审讯开始之后，毛泽民大义凛然，宣传了我们党的正义主张。

敌：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什么？

---

<sup>①</sup>郑亦胜的回忆材料。

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敌：你们八路军的人到新疆，中共中央给的什么指示？

毛：我们的目标是搞统一战线，帮助新疆建设。

敌：共产党在新疆的组织活动怎样？

毛：我们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没有个人利害。

在五月五日的审讯中，敌人恶毒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诬蔑共产党人在新疆搞“暴动”，毛泽民慷慨陈词，痛斥了敌人的无耻澜言。

敌：八路军由三个师偷偷摸摸扩充到五十七万人，这对吗？

毛：八路军扩充到五十七万人，对抗日有什么不好？八路军杂志上已经公布说有五十七万人，当然不是偷偷摸摸的，况且朱德是中央任命的。

敌：假定你们在新疆有阴谋暴动的事情怎么办？

毛：我们做的一切，对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没有违背过的，而且完全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工作。我认为你们所说有什么阴谋，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我们在新疆整理财政，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更没有违背民族利益。在新疆四、五年辛苦于抗战建新事业，事实俱在，哪有对新疆政府进行阴谋事件之理？我要求把事实拿出来！

当敌人理屈词穷无言答对时，就问毛泽民：“你是不是叫毛泽民？”“你是不是毛泽东的令弟？”

毛泽民用嘲笑的口吻回答说：“请你们问督办去。”

敌人气急败坏，逼着毛泽民说：“要你表明立场！”

毛泽民答：我是共产党员！

敌：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不行？

毛：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敌：你究竟愿不愿意脱离共产党？

毛：我不脱离共产党！

敌人无计可施，便对毛泽民用刑，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敌人继续用严刑逼供，审问内容还是老一套：逼他招认在新疆搞“暴动”，逼他脱离共产党。

敌：你脱离共产党好不好？

毛：脱离共产党是不可以的。

敌人重复问：“脱离共产党可不可以？”

毛泽民坚定不移地回答：“不能脱离！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

敌人边用刑边逼问：“假定你们有阴谋暴动呢？”

毛泽民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有这回事！”

在酷刑加身的情况下，毛泽民依然镇定自若。他那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他那字字千钧的有力答辨，使得敌人张口结舌，无所措手足。

五月七日，敌人演出了“隔幕对质”的滑稽戏。他们让怕见阳光的叛徒潘柏南、刘西屏等人躲在刑讯室一角的幕布后面，作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见证人”，捏造所谓“暴动”计划和部署等谎言，并劝诱毛泽民投降。毛泽民怒不可遏，喝道：“潘柏南、刘西屏，给我滚出来！别躲在后面学人话。告诉你，盛世才可以出钱买你的灵魂，可买不了铁的事实！”<sup>①</sup>敌人见绝技也不能奏效，便对毛泽民进行十数

---

<sup>①</sup>毛泽民在历次审讯中与敌审判官的对话，均引自当时的“审讯记录”，原件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日昼夜不停的审讯，动用了“抽皮鞭”、“坐飞机”、“站炭炭”、“坐老虎凳”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酷刑摧毁了毛泽民的身体，但摧毁不了毛泽民的钢铁意志。他如天山苍松，巍然挺立！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夜，敌警务处处长李英奇与敌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三字名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二监狱。他们指挥九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子勒死，装进麻袋，用汽车拉到六道弯，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韶山陈列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和资料。
2. 邓子恢、曹菊如、毛特夫、沈玉山、杨逢春、杨天培、刘德贺、赖毅、杨荣勤、钱希钧、朱旦华、郑亦胜、毛远志等写的回忆材料。
3. 访问钱希钧、朱旦华、黄火青、方志纯、张子意、徐彬如、周铁忠、罗章龙、吴亮平、吉合诺夫、于村、王韵雪、陈茵素、蒋连穆、郑亦胜、冯铨、高登榜、钱平、马殊、江泽民、刘进中、杨锡光、刘琦、宋侃夫、汪小川、陈清源、谢江庭、张东月、马肇嵩、张仲实、秦化龙、韩福音、李云扬、陈祖元、徐明乐等的谈话记录。
4. 报刊发表的有关回忆文章。

## 林 基 路

关继廉 张宝裕 万志方 何伦志  
尼加提 (维族) 郭雨郅

林基路，原名林为樑，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广东省台山县都斛圩大纲村。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台山、广州、上海、日本东京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八年春，党派他到新疆工作，历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是汉族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新疆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榜样。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与陈潭秋、毛泽民一起，被盛世才杀害于新疆狱中。

### 台城的“公众之子”

台山是珠江三角洲上一个风景秀丽的侨乡，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台山人民有力地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

林基路的祖父林立文，原是个农民，后来被迫到美国谋生。一八九五年，他回到家乡购置了一亩多土地和几间房子，但不久，又带着林基路的伯父和叔父到美国去了。林基路的父亲林本伟，民国初年进北京政法学院学法律，后来就回台山挂



牌当律师，并当上台山律师公会会长和台山县法院推事，在当地有点名气。他在台山城仓盈路二十三号修了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取名“伟业堂”，作为律师寓所。

林基路的母亲邝桃兰，是个农家妇女，操持家务。他们先有两个女儿，后又生了林基路兄弟三人。林本伟为三个儿子分别取了“福顺”、“福照”、“福佑”的乳名和“为栋”、“为樑”、“为干”的学名。林基路是老二，也就是林为樑。

林基路六岁即入家乡农村的私塾读书，在他十岁那年，转入台山达人小学。不久，举家也迁到了台山城。他上学时，并不象有些孩子那样读死书，而是活泼好动，爱说爱闹。考试临近了，妈妈、姐姐催他说：“阿照，你还不复习功课？考试得零蛋，阿爸就打你的头！”小阿照扬头一笑：“不怕，不怕，考完试我拿担杆担两箩蛋回来分给你们吃！”（表示要考100分）他一加劲，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林基路小学时爱好作文，他的作文内容充实，文笔清新，经常被老师拿来“贴堂”示范。

一九二八年夏天，刚满十二岁的林基路在达人小学毕业，考入了新开办的任远中学。

新办的任远中学，规模小条件差，开始时只有学生八十人。但教师里有不少人是进步的、革命的，他们反对尊孔读经，提倡新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支持学生看进步书刊。林基路很爱读鲁迅的作品，并深受他的老师朱乃慧的爱好新文学的影响。他在学校当班长、学生会主席，并担任校刊《骆驼》的主编，经常在《骆驼》上发表倾向进步、向往革命、追求真理、揭露和抨击社会黑暗的诗歌、小说和评论文章。他勤奋好

学，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除了从图书馆和老师处借阅新书外，还通过书店老板从当时倾向进步的岭南书局及时购买新书。通过学习，林基路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

林基路口才出众。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参加全校演讲比赛，荣获第一名；接着，代表学校参加全县中学生演讲比赛，又荣获第二名。

一九三〇年暑假，为建筑任远中学新校舍，学校组织师生十九人到广海、海晏、汶村等地募捐，校长亲选林基路参加。每到一处，常要他代表学生会发表演说。在募捐活动中，林基路游览了不少侨乡古迹，参观了许多乡村小学，接触了不少贫苦农民，增长了见闻。他感触颇深，写下了《旅行广海、海晏日记》九篇。十月间，他又去家乡都斛募捐，写下了《我们在都斛》的记事散文，发表在校刊《骆驼》上。在这些日记和文章里，他记事写景，品物论人，抒情述志，处处表现出他对社会现实观察的深入和阶级觉悟的提高，显示出这个刚十四岁出头的少年的早熟的才华。他把募捐旅行看作社会调查的好机会，连那个兼作“向导官”的为他们背行李的苦力，也和他沿途畅谈。林基路在日记中写道：“我跟着他听了很多很多的趣事；他是个善良者，我是个好谈人，两雄相遇，彼此纵谈，毫不觉走路苦……”<sup>①</sup>。

林基路在各处看到兵匪官绅横行，人民大众受苦，气愤地在日记上写道：“现社会毕竟是不合理的社会，坏极的社会。”汶村培远小学的校舍是一些青年人把庙里的木偶扔掉后

---

<sup>①</sup>唯凉：《旅行广海、海晏日记》（1930年）。唯凉是林基路的笔名之一。

改建的，他认为“这是海晏废神权、破迷信，提倡教育的第一声”，说“这些能以勇猛的精神战胜顽固的环境的青年，真教我们钦佩莫名！”在斗山横江育英学校，林基路结识了一位“敢把自己对社会的一切见解发挥出来给萍水相逢的朋友的我们”的胡姓朋友，对于他敢于把“对现社会制度不满意，对所谓时代人物而又是一世之雄也的伟人的极力攻击的议论”大胆发表出来的“胆识”，表示由衷的钦佩，把他誉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对那些教书不负责任，还转卖果食给学生借以敛钱的“毒害青年的私塾”，则表示厌恶和反对<sup>①</sup>。他非常同情那些无书可读的贫苦子弟，也绝不以自己的优裕家庭而盛气凌人。比如在都斛老家，有个老伯父对他说：“你父亲很有声望，所以你还是个好孩子，值得人家爱赞。”他听了非常反感，在日记里写道：“这，我在盛怒之余，便是冷然一笑。难道我的父亲没有声望，我便不是个好孩子了么？太笑话了。”当他听到村中的“长者”说他“毕竟你还年轻，不懂得什么”时，他“自己就暗暗欢喜，因为从他们的批评，得知我还未曾跟现社会同化——恶化。”<sup>②</sup>

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写了独幕话剧《自由神》，满怀激情地歌颂为辛亥革命而牺牲的七十二烈士，抒发了他向往革命、学习革命先烈的深情。因为他感到，要改变中国的面貌，非再来一次象辛亥革命那样的激烈手段不可。

这年暑假，林基路参加了何干之（谭秀峰）、朱伯濂在台

---

①唯凉：《旅行广海、海晏日记》（1930年）。

②林为樾：《我们在都斛》（1930年），原载《骆驼》半月刊第2期“文艺园地”。

山中学举办的台山青年暑期学术研究班学习。何、朱二位是新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主讲现代世界观和新文学，即马列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使林基路学习到不少新东西，对他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起了重要作用。

林基路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就同时以马列主义理论去观察解剖现实社会，从而使他更增强了改造社会的决心。有一次，他和同学们到新会城去旅行，在火车站看见许多扛抬货物的苦力，瘦骨嶙峋，步履艰难，心里很不平静。他用照相机拍下几张照片，送给同学，照片背面有他写的一行字：“看，劳苦大众的血汗金钱流进了资本家的腰包里！”

林基路虽然出生在富裕家庭，被人称为“阔佬二叔”、“林家公子”，但他却坚决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在家里，烧饭有伙夫，洗衣有婢女，但是，林基路不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宁愿自己多动手，对伙夫、婢女十分同情。他对兄弟说：“仆人又买菜，又煮饭，从早忙到黑，要让人家也有点时间休息休息呀！”

林基路在校刊《骆驼》上经常发表文章，直抒胸臆，针贬时弊。他的笔名多用和“为裸”谐音的为零、维良、畏凉、威灵等等，但有一个却很特殊，叫“公子”。出于他的父亲的“余荫”，同学们有时戏称他为“林公子”，他当然不会见怪，但他自然知道这个世俗的“美名”是进步青年的“恶谥”。然而，对这个称呼，他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用为笔名，有时与同学通信时也以此署名。他说：“公子，公子，公众之子，何乐不为！”直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他写给曾平福的信里，还赫然用了“公子”的署名，而那封信的全部内容都是为曾平福等进步青年出主意如何进行革命活动以反对“王孙公子”的教

育和社会的①。

这位不满十五岁的“公众之子”，对劳苦大众的感情日深，要求改变贫寒子弟无权受教育的现状的心情也日切。一次，他看了台山城学生成绩展览会归来就想：为什么展览会上的东西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的，为什么贫穷人家的子弟连学校门也进不去？于是，他写下了一篇评论文章：《当前教育之动向》。这篇文章分析了教育的阶级性，说教育是“落在支配阶级的手中而成为统治被压迫阶级的一个法门”。他愤慨地说，当前的教育是“被有产阶级占用了去的奸污了的秽物，于一般大众只尽着毒害的责任的秽物”。他主张新的教育，“这种教育，不特不与劳动分家，不特不与大众绝缘，反之，它是与劳动形影不离的，它是在大众的怀抱中的。”他大声疾呼：“我们应该——而且必要粉碎‘学校重地，穷人免进’的虎头牌。我们应该号召一般大众围集我们四周，把大众拉进学校来——而自己投进大众的群集去。”②

年轻的林基路身体力行。他在任远中学串连了一些同学，办起了一所民众夜校，吸收附近贫苦工人、店员及其子女四十余人上夜校读书。他不但给夜校上课，还联系实际自编教材。中秋节快到了，他的自编课文《中秋节》也搬上讲台了：

富人赏月，甜瓜香果，美酒佳肴；  
穷人赏月，番薯芋头，满腹悲愁。

---

①林基路：《在台城写给曾平福同学的信》（1932年2月16日）。

②林基路：《当前教育的动向》（1930年，残稿）。

他主张读“活书”，摒弃《修身》、《公民》那一套，联系社会现实讲课。除知识传授的一面，他主张结合进行“灌输思想的一面”。这种灌输，既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他每天为学生批改的日记里。例如，有个学生在日记上写道：“爸爸欠了人家的钱，没法还，他便给人家打了一顿。”他马上就在学生的本子上批了：“你爸爸为了养活你们而欠人家的钱，是不应该给人家打的，你应该帮忙你的爸爸啊！”为了勉励那些生活上极贫苦的学生坚持上学，林基路还把自己积存下来的零用钱，买了纸笔等文具送给学生。

政治上的关心，学业上的教导，生活上的照顾，使贫苦学生们非常感动。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说：“林先生最能体贴我们啊！”

### “有志者跑向这边来！”

一九三一年夏天，林基路在任远中学初中毕业了。他在给《同学录》写的序言上，号召同学们“有志者跑向这边来！”即跑向无产者和人民大众一边来，投入那“鲜明的旌旗在飘扬着”的“红光照展的途程”<sup>①</sup>。

由于他的二姐吕娴（婕妤）、大哥为栋、弟弟为干都在广州上学，林基路也来到广州进入中山大学附中读高中。大哥为栋是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又是广州学联会主席，读过一些进步书籍，思想还算进步。但在功名利禄引诱下，在反动高压胁迫下，逐渐右倾了。弟弟为干，专心致志地钻研自然科学。

---

<sup>①</sup>为樑：《有志者跑向这边来——我们自己的前奏曲》（1931年）。

二姐已婚，在广州学妇产科。林基路兄弟三人和一些同乡，开始时都住在一起。有兄弟朝夕相处，有同窗切磋琢磨，林基路来广州后心情是兴奋的。他如饥似渴地钻研社会科学，学习进步文学，并常写文章投稿于广州和香港报刊。他手不释卷，嗜书成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书籍独占的怪癖真有点象现下中国军人的地盘独占的愿望一样。朋友借来的书读过了，栋兄的书本来就与我自己的无异了，但仍不爽快，一定要是自己的而后足。这似乎于德有所缺。但，我至少相信，勇于智识的争取总比勇于地盘的掠夺高尚的多了！”<sup>①</sup>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驻东北的关东军袭取沈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发布“绝对不抵抗”的卖国命令。林基路和全国热血青年一样，被激怒了。他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出政论《只有一战》，寄回母校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痛斥蒋介石说：“守土有责者的面子老早已没有了，他们的人格——如其有人格而说——老早已破产了。他们不只能在民众之前做出无赖子的兽行，更能在列强的叱咤之下奴颜婢膝！他们不惜以小丑的谐谈去逗他的主子的发笑！”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他大声疾呼：“只有一战！战则生，不战则死！眼巴巴地死！谁有生之意志，谁就应该起来！”<sup>②</sup>一个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满怀壮志”的青年形象，跃然于纸上。

---

①蕙苓：《十月间》（1931年），原载《骆驼》半月刊第16期。  
蕙苓为林基路笔名之一。

②林基路：《只有一战》（1931年10月21日），原载《骆驼》半月刊第16期。

这年的“双十节”，由于爱国群众抵制日货，搜查日货，公安局竟将一些爱国群众加以逮捕，群众要求无罪释放被捕者，遭到永汉分局警察开枪镇压。林基路听到这一消息后，大为骇怒。他参加了学生们的抗议集会，当听到人们议论请求政府抚恤受害者若干千元时，他难过极了，当即退席，在当天的日记上愤慨地写道：“唉，轻轻地出若干千元便能随意枪杀民众，谁不乐为？……且这么若干个千出自若辈囊中又是这样容易！”<sup>①</sup>

第二天，林基路的大哥叫他去帮助书写什么“慎重”、“镇定”的标语，林基路拒绝了。他沿着永汉路北行，入道全祠。沿途看见为沙尘混蒙了的血滴，特别是永汉分局对面美洲酒店的墙壁上留下的累累弹痕和斑斑血迹，心情非常沉重。他预言反动派会把凶手“抓”起来，再让其“逃”掉，然后表面上再下一道“通缉”令收场。事情果不出他的所料，官方消息报道：“凶手与监守的数名守兵联同潜逃”了，接着“政府”便装模作样地下令“通缉”凶手，还以两万元悬赏。可是，其他报纸却揭露了真象，说凶手（即原永汉分局局长杜煊泰）正在香岛欢饮呢！

林基路不愿再在乌烟瘴气的广州呆下去了。他从台山度过暑假后，于一九三二年秋来到上海，进入暨南大学附中，两月后，又转学到南方中学。

几年来进步思想的熏陶，终于使林基路彻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三三年初，林路基在南方中学认识了王兰西等进

---

<sup>①</sup>菡苓：《十月间·双十节》（1931年），原载《骆驼》半月刊第16期。



步同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外围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不久，他又介绍陈洪潮等同学参加了共青团和反帝大同盟。他们经常在一起学革命理论和进行实际革命活动。

上海有一家白俄分子办的报馆，竟公然诬蔑爱国学生的抗日运动，引起学生们的愤慨。团组织决定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对它进行警告和惩罚。林基路等便每人带两个酒瓶去袭击报馆。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大家刚到报馆便被逮捕。在狱中，林基路遭到白俄巡捕的毒打。但他并不低头屈服，还组织狱中难友进行过两天的绝食斗争。他让陈洪潮设法把英语书给他带到狱中，抓紧时间掌握这门人生斗争的工具。地下党组织通过“互济会”，林基路的父亲也派林为栋来上海营救，经过三个月的铁窗生活，林基路被保释出狱。

林基路出狱后，豪情依然，斗志昂扬，他望着滔滔奔流的吴淞江写道：

我愿褪除了一切的束缚与粉饰！  
我愿让我的赤诚的心儿，  
象狂流着的吴淞江的流水般地奔放，向前！  
我要以吴淞江的长流，  
来荡尽人间的一切虚伪与丑恶①！

林基路的父亲来信劝告他放弃革命工作，并说“吾心已碎，吾胆已寒”。林基路也写信给父亲，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他说：“青年人谁无感情，庸碌者用于私而优卓者用于公耳。”

---

①林基路游吴淞江照片背面题诗手迹。

儿虽不敏，目击社会现实情形，能无动于衷乎？年来读社会科学书，对社会病原及改造之方，颇多理解，证以事实，益增信心。且儿生性刚强，意志坚决，素不喜因人成事，勇往直前，尽己所能尽，乃我职志。儿意以为此身能公诸社会，个人痛苦，非所敢计。”<sup>①</sup>

他虽然在信中还说了一些安慰父亲的话，但还是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他父亲从同乡中知道后，两人的关系更疏远了。

林基路除积极参加共青团和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外，还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并成为它们的积极分子。

一九三三年暑期，林基路回到台山老家度假，正遇台山中学有一些学生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林基路就和他们一起成立了台山剧社，排演了独幕话剧《咖啡店一夜》、《父归》和一个林基路自己编导的反封建礼教的活报剧。《父归》是反映一个归侨的遭遇的。林基路演父亲，陈茵素演女儿。演剧的道具和经费，大多是林基路从家里收罗来的。由于演出的话剧反映了进步思想，在当地又是首次男女同台演出，因此场场座无虚席，轰动了台山全城。

林基路成了台山城进步青年的带头人。当他重回上海时，他把这批青年中的许多人也带到上海来了。他们在法租界万宜坊租了个大房子住，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在上级组织的布置下，林基路带领这批青年上街贴标语、撒传单、参加示威游行，从事革命工作。

一九三三年秋季，林基路进入大夏大学文学系学习。年

---

<sup>①</sup>1933年2月17日林基路给父亲的信。

底，经过团组织的批准，林基路代表团组织将黄新波等一批进步青年吸收到共青团中。林基路给他们分配了革命任务：有的当交通员，有的深入到工人中去做宣传工作。

为了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艺理论，林基路决定去日本。团组织考虑到他在上海已为反动派注意，日本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要做，因此，同意了他的要求。一九三四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在同乡同学的欢送下，林基路登上了轮船，辞别了风雨如磐的故国，到日本东京去学习、去斗争了。

### 留日学生的带头人

林基路到日本东京后，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一方面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学，一方面积极投入留日学生运动，是左联东京分盟的积极战士。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留学生群众，他和官亦民等人组织了中华留日座谈会，参加者有一百余人，分设社会科学、诗歌、戏剧、美术等十多个小组进行活动。各小组每周活动一次，全体会议数月举行一次，并进行讲演。从此，留日进步学生活跃起来了。林基路在该会曾主讲过《无产阶级文化的战斗作用》、《关于东京文化运动问题》等专题。他以自己广泛的兴趣、多方面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以及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留日学生的尊敬和好感，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林”。

林基路到东京不久，就和林焕平、欧阳凡海等人发起创办了《东流》杂志。有名的小说《改嫁》、《寿衣》，就是林基路用“何亏”的笔名发表在《东流》上的。《改嫁》描写了农村的贫苦妇女双兰伯母的悲惨身世，《寿衣》描绘了农村一个早

年守寡的妇女的不幸遭遇。这两篇小说都是林基路从他所熟悉的台山农村的现实中吸取素材创作的，反映了中国农村广大劳动妇女悲惨而痛苦的命运。小说刻划的人物，栩栩如生，真切感人，获得了许多读者的好评。

一九三五年五月，林基路和杜宣等人发起创办了一个杂志，取名《杂文》，以示对鲁迅的敬仰。《杂文》得到在日本的郭沫若和在国内的鲁迅、茅盾的支持并为它写稿。《杂文》如匕首，如投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抨击国民党媚日卖国的罪恶勾当。可惜，只出了三期，便被日本当局查禁了。郭沫若给他们出了个主意，改为《质文》继续出版，并亲笔给《质文》写了刊名。七月，林基路又和原台山中学同学雷石榆等人创办《诗歌》杂志。人民音乐家聂耳因要到莫斯科学习，路过东京，也经常被邀去参加聚会，《义勇军进行曲》等战斗歌声，激励着羁旅异乡的游子之心！林基路和杜宣、吴天、张水华等人还发起组织了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排演了《娜拉》、《视察专员》、《复活》、《雷雨》等戏，风靡一时。他还和别人合作，把茅盾的小说《子夜》改写成四幕七场话剧，他用力最勤，后两幕全是他改写的。在他的倡议下，还出版过《文艺科学》杂志。

在各项活动中，人们对林基路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个身材不高的人，精力充沛，学识丰富，见识卓越，对各方面的知识有广泛的兴趣，谈笑风生，热情洋溢，许多人都愿和他交往。

一九三五年夏，林基路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返回东京①。

---

①陈茵素：《缅怀林基路同志》（1979年）。

回到东京后，一个以林基路为书记、陈洪潮为组织委员、官亦民为宣传委员的中共东京支部，于同年九月宣告成立，很快便发展了蔡北华等一批党员。党支部决定让原在上海搞青年团工作的陈洪潮，把黄新波等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以陈洪潮为书记、梅景铤为组织委员、黄维克（即黄克洲）为宣传委员的东京中国共青团支部。党团组织建立后，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文化、社会科学、戏剧等座谈会和美术、世界语等协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得到了切实的领导。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止，东京支部已发展了党员五十多人。

一九三五年，林基路和早就相识的陈茵素在日本东京结婚了。他们夫妇在东京居住，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有困难就给以帮助，而自己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林基路平时穿一身学生装，吃自己烧的青菜、萝卜、豆腐就算上菜，有时还以炒豆腐渣下饭。他日常不是外出开会，就是在寓所读书，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安排得有条不紊。同志们都很钦佩他，尊重他，愿意同他接近。李云扬有一次曾问他：“你生活上的最大支出是什么？”他回答说：“是电车费。要知道，我一天不知跑多少路，而学校只不过挂名而已。”

一九三六年，日寇对我国的侵略步伐加紧了。林基路知道，决一死战的时刻就要到来。他加紧了东京留学生的组织教育工作。除在男青年中活动外，根据党支部的决定，他亲自给许多女同学做工作，鼓励她们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党团组织的发动下，一九三六年夏末，留东妇女会正式成立了，给以后的妇运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一九三六年秋，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东京，大家惊闻噩耗，悲痛万分。林基路和李云扬等积极筹备追

悼会。开会那天，寄居日本的郭沫若，不顾日本警察的跟踪监视，亲自赶来参加，并且发表了讲话。

一九三七年春，日寇侵华活动更加猖狂。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凡稍有爱国心者，无不义愤填膺。然而，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处，却把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视同洪水猛兽，必欲弭平而后快。东京本来有个中华留日同学会，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工具，人数寥寥无几。为了组织进步力量，发动抗日，中共东京支部联络各校进步学生，组成了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开始，大使馆要求学联到监督处登记，企图把学联扼杀在摇篮之中，学联不予理睬。于是，他们又提出与中华留日同学会合并，擅自决定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开“联合大会”，并事先从大阪雇了一批打手，企图通过暴力把他们的人选为主席。中共东京支部即与学联理事商量对策，发动几百名进步学生选举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负责人之一卓如为主席。反动派见如意算盘落空，指使特务打手上台殴打主席。这时，林基路和预先布置好的共青团员们一拥而上，痛惩特务打手，连坐在前排的女同学们也冲上台去举椅子痛打特务。林基路跃上主席台，充当临时主席，宣布“学联”成立，并慷慨陈词，鼓动学生到大使馆请愿，要求严惩肇事者。他率领数百人向使馆进军，途中遇日警阻挡，他们化整为零，分头到大使馆集合。大使馆起初派秘书出来搪塞，学生不答应，群情激愤，一直坚持到晚上八、九点钟，学生还有增无已，迫使大使许世英不得不出来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要求：

（一）惩办打人凶手；（二）保障学联同学的生命安全；（三）保证留日学生读书、集会、结社的自由；（四）承认学联是留学生的合法组织。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这次事件

的消息和照片，使国民党狼狈不堪<sup>①</sup>。

这天，当林基路还在会场时，陈茵素就赶回家去收藏文件。果然不久，日本便衣警察就冲进他们家里搜查。在陈茵素和日本房东老太太的巧妙应付下，才把日本警察支走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六月下旬，林基路决定回国。临行前，许多同志、同学为他送行。他心情激动，朗诵了鲁迅的著名诗句：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林基路说：“真凑巧，鲁迅先生在日本写这首诗时是二十一岁，今天我从日本归国也正好是二十一岁。我是不敢以鲁迅自比的，但他这种以身许国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第二天，林基路告别了爱人和战友，回到了上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林基路向党汇报了在东京的工作，党安排他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林基路和其他归国留日学生，冒着硝烟抢救伤病员，并加入了中华青年抗敌救亡团。由于林基路等人对救亡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他们自己又能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因此，几个月后，这个

---

<sup>①</sup>陈茵素等的回忆材料，原件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救亡团便由原来的二百多人发展到五百多人，对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九月中，延安向上海发来电报，要从上海调一批人到延安搞抗日文化工作。林基路所渴望的时刻到来了，他要求到革命圣地延安，要求奔赴抗日前线。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九月下旬，林基路和李云扬、周立波、苏灵扬等十来个人，跟随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同赴延安。车到西安时，他们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受到邓颖超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并合影留念。一九三七年十月初，林基路一行到了延安。

到延安之后，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毛泽东主席来看望从上海新来的同志。党的领袖平易近人的态度，爽朗开阔的谈吐和对形势的深刻分析，给林基路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不久，林基路进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担任班长和党支部委员。他态度谦逊，团结同志，工作又大胆泼辣，曾受到学校的表扬。在党校三个月的学习中，林基路收获很大，但他从不自满。他曾对同班同学李云扬说：“在延安简直有学不完的东西。这里就象一面镜子，把自己的面貌都照出来了。过去在东京时，与一些人比较，总觉得自己还可以，现在才看到，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实际上我们的学生气很浓，非好好向工农同志学习不可啊！”他还把党校的学习情况写信告诉爱人和其他同志，鼓励他们投奔延安。在他的引导下，陈茵素和许多同志，冲破重重封锁，克服种种困难，陆续来到延安这个革命的圣地。

一九三八年初，党派林基路和李云扬、李宗林等到新疆工作。到新疆去工作的同志都要改个新名字，他把“为梁”改成“基路”，于同年二月离开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



## 新疆各族青年的良师益友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和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盛世才为了巩固其地位，曾多次邀请我党派干部来新疆工作。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从一九三七年秋起，选派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分批来到新疆，林基路便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基路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四月，担任了新疆学院教务长。

新疆学院虽说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但规模小设备差，只有教育、经济、文学三个系，教员仅十余人，学生不到二百人。为数不多的学生，多系贵族、巴依<sup>①</sup>子弟，不认真学习，校风不好。

林基路到任后，把改造新疆学院、发展新疆教育作为己任。他首先为新疆学院制定了“教用合一”的方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把它醒目地刷写在校园的墙壁上。他还为学院编写了《院歌》，歌词是：

巍峨天山，环绕着戈壁无边，  
在这大自然之间，  
陶冶着新社会的青年。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  
努力莫迟延。

---

<sup>①</sup> “巴依”，维吾尔语，即地主。

团结、紧张、质朴、活泼，  
争当抗战教育的模范，  
锻炼建设新新疆的骨干。  
时代的青年，  
勇敢向前，勇敢向前，  
胜利就在前面！

这首歌词，由当时在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师的共产党员陈谷音谱曲，林基路还亲自给大家教唱。

为了转变校风，林基路在师生大会上作了《生活革命化》和《新工作作风》的讲演，号召青年们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培养优良的品质。他的讲演启发和鼓舞了全院师生，大家对这位年轻的教务长非常钦佩。林基路后来把他在学院的讲演，撰写成《六大政策<sup>①</sup>的工作作风》一文，发表在《新疆日报》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连盛世才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把这篇文章指定为全疆干部的必读文件。

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林基路发动、组织学生进行建校劳动。他带头和大家一起干，同学们很受鼓舞，一改过去那种娇气十足、只讲吃穿的常态，积极地投入到建校劳动中来。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同学们也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认识了集体的力量和团结友爱的可贵，精神面貌随之大为改观。

林基路狠抓教学改革，学院增设了数理系和一个高中班，

---

<sup>①</sup>即盛世才标榜的“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项政策。

还开设了几门新课。他亲自讲授“新政治学”、“新经济学”、“社会结构论”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等课程。每门课程讲授时都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受到学生们的赞扬。

在林基路的倡议下，学院规定星期六为“抗战救国日”。每逢这一天，他都要发表演说，报告抗日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方针。

林基路在重点抓学院教学改革的同时，还经常组织歌咏晚会和话剧演出，有的话剧还是他自己编导的。一九三八年十月，在迪化各校联合举办的话剧比赛会上，新疆学院演出的由林基路编导的话剧《呼号》，荣获第一名。

尽管当时来疆工作的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师生们与他接触久了，都判断他是延安派来的共产党人。在他的启发、教育和帮助下，许多学生懂得了革命真理，认清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林基路在新疆学院工作还不到一年，但他已培养出了如坚贞不屈的革命青年乔国仁<sup>①</sup>和后来新疆“三区革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的阿巴索夫<sup>②</sup>等一批青年革命者。

阴险狡诈的盛世才，看见共产党人的威信日增，又恨又怕，于是，开始打击林基路，妄图降低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九三八年“七七”抗战纪念日，林基路为大家印发了一本抗

---

①乔国仁后来被盛世才诬陷，不屈而死。

②阿巴索夫，维吾尔族，是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与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别克、达力力汗、罗志等“三区革命”领导人一起遇难，被追赠为革命烈士。

日歌曲集，扉页上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像。盛世才竟借此下了一道手谕：“查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未经审批擅自印发抗战歌本，违背六大政策，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本应驱逐出境，姑念该员工作尚有微劳，特从轻议处，着记大过一次，此谕。”

既是“抗战歌本”，何来“擅印”之罪？师生及社会舆论闻之大哗。一九三九年一月，盛世才借口“工作需要”，将林基路调往阿克苏任教育局长；不到半年，又把他调到边远的库车县当县长。

### 库车人民的好县长

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林基路，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天下午，乘汽车到库车来上任。当他走下汽车，肩背行李去县府就职的消息在群众中传开后，各族人民都惊奇不已。

库车狱中关押着不少无辜百姓。他们的亲友向新任县长提出了申诉。林基路亲自到狱中察看，审阅案卷，在“犯人”和群众中进行广泛调查，然后，断然地依法释放了那些无辜被押的人，给轻罪重判者减了刑。林基路对原县府的二百多名政务警察逐一审查，将其中罪大恶极的一人进行公审判罪，留下了二十多名较好的继续使用，其余一并裁撤。这几件事办的干脆利索，大得人心，库车少数民族群众无不额首相庆，有的甚至感谢“胡达”<sup>①</sup>给库车派来了“亚克西”<sup>②</sup>县长！

---

<sup>①</sup>维吾尔语：上帝。

<sup>②</sup>维吾尔语：好。

林基路根据共产党人毛泽民任厅长的新疆省民政厅的规定，用民主的方法改选了全县的区长和乡长，并把被地主、巴依把持的管水的“米拉甫”也进行了民选，深受群众拥护。

一九三九年十月，林基路的爱人陈茵素从延安调来库车，负责妇女工作，任小学校长兼教员。同年十二月，林基路、陈茵素和任财政局副局长的共产党人蒋连穆三人组成党小组，林基路任组长，有组织地开展党的工作和进行革命斗争。

林基路急人民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他坚决执行毛泽民所采取的财政和税制改革，废除历代相沿的“包税制”，把原有的二十多种税收减少到七种，农牧民赶“巴扎”<sup>①</sup>一律免税。还规定农民自由开荒，谁垦的荒地即归谁所有，三年免征田赋；对霸占荒地的牧主、巴依，首恶者进行了处罚。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

有一次，林基路在去哈拉玉子树村时，看见一块地里已经抽穗的麦苗快旱死了，便立即把管水的“米拉甫”找来，要他马上给这块农民的麦地浇水，并规定：以后浇水要先浇下水，再浇上水；先浇农民的地，再浇巴依的地。

林基路了解到交田赋中弊端甚多，便亲临收粮现场视察。他看见收粮人把明明已风干扬净的粮食再去过筛，抛撒一地，然后把撒下的粮食装进自己的“搭哈”<sup>②</sup>里；过了筛的粮食在过斗时，收粮人又用穿着皮靴的脚“踢斗”，斗里的粮食沉下去再装满。这样，农民的粮食除上交外，还喂肥了这帮收粮人，农民因此把他们叫“仓老鼠”。林基路观察了一天，把事

---

① “巴扎”，维吾尔语市场之意；赶巴扎，即进行集市贸易。

② 维吾尔语：口袋。

情弄得清清楚楚，然后，采取了改革措施，堵塞了漏洞，将那些“仓老鼠”逐出了粮仓，另派人员秉公收粮，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林基路处处为人民着想。过去，库车县粮仓很少，农民为交纳田赋，不仅远道奔波，忍饥挨饿，到了交粮地点还得排队等候几天。林基路增设了收粮粮仓，解决了这个问题。库车加工粮食主要用水磨，过去各地水磨不多，且都被牧主、巴依霸占，农民到牧主、巴依的水磨上磨面，要经受“五抽一”的剥削。林基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县建设科在各地增修水磨，供各族老百姓磨面。象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库车各族人民至今提起他们的林县长，依然可以讲出关于他的一连串动人事迹：一位老大娘把水瓢掉到河里了，林县长跳进激流，帮她捞了上来；一位老大爷赶的马车陷在泥坑里，林县长帮着他把车扶了上来；……

他走遍库车全境，绘制了一幅库车县详图，拟定出库车建设计划。兴修水利是发展农牧业的当务之急。他发动库车和沙雅两县人民，在一九四〇年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修筑了一条宽五尺、深三尺、长二十五公里的大水渠，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通过县境有一条大河，常年泛滥成灾。林基路骑马跑到河源作调查，并沿河观测，亲自绘制了修筑拦洪大坝的施工图。一九四一年四月，工程开始施工。全县人民知道这是林县长带领他们为自己、为后代子孙造福，都积极踊跃参加，工地上车水马龙，十分壮观。一座长四公里、高三米、底宽十七米的拦洪大坝，只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就修筑成功了！从此，不仅水患永除，二十四个闸口水，还源源流向各乡，灌溉着大片农

田。这座大坝，在一九五八年经过加固，迄今还屹立在河岸上；而当年种植的那条林带，已长成郁郁葱葱的高大柳林了。

库车县境内赤塔河上的大桥，年久失修，摇摇欲坠。为了保证安全，方便群众，林基路亲自设计的建桥方案立即付诸实施，一座牢固、美观的大桥很快落成。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举行的大桥落成典礼上，各族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人们提议以林基路的名字为大桥命名，他坚决不同意。由于库车是古代的“龟兹”（音秋次）古国，因而他建议大桥以“龟兹”为名，并题写了“龟兹古渡，团结新桥”八个大字。

林基路一扫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在库车大力兴办教育，甚至在离县城二百多里的柯尔克孜族聚居的山村，也办起了学校，柯族牧民子弟破天荒第一次背上书包上学了。全县学校由原来的两所很快发展到三十五所，绝大部分学龄儿童都上了学。林基路还提倡成人扫盲教育，库车城里曾出现过黄昏时分一家人围在沙地上学写字的动人景象。陈茵素带领学生，为群众演唱并教群众唱抗日歌曲，至今，库车的老人还记得她那嘹亮动人的歌声。林基路导演的话剧《上海之夜》，使群众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由于群众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许多人自动给县府门前“捐献箱”内投钱，支援抗敌将士，许多妇女自动为前方抗日将士缝制寒衣。

林基路深知新疆是帝国主义垂涎和插手之地，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以印度为基地，很早就把侵略魔掌伸进了南疆，潜入了不少间谍。一九四〇年，库车县突然出现少见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各家商店都把货物隐藏起来，货架空空，人民深感不便。林基路通知各家店主开会，唯有库车英国商总玉素甫迟迟不到。林基路派人把他叫来，严肃地对他说：“在中国土地

上经商，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并通知各家商店，不得囤积居奇，查出者即行没收。各店主纷纷表示愿拿出货物来卖，而玉素甫仍然倚仗英帝撑腰，硬说货已卖完。正在这时，县府接到了英国驻喀什总领事路过库车，要县长负责迎送的通知。林基路立即作了周密的部署，要乘此机会破获英国设在库车的特务网。英领事到来那天，提出要见他们的商总。县府人员回话说：“玉素甫商总下乡收账去了，一时不能回来。”英领事不见商总，便私自派人四出与其特务联系。这一切均被林基路预先安排好的人员侦知，他传出指令，一举破获了英国特务网，并将隐藏的货物全部搜查出来。第二天，林基路义正辞严地向英领事提出抗议，谴责他们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特务活动，并宣布没收其隐藏的所有货物。英领事目瞪口呆，只好狼狈而去。

林基路经常深入库车农村、牧区，路远或事多返不回县城时，就同农牧民睡在一起，亲若一家。他的孩子诞生那天正值“库尔班节”<sup>①</sup>，他就给孩子取名“库尔班阿洪”。他在库车还收养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维族小女孩，把她作为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一次，林基路带着爱人孩子乘车外出，马车夫由于喝醉了酒，把车翻到河里，差一点将小阿洪淹死。林基路并没有斥责车夫，第二天才把他叫来谈话，劝他以后不要喝酒误事。那位车夫开始吓得不得了，以为自己闯了大祸，肯定要受县长的处分。听了县长和善亲切的劝导，他十分感动，从此再不沾酒。

林基路在库车任县长期间，时时处处关心着各族人民，而

---

<sup>①</sup>伊斯兰教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大年。



他自己的生活会非常节俭。他用省下的钱买了两匹马和一辆车，供下乡公干时使用；他自己掏钱修补公家的住房，打破了“从来县官不修衙”的老规矩；他还出钱买了两台缝纫机，组织妇女成立缝纫组，收入都归小组所有。剩下的钱，又都作为党费，上交给党组织。

一九四一年，林基路被调回迪化。

### 不屈的共产党人

为了挽救盛世才与我党日益恶化的统战关系，林基路被调回迪化后，根据党代表陈潭秋的指导，以“鲁父”的笔名，连续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论夏伯阳<sup>①</sup>的败亡和蜀、吴统战破裂的文章<sup>②</sup>，以古喻今，警告盛世才破坏统战决无好下场。文章发表后，轰动全疆，不少读者来信表示支持。盛世才却暴跳如雷，多次打电话到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追查文章的作者。当他得知文章的作者又是林基路时，先是想以高官收买，向陈潭秋提出要林基路作他的私人秘书。这一企图遭到林基路的坚决拒绝后，盛世才非常恼怒，把林基路再次调出迪化，让他到南疆最偏僻的一个小县——乌什县去当县长。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林基路携带家眷，冒着风雪严寒，由迪化前往乌什。到任之后，他仍然象在库车那样，从调查研究入手，打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奸商，稳定了物

---

①夏伯阳即恰巴耶夫。

②指《关于夏伯阳的败亡——读〈夏伯阳感言〉》、《论六出祁山的历史价值——历史遗产研究》等文。

价；并制订了一份《乌什县人民生计调查表》，以图大举，改变乌什的落后贫穷面貌。但就在这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已决心投蒋反共。同年夏，中共在全疆各地工作的党员全部被陆续调回迪化，上任不到四个月的林基路，也同时被调，离开了乌什。

八月底，蒋介石派宋美龄等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进一步勾结。九月十七日，我党在疆人员全部被盛世才软禁。

林基路等二十多位同志被软禁在迪化三角地。他们在这里成立了“学委会”，并作了三点决定：（一）盛世才未把我们投入监狱之前还是统战对象，一旦把我们投入监狱，便成我们的敌人，是斗争对象；（二）盛世才变成敌人，我们就要写抗议书，揭露他的罪行，从政治上打击他；（三）一概不承认敌人强加给我们的任何罪名，变刑场为战场，接受考验，斗争到底！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林基路坚定、乐观。他常用聊天的方式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敌情，积极地同敌人斗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盛世才把被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林基路在和陈茵素分别时说：“不管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党怎么说你就怎么做。”<sup>①</sup>尽管林基路已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自己和爱人的最后诀别，但他泰然若素，昂首挺胸地向囚车走去。

林基路被关押在迪化第四监狱东排十号牢房，同室难友还有马殊、陈谷音、高登榜等。当天，他们就在狱中成立了党小

---

<sup>①</sup>陈茵素：《回忆林基路》，原件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组，林基路为组长。经林基路提议，党小组一致通过了三点方针：（一）要求盛世才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宣布关押我们的理由。我们要利用公审机会，揭露盛世才的丑恶嘴脸，说明我们是盛世才邀请来抗战建新的，来新疆有功无过；（二）要求盛世才把我们集体释放回延安；（三）要坚持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宁愿牺牲个人也不能损害党的利益<sup>①</sup>。

林基路在狱中给大家讲了许多革命先烈宁死不屈、英勇斗争的事迹，鼓励大家保持革命气节。有的人听了之后说：“让我们来个不怕死的竞赛吧！”林基路说：“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但我们不要在不怕死方面作竞赛，我们要看谁死得最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sup>②</sup>

敌人进行秘密审讯，妄图用严刑拷打来威逼共产党人承认他们所捏造的“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林基路和他的战友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狱中，他写了一首《囚徒歌》，溯古追今，针贬时弊，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歌词是：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

<sup>①②</sup>马殊：《关于林基路烈士在新疆监狱中的斗争》，存新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那亿万年的伟业，  
    还要捐弃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壮志，  
黑暗，吞噬了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箕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终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  
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  
    染成红旗，  
万载飘扬！

男牢里的难友通过秘密途径，得知女牢中的同志们带着孩子也在坚持斗争。林基路听了，深受鼓舞，他又写了一首《思

夫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怀念那笼中的猛虎，  
是我梦里的人儿。  
苍天为我，  
    叫月儿缺圆，夜色荒芜；  
草木为我，  
    在窗外含愁，长夜悲哭！

.....

我但愿，拿起长剑，  
去为郎复仇！

.....

丈夫啊，你不要焦愁。  
你坚持节操，  
黎明就要来到，  
黑暗已到尽头！

.....

一旦光明来到，  
你就回来，  
拥抱！拥抱！

林基路的歌词，由同室难友陈谷音谱曲，很快传遍各个牢房，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林基路每次被传去刑讯，他都要高喊：“我们是你们请来抗战建新的，我们没有罪！”敌人用尽重刑，有时连续审讯三天三夜，仍无法使他屈服，只好把他单独关到第二监狱一间阴

暗的牢房里。当他苏醒过来时，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他用台山土话唱《木鱼》调，与同乡马殊又取得了联系。到第二监狱后，他对惨无人道的敌人常常破口大骂。敌人惧怕真理的声音，就用黄表纸浸水层层封住他的嘴，他还是骂不绝口！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深夜，盛世才命令刽子手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秘密杀害于新疆迪化第二监狱，埋在六道弯荒无人迹的山坡上。林基路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作者附记：**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和报刊资料，参阅了有关回忆材料，先后访问了陈茵素、黄火青、方志纯、张子意、朱旦华、吉合、于村、蒋连穆、郑亦胜、冯铨、高登榜、马殊、杨锡光、张东月、马肇嵩、张仲实、李云扬等及烈士的其他亲属、同乡、同学和战友。

# 顾 正 红

张 叁

## (一)

顾正红，一九〇五年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獐沟区篆河乡（今滨海县正红公社）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

顾正红三岁时，家有两间矮小的土屋和不足五亩的薄田。他父亲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又租种新河口富农刘某家的二十多亩盐碱地。顾正红是长子，下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他自小生活在贫寒之中。

顾正红的舅舅是位私塾先生。顾正红九岁那年，被送到舅舅那里读了一年书。

一九一六年，顾正红的父亲为了另寻出路，忍痛抛下妻小，只身去上海，在沪西一家油厂当苦力。当时尚不足十二岁的顾正红，便和他的母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整天辛勤劳动，挖野菜，拾柴片，给人家割牛草。到了寒冬腊月和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去讨饭。为了全家活下去，他还给地主家放过牛。

一九二一年十月，苏北阜宁一带发大水，顾正红一家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母子八人，含泪离开家乡，一路行乞，逃荒到了上海。

顾正红来上海以后，寻到了已经在上海做工五年的父亲。但他父亲因工薪微薄，除了养活自己却无分文积蓄，面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一筹莫展，全家在一起忍饥挨饿。不久，顾正红的二弟就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一九二二年，经过多方托人说情，花钱送礼，十七岁的顾正红，才进了日商内外棉九厂（今上棉四厂）。

那时，日本在上海开设的纱厂是每天开两班，每班十二小时，交接班时间总是在早晨六点和晚上六点，工人们称之为“六进六出”。顾正红每天提着一只篮子，里面带上一块饭，加上几块萝卜干，在五点钟以前就赶到厂门口，深怕误点迟到被开除出厂。

顾正红在九厂粗纱间当扫地工。这里劳动条件很坏，到处花絮飞扬，工人十二小时做下来，都成了“棉花人”。车间里的机器由于没有防护设备，稍不留心，就会送掉性命。顾正红整天在这些机器中间穿梭往返，辛勤劳动，还经常受资本家的虐待和打骂，每天下班出厂都要遭到侮辱人格的抄身搜查。

## （二）

顾正红已经进厂好几个月，但拿不到工资。原来这个厂有个“规矩”：凡新进厂的工人，一定要对拿摩温（number one音译，即工头）表示“酬谢”。他几个月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全部作为“酬谢金”，落进了拿摩温的腰包。顾正红知道这一事后，心头好久不能平静。

不久，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顾正红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当众责问拿摩温：“我做工，你拿我的工钱，这算什么道



理？”拿摩温打了顾正红一记耳光。顾正红正要还手，却被身旁的几个工友劝阻了。顾正红不肯罢休，非要出这口气不可。一天，放工以后，他约了几个要好的小兄弟，在拿摩温回家的路上，把这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但是，顾正红也因此惹恼了资本家，被开除出内外棉九厂。

顾正红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不久又进了内外棉七厂，开始做加油工，后来又做布机上盘头工。

一九二四年，党为了加强工人运动，把沪西工人区列为工作重点。先是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继则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顾正红先是工人补习学校的学生，后来又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

当时，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刘华、杨之华等，都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上课或讲演。他们深入浅出，给工人灌输革命思想，顾正红每次都认真去听。他学习刻苦用功，不论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或迟到。在这里，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哺育。

俱乐部除了给工人上课讲演外，还注意对工人积极分子的个别培养。有天晚上，刘华和顾正红等几个工人谈论东洋老板随便开除工人的事，顾正红首先谈起自己被九厂无理开除的经过，并愤愤地说：“这口气到现在我也消不掉！”许多工人都纷纷议论日本厂主及其走狗随便打骂、开除工人的事实，和过去历次斗争工人心不齐的教训。刘华接着启发大家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这说明团结斗争力量大。”顾正红听着刘华的话，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团结斗争力量大”的道理，理解得更加深刻。

俱乐部在沪西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它自一九二四年秋

在沪西成立，至同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七八十人，并在会员中开始建立了党团组织。“到当年年底统计，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有十九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sup>①</sup>，参加的工人总数将近千人<sup>②</sup>。

顾正红自从参加俱乐部以后，在七厂布机间积极开展活动。每逢夜班，夜半过后，东洋领班和工头都去休息了，他就向工人宣讲从俱乐部听来的革命道理，并低声教唱从俱乐部学来的革命歌曲，组织和发动工人起来斗争。

### （三）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内外棉八厂厂主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开除男工，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在党的教育下已经觉醒了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一致要求起来斗争。党组织决定抓紧这一时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动员全上海的党员投入这次斗争。

二月九日，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等厂工人首先起来罢工，至二月十八日，便发展成沪西、沪东二十二家日商纺织厂工人的同盟大罢工。由于工人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优待工人等四项条件，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是五卅运动的序幕。

顾正红在二月罢工斗争中，参加工人纠察队，到沪西苏州

---

①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出版。

②参见中夏：《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出版。

河一带交通要道上“把口子”，并积极向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讲解工人团结斗争的重要性，劝告不明情况的工人不要去上工。他还同工人宣传队一道，用具体事例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行，以争取各界对罢工的支持。

与此同时，顾正红也参加了有几百人组成的罢工鼓动队，当时叫“打厂队”。他和“打厂队”的工人先后到内外棉九厂、十四厂、十五厂，鼓动工人参加同盟罢工。在这些活动中，顾正红奋不顾身，和大家一道冲破厂主、工头的层层阻挠，使这些厂的工友们迅速加入同盟大罢工的行列。

顾正红在二月大罢工中还积极参加组织工会的活动。罢工开始以后，他和各厂秘密工会小组的负责人一道，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斗争，向他们传达俱乐部的指示，散发传单，并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工人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组织工会的重要性，罢工结束后，许多工人都要求加入工会。在顾正红等人的组织下，内外棉十一厂和其他日商纱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人数“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发生工会小组的组织。”<sup>①</sup>

二月罢工中的一天晚上，顾正红在自己家里，给工友们讲革命道理。他父亲听到后怕他惹出事来，劝他说：“在外面做事，宁交四海友，不结一个冤。”顾正红回答说：“工人和工人都是亲兄弟，结不了冤。要说冤家倒有一个，那就是东洋资本家。”父亲担心洋人势力大，搞不好怕儿子与工友们吃亏，一再劝说儿子少出头露面。顾正红根据党的指示和大罢工的切

---

<sup>①</sup>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身体会，耐心地对父亲说：“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这次大摇班<sup>①</sup>东洋人不是和我们签订了条件吗！你不跟他斗，他就更欺压你。”

顾正红在二月罢工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罢工结束后，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月罢工胜利结束不久，“日人虐待反变本加厉。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铁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sup>②</sup>

顾正红目睹这些情况十分气愤，他和其他积极分子一道，把厂中情况及时向工会和俱乐部作了汇报。工会和俱乐部“每天都在那里举行会议”<sup>③</sup>，研究对策。顾正红不顾他所在的七厂日本厂方人员对他的忌恨和监视，总是及时把他在工会和俱乐部开会的情况传达给工友们，激励大家作好准备，继续进行战斗。

这一年的四、五月间，棉纱行情发生了变化，由棉贱纱贵变成了棉贵纱贱。针对这种情况，工会和俱乐部决定，采取轮流怠工的办法，以拖垮日本资本家。于是从五月初起，内外棉、同兴、日华等主要日商纱厂工人纷纷怠工，彼伏此起，相互配合，与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五月十四日，日本厂主突然宣布开除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工人质问厂方，却遭到铁棍殴打，当场受伤倒地者五人<sup>④</sup>。各厂工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愤慨。第二天清晨，刚刚下了夜班的顾正红，便接到工会和俱乐部的会议

---

①当时工人称罢工叫“摇班”。

②③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

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通知。他顾不得回家休息、吃饭，就直奔浜北潭子湾三德里工会驻地，投入了新的斗争。

#### (四)

五月十五日早上六点多钟，顾正红赶到工会和俱乐部，参加内外棉、同兴、日华等日商纱厂夜班工人紧急会议<sup>①</sup>。主持会议的刘华首先报告了十四日十二厂工人斗争情况，接着分析斗争形势。根据七厂织布是靠十二厂供应棉纱这一情况，刘华估计日本资本家很可能以十二厂工人停工，织布无原料为借口迫使七厂工人停工，借以制造工人内部矛盾，削弱工人斗争力量。他对工人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七厂工人仍应上工，不上资本家的当。七厂日班工人已去上工，夜班工人要有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七厂日班工人刚上工不久，日本领班就召集车间拿摩温到写字间<sup>②</sup>开会，然后向工人宣布：“今天厂里没有纱，大班<sup>③</sup>叫你们统统回去。”他别有用心地说：“工人没生活做，就没有饭吃。这不是东洋老板不给你们饭吃，是十二厂工人不给你们饭吃。你们有亲戚朋友在十二厂的，叫他们赶快去上工！”这家伙还煽动说：“普陀路巡捕房的房子是我们送的，你们打出事来我们负责。”<sup>④</sup>日班工人听了纷纷起来

---

①见1925年5月17日《警务日报》。

②写字间即办公室。

③大班是当时上海等通商口岸对洋经理的俗称。

④《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上棉二厂厂史选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

驳斥：“你们东洋老板开除工人，抓走代表，十二厂工人才停工的。”“我们要上工，不开工就要给工钱。”大家聚集在七厂写字间门口，坚持要上工。

中午时分，普陀路巡捕房派了捕头带领一批巡捕到七厂进行“调解”，答应停工期间发半工工钱。并说，明天礼拜六停一天，后天是礼拜，休息一天。到下礼拜一，不管十二厂是否开工，你们的工钱照发<sup>①</sup>。日班工人经过商量，觉得有了一点斗争成果，就同意“调解”，暂时离开工厂。谁知工人一出厂，日本厂方马上就把厂门锁闭，并贴了一张布告，只说停工两天，对发半日工资的事只字不提<sup>②</sup>。

这一消息很快在七厂日、夜两班工人中间传开。顾正红得到消息，马上约了几个积极分子，分头到夜班工人家里去活动，动员大家不理厂方“布告”，坚持上工，并提早到厂门口集合。

下午五点左右，七厂夜班工人已陆续来到厂门口。此时，七厂厂门紧闭，门外有三名印度巡捕，还有“包打听”<sup>③</sup>，手里都拿着铁棍、木棒，一个个凶相毕露。然而，工人们并不畏惧。五点半左右，大家在厂门口自动排队集合，准备进厂。日本点名员拦阻工人们，说：“厂里没有纱做，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顾正红领着工人们喊道：“叫大班出来说话！”“不发工钱，决不回去。”“日班有工钱，夜班也应发工钱。”一个日本职员狞笑着说：“告诉你们，日班也不发工钱。”工人

---

①见1925年5月16日《警务日报》。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③包打听即暗探。

们听后十分气愤。厂门口那些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和“包打听”，吓得慌忙打开一扇小门溜进厂去。愤怒的工人呼喊着“我们要上工”的口号，奋力冲破厂门，一齐拥进厂内。

凶残的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和“包打听”，对冲进厂门的手无寸铁的工人任意殴打，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见此情景，一面领着大家振臂高喊：“东洋人打伤工人啦！”一面带领一部分工人冲进物料间，拿出一些打梭棒，供作自卫武器。

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接到巡捕、暗探的告急后，急忙带着一群打手，杀气腾腾向厂门口奔来。工人们面对日本资本家的武力镇压，毫不畏惧。他们在顾正红等带领下，一齐向迎面而来的暴徒们冲了过去。顾正红跑在队伍的前列。他举着打梭棒，领着工友们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不开工就要发工钱！”

七厂大班看清工人的带头人正是他早已注意的顾正红，就立即推上手枪子弹，对着顾正红开了一枪。随从打手见大班开枪，也都用铁棍、毒刀对工人猛打猛刺。川村那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顿时鲜血直流。但顾正红毫不畏却。他咬紧牙关，忍住伤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工人们被顾正红的英勇行为所鼓舞，个个奋不顾身，挥动拳头和打梭棒，向日本资本家和他们的一群打手冲去。这时，凶恶狠毒的川村，又迎面向顾正红腹部开了一枪。顾正红强忍剧痛，两眼喷射着对帝国主义无比仇恨的愤怒烈火，紧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依旧挺立在队伍前列，继续鼓动工人坚持斗争。川村见顾正红仍顽强斗争，又向顾正红头部开了一枪。顾正红想和他们拚，但已力不从心。川村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见顾正红仍未绝气，又纵前一步，开了一枪，并用毒刀向顾正红猛

刺了几下<sup>①</sup>。顾正红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这一天，在内外棉七厂，与顾正红同时被日本资本家及其打手们殴打成重伤者还有七人，手折头破者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有女工十多人，十四岁以下童工十余人<sup>②</sup>。工人们奋起反抗，斗争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附近的内外棉东、西五厂有的工人也赶来支援。后来，由于普陀路巡捕房派来了大批武装巡捕，才给日本资本家解了围，使斗争暂时平息下来。

工人们怀着悲愤心情，把顾正红等身负重伤的阶级兄弟扶上人力车，去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并送往医院抢救。在途中，顾正红还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医院……。”成群结队的工人一面护送，一面高呼：“东洋人打死人了！”“我们要报仇！”跟随在车子后面的人愈聚愈多，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反抗人流。

刘华闻讯后，立即把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sup>③</sup>，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年仅二十岁的顾正红，终因伤重不治，为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 （五）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内外棉东、西五、七、八、

---

①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③关于顾正红烈士死亡时间，史料有两种记载：（一）《内外棉纱厂工会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等，记载为5月16日；（二）1925年5月18日《民国日报》等记载为5月17日。本文从《呈交涉使文》之说。



十二等五个厂，八千多工人一致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号召“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内外棉纱厂工会、沪西工友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于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召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近千人在潭子湾三德里开会，讨论对罢工工人，特别是受伤者的援助办法。会议由刘华主持，讨论并通过惩办凶手元木、川村，日人及雇佣者不得携带武器，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八项要求<sup>①</sup>。同时，俱乐部派往支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的代表，和上海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代表，均于十五日返沪<sup>②</sup>。他们怀着满腔革命激情，立即投入战斗。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学生，也纷纷起来声援工人斗争。于是，以顾正红惨案为先声，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运动兴起了。

然而，日本资本家继续采取高压政策，进一步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锁舆论，逮捕工人，拘留学生，审讯被害者。在帝国主义恐怖统治之下，“我同胞均含默不言，新闻纸(界)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sup>③</sup>面对这种情况，工会与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围绕顾正红惨案，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迎接反帝运动高潮到来。为此，他们一面组织委员会，成立纠察队、交际队、救济队、演讲队等组织，领导工人坚持和扩大罢工；一面以内外棉

---

①八项要求，详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②见1925年5月16日《警务日报》。

③梅电龙编述：《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之经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1925年印行。

纱厂工会名义，印发宣言、呼吁书，广为散发，以揭露真相，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同时，在党的领导下，由三十五个团体发起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推动斗争深入发展。

五月十八日上午，当顾正红的遗体运到潭子湾时，男女工人整队往迎，沿途高呼：“誓死坚持到底！”“要行凶的偿命！”当日下午又在灵柩前追悼顾正红烈士，到会的工人、学生约四千余人。刘华手持一面写着“中国人惨遭日人残杀”的白旗，领着大家高呼：“坚持到底！”“不达目的死不上工！”<sup>①</sup>工人们和学生们在顾正红烈士灵柩前轮流演讲，缅怀先烈，激发斗志。

五月二十四日，在闸北潭子湾荒场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有上万人参加。“大家下决心踏着顾正红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决不后退！”<sup>②</sup>这次大会不仅打破了上海市民的沉默，而且因参加大会的学生被捕，以及上海工部局再次准备通过压迫上海人民的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使反帝斗争在上海迅速发展为伟大的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伟大群众运动，而顾正红烈士则是这次伟大运动中的“工人先锋”。他的英名也因五卅运动而被载入中国近代史册，流传万世。

####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
2. 上海工部局1925年5月《警务日报》。

---

<sup>①②</sup>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3. 梅电龙编述：《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之经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1925 年印行。
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5. 上海国棉二厂厂史编写小组：《永不熄灭的怒火——顾正红烈士生平记略》，载 1960 年 5 月 30 日——6 月 1 日《解放日报》。
6. 姜沛南修订编写：《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上棉二厂厂史选载》，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 年第 2 辑（总第 22 辑）。

# 熊 雄

熊 巢 生

## (一)

熊雄，原名祖福，号中和，字黹士，披素。一八九二年四月八日（清光绪壬辰年三月十二），熊雄诞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溪下屋村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祖父务农，伯祖父经商，家中置有田产、山林及房屋。父亲熊景星是前清举人，生有七子四女，熊雄排行第四。家中设有“培兰书室”，请来先生和武师，教诸儿女读书习武。熊雄秉性忠厚，老成持重，古文和武术均有扎实基础。一九〇七年初，他考取瑞州府中学堂（在江西高安县），因勤奋好学，以最优等成绩毕业。

一九一一年初，清王朝被推翻的前夜，熊雄在南昌考取江西新军的学生军。武昌首义后，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义，占领了南昌城。不久，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是学兵团的领导者之一<sup>①</sup>。

辛亥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在

---

<sup>①</sup>许光达（洛华）：《熊雄同志略传》，见《烈士传》，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200页。

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苏、皖、闽、粤、湘、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所在学兵团驻守在湖口石钟山前沿阵地。起义只持续一个多月就遭到失败，熊雄被迫随李烈钧出亡日本。在东京，他得识孙中山先生，并于次年加入孙中山在日本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后进入该党设在东京的军事学校学习。

一九一六年，熊雄由日本回国后，积极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他初在李烈钧的护国滇军中工作<sup>①</sup>，后在程潜的护国湘军中任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

## (二)

多年的戎马生涯，使熊雄目睹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情景，心中充满忧愤；同时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毅然弃甲，准备赴欧求学，探索改造中国和社会的道路。一九一九年十月，熊雄由湖南衡阳送其弟侄入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堂分校后，即去广州筹措路费，得到好友林修梅（林伯渠堂兄）的资助和湘军几个月的薪饷，于十一月取道香港搭法国邮轮去法国。

是年年底，熊雄到达巴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在巴黎西郊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语。他完全抛弃了过去优裕的生活条件，与勤工俭学生过着一样艰苦的工读生活。课余寝前，他常与贵州籍的熊自难、熊味根、汪颂鲁，四川籍的秦青川、肖金芳等

---

<sup>①</sup>陈公培（吴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同学集于一处，切磋学业。由于他刻苦学习，勤记多问，克服了年龄较大、学外语难的弱点，较快地学会了法语。

熊雄非常喜欢阅读国内出版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尤其关注国内和苏俄十月革命后的革命形势。初到法国，他看不懂法文书刊，又无条件订购国内书刊。为此，他倡议勤工俭学同学交换阅读国内书刊，并采用通函的方式进行交换。一九二〇年初，熊雄与同校的熊自难、秦青川、肖金芳等人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sup>①</sup>，在交换新书刊的同时，还讨论了文字改革和革命道路等问题，增进了勤工俭学同学间的交往和了解。与此同时，熊雄还积极参加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所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先后认识了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李立三、盛成等人。他们志同道合，交往甚深。

一九二〇年暑期，熊雄离开圣日耳曼中学，与熊自难迁居巴黎拉丁区（即学校区、巴黎文教中心）<sup>②</sup>，一面选择学校，一面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并结识了许多勤工俭学同学和华工。这年秋天，他陪同来自英美的友人游巴黎埃菲尔铁塔，并作七绝一首：

登高东望一咨嗟，  
长剑倚天信手拿；  
北海鲸鲵终就戮，  
南圻逐鹿竟谁家？

---

<sup>①②</sup>肖金芳：《我所认识的熊雄》、《回忆圣日耳曼中学和巴黎书报流通社》，均存中国革命博物馆。1980年10月访问肖金芳的谈话记录。

这首诗，表达了熊雄“东望沉沉，用伤故国”的忧愤心情，和走俄国革命道路，拯救中国的志向。是年年底，他和赵世炎、李立三、熊自难、陈公培、盛成、张伯简、鲁易、周钦岳等十余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sup>①</sup>，明确提出要革命，要把华工组织起来，要到工厂做工，了解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后来，他们又以劳动学会等组织为核心，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sup>②</sup>。

为了实现勤工俭学的初衷，贯彻劳动学会的宗旨，熊雄于一九二一年初去法国西南部工读。先后在纪龙德省罗米尔农业学校和夏郎德省赖古龙农业学校学习农学，并做农工<sup>③</sup>。在一年多的工读生活中，他“处处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回顾乡国又为军阀官僚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勾结为乱，糜烂不堪”<sup>④</sup>，深深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改造，必须要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上根本改造”，“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一个大证据”<sup>⑤</sup>。因此他十分向往苏俄，时时考虑“游俄事”<sup>⑥</sup>。他在致家中书信里说：“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建议亲友“应尽力创设农会，兼办教育”；并告诫家中弟侄，感于新潮，须谋自给，要勤于生产，以应将来社会变革之需；鼓励在外弟侄，努力读书，接受新思想，要他们到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南开学校、南昌心远学校预备法文，以备

---

①陈公培（吴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②《赵世炎生平》，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③⑥熊雄书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④⑤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载《学生杂志》1924年11卷7号。

西来工读<sup>①</sup>。

一九二一年，旅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了“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大学”三次重大斗争，熊雄因在法国西南部，未能亲身参加。但他对勤工俭学同学的每次斗争都寄以同情和支持。“二·二八请愿”消息传到罗米尔农校后，熊雄即来巴黎<sup>②</sup>，和劳动学会其他成员集于熊自难寓所进行议论，印发声明和意见书，斥责中国驻法使馆勾结法国军警殴打留学生的暴行，号召大家坚持勤工俭学，不择条件，有工就作<sup>③</sup>。

十月，法国当局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鲁易、罗汉等一百零四人武装押送回国。这一事件，更激起了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愤慨，尤其对驻法公使陈篆的反动行为更为痛恨，乃思对陈篆有所惩罚。在赖古龙农校工读的熊雄和李合林等也有同样的想法<sup>④</sup>。

一九二二年三月中旬，熊雄陪同李合林去法国南部上加龙省首府图卢兹附近农校的张桓涛同学处取回借给他的手枪。李告诉了准备枪击陈篆为押送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的计划<sup>⑤</sup>。张深表同情，认为“陈篆这个东西实是太坏”，应该给予惩罚。熊雄于三月十七日离开农校来巴黎，二十一日由巴黎去德国柏林<sup>⑥</sup>。三月二十日晚即发生了李合林枪击陈篆的事

---

①②熊雄书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③《赵世炎生平》。

④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

⑤⑥李合林：《九个月的法国牢狱生活》，载《学生杂志》1923年10卷10—12号。



件。这在当时法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是轰动一时的。

后来，熊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看到国内颇有影响的《学生杂志》一九二三年十卷十至十二号上，登有李合林写的《九个月的法国牢狱生活》，并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已对国内一些青年有所影响<sup>①</sup>，遂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写了《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浅出地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动作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这种暗杀行动“不是什么英雄侠士的神秘行动”，而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并不能解决一种陈腐的社会制度”，“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新制度的表现”。“只有阶级革命这唯一的社会革命的总攻击，才有可能推翻陈腐的社会制度，而代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深受军阀官僚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严酷的支配和压迫下的中国，又岂是几声手枪和几颗炸弹能把社会改良得了的”，“在中国现状下，最需要的革命，只有一个彻底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才有可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地位解放出来”，“始有建设真正中华民主共和国”<sup>②</sup>。熊雄的这篇文章，鲜明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对国内革命青年的思想引导和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九二二年，熊雄在柏林加入了德国共产党<sup>③</sup>。他在德国勤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在旅德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肖三、熊雄、谢寿康等旅德同志，每星期六晚上都集中于康德大街

---

①②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

③《赵世炎生平》。

中国共产党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学习、讨论和研究工作，并进行筹组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是年四月中下旬，他们联名写信<sup>①</sup>，给在法国北方作工的赵世炎，促他于“五一”前做好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六月，在法国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十八人，旅德代表是周恩来。为了进行革命工作，“少共”成员都有代号，熊雄代号“其光”<sup>②</sup>。

熊雄在柏林常与在法诸友联系，把自己游俄之意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且也与国内旧友通信，了解国内情况，表达自己的想法。九月，他应劳动学会成员、被遣回国后聚于海南岛中学教书的陈公培、鲁易、罗汉“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的要求，写信将他们介绍给粤军中旧识陈铭枢等人。结果陈公培等三人在国共合作后均投身于军事运动<sup>③</sup>。

一九二二年八月，旅欧共产党人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sup>④</sup>，在柏林的熊雄、熊锐、王圭、刘清扬、张申府和廖焕星等开会，选举周恩来为代表，出席在巴黎的成立大会。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根据国内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开始有计划地选送了一些党、团员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三月底，熊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王圭等十二人第一批去莫斯科<sup>⑤</sup>，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

①赵世炎 1922 年的几封信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②1980 年 10 月访问郑超麟谈话记录。

③陈公培（吴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④廖焕星：《中共旅欧支部》，见《党史参考资料》第 2 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前言第 37 页。

⑤《赵世炎生平》。

四月底，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欢迎熊雄等人。

在东大期间，熊雄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一有空隙便坐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读书，甚至别的同学和他谈话，他还是一边看书一边回答<sup>①</sup>。由于他热情亲切、勤奋好学，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三年暑期，他们在莫斯科郊外度假，得知孙逸仙代表团<sup>②</sup>来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中共旅莫支部参加接待，并指定熊雄参与陪同参观，洽谈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熊雄因而得与蒋介石相识。后来国民党当局派军官叶希夷（叶挺）到东大学习，熊雄则主动与他接近，感情甚为融洽<sup>③</sup>。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帮助下，叶挺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旅莫支部为了培养党在各条战线从事革命运动的骨干，根据每个同学的专长和特点，先后将他们派往苏联有关部门进行短期的专门教育和训练。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熊雄被派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政治工作<sup>④</sup>，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

### (三)

一九二五年，熊雄奉调回国，于九月三日抵达上海<sup>⑤</sup>。中

---

①1981年5月访问肖复之谈话记录。

②代表团由国共两党人员共四人组成。代表共产党的是张太雷、沈定一，代表国民党的是蒋介石、王登云，蒋为团长，于9月2日抵莫斯科，12月15日回到上海。

③④饶竟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⑤熊雄家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共中央派他去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被分配在黄埔军校任职。十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熊雄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协助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以黄埔师生为主体的革命军即击溃了陈炯明叛军，收复了东江，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东征胜利归来，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由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兼），主持政治部工作<sup>①</sup>，同时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同年三月，他兼任了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sup>②</sup>。

一月十二日，军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熊雄是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经过二个月的紧张工作，于三月一日开学。第四期学生二千三百多人，除编步、炮、工等科外，还增设了政治科。

熊雄在军校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的办校方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

政治部主管全校的政治教育、宣传活动和党务<sup>③</sup>，机构也较前略有变更，在主任、副主任、秘书之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七股，以及俱乐部、图书室、编委会、博览室、书报流动所等；人员由二十多人增至七十多人，还聘请了专任政

---

①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

②《本校十五年三月改组以来之大事记》，载《黄埔日刊》1927年3月1日。

③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载《黄埔日刊》1927年1月1日。

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十余人，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学生队并设了政治指导员，颁布了政治工作人员惩戒条例（平时战时各二十五条），创办了《黄埔日刊》。

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方针，政治部制定了全校的政治教育计划，步、炮、工各科以十分之七时间学军事，十分之三时间学政治，政治科则相反。“过去学生为客观条件所限，没有系统的政治教育”<sup>①</sup>，自第四期开始，制订了政治教育大纲，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政治课程达二十六门，使学生得以更好地掌握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及主义、党纲、政策等。为了更好地向学生灌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部聘请了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张秋人、韩麟符、于树德、熊锐、巴文俊、廖刘平、李求实、李合林等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作政治教官<sup>②</sup>，熊雄并亲自担任《军队中政治工作》和《本党宣言训令》两门课的讲授。同时，还请校负责人、政治教官或社会名人做形势任务和政策等专题政治讲演。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政治部定期组织政治讨论、政治问答、政治测验、政治讲演竞赛和向士兵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实习等；并规定各营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随时考查学生的品性、思想及主义，以作为政治教育实施的参考；还组织学生参加民众运动。为了扩大黄埔的影响，政治部大量印行校报、期刊、特刊、文集、讲义、丛书、画报和传单等，据一九二六年八个月的统计，印行即达千万份以上，发行点有三四

---

①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载《黄埔日刊》1927年1月1日。

②饶竞群（米杰）回忆熊雄材料，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千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sup>①</sup>。

在军校中，初有中共特别支部，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三·二〇”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应熊雄关于加强军校中共组织和领导力量，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决定在军校成立中共党团，由恽代英（新任主任政治教官）、熊雄、聂荣臻（政治部秘书）、陈赓（步科一团连长）、饶来杰（广东区委特派员、军校政治部图书管理员）五同志组成<sup>②</sup>。广东区委明确指出：“党在军校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革命军队军事政治骨干和后备力量，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作好充分准备。”<sup>③</sup>熊雄据此指示，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军校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二六年四月，军校开始筹备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别党部，以方鼎英、张治中、熊雄等五人为筹备员<sup>④</sup>，五月正式成立，熊雄当选为监察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改选时，由于军校中共党团的工作，有声望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和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都当选了，熊雄继续当选为监察委员，使军校特别党部仍然保持了左派的绝对优势，为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中，军校受到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调来的军队的严密监视和控制。在突然事变面

---

①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

②③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

④《本校十五年三月改组以来之大事记》。

前，熊雄命令政治部全体人员保持常态，静候党的指示，使这一事态未波及政治部<sup>①</sup>。

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酝酿已久的“整理党务案”。六月七日，蒋介石在军校发表反共讲话，要军校师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而且还以高官厚禄拉拢和收买公开的共产党人。但是，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人表态<sup>②</sup>。

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后方和军校的控制。他一面在《留别本校同学书》中发出“革命的胜利要植根工农群众和共产党的合作”的高调，一面对校部各负责人作了讲话，并写了“几个口号”（即“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句）当面交给熊雄，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人。同时，蒋介石还运用所控制的“黄埔同学会”进行破坏活动，监视校中共产党人。熊雄于八月十三日在《黄埔日刊》上登出了“几个口号”，并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提出要“团结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势力”，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所谓小组织——小团体是私人团体，“其目的是结党营私”，“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要求“各认清合作的原则”，“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公敌，即拿起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九月，熊雄在为军官政治训练班毕业同学录写的序中，提出“要时时刻刻于革命工作”，“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而且必当

---

<sup>①②</sup>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

负责去打倒这类叛党害党的不良分子。”“要为党为主义即为被压迫的民族——特别农工——利益而奋斗牺牲！”

北伐进军只几个月时间，便克复了湘、鄂、赣三省。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急需大批的军事、政治干部，军校决定第四期学生提前毕业上前线，第五期学生入校，同时在长沙、武昌等地设立黄埔军校分校，黄埔本校第五期的政治科和炮工科也迁往武昌分校。熊雄在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上题词：“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概括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指明了革命势力对北伐胜利的喜悦和反动势力对革命发展的恐惧。同时，他在《告第五期诸同学》和迁往武昌分校学生话别中，谈到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指出黄埔军校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伟大使命，要求同学们保持和发扬黄埔精神，实现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不要为黄埔的败家子”，“不要为革命的障碍物”。他指出：“为革命而死，便于革命有贡献。反之，为升官发财、为恋爱、为军阀作走狗……等毫无意义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万，还是死于非命。”<sup>①</sup>他还给迁校学生制订了赴武昌旅途二十几天的宣传大纲，要求同学“一天不忘担任革命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熊雄、孙炳文、肖楚女等留在后方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熊雄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工农运动的高涨，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和校内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日益疯狂。熊雄始终不渝地率领党、团员和左派贯彻党

---

<sup>①</sup> 《黄埔日刊》1926年11月17日、12月18日。



的指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坚持不懈地对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军校保持旺盛的高涨的革命气氛，成为支援北伐战争的坚强后盾。他在列宁逝世二周年、“二七”运动四周年、军校改组及《黄埔日刊》一周年等各种纪念活动中，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和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宣传对反动势力的活动要提高警惕。在《“二七”在国民革命中之意义》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之先锋队，工农是革命中之主力军，黄埔学生是代表革命民众——尤其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在《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中，他写道：“孙文主义和政策与列宁主义和政策是相得益彰的关系”；“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孙总理的化身”，“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他为《黄埔日刊》周年纪念写的题词是：“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呼声，革命军人之道路。”<sup>①</sup>高度评价黄埔军校的作用和责任。军校内的反动势力对发展的革命形势和熊雄的工作恐惧不安，迫不及待地书而密报蒋介石，派专人直送南昌。蒋介石看后非常恼怒，“对共产党的镇压和熊雄的杀害，在当时已下定了决心。”<sup>②</sup>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上海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国民党右派和军校内的反动势力也积极露骨地配合，斗争越来越尖锐。熊雄坚守工作岗位，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斗争，号召军校同学坚持革命方向，保持革命警惕，不断揭露国民党右派和校内

---

① 《黄埔日刊》1927年3月3日。

② 《黄埔同学会始末》，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反动势力的叛变阴谋。他一面秘密布置一部分党团员和左派转移，保存革命力量；一面采取各种合法的灵活的方式，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阴云密布的大屠杀前夜——四月四日，熊雄召集了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全体党员大会<sup>①</sup>。他在会上表示：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四大方案”，坚决反对破坏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党省党部的议案。同时领导了广州工农群众起来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而举行的游行示威<sup>②</sup>。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当局李济琛等也于四月十五日开始了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并派军舰监视黄埔军校附近海面。李济琛、钱大钧、朱家骅和方鼎英等“熟商”镇压军校共产党人的办法<sup>③</sup>。军校中共党团根据广州军委留守处的通知：保持镇静，提高警惕，等候中央指示<sup>④</sup>。四月十五日，军校代校长方鼎英见在广州沙河四标营分校五期学生和入伍生六百余人已全部缴械，便赶回校本部<sup>⑤</sup>，与校内国民党右派“再三讨论”镇压办法。他们害怕校内共产党影响大，左派力量占优势，“稍一不慎，会引起暴动”，不敢轻易下手。经过秘密的策划，由方鼎英出面找熊雄，妄想逼其就范。熊雄当即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sup>⑥</sup>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校内革命师生的反响，乃“劝熊

---

① 《黄埔日刊》1927年4月5日。

② 许光达（洛华）：《熊雄同志略传》。

③⑤ 黄埔丛书：《方教育长言论集》。

④ 饶竟群（来杰）回忆熊雄材料。

⑥ 《黄埔军校“清党”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方教育长言论集》。

雄出国留学，并派汽艇送去香港。”熊雄当即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黄埔师生讲一次话。”<sup>①</sup>方鼎英于次日集合全校师生在校本部礼堂，熊雄作了简短的讲话。他勉励全校师生继续恪承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熊雄讲完话后，到会师生列队将他送至码头，登上汽艇。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江心，即因“机件失灵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中山舰便将熊雄秘密逮捕。当即有“黄埔同学会”分子两人持枪登舰，企图就地杀害熊雄<sup>②</sup>。舰上负责官员以熊雄是“共党要员，是季济琛下令缉拿者”而予以拒绝，乃将熊雄押送广州，投入公安局监狱。五月初转囚于南石头惩戒场<sup>③</sup>。这个监狱囚有黄埔学生、知识分子、工农活动分子等，他们对突然遭此事变，感到不安和恐怖。熊雄得知后，询问同狱的宋时轮，并说“不要怕，要杀头，首先杀我这样的人。”<sup>④</sup>有力地鼓舞和稳定了同志们的情绪。熊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坚持工作，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sup>⑤</sup>。五月十七日左右的一个深夜，熊雄被广东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sup>⑥</sup>，就义前从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sup>⑦</sup>

---

①李逸民：《黄埔军校战斗生活》，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②熊承武（熊雄之大侄）的回忆。

③④⑥1981年8月访问宋时轮的谈话记录。

⑤1981年8月访问刘弄潮的谈话记录。

⑦1979年12月访问张如屏的谈话记录。

# 邓 培

姜华宣 肖 铨 姜廷玉

邓培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为我国工人运动，特别是早期的铁路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 置身唐山工人斗争的行列

邓培又名配，字少山，化名唐凤鸣，邓少铭、钰云。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石湖洲村。他的家境贫寒，祖父是产业工人，父亲和伯父、叔父都因生活所迫去美国旧金山做苦工，最后葬身异国。幼年的邓培靠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只勉强读了两年私塾。十四岁时，他离乡背井，到天津德泰机器厂当徒工，受尽了资本家和工头的打骂凌辱。他忍受着这种生活的折磨，刻苦钻研技术，很快就能看图纸操作。三年徒满出师，一九〇一年到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现唐山机车车辆厂前身）当旋床工，很快成为手艺高超的技术工人。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创建于一八八〇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铁路工厂，一九一五年全厂工人增至三千名左右。这个工厂在我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李大钊、邓中夏等曾在这里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建立

党、团和工会组织，使这个工厂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北方工人运动的基地之一。邓培置身唐山工人斗争的行列，并且锻炼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压榨下，唐山制造厂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邓培常愤愤不平地对工友们说：“为什么工人就该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压在工人头上的总管和监工就该享福？”<sup>①</sup>后来，经人介绍，他接触和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渐渐认识到，要使工人阶级获得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只有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斗争。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洪流迅速波及全国。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前身）赴京与学生联合会进行联系的学生代表回到唐山后，很快同唐山制造厂工人取得联系。邓培以唐山制造厂工人代表的身份，和学生代表一起，带领全厂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迅速投入运动，举行了三千多名工人和学生的爱国游行示威，吹响了唐山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声号角。邓培在厂内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罪恶实质，大声疾呼：“二十一条”要叫咱们亡国灭种，咱们工人不能不管<sup>②</sup>！邓培的言行，在工人中很有影响。工友们喜欢接近邓培，听他的话。他成为唐山工人斗争的带头人。

五四运动期间，邓培曾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细说了唐山工

---

<sup>①</sup>邓伯长、李辅祥、王彦文等：《回忆邓培同志》，见《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1集。

<sup>②</sup>中共唐山机车车辆厂委员会宣传部、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年编著：《八十春秋》，未刊稿。

人的状况。李大钊向他指出，工人过着骡马不如的生活，原因在于老板的剥削，并提出要多办劳工教育<sup>①</sup>。使邓培受到很大教益和影响。

邓培从北京回到唐山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把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编成许多个讲演队，在市内的主要街道、戏院、茶楼、公同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呼吁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

北京军阀政府在六月三日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唐山后，激起唐山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六月十二日上午，唐山各界人民三万多人在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抗议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由于英帝国主义走卒、机务处副处长孙鸿哲的阻挠和破坏，唐山制造厂的三千多工人未能赶上参加大会。六月二十四日，唐山各界人民在火车站前广场再次举行集会，邓培带领唐山制造厂的三千多工人前去参加。当邓培率领工人队伍走到厂门口时，又受到孙鸿哲的阻拦。孙说：“反对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是国家大事，你们工人出去干什么？”邓培理直气壮地答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加活动是我们的责任！”孙又威胁工人说：“你们上街游行，不发给你们工钱！”邓培怒斥道：“我们工人为的是救国，不光是挣钱！”<sup>②</sup>话毕，他带领工人队伍一齐拥出大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奔向会场。这次群众大会历时四小

---

<sup>①</sup>广东三水县编：《三水文史》第2辑。

<sup>②</sup>《冀东革命史》（初稿）。

时，上台讲演者就有三十多人。他们在演说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控诉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最后大会一致决议，以“外交决不让步”、“惩办卖国贼”、“保护学生自由”等内容，向北洋政府发出通电。这次大会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会后，邓培等人还发动群众查烧日货，并举行罢工和反帝示威游行。

为了深入开展这场爱国运动，七月，邓培在唐山制造厂建立了以工人为基本群众的爱国群众组织“职工同人会”，他被公推为总干事。“该会并加入唐山各界联合会，做种种爱国运动”<sup>①</sup>。唐山制造厂工人在“职工同人会”的领导下，各车间还组织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救国十人团”。他们和学生一起，组成讲演队，分赴市区街巷和乡村进行演讲，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随后，他们又和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处联系，使爱国运动在全市普遍开展起来。

### 接受革命思想，加入革命组织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领导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十分注意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开展工人运动，并把工作重点放在长辛店和唐山地区。唐山工人集中，产业工人居多，研究会派罗章龙等到唐山调查产业工人的生活情况，进一步同邓培等取得

---

<sup>①</sup> 《唐山早期工人运动简况》，载《工运史研究资料》第12期，1980年12月30日。

联系。邓培为这次调查提供了大量材料，在调查结束后写出的《唐山劳动状况》一文的结尾中，曾专门记载道：“制造厂方面的报告，大半由邓培君处来的”<sup>①</sup>。这以后，研究会经常派人到唐山地区开展工作。通过一个时期的了解，他们认为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班徒弟，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领袖<sup>②</sup>。于是就把邓培作为研究会在唐山地区的联系人。邓培也经常利用星期和节假日，以学“催眠术”为名，到北京大学去会见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较多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懂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组织工会等问题的一些道理。不久，邓培被吸收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sup>③</sup>。他更加广泛地组织工人学习《新青年》、《工人周刊》、《劳动音》等革命报刊，向大家宣传十月革命和组织工会的道理。在他的组织和影响下，梁鹏万、阮章、王麟书等一批先进分子，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唐山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这个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为了指导纪念活动，李大钊在《新青年》“劳动纪念号”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一文，介绍“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和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五月一日那天，邓培在唐山制造厂集合了几百工人举行纪念会，向大家散发了北京马

---

①许文启：《唐山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4月1日出版。

②《罗章龙教授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载《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③罗章龙：《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克思学说研究会送来的《五月一日北京劳动宣言》的传单。他还向工人群众宣讲了“五一”节的意义，鼓励大家说：“只要我们穷苦人齐心干，共产主义事业总有一天是会实现的<sup>①</sup>。工人们激动地高呼：“五一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同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sup>②</sup>建立后，就同邓培等唐山工人建立了联系。十二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张国焘到唐山和邓培等讨论唐山工人运动和组织南厂工会问题<sup>③</sup>。邓培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帮助下，对唐山制造厂原有的“职工同人会”加以整顿，于一九二一年春建立起唐山第一个工会组织——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工会成立大会是在扇面街五号秘密召开的，到会代表三十多人。邓培在会上首先讲了成立工会的意义，他说：咱们要打破同乡观念，不分南方人、北方人，都是一同受苦的兄弟。咱们不能要工头、狗腿子参加，因为他们和咱们走的不是一条道<sup>④</sup>。最后，大家一致推选邓培为工会委员长。

这一年五一劳动节的晚上，唐山制造厂工会在唐山交通大学礼堂举行纪念会，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邓培把交通大学同学们赠送给工会的锦旗掖在腰带上，率领工人群众，勇敢地冲出了包围圈。

为了加强工人的联合，唐山制造厂工会很快与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的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与此同时，邓培开始深入京奉铁路沿线组织工人，并与山海关、长辛店等地铁路工人

---

①④ 《八十春秋》。

②有人回忆当时的名称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

③谌小岑：《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载《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建立了密切联系。唐山制造厂工会遂成为唐山地区和京奉铁路工人运动的核心。紧接着，北京党组织派北京大学旁听生、青年团员李树彝到唐山工作。李以唐山职工业余学校教员的身份，积极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唐山组织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李树彝为团组织负责人，团员有阮章等七八个人。这时邓培年已三十七岁了，但因工作的需要，仍被吸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 出席远东大会，会见导师列宁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济南、广州、长沙、武汉分别设立分部，邓培是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sup>①</sup>。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陇海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邓培在唐山制造厂以“职工同人会”名义发出了声援电，坚决支持陇海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工人举行大罢工。邓培又领导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发出声援慰问电，并带领工人和学生上街宣传，募捐了几百元现款，以实际行动支援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

与此同时，列宁领导建立的共产国际，为了对抗帝国主义加紧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侵略，组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在莫斯

---

<sup>①</sup>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分》，载《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年）》。

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三十九人参加。邓培作为唐山地区产业工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的工会以及铁路、冶金工人的罢工情况<sup>①</sup>。会议期间，邓培以中国产业工人代表的身份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一起，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亲切接见。列宁向邓培询问了工作与生活，以及工人运动的情况，紧紧握着邓培的双手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作用。”邓培领会到列宁谈话是对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关怀和鼓励，他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和衷心地感谢。在这次大会上，邓培还听取和学习了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他亲眼看到苏联工人当家做主的情景，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看清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光明前途。

会后，邓培秘密回到唐山。为了进一步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把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他更加积极地领导唐山地区工人的斗争。他满怀信心地对工人们说：“我们一定要争取解放。我们要战胜压迫我们的人，来建设一个公平的制度。我们要将土地和工厂从不劳而食的人手中收回，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民的手里。”还说：“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兄弟都是一家人，我们要团结起来。”<sup>②</sup>

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

---

<sup>①</sup> C·A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

<sup>②</sup> 《八十春秋》。

邓培迅速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和工人领袖。他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中共北京区委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sup>①</sup>。这是唐山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北方工人中最早的党员之一。

一九二二年夏，在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唐山地区委员会。中共唐山地委的成员有邓培、阮章、梁鹏万、王麟书、李树彝、彭礼和（北京区委驻唐山地区的代表），邓培担任书记。

### 加强工人教育，扩大工会阵容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教育工作的通告。北方党组织对发展铁路、矿山等产业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先后组织了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等大小罢工斗争百余次，并在斗争中建立了各级工会和党、团组织。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北京区委成员中逐渐增加了产业工人的成分。邓培作为京奉铁路工会的负责人，参加了北京区委的领导工作，担任区委委员<sup>②</sup>，仍留唐山地区活动。

唐山地委成立后，在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团组织。一九二二年夏天，唐山交通大学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还建立了公开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后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团

---

<sup>①</sup>关于邓培入党时间，老同志说法不一，有的说1921年，有的说1922年。此问题尚待进一步查证。

<sup>②</sup>罗章龙：《亢斋回忆录》，载《回忆李大钊》。

结和组织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的讨论。唐山交通大学团组织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人，并发展了党员，正式建立了唐山交通大学党支部。在邓培和唐山地委的指导下，唐山交通大学的党团员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创办了平民夜校，一方面教工人学习文化，另一方面向工人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原理。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把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邓培直接领导的唐山制造厂工会，把教育工人，壮大工人组织作为最迫切的中心工作。工会学习了长辛店组织工人俱乐部的经验，筹建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和工人图书馆。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唐山工人图书馆在北京《工人周刊》上发表了成立《简章》、《阅览规划》、《干事会议简章》和《通启》。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工人图书馆之一，它的宗旨是，“增高工人智识，联络工人感情”。《通启》向人们宣告：“我们这个工人图书馆，就是每个人出少许钱，可以得到许多书报和杂志来看，并时有专人在那儿，任你们随意阅看，那是多么好呀！”<sup>①</sup>图书馆内，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许多著作，还有《新青年》、《工人周刊》等刊物。经常到这里借阅书刊的，不仅有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工人，而且还有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的工人。它既是一个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也是一个工人群众组织，还是党组织和工人联络的机构，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参加图书馆的会员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这个活动扩大了工会组织的阵容，使许多工人进一步提高

---

<sup>①</sup> 《工人周刊》第28期，1922年2月5日出版。

了思想觉悟，更加靠近党的组织。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了以要求承认工人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八小时工作制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号召全国工人参加劳动立法运动。在全国首先起来响应这一号召的，是邓培和唐山地委领导下的唐山工会。他们发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华新纱厂等工会，成立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九月三日，报纸上发表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宣言》，指出：“劳动立法是关系我们生死关头的一桩大事，是关系我们子子孙孙利害的一桩事”；“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应奋斗，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后盾，誓必达到劳动法列入宪法，并且完全采纳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提出的劳动法案，才能休止。”<sup>①</sup>宣言发表后，邓培和唐山地委又组织工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通过广泛宣传，劳动立法运动在工人群众中深入人心，使大家明确了斗争方向。

### 站在唐山工人罢工斗争的最前线

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唐山地区工人罢工斗争高潮已经到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派彭礼和、罗章龙等五六人，分批常驻唐山地区，同邓培等一起筹划工人罢工的各项事宜。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和书记部派驻山海关工会代表王尽美，也曾先后到唐山指导工作。

---

<sup>①</sup>1922年9月3日天津《益世报》。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邓培代表唐山制造厂工会，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人待遇等五项要求<sup>①</sup>，反映了工人的切身利益，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但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拒不答复。为此，十月初，邓培、李树彝等领导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在原有五项要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铁路当局承认工会，扩大工会权力，雇用、开除工人须通过工会等六条补充要求。职工会一面派出代表按这些要求和厂方交涉，一面积极酝酿罢工斗争。

十月十日，在唐山地委的领导下，唐山工人和学生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国庆提灯游行。邓培提着一个上面写有“引导”两字的大灯笼，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后面是京奉唐山制造厂工人、开滦工人和唐山交大学生三个大队，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

厂方和铁路当局对于工人提出的要求，一再拖延，不想解决。工人们去质问，他们推托说报到天津铁路局去了。为此，邓培代表工人到天津铁路局追问，原来并无此事。真相大白后，在工人们的逼迫下，厂方才将工人的要求上报。可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部又不批准。这件事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邓培召集工人商量办法，他明确地说：“我们工人没吃、没穿、没地位，但是有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机器不转”<sup>②</sup>。

十月十二日晚，唐山地委在扇面街五号召开了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罢工，并通过了《罢工宣言》。

---

<sup>①</sup>五项要求详见 1922 年 9 月 16 日北京《晨报》。

<sup>②</sup>邓伯长、李辅祥、王彦文等：《回忆邓培同志》。

宣言写道：“我们因劳苦终日不得温饱，才向当局要求。当局不仅不体恤我们的苦处，且故意藐视我工人，更欲置工人于死地。现在我们为争生存计，为争人格计，不得已才出此最后罢工的手段。”宣言向全国工人宣告：“为本阶级利益起见，我们已开往前线决战，请你们迅速来作后援军呵！”<sup>①</sup>这次紧急会议还成立了罢工事务所，选出邓培、王麟书、李福庆、许作彬、罗占先等二十五人组成罢工委员会，邓培为委员长。罢工委员会以“救国十人团”为骨干，组织了一千多人的纠察队，此外，还组织了调查队、守望队。调查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各处情况，侦察敌人的破坏行动，并到邮局、电报局检查电信，防止反动当局扣留各地工人支援罢工的信件和汇款。守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工人家属的安全，防止坏分子乘机报复。罢工委员会还派出代表到天津、沟帮子、京汉路等地进行联系，以取得各地工人的支援。

工会组织罢工的行动，使厂方头目惊恐万状。他们赶忙给天津京奉铁路和北京曹錕、吴佩孚军阀政府打电报，要求派兵镇压。天津警察局迅速派出三百名军警，分驻开滦、唐山待命，伺机镇压罢工工人。

鉴于当局迟迟不能答应工人要求，经中共北京区委、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唐山地委共同研究，在邓培的直接指挥下，十月十三日凌晨五时，工人纠察队就把厂门守起来。七时，厂中员司（职员）尚未上班，工人便进厂摘下工牌，将各厂房贴上封条，然后有秩序地走出工厂。此时，预先组织的纠察队开始维持秩序，调查队四处探访各机关消息。唐山制造厂三千多工人

---

<sup>①</sup>1922年10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



的罢工开始了<sup>①</sup>。

十月十四日下午六时，罢工工人在制造厂大门前召开大会，邓培向大家报告与当局交涉的情形。参加这次大会的长辛店代表王俊，介绍了长辛店最近罢工的经验，其重要之点在于不怕什么武力压迫。山海关工会代表佟恩荣，也讲述了唐山工人与山海关工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要加强联络，一起向资本家斗争，誓达最后胜利。他们的发言受到全场热烈的欢迎，大家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

京奉铁路当局一方面以武力威胁罢工工人，一方面企图拉拢分化工人队伍。他们对邓培说：“如果你下令复工，厂方可以给你涨工钱，也可以叫你当头头。”邓培回答道：“我是工人，不想当头头。要涨钱，你们就给大家涨。告诉你们总管，我邓培人穷志不穷，金钱不能收买我。”<sup>②</sup>

这期间，罢工委员会委员、火车房工人罗占先赴京汉铁路沿线联络工人，取得同情与援助。但罗占先从长辛店归来时，在丰台车站被警察局捕去。邓培闻讯，立即召集全厂工人大会，他问大家：“我们的罗代表被捕了，钱他们也不给，要求也不答复，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坚持罢工！”邓培因势利导，号召大家除坚持原来提出的十一条要求外，另外再增加一条：“立即释放罗占先代表，不将罗占先释放就没有谈判的余地。”<sup>③</sup>

罢工后的第三天，京奉铁路局不得不派代表来同邓培等七名代表进行谈判。邓培说：“如果你们不答应条件，我们就是

---

①1922年10月17日《晨报》。

②③1951年5月24日《唐山劳动日报》。

不让车轮转。再不答应，我们就不叫全京奉路的车轮转。”路局代表威胁说：“你们罢工数日，生活怎么办？”邓培坚定地表示：“我们有唐山市各厂矿工人兄弟的支援，还有南洋各国华侨兄弟都在大力支援着。”<sup>①</sup>路局代表不知所措，谈判没有结果。直到罢工第八天，铁路局才被迫答应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大部分条件<sup>②</sup>。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考虑到罢工已取得重大胜利，同意复工。

十月二十日，罢工委员会代表和厂方代表经过谈判签订了协议。二十一日，天津警察局将被扣的工人代表罗占先送回，工人们齐集车站热烈欢迎代表的胜利归来。至此，罢工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罢工斗争，唐山地区的工人更加团结，邓培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唐山制造厂的工人都自愿加入邓培领导的工会，工会公开成立时，邓培被选为会长。

唐山罢工的胜利，对天津、丰台、沟帮子、山海关等京奉铁路沿线的工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纷纷派代表到唐山制造厂学习。邓培热情地接待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了组织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经验。随后，京奉铁路沿线天津、沟帮子等地的党组织和工会相继建立。一九二三年召开了京奉路工会代表会，正式成立了京奉路总工会，邓培被选为委员长<sup>③</sup>。

## 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的勇士

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

---

① 《唐山铁路工厂斗争史》，存河北省档案馆。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③ 《铁总年鉴》，1926年10月北京再版。

工之一。开滦煤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个矿，原为中国资本独立经营，后因借英款（庚子借款）而成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受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矿工受着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没有劳动保险，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生活极其悲惨。唐山制造厂和山海关工人罢工的胜利，给开滦煤矿工人以很大的鼓舞。

一九二二年十月下旬，邓培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驻唐山地区指导员的身份，参与领导了唐山启新洋灰厂七千多工人的大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的总同盟罢工，掀起了唐山工人罢工斗争的新高潮。罗章龙、王尽美、彭礼和、邓培等，是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主要成员<sup>①</sup>。

还在酝酿这次罢工的时候，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就写信给开滦机器房工友，向他们介绍罢工斗争的体会，信中指出：“要团结得好，千万彼此连成一气，才有力量，才可与有产阶级奋斗。”信中对开滦工人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说：“你们有举动时，决计派人前来帮助一切。”<sup>②</sup>临罢工之前，邓培召集唐山各厂矿代表开会，商讨相互支持、联合行动的斗争策略问题。十月二十二日，邓培与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听取了开滦各矿代表的汇报，决定二十三日举行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sup>③</sup>。

罢工期间，邓培发动唐山制造厂、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厂工人捐款、援助，当地铁路职工会捐款一千八百元。唐山制造

---

①罗章龙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

②《开滦总矿师1922年大罢工报告书（中文译本）》第31—32页。

③《冀东革命斗争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厂职工会在支援开滦罢工的通告中指出：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六天了。我们职工会和全厂工人用全体力量来帮助他们……。邓培还发动唐山交通大学的学生罢课，上街募捐支援罢工。对此，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曾发表文章给予赞扬。文章指出：“近在咫尺的唐山学生对罢工同胞之态度怎样，乃为中国人民是否还有民族感情和义愤的试金石。”唐山交大学生这种援助罢工行为，“不但在劳动运动史上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尤为重要。”文章号召全国知识阶级和学生们，都要学唐山路矿大学生的模范<sup>①</sup>！安源路矿、长辛店、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等工会组织，也都积极援助开滦五矿的罢工斗争。

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恐惧，他们互相勾结，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罢工的第二天，开滦总矿师、比利时人杜克茹，给矿务局总理、英国人杨嘉立打电报，要求外国军队和警察来矿进行“特别保护”。同时，开滦矿务局致直隶省警务处的信中也惊呼：“各矿情况危险”，“请求贵处再多派三百名警士，驻防林西与赵各庄以弹压及保护。”十月二十九日，受贿四十万元的直隶省警务处长杨以德，带了大批警察到矿镇压罢工工人，并向英国人保证，“待全部工潮平息之后再走”；“可以放手配备更大的队伍应付暴力，实行大批逮捕。”<sup>②</sup>

面对帝国主义同军阀政府的镇压，罢工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唐山地委领导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由于邓培在领导这场罢工斗争中机智勇敢，做了大量工作，引起了帝

---

<sup>①</sup> 《向导》第10期，1922年11月15日出版。

<sup>②</sup> 引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注意。他们在逮捕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后，便把主要目标对准邓培。十一月二日，英国帝国主义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丹汉，在给开滦矿务局总理杨嘉立的信中说：“我记得上次我对你谈过关于在中国的工潮，你说你所经历的大多数的风潮是由你们的广东机械师的鼓动。”十一月九日杜克茹致杨嘉立的电报中说：“唐山真正的罢工首脑是唐山铁路工厂所雇用的广东机器匠邓培”；“我认为你应该通知警察局，使他们监视这个人。”杨嘉立立即同杨以德商量对策。十一月十日，杨嘉立写给杜克茹的信中说：“杨以德已经知道邓培这个人领导煽动的活动。他已在监视中，他们正尽力搜集充分证据，作为逮捕邓培的正当理由。”十一月十一日，警察查封了罢工机关。警务处给开滦总局的信中说：“邓培、只魁元担任鼓动全国工人，募收捐款，确为本案要犯。闻已逃往北京，正在侦探严密查缉。”<sup>①</sup>

邓培不顾敌人的追捕，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躲藏在侄子邓伯长的家中，并在这里建立起秘密的工会办事处所。为了躲避敌人通缉和搜捕，他曾一度避到天津。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仍经常奔波于京、津、唐之间，与各地同志取得联系，交流情况，并把京奉铁路工会工作形式暂时转入隐蔽状态，进行秘密活动。不久，邓培从天津返回唐山，在唐山制造厂附近的欧阳胡同的一座小楼里秘密组织了“同志会”。他继续深入到唐山各厂矿工人和唐山交大学生中，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学生读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报纸曾报道说：“现在京奉路职工总会被封了；但是常见报上有唐山总工会的名目，可知

---

<sup>①</sup>引自开滦档案原卷。

工人团体仍然存在着了。”<sup>①</sup>开滦总矿师杜克茹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信中无可奈何地供认：“杨以德长期地用最大力量要逮捕（邓培）这个人。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详密的侦察工作，至今未能探索着他。”“著名的罢工首领铁路罢工的领导者，与开滦罢工者的实际组织者邓培，已经安然回到唐山做他的旧工作。”<sup>②</sup>

### 不畏强暴，坚持斗争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二七”大罢工发生后，邓培领导唐山工人集会、捐款，并通电声援。通电说：“年来军阀专政，官僚弄权，国是日非，陷吾同胞于绝境。近闻京汉工友因欲解放政治上经济上之压迫，已于四号开始发动，一致与黑暗势力奋斗。我等深表同情，深望商学各界予以充分援助，以后我等并愿为实力之后援，以达阶级互助之宿愿。”<sup>③</sup>为了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邓培领导京奉铁路工会与京绥铁路工人联络，一致议决于八、九日实行罢工。由于“二七”惨案发生，罢工风潮亦渐平息，此举只好停止。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邓培不畏强暴，仍秘密召集了京奉全路代表会议，提出了惩办凶手、恢复京汉铁路总工会、以后不得干涉工人集会结社、军警无故不得逮捕工人、休息病假不准扣薪、不准无故开除工人等六条要

---

①沛公：《敬告唐山公学两界》，《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第2号，1923年1月6日。

②引自开滦档案复制卷。

③《京汉工人流血记》，北京《工人周刊》1923年5月版。

求，并决定为“二七”被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唐山工人捐助京汉被难工友恤金二百元。京奉铁路工会上述行动，“足证明京奉唐山工会真正存在而具有实力”<sup>①</sup>。

京汉路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从“二七”惨案中认识到，中国应当不迟疑地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为此，应当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的步伐，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议。邓培作为北京地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党的“三大”以后，邓培回到唐山，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并参加筹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二月，“二七”惨案周年之际，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邓培代表京奉铁路总工会出席了大会，并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正式宣告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选举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邓培被选为委员长。

会后，邓培和李大钊等通过铁路总工会同冯玉祥的国民军取得联系，经过各种途经营救“二七”以来被捕的各铁路工会的负责人，使他们得以获释。

同年，党在全国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邓培领导唐山工人、学生组织了“反日会”。他在自己的草帽上写着：“提倡国货”四个大字，以示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这年十一月，京奉铁路局借口原料缺乏，无法生产，大批裁减工人。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人开展了反对厂方裁员的斗争。他在唐山扶轮小

---

<sup>①</sup>张国焘：《“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

学召集被裁的两千多名工人开会，决定开展反裁员复工斗争，同时选出代表，组织请愿团，到天津铁路局请愿。全体失业工人发表了宣言，揭露军阀、资本家的裁员真相，向全制造厂工人发出求援呼吁，立即得到全厂工人响应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纷纷谴责路局裁员。最后，路局不得不同意失业工人全部复工，取得反裁员斗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中国职工运动过去的状况及现在的趋势，指明了今后职工运动的方向。在这次大会上，邓培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唐山的特派代表。

党的“四大”以后，邓培继续兼任唐山地委书记，在唐山地区贯彻“四大”决议，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工作中，他首先选派强有力的党员干部，深入到各重要厂矿，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先后在京奉唐山制造厂、启新洋灰厂、林西、赵各庄、马家沟各厂矿建立起党支部，党员人数也有很大的增长。同时，地委还加强了对学生、妇女、儿童等方面工作的领导。唐山交大建立了学生会，全市建立妇女协会，并组织一部分工人子弟，建立了市儿童团。在党的“四大”决议指引下，唐山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一人，邓培出席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中共中央给大会的祝词指出：“大会工友们竟以艰苦奋斗之结果，能在两年前惨遭巨变之同地同日，召集全国代表盛会，不胜欣幸之至”，并祝贺大会继续斗争胜利。铁路总工会执行委



员会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京奉路唐山有四千多工人在组织了”<sup>①</sup>。大会共开了四天，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显示了中国铁路工人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会上，邓培等十八人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三月一日，为了对抗段祺瑞提出的“善后会议”，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邓培以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五月一日，邓培到广州，出席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邓培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他在广州检查了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工会的工作。

“五卅”惨案发生后，邓培从广州返回唐山，领导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在车站广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紧接着，又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不给外国人当奴隶”等口号。群情激愤，呼声震天，住在唐山的帝国主义分子闻声丧胆，闭门不出。

六月，邓培再赴广州开展铁路工人运动。这时驻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搞军事叛乱，阴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邓培和广州工代会顾问杨殷、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刘尔崧等人，领导粤汉、广九、广三、潮汕、宁阳（江门至台山）等铁路工人进行反抗杨、刘叛乱的斗争<sup>②</sup>。他们组织工人拆藏火车头的重要零件，并把铁路工人集中到河南去，使铁路瘫痪；还从工人中挑选一批能千分子组成侦察队和宣传队，每天凌晨潜水渡过珠江，到对岸

---

<sup>①</sup> 《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

<sup>②</sup> 广东三水县编印：《三水文史》第2辑。

市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当周恩来等率领革命军要回师广州时，邓培等又组织工人迅速把火车头装好，分别开到东莞、清远、三水等地供革命军使用，帮助革命军迅速平定了杨、刘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这年冬，军阀孙传芳在黄浦江边秘密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军阀赵恒惕在长沙逮捕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对军阀的罪恶表示极大的愤慨，在全国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上公开发表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最近上海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汉口烟厂工人遭屠杀通电》，抗议反动军阀的罪行。后来，赵恒惕慑于群众和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刘少奇。邓培为此感到高兴。

一九二五年底，因为工作的需要，邓培被调到北京，专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 临危不惧，壮烈牺牲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五十八人，代表着全国十八条主要铁路的二十一万工人。邓培主持了这次大会，李大钊、王荷波、李季达等分别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大会通过宣言，号召全国铁路工人努力完成国民革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次大会对于全国革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会上，邓培、罗章龙、孙云鹏、王荷波、史文彬等十三人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委员<sup>①</sup>。

---

<sup>①</sup> 《铁总年鉴》，1926年10月北京再版。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邓培由北京调到广州，作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总代表并兼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主任<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培出席了这次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邓培在广东工作期间，积极领导铁路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使广东铁路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省港大罢工时，他发动铁路工人捐款捐物援助罢工斗争，并且率领铁路工人代表团到罢工委员会献旗送信，慰问战友，支持罢工工人的正义斗争。

北伐战争开始后，邓培等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支持，并组织粤汉铁路工人加快运送出师北伐的革命军和武器弹药。不久，又抽调铁路工人组成北伐交通队，随军出发。当铁路交通队长陈秀柏回广州汇报交通队铁路工人的英勇事迹时，邓培听了非常高兴。他高度赞扬交通队，说他们做得好，号召铁路工人学习交通队的革命精神。

秋，受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广东机器工会破坏新宁（宁阳）铁路总工会，并勾结当地土匪陈式容，从广州运送了几十名反动武装“体育队”去该路镇压工人。邓培当即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及苏兆征、邓中夏等商定，派杨殷率三路（粤汉、广九、广三）工人纠察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第四大队第二支队，乘坐胜利号、民生号两艘轮船前往新宁铁路，歼灭了陈式容的反动武装，巩固了新宁铁路总工会。

---

<sup>①</sup> 《工人之路》第321期，1926年5月16日。广东三水县编印：  
《三水文史》第2辑。

冬，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张贴布告禁止罢工，压制工人运动，破坏进步工会。一九二七年元旦，在国民党右派的指使下，广东机器工会的反动武装“体育队”五六十人，突然袭击粤汉铁路工会。邓培等立即部署工人纠察队反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第二天，反动武装又包围了广三铁路总工会，总工会组织工人奋起反击。邓培率领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隔江布防，参加抗击，在农民自卫军的支持下，打退了反动武装的进犯。不久，又打退了反动武装对粤汉铁路总工会的再次袭击，使各铁路工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九二七年二月，邓培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sup>①</sup>。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右派，加紧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军阀又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广州全市实行大搜捕、大屠杀。由于形势紧迫，邓培虽接到党组织要他暂时隐蔽的通知，但他为了清理焚烧有关文件，四月十五日仍然到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上班。作为一个声望很高的工人领袖，邓培早已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成为敌人注意的对象。邓培在办事处工作未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就将办事处包围了。这时，邓培依然坐在办公桌前，而无惧色。穷凶极恶的敌人，破门而入，邓培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径。反动派把邓培捆绑起来，装入黑布袋，秘密押到广州公安局。在狱中，敌人要邓培供出铁路系统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名单，遭到邓培严厉拒绝。敌人企图用金钱利

---

<sup>①</sup>1927年2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诱，又遭到邓培严词痛斥。敌人对邓培进行严刑拷打，使他遍体鳞伤，但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夜间，邓培和刘尔崧、李启汉、肖楚女、熊锐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惨遭敌人的秘密杀害<sup>①</sup>。邓培时年四十三岁。

邓培牺牲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中指出：“邓培、李森、刘尔崧等同志在广州之死难……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sup>②</sup>随之，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议决议案中指出：“第二届执行委员李森、何耀全、邓培、刘国裳、缪卓民诸同志，被反革命所杀，大会愿为诸烈士复仇，继续其精神奋斗。”<sup>③</sup>

---

①朱忱薪：《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载《醒狮》第146、147期合刊，1927年9月3日。

②《向导》第200期，1927年7月8日出版。

③《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出版。

# 张秋人

叶炳南

张秋人，乳名友表<sup>①</sup>，学名慕翰，别号秋莼，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清光绪戊戌年二月二十七）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南乡牌头镇水霞张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先后在上海、衡阳、宁波、芜湖、广州、武汉、杭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一九二八年二月壮烈牺牲。

## （一）

张秋人的家庭是佃中农，除了祖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外，还租种了别人的十来亩田。一家人辛劳终年，所得无几，逢上荒年歉收，还得向亲友借债度日。

张秋人的父亲张乃荣和三叔张成善都是一辈子扛锄头的老实农民，整年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二叔张成美在外面做裁缝活，捎带做点贩卖茶叶的生意，除自己度用外，略有节余，尚可补助一些家用。他的母亲周爱娟，是个俭朴的农家妇女，一共有过十二胎，因为生活拮据，难以周全照料，有

---

<sup>①</sup>丁亥（1947）年重修的诸暨《水霞张氏宗谱》上写作“有标”。

七个孩子先后夭折。张秋人排行第三，因为三叔张成善没有子嗣，他从小就过继给三叔承桃。

张秋人童年时期，父母按照当时农村习俗，从邻村抱来一个比他小八岁、乳名钱芬花的女孩子，做他的童养媳。张秋人读了书稍懂点事后，坚决反对这种童养媳制度，但他并不厌憎钱芬花，而是象亲妹妹一样对待她。张秋人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设法把钱接到上海，送进党所创办的平民女校初级班读书，引导她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她成为红一方面军中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三十位革命女战士之一。

张秋人祖辈世代务农，经常受豪门大户欺压，祖父深受刺激，下决心不论家道怎样艰难，也要让后代读几年书，张秋人兄弟才得到上学的机会。但张秋人的大哥、二哥和小弟读了几年小学就先后辍学务农，只有他因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终于到外地读完了中学，成为全家引为骄傲的唯一“秀才”。

张秋人在本村乐贤小学读完了初小，又去牌头镇上的同文书院读高小。高小毕业以后，因为家庭无力供给学费，曾一度被迫停学。一九一五年，他听说美国教会资助的绍兴越材中学学费比较低廉，便说服家庭借凑了一笔钱，考进了这个学校。读了两年以后，因对校方不满而退学；后到宁波，考进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崇信中学。在崇信中学，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优良，特别是英语说得十分流利，受到校方的注意和赏识，被允减免了学费。后来他又半工半读，做些擦黑板、打扫教室的杂活，换取菲薄津贴，以购买书籍文具。美国人校长甚至还亲口向他许下诺言：如果到毕业时，能够始终保持第一名成绩，一定免费保送进上海沪江大学读书。为了尽量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争得免费上大学的难得机会，他更加刻苦用功，因而学习

成绩连年保持第一，被同学们公认为标准的好学生。

但是，秉性正直刚强的张秋人，决不对帝国主义奴颜卑膝。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浙江时，他和一些爱国同学一起，不顾校方的阻挠和恫吓，毅然走上街头，热情地投身于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之中<sup>①</sup>。这种公然的“叛逆”行为，使教会和校方大为恼火。一九二〇年夏张秋人毕业时，虽然又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但新上任的美国人校长梅立德，却对前任允诺的免费保送上大学的话矢口否认。他阴阳怪气地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去找许诺你的老校长说吧！”张秋人第一次认识了外国传教团体和教会学校的伪善面目。

张秋人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家里按照习俗置办了几桌酒席，招待前来祝贺的亲友们。送走客人之后，父亲清点了送来的贺礼，除掉办酒席的费用，还有些剩余，就把这些钱都给了张秋人，还叮嘱儿子说：这点钱你拿着做路费，到上海去找个事情做。如果有出息，能找到一份差事，将来有空就回家看看。张秋人铭记着在贫困中煎熬了大半生的父亲这番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告别了家乡的亲人，只身前往上海，踏上了独立谋生的旅程。

这时正是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张秋人在四处奔走、谋求生活出路的过程中，结识了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沈定一（玄庐）等浙江籍同乡。这些同乡都是参加建党建团活动

---

<sup>①</sup>有些回忆张秋人事迹的文章，说他在宁波五四运动中被推选为“学生领袖之一”。据我们广泛收集查阅有关宁波五四运动的第一手史料，始终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所以本文没有采取这一说法。



的骨干和最初成员，张秋人通过他们的辗转介绍，又结识了陈独秀、张特立（国焘）等人。在陈独秀、张特立和同乡们的启发、引导下，张秋人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并且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的各种活动，如组织工人夜校、推销新书报刊。在学习理论和从事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张秋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一九二一年，他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大约在一九二二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

## （二）

建党初期，党的活动经费非常困难，党、团员们都必须找个社会职业，解决个人的生活费用问题。失学、失业，到处流浪的张秋人，只好和沈泽民、柯怪君（庆施）等几个熟识的青年人，挤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靠给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其他报刊写点文章或翻译一些外文作品，换得若干稿费，过着“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十分清苦

---

<sup>①</sup>张秋人人团入党的具体年月，至今尚未找到第一手的准确史料。有关他的各种传略和回忆文章，对这个问题说法不一，早者为1920年，晚者为1923年。由于这些回忆者们自己入团入党的时间都晚于张秋人，又都未能说明其史料依据，故仅能作为参考。据1921年下半年入党的徐行之（梅坤）回忆证明，张秋人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的入党时间要稍晚一些，很可能是1922年上半年；又据194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所载，张秋人入党的年份也是1922年；另外，现有的史料尚不能证明他在1920年就加入过社会主义青年团。故本文推定张秋人的入团时间当在1921年，而入党时间则在1922年初。

的“共产公社”生活。但是，艰苦而又极不安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丝毫也没有影响张秋人火一般的热情，他积极投身于各种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七、八月间，张特立等二十六人领衔签名，在上海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张秋人就是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sup>①</sup>。一九二二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正式创办了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这所学校又是党的一个交通联络站。刚入党不久的张秋人，和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高语罕等学识、声望很高的著名共产党人一样，不拿报酬，热情地担任该校的义务教员，给初级班的学员教英文<sup>②</sup>。一九二二年五月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时，张秋人积极支持并率领平民女校的学生们上街宣传、募捐，支援纱厂工人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暑假期间，经过陈独秀的推荐，张秋人从上海到湖南，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随即被聘为衡州（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员<sup>③</sup>。衡阳第三师范，是湘南地区党团组织和学生运动的中心。张秋人到这里任教，固然有组织

---

①1921年7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6号上所刊《宣言》原文，只有“张特立等二十六人”的笼统署名，并无具体名单。现在所能见到关于26个签名者的最具体记述，是罗章龙在1980年第5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一文。其中说：“签名者二十六人，其中少数为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张特立、李启汉、李中、李震瀛、袁笃实、张秋人等。余为青年学生……”。

②上海市妇运史料组：《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辑。

③屈子健：《衡阳五四运动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上关怀、帮助他寻找一个固定的社会职业，以解决生活困难的经济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把加强衡州地区党团组织和学生运动领导的重任交给了他。张秋人不负党组织的信任和期望，很快就以认真教学，平易近人，主动热情，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学校发给他一百多元的高薪，他除了个人的简朴生活费用外，把多余的钱全部用来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和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经费。他与当地的同志们一起，经过共同努力，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提高了党团组织的战斗力。他到衡州不过半年时间，就使得原先因部分领导权被右派学生夺取而陷于停滞状态的湘南学生运动又日益活跃起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共产党员蒋先云、刘东轩领导了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张秋人和他的同志们立即以湘南学联为主，联合衡州各界，组织了支持水口山工人罢工斗争的“后援会”。一九二三年元旦，他们还组织党、团员公开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广泛散发革命传单，使反动当局大为震惊。一月下旬，张秋人以充满信心和自豪的语气，接连给上海团中央负责人写了两封信，汇报了自己几个月来的工作，信中说：

“学生运动可大得手，此间学生联合会已到我们手里了。”

“水口山罢工事，确有大影响，此间又组后援会，益使社会上注目。兼之，元旦日把 S·Y·（社会主义青年团——笔者）的名义公开了——发传单，有些人益大惊小怪了”。

“此间教职员说：镇守使要来检查此校，因省长有公事给他，说三师范某——指我——系上海来之……，水口山罢工事，系某主动。他们怕得了不得”。

“他们想包办此校，目睹半年来学生动了，S·Y·的势力

膨胀了。有非去我不可之势。”

“学校里很怕我，但也无如之何。明年（旧历）秋季定要换我，但学生间感情颇好，而喜欢我底教法，或不易换吧。”<sup>①</sup>

寒假里，他曾去长沙，再次会见毛泽东，向中共湘区区委汇报工作，并研究了进一步加强衡州党的工作和对学生运动的领导等问题。一九二三年春天开学后不久，爆发了震动湖南全省的“三师学潮”。这次风潮的直接起因，是学生们发现政府发给他们的伙食费中，竟有将近五分之一被校长刘志远等克扣贪污了，因而激起了公愤。加之刘志远平日顽固守旧，总是用封建专制的旧礼教压制青年学生，在大多数学生中不得人心。大家这次抓住了他的劣迹，岂肯轻易罢休。张秋人、蒋啸青等党员教师，对学生们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积极指导和支持。他们和党、团组织研究决定，由“后援会”、学生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袁痴、罗严、唐朝英<sup>②</sup>等公开出面，站在斗争第一线，团结和发动全体师生罢课，对刘志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地打击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动气焰。他们还发动了三百个同学上街游行，发表宣言，向外界通告“三师学潮”的真相，揭露刘志远等人的丑恶面目。学校反动当局非但无视师生

---

①张秋人1923年1月23日、25日给“玉英姐”、“子充兄”的两封信，复制件存湖南省档案馆。

②唐朝英，湖南衡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接替戴晓云任衡阳第三师范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是“三师学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6年任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常务委员、市农工商学兵联合会委员长、市总工会委员长、组织部长；1927年5月23日牺牲于湖南零陵。

的正义呼声，反而牌示开除袁等三人，这就激起进步学生的更大义愤。同学们遂派出七十个学生代表（后又增至一百六七十人）到省城长沙向教育司请愿，呼吁社会各界同情声援，闹得满城风雨，全省哗然。反动当局看到事态越闹越大，慌了手脚，急忙进行暴力镇压。他们通过追随支持校长的少数反动分子，向省城通电、呈报，诬控参加学潮的学生都是“捣乱的过激党”，进而攻击张秋人等进步教师，说“内有教员，是讲社会主义的”，已发现有五十三名进步学生“皆醉心于某之主义”。五月二十八日，省里专门派了一个委员，带着警察厅长、镇守使署的副官、知事以及二百多名军警，荷枪实弹，把学校团团围住。他们进校后，宣布开除五十三名学生积极分子（内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四十余人）；接着，刘志远陪同这一伙官员来到已有军警看守的张秋人的住房，很不客气地通知张秋人，说校方已将他强行辞退。那个与校长过去是同学的委员走出门来，杀气腾腾地大声对教职员们说，张秋人必须当天离开“三师”，否则恐有不便。张秋人知道在这里已无法存身，就向校方要了薪金和路费，告别了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的广大进步师生，从衡阳前往长沙<sup>①</sup>。

不久，张秋人由长沙回到了上海。同年七月，他参加了上海地方的全体共产党员大会，听取了出席党的“三大”代表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这次会议，根据中央决定，将原中共上海地委扩大为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党务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

---

<sup>①</sup>关于“三师学潮”的起因、经过以及张秋人在其中的作用和他怎样被辞退离开的情况，他在1923年6月8日写给当时团中央负责人“国昌兄”（施存统）的一封长信中，有相当详尽的第一手记述，该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委员会。当时，全上海的党员只有四五十人，张秋人同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张国焘、刘仁静等一起被编在第二小组<sup>①</sup>。八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恽代英、李求实等四人被选为团中央的候补委员<sup>②</sup>。不久，他又担任了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成为上海地区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经常代表团上海地委列席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被任为这个委员会所设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这时，他一面通过青年团的组织，举办吴淞工人夜校，在青年工人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协助党中央委员王荷波，在吴淞地区的一些工厂筹备建立工会组织；一面又通过党的“国民运动委员会”，为贯彻“三大”决议，努力帮助国民党上海地方组织进行改组，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而不倦地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上海地方的一次党员大会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央报告了国民党改组前后左右派的斗争形势、筹备黄埔军官学校的情况和对时局发展的估计；接着，张秋人在会上详细报告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上海国民党内所占的势力和影响。就在这次党员大会上，他和徐梅坤、杨贤江三人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候补委员<sup>③</sup>。六月，社会主义青

---

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纪事录》（1923年7月8日、7月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回忆录（六）》，《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②赵朴：《团的一次会议至二次会议（团的组织史资料之二）》，载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③《〈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纪事录》（1924年1月1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回忆录（六）》。

年团上海地委扩大改组为团的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他被选为执行委员，担任执委会秘书（即书记）<sup>①</sup>。此后，张秋人的革命活动和工作范围，从上海扩展到杭州、宁波、芜湖、南京等地，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三省一市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对这些地方的建团、以至建党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宁波地区的杨眉山、周天修、许汉城、汪维恒等人，都是张秋人的诸暨同乡或熟人。他在一九二二年起，就通过不断的交往和通信，向这些人传播党的影响，进行政治启蒙和思想教育。一九二四年一月，由张秋人在上海介绍，经党的上海地方兼区委审查批准，他们成为宁波第一批共产党员，回去后，就建立了宁波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波支部，直属上海区委领导<sup>②</sup>。一九二二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宁波建立组织后，更是经常得到张秋人的帮助和指导。一九二四年七月，宁波的团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团章规定，已可成立地方团委，就致函报告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委，要求派人前去组织指导。区委考虑张秋人过去在宁波读过书，熟悉那里的情况，又与那里的党、团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一致推举他作为区委代表前去指导。在他的具体帮助下，七月十三日正式成立了宁波地方团委<sup>③</sup>。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张秋人又一次到达芜湖，一面检查、

---

①③（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关于组织工作的大事记略》（1924年9月18日），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②中共宁波市委党史资料研究小组：《中国共产党宁波市（鄞县）革命斗争简况》，未刊稿。汪维恒：《有关张秋人同志回忆点滴》（1962年3月），未刊稿。

加强当地团的领导工作，一面进行建党活动。他亲自介绍安徽省立第二农业专科学校学生周范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和已在上海入党的王坦甫一起建立了芜湖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张秋人任支部书记。他以在当地新民中学任教为职业掩护，积极领导党团员，努力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公开鼓吹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李宗邨、王寄一等，进行斗争，在群众中揭露他们政治上的反动面目和其他丑闻，迫使李宗邨灰溜溜地离开芜湖，从而在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内确立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优势，为芜湖地区人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张秋人还参加了“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工作。这个运动最早是从一九二二年春天开始的，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为主旨，是中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年四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议下，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从那时起到一九二四年，张秋人曾多次回到中学时住过的教会学校所在地宁波、绍兴一带，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名义进行反帝宣传活动，在这些地方的广大青年，特别是教会学校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九二四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基础，在上海组成联合社会各界的“非基督教大同盟”，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总理“同盟”一切事务的委员会，张秋人和另外两名共产党人唐公宪、李春

---

<sup>①</sup>安徽省党史编写办公室：《安徽省党史资料（初稿）》。查子勤：《芜湖党组织的建立和初期的斗争》，载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史研究室编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蕃（柯柏年），是这个五人委员会的委员；张秋人起初担任图书委员，一九二五年二月改任执行委员，成为“非基督教大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他一方面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怒潮》（一九二五年一月），《帝国主义者与非基督教运动》（一九二五年二月），《传教西人刀俎下的青年》、《某教会学校写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五卅运动与教会学校》（一九二五年八月）等许多揭露和声讨帝国主义宗教和文化侵略罪行的战斗檄文；一方面又奔赴各地，指导斗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他从上海赶到宁波，亲自组织、领导当地爱国青年举行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示威游行。他带领群众在英国领事馆门前用英语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等口号。一九二五年的“圣诞节”那天，他又出现在安徽芜湖群众“非基督教运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反帝国主义演讲。

张秋人以“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名义在宁波进行活动时，有一天来到在教会学校当教员的诸暨同乡杨漱石的家里，看望借住在那里的杨眉山，遇到了也在杨家作客的几个笃信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师生。彼此寒暄了几句，就围绕着“宗教是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的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张秋人对于这次“遭遇战”事先毫无准备，对方却结成了一个捍卫基督教的“神圣同盟”，对这位著名的“非基督教运动”领导人，展开了车轮战式的围攻。张秋人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进行反帝宣传的好机会，就象出使东吴、舌战群儒的诸葛亮那样，从容对答。他列举了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传教、通商等手段，奴役、掠夺中国人民的

反动本质，理直气壮地指出，“非基督教大同盟”所广泛宣传的“神父牧师头里走，军舰兵队后面跟”，并不是要故意伤害教徒们的宗教感情，而是鸦片战争后八十多年中国人民目睹的历史事实。他的滔滔不绝的犀利词锋，令人折服的雄辩口才，驳得对方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杨漱石的妻子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辩论，却一直在认真地旁听着。眼看这么多教友被张秋人驳得无话可说、败下阵来，禁不住当众放声大哭。张秋人猛然想起自己的作客身份，这才中断了讲话，并建议把这场尚未结束的辩论另迁他处继续进行。在这次辩论中同张秋人交过锋的女学生徐成美，受到他的影响和教育，不久就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两人竟结成了伴侣。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以后，张秋人立即把以反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为主要目标的“非基督教运动”，引导到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更广泛的斗争领域中去。他以“上海学联代表”、“上海大学教授”等身份，多次到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声泪俱下地报告上海“五卅惨案”的真相，呼吁社会各界联合起来，组织“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会”等群众团体，开展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和声援、募捐活动。七月十一日，他又一次从宁波、绍兴到达杭州，当天就给“郑容兄”（团中央的代号）写信报告说：“我于八日抵甬，即到各同学处接洽，下午四时，召集全体大会……。首有书记报告最近情形，……继由我报告来意及扩大组织——民众的，C·Y·（共产主义青年团——笔者）的——与宣传反帝，并设法向公团提议募款”。他详述了宁波学生会因上次声援“五卅”惨案的宣传剧，与反共的国家主义者展开的一场斗争，以及怎样指导学生会用巧妙的斗争策略，终

于挫败国家主义分子反共阴谋的经过。信中还讲到：“绍兴情形不甚好，同志星散，现只有六、七（人），昨夜特召集开会，开会情形他们会来报告。”“我对于绍兴宁波二地方情形还熟，他们很需指导，倘若中兄无暇顾及，我可负点责任，请示知。”<sup>①</sup>

这时的张秋人，经过几年革命斗争的磨炼，政治上更加成熟，成了有胆有识，能够独当一面地指导革命群众运动的职业革命家。他深入到工农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一九二四年三月，曾用“秋蕊”的别名和慕翰的学名，在上海报刊上接连发表了《华界电车工人近况》、《在松江所见的农民状况》两篇调查报告。上海华界电车公司的工人，要求公司实现以前所应允的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的诺言，遭到资方拒绝。资方还叫警察厅拘留了工人代表、电车司机顾得标。为此，工人们登报发表宣言，呼吁社会舆论支持和声援，并准备进行罢工；公司方面也在报上刊登声明书进行辩解。为了对付资本家，张秋人对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赏罚在内）和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说：“我们站在第三者地位的，不可不将工人状况调查一下，再来评判。今将调查所得的，公诸大众”<sup>②</sup>。这篇报告，以大量事实说明了工人们的贫苦生活，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对阶级弟兄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上海附近的松江，是苏南的“粮仓”之一，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个富庶的“农家乐园”，很少有人知道那里广

---

①张秋人 1925 年 7 月 11 日给“郑容兄”的信，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②秋蕊：《调查·华界电车工人近况》，1924 年 3 月 22 日上海《民国日报》乙种附刊《平民周报》第 2 号。

大农民的贫苦生活。张秋人到松江走访了五、六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由于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使占全县人口极大多数的佃农、雇农，经济上极端贫困，文化上非常落后，揭示了一幅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中国农村血泪斑斑的图画。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了松江农村的阶级结构，指出在顶层的极少数大地主们，占田数十、百、千亩，“最大的地主占田八千亩之数”；小地主和自耕农（中农）在松江很少；而“佃农占松江人口十分之七八”，“他们勤耕苦做，仅得温饱，若食之者多，工作者少的人家，便温饱也不可得了。所以，他们底子弟每多助理工作，不能入乡村小学，若要到都市里去，便是做梦。许多小村庄里不但没有小学，连私塾也没有”，“知识底浅陋，自然不必说了”，而雇农则分长工、月工、短工三种，“他们租不起田，靠卖劳动力吃饭”，其物质生活的贫穷更“不如佃农”了<sup>①</sup>。

张秋人在从事青年团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传播和扩大党的政治主张和影响。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仅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他就发表了十一篇文章，平均每月一篇以上。

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许多人对列宁的名字还很陌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张秋人在《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一文中，热烈地歌颂了列宁的伟大历史功绩，说列宁“和马克思

---

<sup>①</sup>慕翰：《调查·在松江所见的农民状况》，1924年3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乙种附刊《平民周报》第3号。

一样伟大”，“他能顺着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根据历史的事实，深入群众的运动革命，以实行马克思底理论”；“如果俄国底革命运动中没有列宁底指导，十一月七日怕不会成功吧，至少，也要延些时日”，高度概括地介绍了列宁的主要贡献。当时，“列宁主义”的口号，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而张秋人却在文章中明确地提出：“列宁现在虽然死了，但列宁主义仍然活着，世界革命正因此而蓬蓬勃勃。我们中国底革命运动，也必须跟着列宁主义的灯，向革命的正轨上走啊！”针对当时革命统一战线阵营中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和共产党内刚刚露头的右倾情绪，他尖锐地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们，你们要中国底革命成功，你们也该学点列宁底勇气，毫不顾惜地拿起铁帚，扫除一切不革命的，而且反革命分子；你们应该毅然决然地实行你们所标榜的口号——‘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中国底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中国底‘十月革命’快要到来，我们拿着列宁主义的灯前进啊！”<sup>①</sup>这些犀利明快、振聋发聩的论述，在广大青年和革命阵营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秋人以同情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热情地向读者介绍非洲摩洛哥里孚农民武装抗击西班牙、法国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他指出：“摩洛哥人底英武的行为，是处于非洲‘黑奴’同样命运的中国人所应该仿效的！”呼吁“亚非二大洲被鱼肉的奴隶联合起来”，“打倒这共同的仇敌——帝国主义者！”<sup>②</sup>

---

<sup>①</sup>张秋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载1924年11月《中国青年》第52期。

<sup>②</sup>张秋人：《摩洛哥民族的独立运动》，载1925年8月《中国青年》第88期。

一九二四年冬天，帝国主义列强竭力鼓吹“Dawes Plan For China”（道威斯计划中国化）。张秋人立即发表文章，揭露“道威斯计划”的实质，就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为解决战争赔偿问题计划共管德国，要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的德国“沉沦为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使“德国底人民永远做国际帝国主义者底生产的奴隶”。他大声疾呼：“践踏在国际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中国人民呵！国际帝国主义竟要将共管德国的计划来共管中国了！我们若不要做德国第二，我们只有大家集合在国民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军阀和洋奴们！”<sup>①</sup>

在指导“非基督教运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过程中，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用外国传教团体和教会学校残暴压迫毒害各地青年和学生的铁的事实，驳斥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辩护士们的谎言，揭露其伪善和侵略的本质。这些文章，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的斗争的重要历史文献。

“五卅”惨案发生后不到四个月，张秋人及时总结了各地这一阶段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他正确地指出：“起初只是学生对于工人底反抗运动表示同情，予以援助，可是帝国主义一次屠杀，竟杀出一个普遍全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学生在这运动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依次详尽地介绍了上海、武汉、北京、天津、广州、济南、奉天（辽宁）等各大城市学生参加“五卅”运动的英勇事迹后，他热烈地赞扬说：“我们从‘五卅’惨案中显然可见中国学生群众对于中国民族底独立运动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很纯洁勇敢的”。他高度评价学生们在这

---

<sup>①</sup>张秋人：《道威斯计划》，载1924年12月《中国青年》第56期。

一运动中自觉地加强同工人阶级战斗团结的可喜进步，说：学生们看到工人“有伟大的势力”，“是最勇敢的，同时又知道自己没有阶级势力，若不加入一强有力的阶级中，便不能成就什么”。他欢呼“学生对于这种社会势力的认识，而且愿同这种势力结合，为中国民族底独立和自由而奋斗，实是中国民族前途之幸！”<sup>①</sup>

张秋人热心地向青年读者推荐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指出它“是指导中国工人做经济的和政治的奋斗的唯一刊物”，“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的灯塔，是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底军师。我们天天喊‘到民间去’、‘到工人群众中去’的青年，不可不人手一册。”<sup>②</sup>他还特意摘录了《中国工人》第一期上发表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中讨论指导罢工战术的一篇演说词，列举指导群众斗争必须懂得和注意的二十六个问题，向中国广大革命青年介绍国际无产阶级的宝贵斗争经验。

一九二五年四月，当黄埔军校内以反共学生贺衷寒、缪斌等为头子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党领导和支持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时，远在上海的张秋人，立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广州的革命青年军》一文，旗帜鲜明地热烈称颂和高度评价以“青年军人联合会”为核心的广州青年革命军，“是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文章特别赞扬和肯定了“青年军人

---

①张秋人：《五卅惨案中的学生运动》，载1925年9月《中国青年》第91期。

②张秋人：《介绍〈中国工人〉月刊》，载1924年12月《中国青年》第58期。

联合会”，“要把他们底主义精神和纪律传到中国各军队中，要使中国各军队都变成革命军，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sup>①</sup>文章指出：在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部的战争中，黄埔军校教导团的青年革命军，所以能以少胜多，每战必克，主要是因为内部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受过很正确的革命的政治教育”，纪律严明，保护人民，因而得到农工群众的欢迎、支持和援助。张秋人在他的文章中，对我党早期通过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努力改造“素来是野心军阀的工具”的旧军队，并探索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主要经验，作了初步的总结。这篇文章，不但在当时国民革命阵营中产生重大的影响，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诬蔑和攻击；而且在张秋人牺牲多年之后，到延安整风运动时，还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作总结我党历史经验的重要材料，选进《六大以前》这部党的历史文献汇编里，规定为党的高级干部所必读的学习文件。

张秋人杰出的宣传鼓动才能，受到了党的重视。为了加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党决定调他去广州，继毛泽东、沈雁冰之后，接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机关报《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他从上海到达广州，住进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毛泽东的寓所，和沈雁冰同室，睡在已经搬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的萧楚女所空出的床铺上<sup>②</sup>。他的到来，使广东的党、团组织都很高兴。三月二十二日，广东

---

①张秋人：《广州的青年革命军》，载1925年4月《中国青年》第74期。

②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回忆录（八）》，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团区委负责人杨善集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兴奋地说：“校务改组以后，……宣传工作无人，幸马英自申来，以之代理，现在工作已经就绪。秋人兄昨日亦抵粤，可以做文章帮助《少年先锋》出版（区伟〔委〕议决《少年先锋》为粤校处的公开出版品，主持人为马英、大英、善集，现秋人来更好了。此刊物四月一日可出版）”，“广州各部部委已经成立，工作亦略就绪了，又有代英、秋人在这里，可以商量一切”<sup>①</sup>。

张秋人在当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第八期到第十三期，共编辑了六期《政治周报》，每一期上都有他所写的重要政论文章，有两期刊登的全部是他的文章<sup>②</sup>。这些文章，不但对省港大罢工、粤海关事件、“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西山会议派分子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伪“二大”、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及时地进行分析评论，明确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主张和方针，忠实地发挥了革命喉舌的作用；而且由于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为后人研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政治周报》停办后，张秋人先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国民党广东省青年部举办的第一、二届青年训育员养成所担任教员，热情地向学员们讲授“各国革命

---

① 《粤校教务长（杨）善集报告第2号——教务处改组后的工作情形》（1926年3月22日），复制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② 包括《最近的粤海关事件》、《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事件》、《香港罢工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经过与反响》、《国民政府下的工人运动》、《国民政府下的除盗安民运动》、《国民政府下的五月“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国民政府下的工农教育大会》等共计八篇署名文章，发表时间为1926年4、5两个月。

史”<sup>①</sup>。不久，张秋人又被派到黄埔军官学校，担任入伍生部和第四、五期学员的政治教官，讲授“各国革命史”、“国民革命概论”、“苏俄研究”等课程<sup>②</sup>。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前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到职的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既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为公开宣传革命思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方便条件。除了恽代英、张秋人外，担任政治教官的还有萧楚女、安体诚（存真）、熊雄（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著名共产党人。他们开设各项政治课程，定期举行政治讲演，在学生中以区队为单位定期举办政治讨论会，接待到黄埔军校参观的国内外各界代表，在校刊《黄埔日刊》上设立“政治问答箱”，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活动。军校政治部曾把被称为“广州三杰”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解答学生提问的内容，汇编成《政治问答集》，印发给学生学习参考。张秋人回答学员的提问以及参加接待来校参观各界代表的座谈、讲演，不但旗帜鲜明，内容准确，文字简练，深入浅出；而且能够区别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听众闻之甚为明了”，“异常感动”，“尽欢而散”<sup>③</sup>。

---

①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载《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9月。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

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7篇：《政治训练与政治工作》，存广东中山图书馆。《黄埔日刊》第206号（1926年12月4日），存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

③ 1926年12月9日、14日《黄埔日刊》第210、214号：《校闻》，存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

一九二六年九月，张秋人在向来黄埔军校参观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团和香港总工会代表团发表的讲演中，着重指出：“黄埔学生，大多是工农的子弟，因此，更能实行党的农工政策。同时农工也能拥护和帮助黄埔的学生”。“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黄埔决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你们应该用这工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完成国民革命”；使“听众异常感动”<sup>①</sup>。对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前来参观的五十余名女生，他除了介绍黄埔同其他军官学校不同处，在于有革命的政治教育外，又针对听众都是妇女的特点，强调指出：“创办本校最辛苦而努力者，为实行本党主义廖党代表（指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笔者），今妇女运动讲习所的主办者廖夫人（指何香凝先生——笔者），也是实行本党主义的健将，希望诸同志毕业后，能够象廖夫人一样的为主义去努力，深入民众中去宣传，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sup>②</sup>在接待广州市立中山小学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等三百多名参观者时，他又着重寄托了对于革命后继人的殷切希望：“现在革命的势力已有极大的发展，但成功尚不知究在何时。希望各位将来为黄埔学生的后继者，以完成革命的使命。”<sup>③</sup>而在同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旅行团所举行的谈话会上，他又言简意赅地启发这些信教青年，帮助他们认识“基督到了今日，乃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各殖民地的工具，已完全失去耶稣当日对付罗马专制的革命精神”<sup>④</sup>。

---

①1926年12月9日、1927年2月10日《黄埔日刊》第210、254号：《校闻》。

②1926年12月14日《黄埔日刊》第214号：《校闻》。

③1926年12月22日《黄埔日刊》第221号：《校闻》。

④1927年1月6日《黄埔日刊》第228号：《校闻》。

### (三)

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张秋人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通缉对象。他接到党组织要他撤退的紧急通知后，立即离开广州，转道前往武汉，暂住在中央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所在的武昌两广书院，一面等待党中央分配新的工作，一面经常接受组织上交给的临时任务。他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讲演，剖析时局，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鼓舞群众的斗志。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也公开反共，张秋人又秘密离开武汉，来到他战斗过多年的上海。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张秋人已不能公开活动，只好和杨贤江、沈端先（夏衍）等人一起，寄住在虹口有恒路一号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这家公司的主人蔡叔厚，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收容和掩护了许多被国民党通缉搜捕而跑到上海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有“小孟尝”之称。因为都是浙江同乡，又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和语言，所以即使当着尚未入党的沈端先、蔡叔厚等人的面，张秋人也毫不顾忌地经常大声议论时局，发表政见。有一天，他看到几个过去在党内很知名的人在报上公开刊登“脱党启事”，就马上指给杨贤江看，并且痛心疾首地大声谈论自己对这些人的看法。杨贤江听了，只是淡淡的一笑，停了一会，低声说了一句话：“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一个性烈似火，溢于言表；一个性格内向，含蓄深沉，充分显示了两位革命者各自性格特点的这一番谈话，给在一旁倾听的沈端先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象<sup>①</sup>。

“五大”以后，全国各个跨省、市的区一级党的地方组织被撤销，先后建立了省委一级的地方组织。浙江也在中共江浙区撤销和江苏省委成立后不久，以原先的杭州、宁波两个地委的领导成员为基础，建立了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二七年七月，刚成立的浙江省委组织部遭到破坏，组织部主任张叔平和秘书处负责人马吉良被捕，全省三十二个县的党组织中，有七个被完全破坏<sup>②</sup>。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省委书记庄文恭消极动摇，称病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以个人代替省委全体写了呈报中央政治局的《浙江省委总辞职书》，不久，他就离开了浙江。为了迅速整顿、恢复遭受严重摧残和处于混乱状态的浙江党组织，加强省委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决定派张秋人回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张秋人虽然知道自己的政治身份早已公开暴露，在杭州熟人又多，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慨然从命。临行前，他对早年在宁波建团建党时就已熟识的潘枫涂（念之）悲壮诀别说：“看来，我的头是要砍在杭州了！”<sup>③</sup>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张秋人和他的爱人，随同主持浙江省委改组工作的党中央代表王若飞，从上海到达杭州。他们刚在城站华兴旅馆安顿下来，顾不上休息，便于当晚在皮市

---

①夏衍：《回忆杨贤江同志》，载1981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第5版。

②见1927年7月24日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主任王嘉谟代表省委署名的《七月份报告书》，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③潘念之：《大革命时期浙江党的组织状况和对张秋人、宣中华烈士的回忆》，载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浙江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3期。

巷嵛县会馆召开了在杭州的全体共产党员活动分子大会。中央特派员王若飞作了政治报告，原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王亦政在会上讲话，他说：“省委成立以来，三月于兹，中间因省委的不健全，党的组织涣散和机会主义病，活动人才的缺乏，党的经费的困难，工作很少成绩可言”，“纠正这种错误和缺点，是浙江党的新使命”<sup>①</sup>。这次会议正式改组了浙江省委，选出了张秋人、王嘉谟（小曼）、卓兰芳、贝介夫、卓恺泽等十一人为正式委员，俞伯良等五人为候补委员。张秋人决心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起，尽最大努力，在短期内迅速改变省委领导涣散软弱的状态。第二天，他立即召开新省委的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当前的主要工作。会议推选张秋人等五人组成省委常委委员会，张秋人担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负责人<sup>②</sup>。会议决定，在抓紧恢复、整顿、改组全省各县、市党的组织的同时，迅速贯彻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的精神，积极准备力量，组织各地农村的秋收暴动，以革命的武装斗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新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中，王嘉谟、卓兰芳、贝介夫、卓恺泽等，过去就与张秋人熟识，深知他的疾恶如仇、性烈似火的性格。从同志间的个人关系来说，他们非常欢迎他的到来，但从浙江严重的政治形势来看，对于党中央派这样一位性格豪放，习惯于向群众进行公开宣传鼓动工作的同志来领导省委工作，却深为担心，生怕出事。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张秋

---

<sup>①</sup>1927年9月27日《亦政同志在省委改组会中的党务及工作报告》，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sup>②</sup>1927年10月《浙江省委九月份组织工作报告》，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人同学来杭，此地负责同学均不满意”<sup>①</sup>，主要就是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心情。不幸的是，他们心中的隐忧，很快就成了严酷的事实。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张秋人夫妇在街上遇见两个久未相逢的诸暨同乡和亲友，他随口敷衍地说，自己早已脱离政治活动，这次是和新婚的妻子来度蜜月游西湖的。对方信以为真，就硬请他们一起去游西湖。不料，在湖滨觅雇游船时，迎面碰到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两个反动学生，张秋人一时疏忽，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拱手而别。这两个反动家伙也雇了一条船，从三潭印月到西冷印社，再到刘庄，紧盯不舍。待张秋人等从刘庄出来正要下船回城，他们就露出了狰狞面目，硬要“请”张秋人“到黄埔同学会去给同学们谈谈当前的形势”，并且口是心非地保证“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张秋人在情急万分之际，纵身跳上游船，吩咐立即开船，并用英语关照爱人说：遇着危险了，你不要慌张，你脱身回去赶快想办法把在旅馆里的文件销毁或转移出去。此时，敌人也紧跟不放，跳上游船。张秋人急忙解开鞋带，甩掉皮鞋，纵身跳入西湖，把藏在身边的一份党员名单踩进湖底淤泥。但由于他用力过度，陷在西湖底的“香灰泥”中，挣脱不开，终于被捕。他的爱人按照他的吩咐，和两个亲友在混乱中脱了身。等到反动派在全城进行突击搜查，派军警来到华兴旅馆时，他的爱人已从房内枕头蕊中取出了秘藏的党内文件，走下楼梯。因为敌人不认识她，得以再次脱身，安全地保住了党的组织机密。

---

<sup>①</sup>1927年10月《浙江省委九月份组织工作报告》，复制件存浙江省档案馆。

张秋人被捕后，从“黄埔同学会”被押送到警察局。几个月后，又被转押入浙江陆军监狱。审讯时，因为在杭州的黄埔军校反动学生有一百多人联名指控他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加之别的案件导致了浙江省委机关的大破坏，暴露了他的省委书记身份，所以他被当作要犯，扣上脚镣，不准接见外面的亲友，不久就被判处死刑。党组织和他的爱人、同志、亲友们虽然想尽各种办法力图营救，都因案情重大，不能奏效。

他被捕入狱后，虽然自料必死无疑，却并不因此悲观消沉，总是以自己豪放爽朗的性格，生动风趣的谈吐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断地教育、激励和鼓舞同狱的难友。被捕的政治犯中，有不少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人，他就经常向难友们讲世界各国的革命历史，从法国大革命讲到巴黎公社，讲到俄国十月革命，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受到深刻的教育。直到牺牲前一天的晚上，他还讲了“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给难友们上了最后的一课。张秋人还以坚强的毅力每天在狱中坚持读书学习五六个小时。难友们问他：“你既然等着枪毙，为什么还要天天孜孜不倦地读书呢？”他严肃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工作一天，在监狱里既然不能为革命工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他的这些言行，在许多青年政治犯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至死不忘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激励和鼓舞着他们，把监狱当作学校，为革命而勤奋学习，追求真理。当年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合盖一条棉被的薛暮桥，少年失学，正是在张秋人的光辉榜样鼓舞下，在狱中发愤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政治历史著作，还自学了外文，为出狱后的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事隔半个多世纪后，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家，仍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在“监牢大学”里的启蒙导师。他说：“张秋人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但他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在革命的艰险时刻，都充满了勇气和信心”<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十七），一个姓骆的反动法官，突然命看守提审张秋人。根据过去狱中的经验，凡是经他开庭的犯人，审讯后都被立即枪决。视死如归的张秋人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便镇静自若地整了整衣服，从容地走出牢门，并向难友们高呼：“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他来到狱中的小法庭，法官要“验明正身”，问他的年龄、姓名。他先是幽默地回答，今年阴历几岁，阳历几岁；讲到姓名时，突然拍案起身，厉声大喝：“老子张秋人！”趁敌人惊呆不备之际，他探身抓起桌上的一块砚石，愤然向法官头上掷过去，接着又把审讯桌一脚踢翻，吓得敌人丧魂落魄，急忙命刽子手把他推到监狱内的刑场上就地枪决。张秋人临刑前怒掷法官的壮举，惊破了反动派的狗胆。从此以后，他们枪杀政治犯，就再也不敢履行那一套“当面宣判”的“手续”了。

张秋人壮烈牺牲后，遗体被掩埋在杭州清泰门外。他的大哥张金表闻耗赶到杭州，忍痛收殓时，发现他身上被打了七个枪洞。遗体盛进棺木后，沿浦阳江水路运回家乡，葬在本村浦阳江东岸、浙赣路北侧的墓地里。一九八一年五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把张秋人墓列为重点保护的革命文物，供后人永远纪念瞻谒。

---

<sup>①</sup>薛暮桥：《忆张秋人、胡公达烈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革命史资料》第1集。

##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一、档案、报刊资料

1.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先驱》的介绍、第3集《平民周报》“非基督教特刊”的介绍。
2. 《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议事录》（1923—1927年），上海市档案馆编印。
3. 《芜湖范文、秋人、吴德给曾延的信》（1925年12月28日），安徽省档案馆团的历史文献复制件。
4. 《黄埔日刊》1926年12月1日至1927年3月24日，第207号至285号；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报刊资料室保藏。
5. 李义彬：《周恩来与黄埔军校》，1981年9月7日《人民日报》第5版。
6.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死难烈士英名录》（1945年4月）。

### 二、传略材料

1. 边风：《悼念张秋人同志》（1945年1月），存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文档处。
2. 逸名：《张秋人烈士传略》（1951年），存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文档处。
3. 陈修良：《张秋人烈士事略》（1979年10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浙江革命史料特辑》。
4. 湖南衡阳“湘南学联陈列馆”：《张秋人同志在三师》。

### 三、有关回忆资料（回忆录、谈话记录等）

1. 张秋人烈士家属周冲兰（二嫂）、张均表（四弟）、张伟良（侄儿继嗣子）、张章才（堂弟）的回忆谈话记录稿（1978年10月、1981年12月）。
2. 张秋人烈士亲属宣树高（姑表弟）的回忆谈话记录稿（1981年12月）、信件（1982年1月）。
3. 钱希均：《张秋人烈士回忆片断》（1959年）、《关于张秋人的情况》（1959年11月）、《关于张秋人烈士的回忆》（1974年5月），以及1981年4月、6月的访问谈话记录。

4. 徐镜平档案材料（干部自传）摘录、以及三次回忆谈话记录稿。
5. 金世桢：《忆张秋人烈士概况》（1969年2月）。
6. 嵇直：《关于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经过的回忆》。
7. 梁人伯：回忆张秋人在“三师”情况的谈话记录稿（1969年3月），存衡阳“湘南学联纪念馆”。
8. 陈修良：《五卅惨案与宁波学生运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
9. 王会悟：《党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妇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10. 刘静：《访钱希均同志》（同上）。
11. 薛暮桥：《张秋人烈士回忆》（1971年6月）、访问谈话记录（1979年1月）。
12. 张以民回忆谈话记录（1981年5月）。
13. 王一知回忆谈话记录（1981年8月）。
14. 阳翰笙回忆谈话（转述）记录（1981年6月）。
15. 《徐行之同志回忆本人革命简历和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浙江地方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第5期。
16. 姚天鹏回忆谈话记录（1981年10月）。
17. 王起莘回忆谈话记录（1981年11月）。
18. 许文谟：《忆述张秋人烈士被捕牺牲前后》，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革命史料特辑》（4），1981年5月。
19. 于渊：《张秋人烈士狱中二、三事》（同上）。

#### 四、敌档资料

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编：《铲共丛论·〈浙江省委之建立及破坏〉》，存浙江省档案馆。

# 郝清玉

佩军 梅芳

郝清玉是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于一九二四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河北正定特支委员、保属特委书记、省委委员兼农运部长、顺直省委（即北方局）常委兼农委书记，一度主持了顺直省委的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天津被捕，由于敌人的长期摧残，一九三五年九月病逝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 （一）

郝清玉、又名庆玉、庆宇，一九〇四年旧历五月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赵村，兄妹九人，他排行第二。五岁开始启蒙读书，第二年入本村私塾，十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辍学，参加农业生产，替父母分担忧愁。十四岁那年，为了生活，和大哥捧玉出外谋生，先到平地泉一家鞋店当学徒，后经人介绍又到北京前门外一家鞋店里当制鞋工人。“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想广泛流传。鞋店掌柜的侄子是北大的学生，思想进步，经常和清玉聊天，并带回些进步报刊给清玉看，使他受到了当时新思潮的影响。

一九二四年春，清玉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故乡。这时，他已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人了。回乡后，他很快结识了尹玉峰。尹玉峰曾在正定河北省立七中读书，是这个中学马列主义学说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正定师范也有一些进步师生参加这个小组。清玉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结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通过学习和宣传活动，为正定地区建党工作作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二四年冬，根据北方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正定特别支部成立，郝清玉、尹玉峰等担任领导工作。他们认真地分析了面临的政治局势，积极的承担起领导这一带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在党的工作开展活动初期，首先需要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构，制定一套秘密工作方法。尹玉峰说：“清玉是有名的皮鞋匠，我们就开个鞋店，这样联络机构有了，一部分同志的掩护职业也有了。”大家很赞成这个办法。于是，清玉四处筹集资金，聘请人员。一九二五年正月元宵节（按一般习惯在这天新商号开张），鞋店设在正定学府西街，正式开张。宽敞的三间铺面上，悬挂着“裕华鞋店”黑漆金字匾额。这天一大早，店“老板”郝清玉站在柜台里边微笑着迎接接踵而来的顾客，热情地与前来送贺礼的人们寒暄，给人留下了个地道的买卖人的深刻印象。

鞋店的事情就绪之后，清玉把店里的日常工作交给他老实忠厚的大哥捧玉管理，自己腾出大部分时间深入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他常说：最要紧的事，是到基层去，到农民中去，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受苦，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有觉悟的农民中发展党员。当时有一位农村教员对清玉的工作情景曾写过这样的话：“日走阡陌，夜宿草堆，饿食干粮，渴饮冷

水。”<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初，郝清玉和尹玉峰到北京向北方区党委汇报工作，李大钊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同年一月，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正定地方委员会（党团在一起），四月又改组地委，将党团分开，郝清玉、尹玉峰一直是地委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他们积极工作，到这一年的年底，仅正定一县（不包括正定地委所管其他县）就发展了二十四个党支部，有党员一百四十多名，团员四百多名，还在不少村镇建立了农民协会、平民学校等组织，为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领导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七年旧历五月，郝清玉等成功地领导了正定地区有万余群众参加的农民暴动。当时，奉系军阀为了搜刮民脂民膏，除预征钱粮外，又增加了二五附加“讨赤捐”和其他名目繁多的捐税。百姓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不少村子的群众吃榆树皮和树叶子，拿什么去缴纳粮税？偏在这时正定地区又下了一场冰雹，把即将黄熟的麦子都砸在地里。官税、天灾，逼得劳动人民实在无路可走了。为了带领农民反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压迫和盘剥，郝清玉等及时召开中共正定地方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利用五月十七日城隍庙会，举行农民暴动。接着，郝清玉和尹玉峰又在“裕华鞋庄”分批召开了地委委员和各支部书记会议，对暴动事宜做了具体布置，要求党、团支部，组织党员、团员、农民协会会员，利用各种方式到各村串

---

<sup>①</sup>转引自薄一波、刘澜涛、王从吾、李运昌、徐彬如：《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回忆战友郝清玉同志》，载198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通群众，多动员一些人参加这次庙会。郝清玉和尹玉峰等还到一些重点村去做了组织发动工作。

五月十七日是城隍庙会的正日子，赶庙会的人很多。上午十点钟，在城内戏楼广场，突然有人把红布白字的“正定农民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讨赤捐大请愿”的横幅举起，喊了声“集合了！”人们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队伍象滚雪球似的，越走人越多。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参加了；没有组织的赶庙会的群众，一听是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讨赤捐的，也自动参加进来了。人们高举着大刀、长矛、铁锹，呼喊口号，向县公署冲去。奉军士兵和伪警察荷枪实弹慌忙拦阻。郝清玉挺身而出，带着纠察队员赶到队伍前边，大声喊道：“奉军和巡警弟兄们，你们也是穷人出身，乡亲们叫官府衙门、天灾兵祸逼得走投无路了，够朋友的让开一条路！”<sup>①</sup>示威群众接着高呼：“反对预征钱粮！”“反对讨赤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声震耳欲聋，有的军警把枪缩了回去。郝清玉把手一挥，高喊：“乡亲们，冲啊！”人们潮水般的涌进了县署衙门。

县衙大堂的屏风挡住了人流。郝清玉想：大堂，几千年来作为反动官府压榨百姓的象征，这次一定要把它的“威严”打掉。他抡起三节鞭，把大堂屏风砸了个粉碎。这一举动鼓舞了农民的勇气，使原来仗势欺压百姓的“三班六房”吓得面如土色，两腿筛糠。奉军任命的县知事金某在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取消预征钱粮和讨赤捐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大长了老百姓的威风，人们奔走相告：“连衙门大堂都给砸啦，还有

---

<sup>①</sup>郝清玉 1964 年的回忆。

什么可怕的！”

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教育了农民，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解救自己。中共正定地委和郝清玉、尹玉峰等没有沉溺在这种欢乐之中。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敌人绝不肯罢休，必须积极采取对策，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他们利用这次胜利，加快发展农民协会、平民夜校等组织，进一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发展党、团组织；对城里的党组织也做了调整，有职业掩护的党、团员，没有暴露的尽量不要暴露，继续干下去，已经暴露的要调离原工作。郝清玉也辞去“裕华鞋店”经理的职务，让给大哥捧玉担任，并正式向工商局报了转户签呈。“裕华鞋庄”仍然担负着党的联络点的任务。

郝清玉作为职业革命者，继续深入农村，为更大的革命风暴的到来进行准备。

## （二）

一九二八年春节期间，郝清玉接到顺直省委的调令，要他赶赴天津，接受新的工作任务。郝清玉到天津后，很快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任党中央特派员的蔡和森对他说：“北方广大地区的农运工作还比较薄弱，你是搞农民运动的，有经验，工作有成绩，因此决定调你负责顺直省委的农运工作。”<sup>①</sup>这一年的下半年，由于工作需要，他的妻子秦兰也来到天津，从

---

<sup>①</sup>秦兰 1964 年——1965 年的回忆。



此，他的家就成为省委农委机关的所在地。他事后向妻子谈起过与蔡和森第一次交谈的情景，他说：“蔡兄是我们党的一位很有远见的领导干部，我们那次谈了很久，谈了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谈了我们党所面临的困难。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国革命遇到了空前的劫难。”<sup>①</sup>他还对妻子说：“我们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随时准备流血牺牲。”<sup>②</sup>郝清玉很少待在机关里，而是经常到顺直省委负责领导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察哈尔、热河、内蒙古等地巡视指导工作。

顺直省委由于不团结，严重影响了工作。党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决定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和刘少奇参与省委领导，并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顺直省委，郝清玉继续当选为省委常委。他坚持党的原则，极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针对党内团结以及党内有些同志在政治上发生动摇等问题，曾在顺直省委的机关刊物《出路》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既是共产党的信徒，共产党就是我们的终身出路，我们就应当处处恭敬她、爱护她，使她一时一刻的不要与我们分开”<sup>③</sup>。针对当时有些人借口省委、市委或某人的错误而闹分裂的情况，他指出：“不要总指责省委错误或市委错误或某个人的错误，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固然谁有错误，谁负责任，但党并不是某几个人的党，我们应当站在共同的立场上，一天一天的在工作中努力改造党、健全党，使党真正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sup>④</sup>郝清玉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团结同志、光明磊落的品

---

①②秦兰 1964 年——1965 年的回忆。

③④《出路》第 4 期，1928 年 12 月。

质，直到现在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很敬佩。他们说：清玉是我们党的一位很好的同志，他有胆识，有魄力，党性很强，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做出了表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取道上海来到天津，主持召开北方党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组织。北方党代表会议之前，郝清玉、陈潭秋、刘少奇和其他常委率领机关人员分赴各地，深入调查研究，为会议做准备。周恩来在同省委常委们的广泛接触中，对郝清玉全面客观观察问题的能力，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表示赞扬。十二月十七日，他在给中央关于顺直情况的汇报信中，总结了顺直省委工作及错误之后，就提出了改组顺直省委的具体意见，指出：“现时顺直除潭（陈潭秋）、郝（郝清玉）、刘（刘少奇）三同志可留在常委外，馀不够胜任”<sup>①</sup>。北方党代表会议于十二月底在天津佛照楼饭店开幕，到会代表四十三人。郝清玉在会上有过几次发言，透彻地阐明了自己的一贯观点，深得代表们好评。会议改组了原领导班子，选出了新省委，郝清玉仍当选为省委常委，继续担任农委书记。这次会议纠正了顺直党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使顺直党的工作开始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正如一九二九年八月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的那样：“去年十二月扩大会议将北方党从脱离原则的纠纷停顿状态中挽救出来，因此十二月扩大会议是北方党复兴的纪元。”<sup>②</sup>

郝清玉坚决贯彻执行十二月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路线。

---

① <冠生来信对顺直省委改组的意见>（1928年12月17日）。

② <出路>第13期，1929年8月。

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出路》上发表题为《顺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说：“党已渡过了十二月会议以前的危机，奠定了发展壮大的基础。过去的错误假如不能马上铲除，党的发展前途是绝对困难的。今后我们要根据六大大会的精神，及顺直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和决议案，有计划、有组织地、一步一步地、刻苦耐劳地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轨道。”<sup>①</sup>

十二月扩大会议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顺直和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顺直省委的领导下，出现了一个大好的革命局面。这期间，郝清玉曾一度主持顺直省委的全面工作。他热情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革命的影响，使党的各级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中，他十分强调灵活而又秘密的工作方法。他在总结天津、唐山、北平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时，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不注意秘密工作而造成损失的错误。他说：“首先就要说到我们的秘密工作不好，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技术工作常识，在一切工作上都表现着半公开的工作方式。但在主观上还以为非常的秘密，其实不然；再说到我们对少数叛徒的处理有姑息，不敏捷，这些叛徒，他们早就下了出卖阶级的决心，平心要做国民党反革命忠实走狗，在言论上、行动上早就表现出反动的真面目，我们应当用积极的方式在群众中宣布这些叛徒死刑，用群众的力量消灭这些叛徒”<sup>②</sup>。他进一步指出：“我们除了明白被破坏的主要原因与教训外，并应当认识目前的环境，加重自己的责任去努力工作。目前群众斗争潮流正在高涨，我们旧有的工作方法已不适当当前的环境，我们必须真正钻到群众

---

<sup>①②</sup> 《出路》第13期，1929年8月。

中去，与群众结成生死关系，继续领导群众工作、群众斗争，学习群众中秘密工作的经验……。”<sup>①</sup>

长期的地下工作，使他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他非常讲究工作效率，善于化装，行动快而敏捷。他的家长期作为顺直党重要的秘密机关而安全的保存下来，许多重要会议是在他的家里召开的。他的妻子秦兰机敏地为他们传递消息，站岗放哨，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衣裳，使这些为革命日夜奔忙劳碌，没有生活保障的革命者，来到这里就象回到了自己的家。

### (三)

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央派贺昌担任顺直省委书记，传达贯彻李立三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游击战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指示。贺昌到天津后，对顺直省委的组织机构作了多次调整，成立了京东特委，通过了地方暴动的决议，取消党团组织，成立顺直总行动委员会，成立北方局取消顺直省委，又取消北方局成立河北省委。多则三两个月，少则一个多月，组织机构就要变动一次，搞的人心浮动，不知所措。

这年七、八月，郝清玉以省委常委、巡视员的身份，调任保属特委书记。他的爱人秦兰和省委农委的部分同志，也随他一同来到保定。郝清玉等对保定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特委所面临的局势是严重的：敌人的疯狂破坏使保定地区党组织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至一开会就被敌人发觉破获，事

---

<sup>①</sup> 《出路》第13期，1929年8月。

实际上已处于无法工作的状况。郝清玉敏锐地感觉到，贯彻“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指示，在这一地区条件尚不成熟。因此，他坚决制止了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很少实际效果的集会游行、公开散发传单等“左”倾盲动活动。他指出：“要千方百计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完全进入秘密工作状态，真正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争取得到人民的保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更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斗争。”<sup>①</sup>

郝清玉经过调查研究，很快把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他知人善任，在熟悉每个成员的出身、特点、阅历之后，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在使用中帮助他们。大家感到在郝清玉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提高快，工作做得有成绩，很快改变了“开个会都很困难”的被动局面。有一次决定召开党、团委联席会议，郝清玉把地点选择在保定市有名的“白云章包子铺”，使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感到惊讶。“白云章包子铺”地处繁华街道，来往的人很多，为什么要在这里召开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呢？但这个地点是经过郝清玉慎重考虑的，他认为：

（一）越是繁华地方相对来说越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二）经过一段工作，已经打开局面，这个包子铺就是一个可利用的地点；（三）面对敌人的疯狂破坏，在这里开会本身对党、团特委的同志就是一个鼓舞。那天上午十点，“白云章包子铺”楼上雅座摆开了“宴席”，人们一边认真地听取特委书记郝清玉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一边警惕地注视着过往人等。当有人靠近他们时，郝清玉随机应变，立即转变了话头，闲杂人等过

---

<sup>①</sup>黎彦昌等 1981 年 1 月的回忆。

去了，会议又照常进行。郝清玉领导的保属特委，就是这样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着。

一九三〇年八、九月间，保属特委决定，在完县“五里岗”和博野、蠡县举行武装暴动，由特委军委书记张兆丰具体指导暴动准备工作。郝清玉向参战的干部、战士做了动员，号召大家：“勇敢杀敌，为建立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sup>①</sup>据薄一波等后来回忆：“两次暴动，都狠狠打击了敌人，对党以后的武装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作战经验，‘五里岗’暴动遭到了较严重的损失。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清玉同志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举行这样的暴动是不适宜的。”<sup>②</sup>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间，郝清玉回天津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贺昌在这次会议上，仍然传达贯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扩大红军武装，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指示。郝清玉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感到，这一指示根本行不通。他不仅在会议上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回保定后没有向保属党组织传达会议精神，还坚决顶住了省委关于撤销党、团组织，成立“特别行动委员会”的指示，保持了保属特委的相对稳定。在这段时间里，保属特委所辖的党、团组织，以及农民协会、贫农会、雇农会、青年工会、革命学生会、少年先锋队、反帝大同盟、织布工会、人力车工会、小商人同盟、争自由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

---

①转引自薄一波等：《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回忆战友郝清玉同志》。

②薄一波等：《我党北方农运战线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回忆战友郝清玉同志》。

来，当时虽然还没有达到郝清玉提出的“村村有党员”的要求，但多数村庄有了党员和党的小组在活动。

由于郝清玉从实际出发加强领导，不仅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同时也打击了敌人。他根据自己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总结了一套工作方法，概括起来是十六个字：“立场坚定，随机应变，视人出言，不离原则。”他很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党的纪律教育。在他的领导下，特委制定了一整套秘密工作的方法和制度。为了工作需要，他的家经常搬，在保定几个月，他就住过唐家胡同、秀水胡同、双井胡同等地方。党的接头地点也经常变动，如二师、六中、曹锟公园“别有洞天”、河北大学南门小桥、保阳第一楼的“南纸铺”门前、思罗医院、“白云章包子铺”、城隍庙、莲花池等等很多地方。由于严格执行了秘密工作的方法和制度，减少了党的损失。郝清玉担任保属特委书记这段时间，使保属特委所属四十个县、一个市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各种群众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获得了稳步的发展。

#### （四）

一九三一年三月，郝清玉调回省委。这时，由于省委机关出了叛徒，危险不时地向他袭来。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日夜工作着、忙碌着。有一天，他很晚才回家，一进门就对爱人秦兰说：“刚才费了很大劲才甩掉尾巴。我最近感到有些异样，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回来，你们和农委同志就搬家。”<sup>①</sup>

---

<sup>①</sup>秦兰 1963 年的回忆。

秦兰深情地望着丈夫，不想多说什么，因为她知道，他是不喜欢悲悲切切的。郝清玉胸怀坦荡地说：“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他的理想，为了工农民众不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他握住爱人的手，深情地继续说道：“不过孩子还太小，你又刚怀了孕，今后要你多受苦了。”秦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头扎在丈夫的怀里边哭边说：“你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定教育他们成人。”<sup>①</sup>

同年四月，由于叛徒的告密，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破坏，郝清玉在天津被捕了。他最初被关押在天津市警察局，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但他毫不动摇。在一次审讯中，敌人让叛徒当面指认，郝清玉的共产党员、顺直省委领导成员的身份暴露了。从此，他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六月间，郝清玉被押解到北平，同在天津、北平先后被捕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殷鉴、胡锡奎等几百名党的干部关押在宪兵司令部。在这里，敌人继续施用酷刑拷问和威逼利诱等伎俩，但郝清玉和他的战友们大义凛然，坚强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敌人将宪兵司令部和天津监狱来的共约一百余人集中于“陆海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判刑后，又押送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这座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法西斯的“反省”政策，在肉体上野蛮摧残，在精神上残酷折磨，并规定“反省”期限，到时不“反省”的就枪毙；要“反省”出狱，必须在报上公开发表反共启事。

---

<sup>①</sup>秦兰 1963 年的回忆。



一九三二年春，国民党中央派中央委员、职业特务刘建群、曾扩情来到草岚子监狱。从此，监狱在对共产党人进行更加残酷的摧残折磨的同时，又施展了一套让封建法官讲佛经、洋神父讲圣经等中西并用的“反省”手段，把那些不肯“反省”的人带上重镣、关进单身牢房。后来，还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定期“审查”，每六个月“审查”一次，三次“审查”仍不反省者就枪毙。与这种反革命的“审查”相配合，监狱采取了高压手段，不许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厕所也有看守监视，放风时间减少，还经常搞突击搜监。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郝清玉和他的战友们团结战斗，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一次、二次和三次“审查”。

敌人三次“审查”失败之后，不再搞什么定期“审查”了，而把“反省”手续简化到只要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以释放。一天，敌人拿着一份“反共启事”，对身患重病的郝清玉说：“我给你手上擦点墨，只要在这份东西上按个手印，就马上送你到德国医院去看病，放你出去，如果不按手印，就送你到天桥（刑场）去！”郝清玉从容自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要我叛党办不到！你们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人民，应该反省，我是革命到底，无过可悔，别说送我到天桥，到地桥也决不按手印！”<sup>①</sup>

狱中党支部为了改善同志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决定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开展为时一周的绝食斗争。郝清玉和他的战友们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他们向敌人提出了六项条

---

<sup>①</sup>转引自《天地有正气——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人民日报社1978年12月31日编印。

件：政治犯一律下镣；改善伙食；打开监门，犯人可以自由在狱内走动；延长放风时间；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增加取暖火炉。头两天狱卒端上好饭好菜，鸡蛋挂面，企图破坏绝食斗争，结果被同志们连筷子带碗一起往外甩。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生病、体弱的同志面临着严峻的生死考验。敌人抬来了担架并威胁说：“现在是死一个抬一个，死几个人我们不在乎。”牢房里没有任何回答，同志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和饥饿的熬煎。第五天、第六天，同志们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了，死亡时刻在威胁着他们。狱吏和看守走进监房时都戴口罩，说明牢房已呈现一股尸体的气味。到第七天，敌人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匆忙派来专人，要求谈判，并表示绝食者的要求可以满足，请大家复食。薄一波等作为狱中代表同敌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病号一律下镣，其他政治犯换三斤轻镣；监门早开晚闭，可以在监内自由走动；增加取暖炉；改善伙食；订阅《华北日报》、《益世报》、《大公报》，还可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每次一小时。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的时间里，大家利用争得的这些条件，在狱中进行学习和身体锻炼，为出狱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打基础。

经过绝食斗争，郝清玉的病情更加恶化，住进了单人牢房。他是多么希望和同志们在一起啊！他的心里想的是每一个同志，总是关照大家要搞好身体、多吃一些，准备出狱后能为党更好的工作，争取为党尽可能多的保存下几个干部。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就在生命垂危之际，仍向同志们说：“看看今天的报纸，有什么好消息？”当时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朱、毛率领红军向陕甘方向流窜”。郝清玉听到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太好了，太好

啦！他们过来了就好了！”<sup>①</sup>由于敌人摧残，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一九三五年九月，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儿子郝清玉，在敌人的监狱里与世长辞了，时年三十二岁。

**作者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天津历史博物馆：《关于中共顺直省委的建立、组织建设和几次改组的情况》（讨论稿）。
2. 胡锡奎：《一场长期、持久、紧张的监狱斗争》，载《北京日报》1961年7月24日。
3. 《中共正定党史》（讨论稿）。
4. 薄一波、刘秀峰、刘澜涛、李运昌、王从吾、徐彬如、周仲英、黎彦昌、王志远、秦兰、郝捧玉等的回忆资料。

---

<sup>①</sup>周仲英1980年8月的回忆。

# 夏 曦

刘晴波 雷 子

夏曦，字蔓伯（也作蔓白），化名劳侠，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七日（农历七月十四）生<sup>①</sup>于湖南益阳县桃江镇（解放后划属桃江县）。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参加了新民学会，是省内群众运动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以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党的“五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犯有贯彻执行肃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后，继续担负党内外职务，并任红六军团政治主任。一九三六年二月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

##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走向革命道路

夏曦生于农村集镇附近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夏樾巛教过私塾。夏曦幼年在乡下读《论语》、《左传》、《诗经》等书，开始学写诗文。一九一五年，夏曦十四岁时考入了益阳县立龙洲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一些新知识。

---

<sup>①</sup>关于夏曦生年，有的书籍记为1900年或1902年，不确。现据夏曦夫人龚玉泉所述和刘崑林撰《忆夏曦同志》（稿本现存湖南省政协）订证。

当反对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群众运动扩展到益阳的时候，他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了街头的演讲宣传，在年轻人的心灵中激发了爱国热情。夏曦在校内学业成绩良好，曾被评为优等学生。他在该校两年毕业后，打听到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不收学费，还能供给伙食，于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考入了这所省内著名的学校，被编入第一部第十六班<sup>①</sup>。在这所学术空气浓厚、新思想活跃的学府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胸襟豁达的有志青年，他们经常聚会，热情严肃的讨论国家大事。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该校毛泽东、蔡和森和何叔衡等十多人，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朝气蓬勃的团体，后来成为五四时期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

夏曦这时受到新文化的薰陶和新民学会的影响，痛恨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日趋进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长沙以后，新民学会会友和广大青年群情激愤。他们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各种压迫，掀起了群众性的反抗浪潮，并于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通过了罢课宣言。在这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夏曦热情勇敢地走向社会的群众斗争中去。他先后参加了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人团，维持国货，调查日货，进行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七月七日长沙各界举行了焚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当张敬尧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迫害群众，并于一九一九年七月悍然解散了湖南省学联后，毛泽东和新民学会联合各界，发动了驱逐张敬尧的群众运动。不久重组了湖南省学联，十二月初长沙各校总罢课，并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省内各

---

<sup>①</sup>刘崑林：《忆夏曦同志》。

地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处进行宣传 and 请愿。夏曦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和柳直荀等被委派在长沙组织通讯团，主持省内外通讯联系，编印驱张通讯，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报道各地请愿团驱张运动的情况，以促进省内外驱张运动的开展。他在主持通讯团工作期间，曾和何叔衡等先后前往衡阳<sup>①</sup>，以第三师范为基础，健全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几期《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并在利用直皖两系军阀矛盾以加强驱张运动方面，起了明显的作用。因此他被张敬尧视为“过激党”分子之一，遭到通缉。夏曦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受到了革命的洗礼，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加入了新民学会<sup>②</sup>。他在学会中经常参加关于政治、社会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往往到深夜才回到学校宿舍。

十八岁的青年夏曦，紧随着时代的战斗步伐，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重要的转变和明显的进步。夏曦被列入公开发表的黑名单遭到军警通缉之后，回到益阳家乡，在双江戴氏族学任教员，教育管理五十多个学生。他还教唱国耻歌曲，讲解列强侵略史实，同时还积极宣传新民学会的进步主张，激发学生爱国上进的热情<sup>③</sup>。一九二〇年六月，张敬尧自长沙溃逃以后，各校复课，夏曦也回到了一师复学。这时，他和蒋集虚等

---

①参见唐耀章撰《湖南学界驱张运动前后》，载《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李维汉著《回忆新民学会》，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②《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说：民国8年“下半年乃有下列诸人入会”，即罗耻迂（宗瀚）、蒋集虚（竹如）、向警予等22人，夏曦名列第三。

③刘崑林：《忆夏曦同志》，戴武仁口述记录，现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按：刘、戴均系当时学生。

人“尽力于第一师范之革新”<sup>①</sup>。同年九月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正式成立，成员多是新民学会会友、学联骨干和教育界进步人士，夏曦是该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五四运动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日益增长，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湖南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一些有志青年，开始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讨论着建立共产党的有关问题。一九二〇年十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建党的重要准备。夏曦几年来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又进行了一些社会斗争，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因此他成为湖南早期的团员之一<sup>②</sup>。新民学会为了探讨革命道路的有关问题，于一九二一年元旦召开了新年大会，在广泛地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的之后，一月十六日，该会由何叔衡主持在文化书社召开本年一月常会，继续讨论在共同目的之下“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当时会友有出省出国、从湖南做起等几种想法，夏曦认为自己“深信工、学并行与体、脑共用之理。想一方面研

---

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

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团员调查表》（1923年至1925年）中“（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1923年11月）”，夏曦为1921年10月入团（并注明已加入国民党）。此表为夏曦于1923年所补填，其加入国民党时间，实际上在参加青年团和共产党之后。据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称：“夏曦和郭亮等同志都是（湖南）第一批团的参加者”。易礼容谈党的创立时期在湖南的一些情况（载人民出版社《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刘崑林：《忆夏曦同志》，所说相同。按上述《团员调查表》中1920年入团的计13人，无夏曦、郭亮。因此，本文在夏曦入团时间上写为“早期的团员之一”。

究教育，一方面学习工艺”，“在师范毕业后任教员几年，教书时并兼从事研究与练习工艺，十年后，再出洋”<sup>①</sup>。当讨论“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时，他准备将来“想从事手工业”，“拟于年内着手办一小印刷局”。对于这个打算，何叔衡认为“可以商议进行”。毛泽东说：“文化书社有此计划……还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一个编译社”。夏曦因此又自告奋勇说：“如有人帮助组织，愿任进行”。大家认为“此事甚属重要”，遂“决定另行筹议”<sup>②</sup>。

一九二一年秋，当毛泽东等回湘建党之后，同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sup>③</sup>，夏曦和郭亮这年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sup>④</sup>。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成为我党早期曾经“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

---

①②《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③毛泽东回忆谈话称：“那年（1921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8页）所载相同。肖三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说：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此文1945年印出，后未发行，在其《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所附“几点重要更正”中，说到上文第六章有一节题为《可纪念的“七一”和“三十节”》，见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7页）。

④关于夏曦入党时间，因建党初期档案资料缺乏，有关同志也无记述，不明具体时日。笔者曾函询肖三同志，1982年7月3日复函云，1924年与夏曦相识以来，他“从未谈过他入党入团入国民党等具体情况。”刘一华所述为1921年10月。现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42年关于蒋啸青烈士入党时间批注（称与夏曦、郭亮同时入党，为湖南最早的党员之一）、《周恩来选集》上卷《注释》第129条和一般说法，订为与郭亮于1921年同时入党。



人”之一<sup>①</sup>。

## 站在反帝反军阀群众运动的前列

在中共湖南支部正式建立后，次年“五一”前后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此，湖南的革命运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夏曦积极地投入湖南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尤其在青年团的建设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统一战线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美、英帝国主义等九国将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开始举行华盛顿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举行）的消息宣布后，共产国际为了对抗这种争夺远东霸权和宰割中国的阴谋，决定准备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sup>②</sup>。为此，中共中央工作部派员来长沙联系，经毛泽东等选拔，确定了湖南前往参加会议的成员，夏曦是其中代表之一<sup>③</sup>。夏曦等被选派出席这次会议，在长沙和全国都是一件大事。虽然党为了安全起见并未宣扬，但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热情的祝贺。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二十二），

---

①毛泽东的回忆谈话，所举为罗迈、夏曦、何叔衡、郭亮、蔡和森等8人，见《西行漫记》第124页。

②此次会议名称，说法不一，现据《先驱》第10号用此名称。

③据刘崑林《忆夏曦同志》、刘一华回忆录称，此次湖南派出的代表有任弼时、夏曦、罗亦农、王光辉、贺恕、欧阳笛渔、刘一华等。并见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周佛海在《扶桑爰影溯当年》一文中称“二十余人”，误。

夏曦所在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会举行大会，热烈隆重的“欢送赴俄的夏曦”，夏曦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也有发言<sup>①</sup>。之后，夏曦随中国代表团到达伊尔库次克再转莫斯科，参加了那次为时一周的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影响的会议。

一九二二年春，夏曦回到了湖南。五月五日，为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召开了纪念大会，夏曦根据平日所学和莫斯科见闻，发表了宣传共产主义的演说<sup>②</sup>。同年秋冬之交，在夏曦领导下，以肖述凡等为骨干，在第一师范组织了崇新学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全校同学加入者至二百人”<sup>③</sup>。这时，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也举行过几次公开的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夏曦为主讲人之一。特别是在青年团的教育方面，他经常“为主义、政治”进行宣传<sup>④</sup>。

为了开展县镇工作，夏曦于一九二二年暑假回到益阳桃江

---

① 《谢觉哉日记》1921年10月22日条，现存韶山陈列馆。

② “是日到会者一千人以上，……首由主席熊瑾玎报告开会宗旨，依次夏曦讲演《共产主义与俄国》，次毛泽东讲演《共产主义与中国》。”——载湖南《大公报》1922年5月6日。

③ 夏曦：《肖述凡同志事略》（1926年11月16日，原载《湖南青年》第5期，后刊《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文中未提及夏曦本人；据刘崑林《忆夏曦同志》云，该社为夏曦所领导，唯误记为1920年。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关于团务工作的报告》（1924年3月，排印件现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指出：崇新学社等为“学校内部之组织，均同志主持，在本校皆有势力之团体”。

④ 夏曦1923年3月17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国昌、务善诸同志信，排印件现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镇，提出以农村知识分子为对象，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团体，以便领导群众斗争。经过多人讨论，他起草了社章，在禁牌小学成立了新民共进社。通过这个团体教育培养和团结农村知识分子，进行反对豪绅贪污校产的斗争和男女平权的宣传<sup>①</sup>。熊亨瀚、刘崑林等都是该社二十多个成员之一，有些以后成为党的骨干。这年九月起，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为党训练青年干部。在毛泽东（该校指导主任）、何叔衡（主事）等主持下，夏曦和姜梦周、罗学瓚、李维汉等担任教员。在这所学校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学员达二百人以上，其中的优秀分子多由上述教员介绍入党，成为我党的活动分子<sup>②</sup>。

夏曦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和领导人之一，为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作出了贡献。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七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信中，对湖南团的组织、教育、宣传等方面作了详细叙述，特别是在全省工矿企业和各行各业方面更为注意。他说：全省团员“二百五六十人。工人占三分之一，学生占二分之一”，“长沙各工会中，有SY组织的已多<sup>③</sup>，长沙SY分子，工人约占百人左右”。为了加强湖南团的领导，他建议“组织（湖南）区执行委员会”，“衡州、安源诸地方团皆有此意”，而且在全国团代会已经延期的情况下，团的湖南区执委会“仍须先行组织”。后来按照这个建议，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建立了团的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夏曦在报告中强调团的活动要与各界的政治运动相结合，特别提出“拟组织民权

---

①据参加该社的戴武仁所述，成立时间为1921年暑假，现据刘崑林《忆夏曦同志》定为1922年。

②《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470页。

③“SY”，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号。

运动大同盟，以为公开的活动”。为此，当湖南《大公报》因抨击“省宪”丑剧被勒迫停刊后，他立即撰写了《〈大公报〉停刊与民权保障》一文，痛斥“省宪规定的言论自由，是欺人之语”，号召民众“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保障”；接着又写了《省宪的生死关头》的评论，进行揭露<sup>①</sup>。当时，湖南的青年团是全国发展最快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团的活动能与各方面的斗争相配合，为以后二运、学运、农运和社会斗争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在一九二二年反对赵恒惕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湖南的学生运动又趋活跃起来，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实行了整顿。夏曦从一九二二年冬至一九二三年担任学联干事部主任，毛泽民和夏明翰分别担任庶务和编辑。在党的领导下，湖南学联是青年团直接“主持之团体”，不但在湖南学生运动中表现了坚强的战斗性，而且在全国学联中也起了骨干作用，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sup>②</sup>。

夏曦任学联干事部主任期间，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继续出版并主编了学联的机关刊物《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在《本刊继续出版宣言》中明确指出：“本周刊……使它对内成为我们学生思想上、知识上的日用滋补品，对外成为湖南健全、真正的舆论。代表人民痛苦，向社会、政治、教育下严格的批评，并把它罪恶、弱点、病态赤裸裸的暴露出来”<sup>③</sup>。本期

---

①二文分载《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31、32期（1923年4月22日、4月29日）。

②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8—396页。

③《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28期（1923年12月17日）。

关于《湖南学生联合会对于会务进行的方针和计划》中确定：“重大政治任务，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改革中国的政治”，“因此学生团体的活动渐趋重于社会方面，如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从此学生联合会也就添了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改造社会”，以“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筑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光明世界”。在学联的十四条计划中强调了促进学生自治，与工会、农会等联合举办社会教育，组织学术研究会和学生俱乐部，加强宣传活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推动学校革新运动等等内容。这个方针和计划公布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湖南《大公报》、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驱》等，都曾有专文加以介绍和转录；《先驱》并载文评论说：“一向以革命精神丰足著称的湖南学生，现在已做了全国青年学生的先驱了”<sup>①</sup>。夏曦和李达、恽代英、李维汉等也经常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撰文，使这个刊物有力地推动了学生界反帝反军阀运动的开展。

一九二三年三月，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大会，夏曦代表湖南学联前往参加。他所提出的《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在《全国学生大会特刊》第五期上予以发表，《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予以转载，大会并采纳了这个提议的基本内容。夏曦在参加学生大会的同时，针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发表了一些评论，如请孙中山北伐、裁兵、工潮等等，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政治斗争<sup>②</sup>。他还代表学生总会参加了

---

① 《湖南学生的大觉悟》，载《先驱》第14期（1923年1月9日）。

② 见《全国学生大会特刊》第2、3期（1923年3月16、18日）。

上海国民对日外交会的工作，并及时把那里的工作情况、方针任务等介绍到湖南，从而促进了湖南外交后援会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为收回旅大事，“夏曦自沪来电，嘱发启市民游行大会”<sup>①</sup>。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即召开紧急会议，“与长沙各公团等四十四四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确定发动市民游行，定名为‘取回旅大运动湖南市民游行大会’”<sup>②</sup>。二十九日，以湖南工团联合会（毛泽东、郭亮为干事局正副总干事）、湖南学生联合会与各团体为主力，举行了约有五六万人参加的长沙全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四月五日，湖南外交后援会成立，并创办了《救国》周刊，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和会务报道。

夏曦从上海返回湖南后，在长沙船山学社召集学联代表会、职员联席会议，报告了学生总会开会详情。他讲论到北京学潮时说：“此次北京学潮，表面上虽觉失败，但实际已激起北京学生向改革政治的路上走，如请孙中山北伐，即其明显的表示”。他代表干事部提出并讨论了民权运动（议决增设民权运动部，促进民权保障会之进展）、外交问题（议决增设国民外交运动部，实行经济绝交等项）、追悼京汉工人问题（议决由联合会及各校派代表参与工界京汉追悼会，募捐救济京汉死伤工人）等项议案<sup>③</sup>。关于全国学生运动，他说：“湖南学生联合会右、江电发表，主张重新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省学生

---

① 《湘粤晋学生对于日本外交大运动》，载《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46期（1923年4月4日）。

②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第398—399页。

③ 《二十二日开会详记》，载《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31期（1923年4月22日）。

联合会多复电赞成，此即全国学生大会之所由召集”。会议的议决案，列举了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如学生活动之范围，学生对于现政治的态度，对于裁兵运动的主张，收回旅大及否认“二十一条”等。他以为此次大会的结果“诚不能认为圆满，然重新组织全国学生总会与确定学生运动之方针与范畴，此两点，不能不算是一种好现象，此后循此正轨以进行，使学生运动日益进步，是在总会之得人与各地同学之努力”<sup>①</sup>。对于上海学生总会这次遭受法帝国主义者查封一事，夏曦愤怒地说：“上海是中国的一块地方，法国巡捕房居然把我们驱逐了，这是何等的耻辱！”“这回事实在我们的教训：一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相勾结的压迫；一是日、法帝国主义者互相帮助的表现”，“我们要为自由而战，为自由向国际帝国主义者与本国军阀宣战”<sup>②</sup>。这些就是他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明确主张和态度。

夏曦这时又立即投入了外交后援会的斗争。他在《救国》的“五七特刊号”上发表了《爱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论文，指出中国所以遭受侵略而不能自强，是因为国内有封建势力与反动军阀专权卖国；因此要争国家独立自主，必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势力<sup>③</sup>。六月一日，日轮水兵殴辱湖南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又枪杀长沙市民二人，造成“六一”惨案，外交后援会即于当日发动全市罢市罢工罢课，抬尸向赵恒惕政权抗议请愿；次日又举行了六万余人抬尸大游行。反动派

---

①夏曦：《全国学生大会情形略述》，载《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31期（1923年4月22日）。

②夏曦：《学生之耻辱与教训》，载《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31期（1923年4月22日）。

③转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第402页。

在惊恐之余，宣布了戒严令，禁止学联等团体集会，并解散外交后援会。站在群众斗争前列的夏曦和郭亮、夏明翰等人，遂被通缉拿办<sup>①</sup>。

夏曦长于写作和宣传。在他从事青年学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的实际斗争时，还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新民》周报、《救国》周刊等报刊上共发表了文章三十余篇。他紧密结合运动中的思潮，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揭露问题，针砭时弊，有如匕首投枪，深刻有力，痛切疾呼，促人深省。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篇章，构成了他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质批判了某些人的所谓和平道路，指出“军阀不打倒，民主政治即不能实现，无论是联邦制也好，单一制也好，裁兵也好，争外交也好，都只是些空想”，“希望军阀觉悟，希望和平统一，在提倡者固自有其苦心孤诣，然而事实总是不允许的”，“我以为惟有采取以革命的手段，打倒万恶的军阀”<sup>②</sup>。

他在关于当时群众运动和罢工问题上，对全国特别是湖南工人大罢工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他为即将付印的《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写了《弁言》，他说：“要想成功一件社会事业，个人要牺牲，群众要能团结。水口山工人之大罢工，都能牺牲自己，服从团体，这种精神，就是他们战胜敌人的炮火，也就是值得大家赞美的所在”。但是“帝国主义的列强——英、美、日、法、意不打倒，祸国殃

---

① 《湖南省志》第1卷第516—520页。

② 夏曦：《和平与革命》，载《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31期（1923年4月22日）。



民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不推翻，无论是资本家、劳动者，都是洋人的奴隶”；“我们要大声疾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全国军阀！为全世界和中国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我们要用自己的权力，毁灭颈上的枷锁，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的权力是什么？马克思说：团结就是权力”<sup>①</sup>！夏曦这些思想论点，反映了他对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认识深度和工人阶级团结必胜的坚定信心。

夏曦在这个时期还注意到社会许多方面的问题，尤其对教育改革、农民运动以及学生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等等，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他说：“我十分不满意现在暮气沉沉的教育，以为足以断丧青年乃至亡国”。希望“教育家改革教育”，希望全国的学生们“莫为腐败的教育所支配”。他又就当时“一般教育状况批评其缺点之所在”，指出“偏于学校教育而忽视社会教育”，“不重视德育、体育、美育而偏重智育”，“学生之精神身体，不能平均发展”，“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数目、程度无差异，义务教育之不能普及”，以及一意模仿外国，不注意社会的实际需要等等<sup>②</sup>。

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论述农民运动和学生知识分子到乡村工作问题时指出：“中国的改造，大家不要忽视了农民地位的重要”，“在民众运动中，农民运动是占了极重要的位置”，因此学生们“回乡后应该做一种‘农民运动’的工作”。他在文中附了一张“地方农民状况调查表”，并且提出要在农村组织团

---

①此书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3年11月印行。

②夏蔓伯：《请注意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言》，夏曦：《对湖南教育会年会之建议》，载《新民》周报第22期（1924年9月11日）及第25期（1924年10月2日）。

体，如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村补习教育社等<sup>①</sup>。与此同时，他在益阳兰溪乡村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夏曦作为湖南群众运动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上述文章代表了他的部分教育思想和农民运动的基本观点。

对于中国当时的形势以及关于国民革命的方针和目的，夏曦作了较详的阐述。他曾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清朝的政权，仅仅改了一个民国的年号，所以民国十三年来，无一日不在扰攘之中”；而“其综合的原因，则为军阀制度之存在”，“而帝国主义各国家复利用一部分军阀，以为劫夺华民、抵制他国之工具”。所以“辛亥革命以后之中国，较辛亥革命前固江河日下也”。他又指出：“因此今日而言革命，断非以少数革命党，运动军队运动土匪之能事所可办到；亦断非利用一部分军阀，雇佣一部分军队所奏效者也。”他驳斥了所谓联省自治和法治分权等议论，说明“今日中国惟一救国之途径，惟有号召全体国民，以真正国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解除军阀武装，然后才可能达到革命党的目的。”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失败，正是吾人革命之好教训”。这些教训，主要在于没有“大多数民众”的基础，组织不统一与纪律松弛，而“当时革命军队，乃系利用旧时的军队，而未加以改组与训练”<sup>②</sup>。

关于进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吸取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上述论文中，提出了五个重

---

① 蔓伯：《欢迎学生到民间去》，载《新民》周报第11期（1924年6月26日）。

② 蔓伯：《双十节的回忆与感想》，载《新民》周报第26期（1924年10月10日）。

要方面：“（一）必须注重革命的宣传，使民众了解革命拥护革命；（二）革命的主义政策，必须适合大多数人民的要求；革命的势力，必须建筑在民众基础上面，因为革命要为人民而奋斗，人民方为革命而奋斗；（三）必须注意革命党的组织纪律训练，使党员不致中途变节，不致行动纷驰；（四）必须解除旧式军队的武装，创立人民的革命军；（五）革命发动以后，断不可妥协，必须夺取政权，以严格手段镇压反革命派”。他并着重指出，“以上五点，为革命成功最重要之方法”，而“欲求帝国主义之推翻，势非联络世界被压迫民族及苏维埃俄罗斯不可。此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夏曦在一九二四年探索中国革命的方法和道路时，提出了上述比较系统的基本观点，在当时还是很为突出的。

### 北伐战争中湖南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夏曦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大会之际，由于林伯渠的关系，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从中开展统一战线及有关工作。同年四月七日，他返回长沙时，被国民党本部总务部派任为湖南筹备处负责人<sup>①</sup>。

<sup>①</sup> 《中国国民党本部各部长联席会议第十九次会议记录》（1923年4月7日，排印件现存韶山陈列馆）中称：“民国十二年春”，“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中，已有几个是共产分子……由于总务部副部长林祖涵是共产党，又是湖南人，不久就有两个湖南籍的共产分子夏曦、刘少奇加入了国民党。”此与夏曦1923年11月所填《团员登记表》中注明“已加入国民党”相符。该记录又称：“民国十二年四月七日，总务部又派夏曦、刘少奇回长沙去担任一二两分部的筹备处主任。夏曦又抬出了他的共产党同志毛泽东协助他筹备。”

一九二四年，夏曦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委员。是年春，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开展湖南的各项革命活动，他和何叔衡等开始筹备国民党省党部<sup>①</sup>。一九二五年春，中国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有夏曦、何叔衡、李维汉等人，分别被选为执、监委员。一九二六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曦和毛泽东等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七月，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夏曦在国民党省党部中担任中共党团（即党组，当时代称为“民校党团”）书记<sup>②</sup>，又是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了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某些县份土豪劣绅、团防及清乡队诬陷农民为匪及破坏农运等案，议决开展湖南农、工、商、学、青、妇运动各案，发表了宣言，提出“援助北伐军”、“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假革命派”等八项奋斗目标。夏曦和唐生智、李荣植、凌炳、何叔衡、谢觉哉、熊亨瀚、董维健、周以栗等分别被选为第二届执行和监察委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八月二十六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为全省总工会，夏曦向参加庆祝游行的群众发表了演说。他说：“国民革命非工农参加，不能成功”，“将来之政府，非造成工农政府，不为彻底革命”<sup>③</sup>。这时全省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正开

---

①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页）称：国民党改组后，“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是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湖南的何叔衡、夏曦同志”等。

②见《王凌波的自传》（1941年4月17日写于延安），现存中央档案馆。王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中共党团副书记。

③湖南《大公报》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

始走向高潮。

在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以夏曦为首，会同朱剑凡等又准备召开省民会议，“结成农工商学民众革命大联盟”，开展湖南民主政权的建设，“以期政权归革命群众”<sup>①</sup>。同月二十一日，夏曦等三十余人参加了湖南省民会议筹备处第二次会议，积极进行筹备事宜。在全省农民协会已经普遍建立的基础上，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为了击退反动逆流，保障工农利益，巩固北伐后方和进一步开展工农运动，于是年十二月一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李维汉、夏曦等八人被聘为大会顾问<sup>②</sup>，指导工作。会上成立了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颁布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这些措施给予城乡反动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

夏曦在此期间，积极参加并主持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扩大统一战线和支援北伐。先是在一九二六年夏初，唐生智退守衡阳，湖南省国民党的组织已在粤汉路沿线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已达四十余万人之时，夏曦和郭亮、何叔衡、曾三、熊亨瀚等到衡阳组织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迎接北伐军和动员群众支援战争，并由此促进唐部向革命方面转化。这年六月，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并就任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时，夏曦和特别委员会诸人参加观礼，并与唐生智洽谈了一些重大事宜<sup>③</sup>。七月三十一日，唐生智在长沙检阅第八军及鄂军第一师，夏曦代表国民党

---

① 《湖南通俗报》1926年11月22日。

②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

③ 曾三谈话记录，现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省党部发表了演说。他在祝贺这些军队“已成为国民党的军队”之后，着重讲了“民众的权利问题”。他说：“民众的权利，对内的便是政权，着手的方法便是开国民会议；对外的便是争回自由平等之权，着手的方法便是取消不平等条约”<sup>①</sup>。当北伐军克复岳州以后，他和李荣植、熊亨瀚代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驰电祝贺，并立即在长沙成立了湖南人民庆祝北伐胜利筹备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到达郴州，来电邀请夏曦，并说沿途“见党部、农会组织完善，为他省所不及”。夏曦和易礼容、凌炳代表国民党省党部前往衡阳洽谈；接着，在长沙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夏曦以主席团主席之一发表了演说<sup>②</sup>。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留在南昌，不赴武汉，正在拼组反革命联合战线，企图另立中央；湖南的反动势力也有计划地向革命势力进攻。这时，中共湖南的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开始向反革命势力回击。夏曦在这个重要转折时期，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全国庆祝北伐胜利之际，他撰文指出：“今天虽然是北伐胜利庆祝的日子，但决不是革命成功的日子”。他在论述了全国的斗争任务以后，提出“在南方的工作……应该要促成民权主义的实现”，要“推倒一切封建势力，反对一切专政包办操纵”；而对于已经采取的革命措施，却“偏偏有许多人反对、怀疑、破坏，这种反对、怀疑、破坏，就是反对国民革命，怀疑国民革命，破坏国民革命”<sup>③</sup>。其锋芒所指，

---

①②湖南《大公报》1926年8月1日、8月16日。

③夏曦：《我们今后应该怎样斗争》，载《湖南民报》1927年1月1日。《北伐胜利总庆祝》，全国总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发行。

对于蒋介石和湖南反动的“保产党”、“左社”等等，不啻是当头一棒。一九二七年三月初，配合全省各地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夏曦等发动国民党省党部清除了刘岳峙（“保产党”头目、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等八人出党，封闭了“左社”在省城盘据的基地，并在全省追查“左社”组织。他在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参加了汉口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归来以后，作了传达，说明这次全会虽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独裁的决议，但蒋介石在南昌“另成一个政治中心”、“个人独裁，军事专政，有点军阀神气”，这不能不“激成了一个救党运动”。他还说：“这不过是新时代的一个第一幕”，“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而且这种斗争“更加紧张了”；“所有决议案，不过是革命派的指南针，反革命的照妖镜，我想一切反革命派都会在此照妖镜下表演出来”；“革命势力愈高，反动的工作也会加紧，不过反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他坚信“一切的反动的阴谋活动，都会要粉碎于革命派团结奋斗之下”<sup>①</sup>。

在上海、南京、郑州克复之后，夏曦认为“这不仅是党外的争斗加紧了，而且（国民）党内的争斗也会加紧”。他针对蒋介石等人的阴谋说：“右派正想拿到上海，想和上海的买办阶级以及一切集中在上海之官僚政客，来巩固他个人势力”，从已出现的事实来看（如蒋介石不经过国民政府，在沪宁杭铁路已委派人员等），“右派事实上（已）背叛中央了，背叛国民政府了”。“在湖南，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一天天激烈

---

<sup>①</sup> <夏委员（曦）关于中央全体会议之报告——在长沙市党员大会>，载<长沙评论>第22期（1927年3月31日）。

了，在这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形势发展中是不容中立的”。因此，夏曦在这时特别强调了“革命的利益归民众”，要打倒“假革命派、反革命派”，不能走“辛亥革命的旧路”。他指出：“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军阀，我们要以工农群众为革命基础”，“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sup>①</sup>。四月十日，以中共湖南省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名义发表了《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运目的，尤在于打倒土豪劣绅所赖以生存之封建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取得乡村政权；并且密函各地枪枝一律交农协。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了国民革命。李维汉、夏曦、郭亮等领导人立即发动群众，声讨反击蒋介石和湖南反动派。四月十四日，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六百多个团体，举行了十万余人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铲除压迫农民运动的军阀势力”。夏曦在示威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肃清反动派与团结革命势力》的演说。他说：我们在湖南所以“要肃清反动派，就是要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湖南”。“土豪劣绅起来反对”，目的是“要摇动革命政权”，因此“愈要肃清反动派，愈要团结革命派”；“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就是土地问题”，“现在可以断定，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就是革命派，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存地主制度的，是反革命派”。他明确提出：“湖南的斗争，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民运动为中心”，并且最后提请党员和群众注意，“我们

---

<sup>①</sup>夏曦：《在庆祝克复南京、上海、郑州大会之演说词》，载《湖南民报》1927年4月3日。



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团结一切革命的势力，肃清一切反动势力”<sup>①</sup>；与此同时，他又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的名义发出了公布《蒋介石最近反革命行为的通告》，指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倒行逆施较之张作霖、张宗昌为尤甚”，各县要“克日号召各该地方民众，举行打倒蒋介石示威大运动”<sup>②</sup>。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勾结，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十八日组织了湖南人民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举行反蒋大会，郭亮、夏曦等十三人被推为执行委员<sup>③</sup>。在省农协通令之后，有些县农协已开始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湖南出现了讨蒋和挽救北伐战争的群众运动。

四·一二政变后一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在十九日于汉口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等十七人出席，夏曦代表湖南省党部首先向会议报告了湖南情况。他说：“（湖南）有些地方的农民已自动的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因为非土地问题解决，无以解决一切农民问题，现在土地问题应马上解决”。又说：湖南“现在拟定没收土地的办法：（一）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先没收一百亩以上的，一百亩以下的不没收，自耕农不去扰及他；（二）到明年实行平均地权”。在随后的会议上，他又提出：“大地主的土地没收是不成问题的，小地主与自耕农是否没收是有问题的”，“根据此次决议草案，（有）很多矛盾”。他还说：“湖南的（土地）问题，即是全国的问题”，因此湖南不能单独完满解决土地问

---

①② 《湖南民报》1927年4月16日。

③湖南《大公报》1927年4月19日。

题，所以“湖南亦应赞成这个提议，用政治没收”<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夏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sup>②</sup>。这时，湖南已在开展讨蒋运动，五月八日起国民党省党部召开各县市特区党部联席会议，作出了《湖南土地问题决议案》和《武装问题决议草案》<sup>③</sup>，决定了镇压反革命问题，以进一步发动组织工农反击反革命势力。夏曦参加“五大”归来后，根据党中央主张，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拥护第二次北伐之报告》。他说：这次“北伐之目的，是进兵河南，攻取北京，扑灭张作霖。再进兵南京，解决蒋介石”，“消灭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他又说：“要巩固北伐既得的胜利”，就“要解放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他还提出了湖南人民在第二次北伐中应尽的责任和八项工作<sup>④</sup>。

党的“五大”以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时尚未离湘），夏曦继任省委书记。鉴于形势，湖南省委拟出了

- 
-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19日—23日），现存中央档案馆。按：党的“五大”会议上对土地问题，“当时争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政治没收；（二）一切没收；（三）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军人与小地主不没收。大会的决议，是第三条主张，以后感到有矛盾故未发表”，见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43年12月20日和21日在延安的讲话），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 ② 有些著述称夏曦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现据历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订正。后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六届中央委员。
- ③ 《湖南省志》第1卷第580—581页；谢觉哉：《镇压反革命问题》，载《湖南民报》1927年5月12日。
- ④ 报告原文载《湖南民报》1927年5月12日。

反击湖南反动派的计划，分别通知了各县。而湖南的反动派，在四·一二政变后与蒋介石相勾结，在省内进攻革命组织，残杀农民，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军官何健及其爪牙也正密谋在湖南进行反革命政变。当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刻，夏曦和省委一起，在五月中旬，又采取了一些对付反革命的紧急措施，拟出了“一个反攻的计划”，也就是“长沙附近数县进攻长沙的计划”<sup>①</sup>。在夏曦主持下，经过省委会议讨论，先后决定的主要事项有以下几点：通知各地农民自卫军加速整顿，准备组织义勇队，就地自卫，并派熊亨瀚等去岳州协助驻军防阻夏斗寅叛军犯湘；压缩公开机关，减少对外活动，并重新规定内部通行的机关代号<sup>②</sup>；成立临时省委（秘密省委），由林蔚、王则鸣、薛世纶等组成。五月二十日晚上，在夏曦主持召开的省委会议上，又决定加强工农武装，统一领导，由王则鸣负责；几个公开的出名的负责人离开长沙，转移外地就地指挥工作，并且发了路费，其中有夏曦、郭亮、柳直荀、滕代远等人<sup>③</sup>。根据上述计划，夏曦于二十日夜通知谢觉哉，要谢马上离开长沙，

---

①柳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1928年5月21日），载《布尔塞维克》第20期（1928年5月30日），《李维汉的自传》（1940年）和回忆谈话。

②以上见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团报告：《湖南事变经过情形》（一）（1927年6月4日），载《向导》第199期（1927年6月22日）；李维汉回忆（1977年11月、1978年9月25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7期，1979年7月2日出版；黄则民：《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页。

③李维汉回忆（1977年11月、1978年9月25日），载《党史研究资料》第7期；曾三回忆（1978年10月10日），载《党史研究资料》第7期；黄则民：《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

并囑谢通知朱剑凡<sup>①</sup>。他自己也于二十一日上午离开了长沙。临行之际，他送了一个条子到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办公室，说明他和凌炳到武汉找国民党中央去了。当日上午国民党省党校第二期举行开学典礼，夏曦和凌炳（该校主任之一）、李达（教务主任）都没有参加<sup>②</sup>。二十一日午夜，反革命事变发生了。

血腥的“马日事变”发生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了反击。事变之前，省委曾有主要负责人向湘东（如株洲、醴陵、浏阳一带）、湘南、湘西转移的安排。“马日”之后，郭亮、柳直荀、彭公达等在隐蔽中曾于长沙河西部署，用省总工会、省农协名义通知各县组织武装反攻。夏曦到达宁乡、益阳，指令省农民自卫军总队长武文元反攻长沙；失败后，他又令武文元占宁乡、扑益阳（该县有农民自卫军第三大队，此次死伤八百余人），均未成功<sup>③</sup>。郭亮又到平江、浏阳、醴陵一带，在浏阳组织了第一路指挥部，有毛简青、潘心

---

①谢觉哉1943年的一篇日记及1960年6月27日、1968年7月25日回忆记录。三次内容相同，前文转录《党史研究资料》第17期（1980年9月5日），后者现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按：柳直荀于五月十九日囑其爱人“准备搬家”，次日下午同爱人“作别”，隐蔽一月后，转移到了湘潭、株洲，见李淑一：《柳直荀同志传略》，载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湖南革命烈士传》，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2年版第96页。郭亮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告杨东莼（人杞）等离开机关，见杨东莼《关于马日事变等问题》，1960年6月25日回忆记录，现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②谢觉哉（当时为该校秘书长、实际代理校长）1943年一篇日记及两次回忆记录，

③《武文元的回忆》（1973年3月20日），记录现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另据夏曦夫人龚玉泉回忆，夏曦于马日事变后确到益阳。

源等五六人参加<sup>①</sup>。长沙附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反击敌人的政变和屠杀，使反革命政权惊呼：共产党“首领，多逃湘潭，啸聚宁乡、醴陵”，“希图大举”<sup>②</sup>。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中央的决定，这次武装反政斗争没有广泛地发动起来。接着夏曦在益阳桃江镇隐蔽，不久和郭亮、柳直荀等分别辗转到了武汉，随党中央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夏曦在“马日事变”前，进行了反击反动派的斗争，事变后也曾有上述反攻行动。但是，大革命时代，我党准备了群众，而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均准备不足<sup>③</sup>；湖南的党组织，遭到这种突然而紧急的巨大事变，更缺乏斗争和处理的经验。湖南的“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环境”<sup>④</sup>；“那时多么幼稚”，“明明的事看不见”，“不知道斗争要力又要术”。一些重大问题虽然有省委的决定（如负责人转移等），二十六岁的夏曦处此紧急状态，临事慌乱，枪未响先行离开，以致临时“无计划各走各的”，“省委自身走得很乱”<sup>⑤</sup>。作为省委书记，这是夏曦在“马变”之际的一个突出缺点。

---

①潘心源：《湘东各县综合性的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

按：马日前曾指定四路总指挥，见李维汉：《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

②湖南省政府张翼鹏寝电（1927年5月26日）载《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北京《晨报》1927年6月1日亦有类似报道。

③以上三句参见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④柳直荀：《湖南马日事变之回忆》。

⑤上引均见谢觉哉1943年的一篇日记。

## 在湘鄂西苏区的错误和黔东 根据地的创建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等率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夏曦从武汉到南昌，参加了这次起义<sup>①</sup>。当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夏曦是署名者之一<sup>②</sup>。当起义部队开始撤离之际，夏曦从南昌到庐山，遇到了矛盾，共同考虑着转移的问题<sup>③</sup>。接着夏曦化装去上海。

不久，他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在学习期间，“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sup>④</sup>。一九二八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夏曦于一九三〇年回国，被党中央派往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次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三月，夏曦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随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一九三二年一月底，湘鄂西党的“四大”后正式成立湘鄂西省委）。他和贺龙、万涛、关向应

---

①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②署名者有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夏曦、邓颖超等二十二人，载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③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载《新华文摘》1981年第1期。

④杨尚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大意，转录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到达)等都是主要领导成员。

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前段，对于反“围剿”，建设工农政权和游击队，发展经济文化事业，进行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的发展，他推行得更加积极。开始时，他曾受到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批评，对他“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是不适宜的”，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很低”<sup>①</sup>。但在他一九三二年一月主持的湘鄂西党的“四大”决议中，依然将“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要求“首先与鄂豫皖及鄂北苏区打成一片”，“以造成包围武汉、长（沙）岳（阳）的形势”，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并把“改造党”作为“保障胜利的唯一条件”<sup>②</sup>。为此，夏曦几次提出，红军应迅速向襄河北岸转移，开辟新的苏区。随后，同肃反联系在一起，曾一度解散了党、团组织（一九三三年三月），取消了政治机关，遣散了伤病员。他的这些“左”倾错误，尤其因为转向襄河北岸新区，将有造成红军脱离洪湖老根据地的危险，所以贺龙、段德昌、柳直荀等表示异议，发生过几次争论。在干部中，对取消政治机关、遣散伤病员等意见尤多。然而，夏曦脱离群众，凭借王明统治的中央的支持，排斥不同意见，使错误得不到纠正。他在贯彻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过程中，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

① <湘鄂西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议代表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中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1931年12月3日），现存中央档案馆。按：此次会议指责夏曦“有右倾的表现”或说是“一贯左倾机会主义或取消主义”等则是不对的。

② <湘鄂西苏区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2年11月27日），并经“中央分局审查批准”，现存中央档案馆。

在中央苏区进行肃反并且已经扩大化之际，王明等统治的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和一九三二年一月，向各苏区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出了指示，其中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视为“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特别指出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指示”介绍了“中央区、鄂豫皖、闽西等苏区（肃反）经验”，并说“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sup>①</sup>。夏曦等积极贯彻这些指示，在湘鄂西党的“四大”会议上，将“开展群众性的肃反工作”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及至一九三二年五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开展了肃反运动，并以“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错捕错杀了一些干部；然而这时的肃反面尚不太广，捕杀人数还不太多。随后，虽然肃反面相当广泛，并已扩展到红军干部中，但基本上还没有搞到党内、军内的主要领导干部层中去<sup>②</sup>。在肃反扩大化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之下，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中央又发来了指示信，不仅没有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反而指责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没有能够在斗争中加紧肃反工作的进行”，甚至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敷衍了事”，“使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些机会主义者能够一方面敷衍上级党部的指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指示的执行怠工，以致执行完全相反的路线”；并且在信中把敌军的

---

①《中央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1931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关于湘鄂西党目前组织任务》）1932年1月21日，现存中央档案馆。

②《湘鄂西夏曦（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8日），现存中央档案馆。



包围和“内部的肃反”相提并论<sup>①</sup>。由于这种错误指示，夏曦和中央分局所领导的肃反扩大化愈来愈严重。他这时也更为专断，往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数，把党内、军内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看作为敌我矛盾，把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表示异议和对夏曦有些意见的同志，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以“改组派”、“第三党”等嫌疑或者逼供材料为据，株连扩大到党内、军内的领导层中。从一九三二年五月起的四次肃反运动，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较一次严重，错捕错杀了很多好人，其中包括党内、军内的某些重要领导干部如段德昌等。这时，湘鄂西苏区的四次肃反已为根据地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惨痛的巨大损失，曾经发展到二万人的红军，到与六军团会合之前，只剩下四千人<sup>②</sup>，使湘鄂西苏区不断缩小。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所犯的这种重大错误，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产物<sup>③</sup>。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夏曦负有主要责任，但作为党组织的集体，也“不只是夏曦有责任，（作为中央代表的）关向应也有责任”<sup>④</sup>，其他领导人员也有一定的教训。

在这种严酷环境中，红二军团不得不进行缩编，被迫由洪湖向湘鄂川黔边转移。夏曦遂带领第七师和警卫团，经过江陵及鄂北游击活动，进至五峰、长阳、巴东地区。以后，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辗转到达黔东。

---

① 《中央为肃反问题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信》（1932年8月5日），现存中央档案馆。

②③ 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④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在转移过程中，第七师和第九师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鹤峰会合。夏曦和贺龙等共同商定，处决了由蒋介石派来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反革命“游说”的反动分子熊贡卿，粉碎了敌人劝降的阴谋。

这时，指战员从离开洪湖苏区后两年来的游击活动中，感到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于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于利川县十字路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根据贺龙的建议，讨论了准备以西（阳）、秀（山）、黔（江）、彭（水）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年五月九日，红三军占领了彭水。夏曦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处绝境，遂决定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军<sup>①</sup>。沿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的布告，说明“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争”，在“红军的纪律”十条中，列举的内容有“不拉夫、不扣船”，“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不进入家内房”，“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不乱杀人”等等<sup>②</sup>。

在黔东一带，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各县人民为“灭兵、灭捐、灭税”，自发地以“神坛”为号召，成立了名为“神兵”的组织，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湘鄂西中央分局对“神兵”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以夏曦和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共同署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这份文告说，“神坛”“起来反抗万

---

<sup>①</sup>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王庆澜：《红三军和黔东特区》，载《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3期。

<sup>②</sup>转录王庆澜：《红三军和黔东特区》，原件存贵州省博物馆。

恶的军阀和区长豪绅”，红军对“这种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表示万分的敬意！”“我们与你们正站在一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命的联合”。接着指出“神兵”的弱点、缺点和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的计划”，“没有代表工农劳苦贫民一致的政治纲领”，进而阐述了“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指明了“神兵”的出路<sup>①</sup>。从此，各地“神兵”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六月十九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原属沿河县，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夏曦和中央分局开始认识这种错误。按照会议决定，分局所属提拔了一批干部，恢复了红军中的党团组织系统和政治机关，各县也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特别重要的是决定筹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枫香溪会议是红三军挽救挫败局面的转折点，也是夏曦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

黔东特别苏区，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界。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夏曦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代表名义首先向大会致词。他用深入浅出结合实际的语言，论述了十月革命是我国应走的道路，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告诉边区的群众，相信皇帝、菩萨、神仙都没有用处，工农群众“要靠自己救自己”，“只有继续着这一反地主豪绅、反军阀的斗争，才有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要推翻旧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成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他最后提出了黔东特区“要立刻进行三件

---

<sup>①</sup>转录《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3期，原件存贵州省博物馆。

大事”：一是“实行土地革命”；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坚决同地主富农作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三千人参加红军”。会议讨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等六项决议，并决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夏曦、贺龙、关向应等八十人为委员，孙秀亮为主席<sup>①</sup>。

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共临时中央送来指示信，贯彻了六届五中全会的一些错误观点，但在强调要经常注意肃反工作的同时，也指出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过去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为此，夏曦于八月四日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在九月十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上年（一九三三年）三月巴东金果坪会议上，决定“解散红军中、地方上党和团的组织，举行重新登记，取消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等，是一个错误，“以致在某一时期红军中大部分陷于无党的状态”，“夏曦领导第七师单独游击时……没有集中军事力量”，中央分局“终于没有把湘鄂边苏区巩固起来”；虽然“相当克服了党内和红军内的恐怖”，但仍“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等等<sup>②</sup>。夏曦和中央分局虽仍旧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所束缚，没有实行根本的转变，但是这时已基本上停

---

① 《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记录及决议》（1934年7月），黔东革命委员会秘书处印，原件存贵州省博物馆。

② 《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4年9月10日），现存中央档案馆。

止了大规模的肃反<sup>①</sup>，红三军所处的斗争形势也逐步好转。奇袭沿河县淇滩、初战印江县木黄之后，同年九月下旬，夏曦率领第七师第二十五团、沿河和德江二个独立团，打垮了敌人从遵义调来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在贺龙指挥下，于二战木黄时歼敌二百多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夏曦很赞扬贺龙的这次战术<sup>②</sup>。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很注意基层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按照夏曦和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署名发布的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关于县区乡《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一九三四年六月）及前述《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先后在各县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一九三四年十月底，红三军也有了较显著的发展，并将“神兵”编为一千余人的黔东纵队（后为黔东独立师）。在各县游击队的配合下，有力地反击了敌人的围攻，稳定了黔东根据地。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这时建立黔东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新苏区，“建立了十七个区革会，约百多乡苏，约有将近十万人，纵横约二百里”。“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sup>③</sup>，“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sup>④</sup>。正由于黔东根据地的建立，有利于准备红二、六军团的会师，为红军长征途中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

①④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②王庆澜：《红三军和黔东特区》。

③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任弼时、王震、肖克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旬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十月中旬先遣部队到达黔东。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和松桃县石梁一带胜利会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对于这次会师，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夏曦更非常兴奋地说：“这是我参加党以来第二次大胜利”<sup>①</sup>。

会师后，同年十一月上旬，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他承认犯了严重错误，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紧张的战争环境，有些批评未尽恰当（如批评他“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在组织处理上，夏曦的领导职务也全被撤销。因此，夏曦既承认错误，又有若干意见。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sup>②</sup>对于夏曦的这次批评处理，在部队转移的情况下，于仓促中基本结束<sup>③</sup>。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后，中央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电报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反倾向斗争的重要目的是在教育

---

①饶兴：《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5期第193页。

②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③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按：《湖南省志》第1卷第703页称：1934年11月7日红二、六军团攻占永顺，13日撤出。

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sup>①</sup>。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后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sup>②</sup>。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员<sup>③</sup>、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继续在湘鄂川黔边区工作，参加了长征。

### 长征途中不幸牺牲

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从湘鄂川黔边临近出发长征的时候，中央发来了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为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夏曦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布。这是一个很好的布告，前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憨”；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sup>④</sup>。六军团各部队边走边打边宣传，到新化县时，提出了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的号召，七天之内就有一千人参加了红军。夏曦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他主持六军团的宣传文教和统一战线工作，鼓动全军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

---

①转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②据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称：夏去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在前，中央电报在后。

③1934年11月下旬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成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④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道理，对沿途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在贵州毕节县，他还注意团结地方开明士绅。该县的著名开明人士周素园（原名培艺），是清末的贡生，辛亥革命前在贵阳创办《黔报》，加入同盟会，贵州光复时曾任军政府要职；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参众两院任秘书和黔军总指挥部任秘书长。红军快到毕节时，国民党省政府行政专员英雄要周素园出走。周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军到后，在周家发现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有些书上还有不少圈圈点点。王震和夏曦得知后，两人马上去见周，问过经历，又问周为什么要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周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好，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和夏曦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说：“赞成，完全赞成。”这样，王、夏等请周出来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拥有一千人枪。周后来跟随长征部队一直到了延安<sup>①</sup>。

长征途中，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当时战斗频繁，伤员很多，他在政治部卫生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提到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沉痛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我们“一定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sup>②</sup>

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城内休整时，原想在贵州西部站住

---

<sup>①</sup>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周素园自传》，载《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第1期。按：周素园于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已去世。

<sup>②</sup>饶兴：《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



脚。为此，夏曦向贵州抗日救国军（下辖三个支队，多是中共地下组织联系指挥的）传达了 this 指示，决定在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进而创建川滇黔新苏区<sup>①</sup>。但是，在敌人进攻之下，红军休整了近二十来天之后，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开始从毕节撤出。在撤离之前，夏曦曾派政治部破坏部李部长前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联系，动员该部随同长征。李去后不见回返。部队撤离的头一天夜里，夏曦忧虑地对政治部总务处的饶兴说：前几天“李部长去席大明部，至今没有回来，部队撤退的时间，李部长是知道的，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万一部队转移后，李部长再回毕节就麻烦了。”次日拂晓，部队撤出毕节，夏曦在报告了军团部王震以后，决定在七星关附近接应李部长，遂带一个警卫连向七星关进发。在一个陡峭山路的河边上，前面是席大明部活动的地区，这里就是李部长回来的必经之路，于是夏曦和周素园、邓止戈（中共贵州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等在这里休息，等待着李部长的归来。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见人影。夏曦心里更着急了，他难过地说：“这次派李部长去，是我考虑不周，急于求成，又犯了‘左’的错误”；“要是出了事，我真该死，悔之晚矣！”话毕不久，李部长回到了七星关，向夏曦报告说：“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请夏主任到部队去作动员。”周素园、邓止戈分析道：席部武装是家族中二千余户共同出钱购买枪枝用以保家的，如果我们不离开黔西

---

<sup>①</sup>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席大明参加贵州抗日救国军和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按：原想在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曾先在石阡开会讨论（1936年1月19日），夏曦参加了会议。

北地区,他是我们的同盟军,如果我们离开了,他们是不会跟我们走的。但李部长还是主张请夏曦去动员。夏曦同意了李的意见,先派邓止戈和李部长过河,他留在岸上等着接应。然而,不大一会功夫,夏曦听到对岸响起了枪声。他心中十分焦急,便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两名战士,毅然徒涉渡河,前去了解情况。夏曦因工作紧张,身体疲惫,行至河心深处,忽然一股激流冲来,他和警卫员被卷进了旋涡。不久,在下游不远处,战士们发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尸体,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sup>①</sup>,夏曦时年三十五岁。

次日凌晨,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军团部里,王震、肖克等和战士们一起,在一个山坡上为夏曦举行了追悼会。王震在悲痛中讲了话,追述了夏曦的革命历程。在敌人的炮声逼近之际,夏曦被安葬在附近有一座石桥的山坡上。

**作者附记:** 本文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莫秀华协助收集资料, 谨志致谢。

---

<sup>①</sup>关于席大明参加贵州抗日救国军和夏曦牺牲经过, 本段据邓止戈 1979年5月8日给王震函件(王震同月25日有批示,肖克、张子意、袁任远一致认为属实,中共贵州委办公厅于1979年6月27日以18号文件下达,基本内容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21—224页)、饶兴:《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按:关于夏曦牺牲日期,各说不一。饶兴记为红军撤离毕节当日,周素园《光明日记》称“2月28日从毕节出发”(载《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第1期第33页),今依此而定。

# 王 凌 波

邹 秋 龙

王凌波，湖南省宁乡县入，一八八八年生。祖居宁乡第八区王家大冲。父亲王恕轩曾在私塾教书，中年以行医为业，有田二十余亩。凌波兄妹五人，他最小。十三岁时母亲去世，父亲送他就读于小金陀馆李藕苏先生门下<sup>①</sup>。同窗二三十人中，凌波年小，性格又耿直诚实，常受大同学欺负和戏弄；只有谢觉哉、姜梦周两同学很爱护他，时常给予保护，不许别的同学欺负。与此同时，他和姜、谢两人还结识了年龄更大的何叔衡。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他们四人成了莫逆之交，并共同走上革命的道路。

王凌波在小金陀馆读了三年，满十六岁时转入宁乡县立高等小学堂。半年后，又考取了湖南省高等学堂。他来到长沙，在岳麓山下这所学堂里读了六年（中学预科四年，本科两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而提前结业回乡，先后在宁乡、益阳县立高小、师范讲习所担任国文、史地教师，历时三年。一九一五年，他应在广东河源县当县长的老朋友张干清的邀请，到河源就任县府民政科长；后来还担任广东高雷镇守使署

---

<sup>①</sup>小金陀馆是宁乡县沩山区岳姓绅士所开设的私塾，聘请该县以饱学闻名的秀才李藕苏执教。

秘书和高雷道尹署科长。两年多的官场经历使他想做一个“好官”、在公务上“矢勤矢慎”的愿望渐趋破灭。加之各军阀之间连年混战，自己的一些朋友又在混战中死去，他感到衙门这碗饭再也吃不下去了。“鉴于殉名殉利的朋友多死于非命，从此不想做官，只想做好人了”<sup>①</sup>。于是，他决定弃官还乡，从事教育。

王凌波于一九一八年回到宁乡。经在云山学校教书的老友谢觉哉、姜梦周的介绍，他也来到这所学校任教。云山学校是当时宁乡县规模较大、校产较多的一所高等小学，也是学界新旧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他在该校先担任国文、体育等科教员，“因为他的才学的非凡，不多久就博得了全校师生的信仰。”<sup>②</sup>一九二一年秋，他被推为校长。这一期间，他把来云山学校教学，看成是自己“以后不落后，而且日益前进”的一个新起点，并且认为自己所以能够前进，是由于得何叔衡之力颇多。正因为他有坚持进步的强烈愿望，又有何叔衡等好友的指导和帮助，因而在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中，能够坚决地站在进步势力一边，有力地维护了学校的进步。他当时的一个学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追述说，王凌波担任云山学校的校长后，“学校不独改变了形式，内部的组织也更新了。所聘的教师大都是富有新学识的青年，先生生前采用的教育方针是——力求学生自动自治及新思想的灌输。记得当时的图书馆里，新书杂志有好几十种，都是先生设法从外搜集而来的。因为先生特殊的努力，学校的名誉空前隆盛了，学生也空前加多

---

①王凌波：《自传》（1941年），原件已于当时上交中央组织部，本文引自姜国仁所保存的亲笔附件。

②树青：《忆凌波师》，载1942年12月11日《新华日报》。

了。当时的云山学校的确可算为宁乡的文化中心。”<sup>①</sup>正因为如此，王凌波遭到了地方封建反动势力的激烈攻击。一九二二年七月，在县长召集的县政会议上，反动势力公然提出要改组云山学校的议案。王凌波当即予以严词驳斥，声震屋宇。县长和婉地说：“王先生发言，请细声一点。”他大声答道：“愤之所至，急不择言，请县长原谅。”县长无可奈何，结果决定云山学校仍由他主办。后来虽因反动势力的排挤，他曾离开学校，但不久又在进步势力的支持下回到学校当教员兼训育主任，一九二五年又再度担任校长。这时，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王凌波的领导下，云山学校越办越好，成了当时全县宣传革命的一个中心，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人才。他自己也因此受到鼓舞和教育。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县学界有新旧之争，旧派人物结合团防派及财团反对我们，当时有团匪、学匪、团阍、学阍之称，他们又称新派为三无党（即无父、无君、无礼义），旗鼓相当，一直闹到大革命开始，旧派势力始稍衰落，我的思想即在此鼓舞中逐渐转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sup>②</sup>

王凌波办学，对于聪明好学的学生经常给予鼓励；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不遗余力地资助；对于顽劣学生管教极严。有一次，老友张干清的儿子违反校规，他不徇私情，亲自给以重罚。他又善于团结全校师生和工友，大家都乐于同他一起为办好学校而努力。他同在校教课的谢觉哉、姜梦周两人更是亲密无间，朝夕与共。他后来回忆说：“彼此不曾讲过薪金多少，（教课）钟点多少……。努力读书，努力教学生，并努力与腐

---

①树青：《忆凌波师》。

②王凌波：《自传》（1941年），引自姜国仁所保存的亲笔附件。

败恶势力作斗争。不屈不挠，数十年如一日，精神上之团结一致，自谓无有出我辈之右者。”<sup>①</sup>

他在宁乡办学期间，还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当时，有的地主仍以小钱照数退还佃农在几十年前的押租。经过几十年时间，币值不断下跌，地主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吃掉佃农原来的部分押金。王凌波支持佃农起来斗争，为佃农发宣言、造舆论；同时调查五十年前小钱的购买力，坚决要求地主按几十年前小钱的实际购买力，折算成此时的货币数额退还押租，不能让佃农受损失。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因此，当地劳动人民都很敬佩他。事隔十多年，有位轿夫听到他在苏州出狱时，还特地远道跑去看他。

一九二四年，经过何叔衡介绍，王凌波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积极从事国共合作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他又由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前来宁乡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罗迈（即李维汉）的主持下举行了入党仪式。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一次飞跃。他说：“自加入本党后，才知道单是做个好人，还不够真正做人的意义，从此，便想努力做一个为大众服务的革命者。”<sup>②</sup>

王凌波入党后，任省委直属宁乡县支部书记。一九二六年三月，唐生智部进入长沙后，他奉调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作。后因唐部退守衡阳，他仍回云山学校任教。七月，北伐军攻克长沙，进逼武汉。他又来到省城，被推选为国民党省党部

---

①见王凌波 1939 年 1 月 4 日给姜国仁的信，原件藏湖南省博物馆。

②王凌波：《自传》（1941年）。谢觉哉：《不惑集》，作家出版社 196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书记长，并担任中共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团副书记。这时，何、姜、谢、王四人均为中共党员，为了掩护革命活动，都蓄上小胡须，象个老头子模样。一九二六年十月，他们在长沙聚会时合拍了一张照片，谢觉哉在照片上题了“宁乡四髯”四字，这就是以后传称“宁乡四髯”的由来。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王凌波转移到宁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避居在宁乡与湘乡交界的山村。次年一月，他化名王恕平来到益阳，在岳森部当了上尉书记隐藏下来，并随军到了沅陵。五个月后，湖南军阀何键密电缉拿他，他便辗转去武汉，旋即又转上海寻找党组织。前段他在沅陵时已从姜梦周处得知谢觉哉在上海的通信地址，并按地址汇款给谢觉哉收存。不料他到达上海的预定接头地点时，谢觉哉已去沈阳，何叔衡也到苏联学习去了。因为接不上关系，又回不了湖南，他只好辗转寄居于天津、北平一些故旧之间。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月，才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又回到上海一家同乡同姓的药店住下来，再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从沈阳回到上海的谢觉哉，并经过谢觉哉、毛泽民、李维汉的证明，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

恢复组织关系以后不久，党派他与谢觉哉、熊瑾玎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开办了一家兼卖杂货的天生祥酒店，掩护党的工作，他是酒店的“老板”。当时，熊瑾玎在中央做会计工作，负责管理党中央的经费。凡党内汇款需要铺保，向银行存款、取款需要户头，均由酒店出面盖章负责。同时，酒店还担负了掩护一些同志进行地下活动的任务。由于王凌波等的积极努力，这家酒店开张不久，便在同行中取得了信誉，他还被推选担任了酒店行会的“会首”。

一九二九年冬，党中央派王凌波与邓小平一起，去广西领导红七军的工作。他为交代店务，来不及与邓同行。后来乘船绕道香港去广西时，港英当局不肯签署入境护照。交涉月余未获结果，他按上级决定仍回上海。次年，在沪西主持一个秘密印刷厂的工作。

秘密印刷厂在一九三〇年九月遭到敌人的破坏，王凌波和杜延庆、杨匏安等十七人被捕，关在上海提篮桥西牢。他这时化名黄德宣，被判处一年半徒刑。由于他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抗议监狱当局克扣囚粮，因而受到敌人严刑毒打，右眼被打成重伤。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凌波刑满出狱，他身体虚弱，又染时疫，病情严重。经组织安排，他在沪西红十字医院治疗了五十多天，虽然脱离了死亡的险境，但健康状况一直不好。由于他一再要求工作，病未痊愈，就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央技术部。这个机关设在上海蒲石路一栋三层楼房里，他和张唯一等负责刻写钢板。年近半百的王凌波，眼睛又被打伤，视力严重消退，但他意志弥坚，每天晚上都伏案刻写着一张张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直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眼睛常常痛得流泪，仍然不肯休息。就这样，他在党分配的岗位上，坚持战斗了两年多时间。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sup>①</sup>。二月十九日，王凌波在敌人大搜捕时再次被捕，先与张唯一、黄文杰等一起被关押在善钟路捕房。两个月中，他被移囚几处地方，受过十多次审讯。任凭敌人威胁利诱，花招耍尽，王凌波始终

---

<sup>①</sup>王公道：《和凌波同志在狱中的日子里》，载《峥嵘岁月》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83页。



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情况。最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邵军法处判处他七年有期徒刑，送至苏州陆军监狱执行。

在监狱中，王凌波注意锻炼身体，坚持每天早起用冷水擦身，做室内室外的各种活动。他经常用“留得青山在，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和难友加强意志和身体的锻炼。他还向难友讲述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事迹，帮助难友学习文化知识。先烈们在牢狱墙壁上留下来的诗句，也被他用来作为激励自己和鼓舞难友的教材，使大家把坐牢的日子看成“过熔炉生活”，坚定革命到底的战斗意志。王凌波善于团结狱中难友，领导被捕的同志对敌人开展斗争。三月十八日那天，王凌波等在狱党员发动全体难友默哀悼念巴黎公社死难烈士；后来又联合各个号子罢饭，抗议敌人克扣囚粮，要求改善狱中伙食。这两次行动都取得了成功。对于狱中看守和在押的其他一些犯人，王凌波也做了许多争取和转化工作。他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争取看守同情革命，争取被押的其他犯人共同参加狱中斗争。即使在他与许涤新一起被解往苏州服刑的路上，他也不放弃对押送他们的宪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的宣传使一个宪兵深受感动。这个宪兵在同他们分手时曾说：“看来你们都是好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吃官司的。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啊！希望你们好好注意身体。”<sup>①</sup>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释放在押政治犯的要求，入狱两年零七个月的王凌波在苏州监狱被提前释放。他出狱后，先到上海，再到南京八路军办事

---

<sup>①</sup>许涤新：《屹立的青松——忆王凌波同志》，载《峥嵘岁月》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

处，经博古、李克农介绍去延安。党组织就他在狱中的情况作了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安排在中央秘书处做整理文件的工作。

同年十月，党中央派遣王凌波同徐特立去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一行于十月二十六日离开延安，十二月九日到达长沙。徐特立以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代表；王凌波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他在湘工作期间，生活刻苦，律己甚严，每天起早睡晚，不顾身体衰弱，视力损伤，总是拿着放大镜，孜孜不倦地阅读文件和书报。他对同志态度谦和，平易近人，组织纪律性强，深受大家爱戴，因而能够很好地团结办事处工作人员，协助徐特立开展工作。这段时期，办事处在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筹措军需物资支援前线，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作斗争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办事处成为我党在湖南公开活动的中心，在它的周围，聚集着广大的革命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国民党在放弃武汉后，又放火焚烧长沙。长沙市区被大火烧毁。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王凌波带领办事处人员移驻沅陵，以后又迁往邵阳。“平江惨案”发生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将新四军办事处的名义自动取消，只用八路军名义开展公开活动。然而，国民党顽固派逼迫日甚，为了保存力量，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被迫撤销，其他工作人员分配到桂林、重庆两地，仅由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进行活动，王凌波则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

义帮助徐特立工作。一九四〇年七月底，徐、王二人由邵阳转移到衡阳时，衡阳警备司令根据国民党顽固派的指令，通知徐特立限期离湘。是年八月，徐特立被迫先期离湘返回延安，王凌波被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他来到长沙，租居在白沙岭一栋民房里。这时，常有日本飞机盘旋轰炸，又有国民党特务暗中破坏。王凌波转移到衡阳时曾因借用民物从楼上跌下伤脚，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更加衰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千方百计与八路军、新四军保持联系；设法把徐特立的家眷及留下的书籍文件安全送走；对留在长沙的烈军属进行妥善安排（如他常给袁福清、陈永清等家里送生活费；又设法把罗学瓚烈士的儿子送进学校，交组织上维持他上学等）。当时他曾写诗一首抒发情怀，并痛斥顽固派的特务监视，诗道：

生平不多病，  
一病便难支；  
夜深灯作伴，  
鬼影显常姿。

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包围白沙岭，逮捕了王凌波和同他结婚不久的妻子姜国仁，关进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地牢。当“九·一八”事变九周年时，他们夫妇在狱中联句作诗，以志对顽固派的痛恨和坚信革命胜利的决心：

东北沦亡已十年（王），  
至今狼虎闯垓埏（姜）。  
血流漂杵沙场劫（姜），

鬼哭烧垣<sup>①</sup>井里烟（王），  
四亿民心金可镂（王），  
千秋史册党争妍（姜）。  
莫伤一己生和死（姜），  
且喜红潮浪击天（王）。

同年九月十九日，王凌波夫妇被国民党顽固派派军警武装押送离湘赴桂。途中，王凌波滔滔不绝地宣传抗日，使国民党士兵也被他的爱国热忱和抗日决心所感动，不愿再对他进行监视。在衡阳去桂林的火车上，同车的旅客也被他的宣传所感动。当车开到桂林时，其中有士兵和乘客自动先去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为他报信。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派人找到王凌波后，他在办事处工作了四十多天。十一月间，中央来电调他回延安。当时他对在办事处工作的李涛说：“中央如怕我遇险，那可不必。我想我还可以在外面多做一点工作。”<sup>②</sup>

王凌波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延安后，党派他任延安行政学院的副院长，院长是林伯渠。学院的任务是培养行政干部。他来到学院以后，主要负责校务工作。由于他谨言慎行，大公无私，能够听取意见和团结同志，沉着冷静地处理问题，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既有才、又有德，能排除纠纷、能解决问题的好领导。他关心师生生活，鼓励炊事员办好伙食，开展竞赛。他曾说过，对于学生，尤其是年轻的学生，穿衣、洗澡、夜晚盖被，都要去管。林伯渠曾称道说：“行政学院初

---

<sup>①</sup>烧垣，指长沙大火。

<sup>②</sup>谢觉哉，《哭凌波》，原载1942年9月延安《解放日报》，转摘自《不惑集》。

开办，困难很多。我挂名正院长，凌波同志从没推过责任，也不肯告苦。”<sup>①</sup>

王凌波对自己要求极严。他在一九四一年写的《自传》中分析自己的不足时说：“在此十余年中（指入党以后——引者），虽然坚定地认清了走的道路始终没有错，然而年龄日长，脑力日衰，尤其目力昏花，戴四百五十度的老花镜（俗称七十光），看五号字报纸，还很吃力；又前年在衡阳跌伤右腿，九个月方愈，现遇气候寒冷或多走山路，便感疼痛。有此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为党工作，又不能很好地加强自己学习。对党所给我的一部分任务，自问很难很好的完成。思念至此，不禁慨然！”

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早晨，他和教育处长余修谈完课程安排问题后，又去察看学生伙食，突然由高血压引起脑溢血，急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五十四岁。

一九六二年一月，徐特立为王凌波墓重写碑文，概括了这位模范共产党员革命的一生，碑文全文如下：

王凌波同志，湖南宁乡人，生于一八八八年，一九四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是青年运动杰出领导干部，入党后长期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曾在白区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十一年。其中三次下狱，在狱中近六年。凌波同志曾在中央技术部作机要工作，以无名战士的精神，埋头苦干。共产党员不怕一切牺牲，不择任何工作，听党的话，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凌波同志足为党员的模范。

---

<sup>①</sup>谢觉哉：《哭凌波》，转摘自《不惑集》。

# 宋 绮 云

江 山 胡民新 黄朝章

## 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宋绮云，原名元培，字复真，一九〇四年生于江苏邳县杲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宋家祖祖辈辈给当地豪绅杲氏当长工，终年劳累仍不得温饱。勤劳善良的父母及兄长盼望改变贫境，把希望寄托在小绮云身上，一家人含辛茹苦，积攒一点点钱，供他上学读书。

一九一七年宋绮云就读于离家十多里的土山峰阳小学，因家贫无力缴纳膳费，只得隔几天回家拿些粗粮饼、山芋、咸菜等，带到学校食用。因为贫穷，经常受到富家子弟的耻笑凌辱。他沉默寡言，奋发苦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业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sup>①</sup>。

一九二〇年，宋绮云高小毕业后，步行三百余里，考进清江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当时江淮地区为军阀马玉仁所盘踞，人民生灵涂炭，加上水灾连年，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六师校长徐慕杜，思想守旧，治校专横，学生在其威严统治下，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称他为“小皇帝”。一次周会上，他又

---

<sup>①</sup>参考宋绮云之二兄宋曜坤的回忆材料。

借训话之机，吹捧马玉仁的所谓“德政”。宋绮云非常愤慨，毅然登上讲台，列举军阀罪恶，据理驳斥了他的谬论，受到了全校同学的赞扬。一个星期六的晚间，宋绮云又约集同学数人，在清江西关普应寺古庙中集会，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一九二一年暑假期间，宋绮云和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进步学生郭子化、丁毅忱、李觉民、吴钟英等，在郭子化家中聚会，研讨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绮云说：“当前我们的国家，内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则列强觊觎，肆意欺凌。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若不急起推翻军阀，与民更始，举国团结，外御其侮，则前途不堪设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舍此别无他途。”<sup>①</sup>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六师全校师生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宋绮云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了极大的悲恸，并对临时执政、封建军阀段祺瑞误国殃民行为作了义正词严的指责。

一九二五年六月，宋绮云于六师毕业，返回邳县，任县立土山高小国文、历史教员。在课堂上，他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启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在课余，他经常组织学生阅读报纸，讨论时事，给学生教唱和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介绍秋瑾等辛亥革命烈士的斗争事迹，教他们朗诵爱国诗词。

一九二六年初冬，宋绮云接郭子化自武汉来信，得悉北伐军已于十月上旬胜利攻克武汉。这一喜讯使他深受鼓舞，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奔赴武汉，经郭子化引荐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

---

<sup>①</sup>参考丁毅忱、李觉民的回忆材料。

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一九二七年三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和军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回师武汉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军官教导团。七月，武汉政府叛变后，他们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八月三日部队到达九江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指示一批党员返回原籍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宋绮云和石玉如、张凤石等被组织派遣到南京，与南京地下党员康靖人、郭清洁、曹冷泉等秘密成立了南京党的临时组织——清凉山小组。后，党中央派孙津川来南京整顿党的组织，在浦口南面芦苇滩里，召开了中共南京市委扩大会议，出席人员有孙津川、宋日昌、宋绮云、康靖人、姚佐唐、曹冷泉、傅金凯、贺瑞林等二十余人。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在当时形势下的工作，并提出了“不遗余力地打入敌人内部，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行动方针。宋绮云由组织安排在南京市伪警察局长任警察大队长，以便掌握敌情，掩护斗争。一九二八年春，南京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决定逮捕宋日昌的密令恰好落到宋绮云之手。他连夜赶到宋日昌的秘密住所通知转移，使敌人逮捕计划落空。组织鉴于宋绮云也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于是调他离开南京到邳县工作<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四月宋绮云回到邳县后，参加以李超时为首的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李超时调东海县后，由他主持特支工作。同年秋，建立中共邳县县委，宋绮云担任县委书记。他通过关系打入伪邳县警备大队，任警备大队第二中队长。在这期间，他同大队副徐怀云、第一中队长宋学珍及姜景义等同

---

<sup>①</sup>参考曹冷泉等的回忆材料。



志，组成四人军事小组，以极大的精力做团结士兵的工作，并在警备大队中发展了四十多名共产党员。他还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深入各区，了解民情，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全县党员发展到二百多人。当时邳县各中、小学校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县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是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县党部也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左派控制，革命力量迅速增强<sup>①</sup>。一九二八年十月，宋绮云与他的战友，邳县县委委员、妇女会长徐林侠结婚。

邳县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震惊。一九二九年一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监察委员段木桢到邳县坐镇，指挥镇压革命力量。段指使徐州“剿总”刘峙驻扎运河的梁华胜团，星夜行动，拂晓包围了县城，逮捕了教育局总务主任李培南、县立中学校长佟虚吾、教导主任张继超、训育主任李广深、土山小学教师许又新、许运涵姊妹等六人。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宋绮云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步行一百五十余里，赶到铜山县，在贺村佟虚吾家中商讨营救办法，后又赶到东海县，向中心县委书记李超时汇报。不久，宋绮云带着党的指示，返回邳县。

宋绮云回到邳县后，首先在土山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部署斗争策略，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转移。这时，敌人反共活动异常猖獗，七月底，邳县党组织又遭第二次大破坏，县委委员徐林侠、县教育局局长戴蔚侠等十一人被捕。宋绮云外出活动归来，刚进入县境，即被敌人发觉，武装军警跟踪而至。他昼伏夜出，机智地应付着越来越复

---

<sup>①</sup>丁毅忱、李觉民的回忆材料。

杂的局面。为了保存力量，宋绮云接到上级关于“所有暴露身份的同志都要离开家乡”的指示，召集尚留在县境内的党员李觉民、宋学珍等会面，布置安排了转移工作。

## 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上

一九二九年秋，宋绮云在敌人严密搜捕下，离开家乡潜赴北平，等待组织重新分配工作。在此期间，他一面向《大公报》投稿借以维持生计，一面到北大文学系听课，并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一九二九年冬，经党组织批准，投往河南南阳杨虎城部队。一九三〇年初，经郭乐三、陈子坚等引荐，担任了《宛南日报》总编辑。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冯系军阀宋哲元、刘郁芬由陕西败退山西，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率师返陕，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绮云亦随军前往西安，主编《西安日报》。蒋介石对杨虎城早存戒心，他为控制大西北，派兵进驻陕西华阴、华县一带，在潼关设立行营，任命亲信顾祝同为行营主任。顾祝同为制造反革命舆论，在西安办了《西北文化日报》。一九三一年夏，由于安徽、江西、湖北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顾部被调离陕西前往“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北文化日报》为杨虎城接收，改为第十七路军的机关报<sup>①</sup>，任命陈子坚为社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由于陈子坚是十七路军办公厅主任，社长仅是挂名，报社的一切工作均由宋绮云负责。从此，宋绮云就以《西北文化日报》为舆论阵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直到一九三七年

---

<sup>①</sup>参见米哲沅：《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他才被逼离开《西北文化日报》社。

顾祝同在《西北文化日报》社安插了不少特务和亲信。该报被十七路军接管以后，这些人采用辞职、怠工、造谣等卑劣手段，企图把它搞垮。面对这种情况，宋绮云除安排一批地下党员参加报社工作外，还吸收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进来，乘机把反动分子清除出报社。从此，《西北文化日报》逐步以崭新的版面和进步的内容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张报纸每日出版对开两张，发行五六千份，畅销全国各省，并远销到南洋等地。另外，报社还办有《边闻通讯》、《西北画报》、

《地下新闻》等刊物。《边闻通讯》于一九三三年创刊，在银川、兰州、天水、西宁等地都聘有特约通讯记者，并派旅行记者经常到西北各地采访，每日发稿一份，供全国各大报采用。

《西北画报》创刊于一九三四年，刊载西北各地文物古迹照片，深受各阶层人士欢迎。不少历史学家、古文物收藏家纷纷提供珍贵文物资料，对宣传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起了很大作用<sup>①</sup>。

“西安事变”以前，陕西虽然在杨虎城的控制下，但它与其它国民党统治区一样，反动势力仍极猖獗。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这个阵地，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经常采用或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揭露敌人的反革命阴谋，反映红军的胜利，把党的声音传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一九三二年夏初，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对各革命根据

---

<sup>①</sup>郭子刚、曹冷泉等的回忆材料。

地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一九三三年元旦全国各大报纸在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控制下，在其“新年献词”中都大肆吹嘘南京政府的所谓“胜利”，唯独《西北文化日报》发表宋绮云亲自署名的元旦社论：《危机严重之新年》。这篇社论剖析了蒋介石连年内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特别指出了由于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致使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他尖锐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其将何以克服未来之危运？！”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西北文化日报》的《边闻通讯》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伟大胜利的消息。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为“围剿”我陕北主力红军，专程赶来西安视察军事部署。那一天，西安各大报纸都按反动当局的规定，在头版头条以特大标题报道了“中央社”的消息；而《西北文化日报》却按宋绮云的指示把它安排在第二条位置上，并将蒋字去掉了草头，标题成了《蒋委员长飞抵西安》。当天的《西北文化日报》很快销售一空，人们争相传阅。一时，“蒋委员长丢掉脑袋”，成为全城争相传说的笑料<sup>①</sup>。为此，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立即召见宋绮云，对其大加训斥。宋绮云沉着应付，以校对马虎难免出错为由，予以搪塞。由于省府害怕承担责任，也就未敢大肆声张与追究。

日寇入侵华北以后，蒋介石借口“攘外必先安内”，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先后秘密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

---

<sup>①</sup>曹冷泉、郭子刚的回忆材料。

协定”。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阴谋，激起人民抗日情绪，宋绮云连夜带领进步工人翻印“何梅协定”原文，并提笔撰写了编者按语，邮寄散发给西北各地学校及各界知名人士，促进了西北地区对国民党妥协卖国罪行的揭露和声讨，使反动派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何应钦之流气急败坏，限令陕西特务机关定期破案，但他们既想抓到揭发他们卖国丑闻的革命者，又不敢大声嚷嚷。

宋绮云就是这样，以笔作刀枪，以报纸作阵地，在古城西安，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投降政策和欺骗人民的伎俩，进行着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他撰写的《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八周年》、《今年国庆所感》、《何处是中国的出路》、《辟“安内攘外”之谬论》、《辟蒋介石之准备论》、《彻底肃清汉奸、拿办法西斯蒂》、《九·一八五周年》、《敬悼鲁迅先生》、《募捐援绥运动》、《纪念总理与解救国难》、《危机严重之新年》等文章，对提高群众觉悟，激发西北地区革命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文化日报》在宋绮云的领导下，以更加鲜明的旗帜，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回报社后精神无比振奋，连夜赶印出两期号外和传单。十二日上午九时蒋介石被抓回西安后，西安军民就及时了解了张、杨兵谏的经过和实质，以及八项政治主张的内容。十三日，《西北文化日报》又发表了《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全面论述了“西安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社论指出：“自上月暴日驱使匪伪汉奸侵入绥远以来，举国愤慨，万众齐

起，前方将士，既浴血而战，后方民众，更毁家而纾难，如此阵线，实为救亡图存的唯一办法。”“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发为义举，举行兵谏，号召全陕全国同胞迅起响应。”这一天，《西北文化日报》还发表了宋绮云署名的《呼声》诗一首：

千万重的压迫，  
千万重的毒怨！  
民情沸腾了，  
民情喷涌了。  
火山上谁能施着压力！  
四万万同胞，  
兴起！兴起！  
我们去饮敌人的血！  
四万万同胞，  
兴起！兴起！  
我们去食敌人的肉！  
只要我们铁似的意志，  
山可倒，海可倾！  
时候到了，  
渡过这血潮，  
那即是倭奴授首的时候了

十三日以后，《西北文化日报》又根据事变需要，连续发表社论和专文，有《双十二兵谏的伟大意义》、《双十二革命行动之前因后果》、《一片民众解放声》、《民众与张、杨的救

国斗争》、《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从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到自力抗战》等等。他在《剿共之停止、抗日联军之成立》为题的社论中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天下也！谁领导我们抗日，收复失地，我们就拥护谁。”明确提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造成日寇入侵、国困民穷的根源，只有联合抗日才是救国于危亡，拯民于水火之唯一途径<sup>①</sup>。

当时在南京的反动文人罗家伦之流，配合亲日派的所谓“讨逆”，炮制告张、杨的传单，用飞机在西安大量散发，公然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辩护，对张、杨二将军的义举进行恶毒攻击。《西北文化日报》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专门发表了《汉奸理论之贫乏》的社论，指出：“罗家伦之流所以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过是为了将来日本军阀来了还可以做个名流学者、幕僚政客……，其利害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结合在一起而已，罗家伦自以为代表民意，丑颜抛向光亮洁明之西北天空，谁不知道他是早已被人强奸过了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等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西安，向张、杨及其将领宣传党的“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使他们接受了我党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和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本人进行了责以大义的谈判和坚决的斗争，迫使蒋接受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西安有一部分军民认为放蒋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宋绮云根据周恩来关于只要我们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只要我们抗日救国的方针不动摇，我们就不怕蒋介石

---

<sup>①</sup>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翻脸的指示精神，及时发表了《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等社论，反复论述依靠团结、依靠群众、依靠斗争、依靠武装逼蒋抗日的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在于继续发动斗争、开展斗争、坚持斗争！而斗争之力量在于民众，民众为一切力量之源泉，民众为一切力量之动力。……唯有武装，更能增加民众斗争的力量，更能增加抗日斗争的力量。”这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鼓舞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宋绮云领导的《西北文化日报》，不仅是战斗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一个秘密据点。他先后安排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在报社工作，如邵幼和、丁毅忱、周西林、曹绶祉、曹冷泉、陈翰伯、边西巩、张从仁、张熙霞、刘渺森等。这些有较高革命觉悟和斗争精神的同志，以宋绮云为核心，组成了《西北文化日报》的基本队伍，战斗在革命的新闻战线上。

《西北文化日报》利用一切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中去，能在报纸上公开登的文章就公开登出去，不便刊登的文章就秘密印成传单或小册子广为散发，有时还直接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口头宣传。报社除经常编印《地下新闻》外，还先后秘密印发了瞿秋白著的《中国政府向何处去？》、云峰著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宋绮云撰写的《辩证唯物论》、《辩证法初解》等书籍，这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北文化日报》经常遭到敌人的捣乱破坏。报社不少同志遭受逮捕监禁，严刑拷打。特务机关的新闻机构常借新闻检查名义，不让发表一些带有革命词句的文章。宋绮云领导大家作了巧妙而坚决的斗争，或者用“开天窗”来抗议，或用锤子



将字迹敲打模糊，使有心的读者从模糊的字迹中仍可看出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敌人气急败坏，使出了特务的看家本领，偷偷纵火焚烧报社。宋绮云亲自带领编辑人员和工人抢救、整理，保证了报社业务照常进行，使报纸发行一天也没有停止。

## 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宋绮云在西安的战斗岁月中，除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新闻事业外，还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从多方面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三二年冬，鄂豫皖苏区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进军陕南、四川，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慌忙命令四川军阀刘湘、驻甘肃的亲信胡宗南和驻陕西的十七路军，从四面包围川陕根据地，妄图一举歼灭红四方面军。在此形势下，争取和团结十七路军，就成为这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央指示西北地下党努力做好杨虎城的工作，积极配合苏区红军的行动。宋绮云和进步人士杜斌丞一起，说通了杨虎城，并派武志平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促成十七路军孙蔚如部与红四方面军的谈判，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sup>①</sup>。宋绮云还通过武志平给红四方面军送去了川、陕、甘、宁、青军用地图和情报资料，以及蒋军的口令、信号和密码本等。当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接到这些材料时，激动地说：“感谢西北地下党的同志，你们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给予我们这么巨大的支

---

<sup>①</sup>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援，真是雪中送炭，这对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最大的支援。”根据红四方面军的要求，宋绮云还通过在汉中的武志平，建立了一条西安经汉中到川陕的红色交通线，全国各地报刊、通讯器材、医药用品等就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到被敌人封锁的红四方面军中，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为止<sup>①</sup>。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杨虎城的欢迎。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负责人陈赓派谢华、徐彬如等到西安，和在西安坚持工作的宋绮云一起，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为特支书记，徐彬如、李木庵、金闽生、宋绮云、童陆生等为特支委员。西北特支开始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派张文彬来西安负责特支工作，并明确特支工作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积极贯彻党的“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积极开展西安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支援中央红军。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以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为组织西北军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北特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杨虎城的积极支持下，按照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组织章程，组成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西北特支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西救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宋绮云任“西救会”宣传部副部长并负责总务和联络工作。他选派《西北文化

---

<sup>①</sup>以上根据武志平的回忆材料。

日报》的得力编辑人员，创办了“西救会”的会刊《救亡周刊》，并由《西北文化日报》社代为印刷和发行。不久，张学良指派由东北来陕的高崇民、车向忱、宋黎等，在西安发起成立了东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救会”）。

在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在“西救会”、“东救会”的共同组织下，一九三六年，西安地区群众革命风潮接连不断<sup>①</sup>。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西安文化界准备开会悼念，反动当局极力设法破坏。宋绮云按照西北特支的决定，巧妙地骗过敌人，以文化教育界的名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宋绮云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他说：“鲁迅先生是坚定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的，因而他强烈地同情于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的革命政党。”“他强烈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因而他也强烈地痛恨向日寇屈膝投降的汉奸卖国贼。”“鲁迅从来反对空喊革命的空头革命家，他近年以来，以病危之身，垂暮之年，犹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要求我国同胞，无条件地接受革命政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呼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于国家民族无限忠诚的表现。”“我们必须化悲痛为救国的力量，无负于鲁迅先生对于我们的希望。”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华军侵占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的大部分地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绥远驻军在傅作义领导下，奋起抗敌，重创日寇。全国人民纷纷发起援绥抗战运动。宋绮云连续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号召援绥抗战的社论和文章，还亲自组织为绥东将士的募捐活动。七月十八日，以各救国会和各校师生为主体进行援绥抗战示威游行，参加者

---

<sup>①</sup>以上根据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万余人，极大的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领陈诚等南京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策划“围剿”陕北根据地。这时，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西北特支成员，利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机会，组织各救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向蒋介石的住地临潼华清池进军。张学良害怕群众遭到镇压，赶到十里铺阻拦，并答应一周内一定给予满意的答复。西安革命群众的这次爱国示威游行，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特别支部立即给党中央发了急电，报告事变的经过和情况，请求中央指示。在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北特支通过“西救会”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将省党部的牌子换上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牌子；宋绮云负责接管了中央社陕西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秦风日报》等宣传舆论工具；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员有董英斌、吴家象、高崇民、郭维城、宋绮云等，这是三位一体的指挥机构<sup>①</sup>；他们营救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的政治犯出狱，宋绮云除组织募捐购置一百八十多件棉大衣给难友外，还派出记者采访他们，并以《女政治犯访问记》、《奔腾在大海里——政治犯速写》为题，在《西北文化日报》上报道了特务机关迫害政治犯的真象。同时，他还以救国会的名义，组织进步学生到工厂、机关、街道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宋绮云亲自编写了《抗日救亡宣传大纲》等在报纸上发表。特支还派人到工厂、学校、机关，协助基层成立了起卸夫业救国会、木泥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

---

<sup>①</sup>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会、运粮业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还出面联合西安各报业同人，发起组织了西安新闻记者救国会，制定了救国会章程，发表了《新闻界救国会宣言》，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十二月十六日，特支以救国会的名义召开了规模庞大的庆祝大会，支持张、杨兵谏，声讨蒋介石不抵抗罪行。张学良、杨虎城亲临讲话。西北特支成员与杜斌丞等商讨，将西安到陕北根据地的重要县份，如长安、三原、耀县、洛川、渭南、延安等县的县长，调整安排由爱国分子、救国会成员或地下党员担任。特支还组织慰问支援张、杨兵谏而进驻西安附近的红军主力部队。十二月十六日到渭南慰问，受到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等的接见。十二月二十日，宋绮云和杨虎城的秘书米哲沉等，受杨虎城的委托，到咸阳慰问红军第十五军团，并同徐海东夫妇合影留念。周恩来来西安后，对西北特支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接见特支成员时说：“西安事变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动起来的，张、杨受到群众的推动，加上你们把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得好。”

“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西安事变’的母亲。”“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央指示，在西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宋绮云为临时省委委员<sup>①</sup>。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违背了他对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当即软禁了张学良，随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压迫、收买、分化瓦解。一九三七年春，撤了杨虎城的职，令其出国“考察”。这时宋绮云的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在十七路军中留下去了。他

---

<sup>①</sup>以上根据徐彬如、米哲沉的回忆材料。

于上海送杨虎城出国后，本来打算接受杨虎城的劝告和馈赠出国留学，但正值芦沟桥事变发生，在这国家存亡的关头，他不愿离开苦难的祖国和人民，不愿离开火热的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又毅然回到西安。

一九三八年初，宋绮云被陕西省委派往鹿钟麟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负责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这期间，他在晋东南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汇报了工作。朱德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他在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指示他如有条件应继续去那里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到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难民服务团任总干事。他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向难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后因受到特务的威胁限制，无法开展活动，遂于一九三九年撤回西安。同年底，经党组织批准，他又回到杨虎城旧部第四集团军，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政治教官。他利用这个讲坛，向学员灌输抗日救国思想，痛陈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他讲的《抗日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使学员受到很大的激励，纷纷要求上前方，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正如他对朋友们说的：“我所以出来任教官，就是希望由我教出来的军官，都能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宋绮云的革命行动，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极度仇视。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宋绮云在第四集团军军部突然接到一份“家中有急事，请速回”的电报。他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特务机关施展的诱捕奸计。当他匆匆赶回已搬至陕西长安县

蒲阳村的家中时，即被埋伏的特务逮捕。后来特务机关又诱捕了他的爱人徐林侠和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宋振中<sup>①</sup>。

宋绮云被捕以后，敌人软硬兼施，妄图动摇其革命立场。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面设宴款待，许以高官厚禄，要宋绮云为蒋介石反动政权服务。宋绮云庄严宣布：“本人抗日无罪，除非无条件释放，别无可言。”敌人恼羞成怒，报请处决。蒋介石不忘宋绮云在西安事变中的揭底之恨，又不肯轻易丢掉共产党的这一重要人犯，结果批复“和杨虎城案一并处理”。他们先后将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关押于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和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

宋绮云在被监禁的八年中，三易重庆监牢，二次被押赴贵州。在长期囚禁生活中，他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始终心情开朗，精神充沛，并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仍然尽量吃饱肚子，睡好觉，每天坚持学习和锻炼身体，并教会了不少难友打太极拳。他经常从狱中的国民党报纸上，找到人民革命胜利的喜讯，来鼓舞大家。难友梅含章回忆宋绮云这段历史情况时说：“他象一团烈火一样的激励着我们去顽强地斗争。”宋绮云经常对难友说：“一个人活着得有骨气，有志气。”他经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但从不叫苦，更不屈服。他受酷刑后吟诗明志：“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白上九霄。”“漫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我无罪，必须无条件释放我出狱，他们休想在我身上捞到什么东西。”

---

<sup>①</sup>烈士生前警卫员王迁升的回忆材料。

宋绮云在狱中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拿出已经少得可怜的衣服，援助其他难友。狱中临时党支部决定让韩子栋越狱，宋绮云即叫体弱多病的爱人徐林侠赶缝衣服和布口袋，通过“小萝卜头”（即宋绮云的幼子振中）送到韩子栋的手中，作为越狱途中之用。狱中临时党支部书记罗世文，由于狱中营养不足，不幸染上瘰疬病，病情不断恶化，威胁着生命，同志们忧心如焚。在狱中有“峨眉山人”之称的宋绮云沉思了几天，终于想起了早已忘记的治疗瘰疬病的配方，经难友们拍卖衣物买来了药品，但狱中没有捣碎工具仍制不成药膏，需设法到狱外去制作。当时适逢“小萝卜头”头上长了一个大疖子，宋绮云有意叫妻子把“小萝卜头”的疖子尖挑破并用生水洗。结果疖子大肿，“小萝卜头”哭喊不止，取得狱外治疗的借口，并乘机在狱外制成了治疗瘰疬病药膏，因而治愈了罗世文的病。有些难友曾一度悲观动摇，宋绮云得悉后，即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帮助，使他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有一个同志因一时受刑不过，给特务写了悔过书，表示出狱后要“戴罪立功”。后来经宋绮云的教育，这个同志认识了错误，并坚决收回了悔过书<sup>①</sup>。

宋绮云对杨虎城将军夫妇也十分关心。一九四三年宋绮云一家三人转入贵州息烽监狱不久，得悉杨虎城也囚禁在息烽一个山洞里时，曾要求去拜访，但未获准。杨虎城得知后，心情十分激动，向看守所所长周养浩假说宋绮云是他的“秘书”，要求宋绮云同他住在一起，但因戴笠不同意，终未如愿以偿。一九四六年他们转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监狱后，杨

---

<sup>①</sup>韩子栋的回忆材料。



虎城仍然提出要求同他的“秘书”宋绮云同住，但特务们仍然不予答应。宋绮云虽然无法与杨虎城面晤，但却时刻关心着他，曾托也被监禁的黄显声给他带去诗、信，鼓励他们夫妇坚持斗争。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监狱曾囚禁着国民党“青年将校团”的六名发起人员，他们是王凤起、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和胡翔。这些国民党少壮派军官，不满蒋介石的腐朽无能，崇拜法西斯主义，欲仿效日本少壮军人的“二·二六”事件，秘密组织“青年将校团”，以陈诚为靠山，准备推翻蒋介石以取而代之。后因事泄，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当时监狱临时党支部认为，“青年将校团”虽不倾向革命，但同蒋介石有矛盾，只要善于引导和教育，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决定让宋绮云去做他们的统战工作。

此书在军官被捕入狱后，深感个人的“光辉前途”不能

前进。”这些青年军官由于长期受到蒋介石关于“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影响，认为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内部，没有一个统一巩固的后方，是不能一致对外的。宋绮云耐心细致地开导他们说：“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军队，他们来自人民大众，又为劳苦大众服务，蒋介石镇压与屠杀的是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这个‘内’是永远也‘安’不完的。”他又以“九·一八”以后蒋介石的不抵抗致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以及后来的察哈尔、绥远、华北大片土地沦陷等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他们，使他们终于深刻地认识到蒋介石欺骗人民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

一九四六年戴笠死后，这些青年军官经多方活动，终于有释放出狱的希望，宋绮云得悉后非常高兴，进一步鼓励他们，希望他们出狱后要为全中国劳动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不要忘记几年铁窗之苦，要参加打倒蒋家王朝的斗争。他真挚地对他们说：“有恩不报固非君子，而有仇不报定是无能之辈，决不能忘记坐牢时受的折磨和侮辱，要坚决与彼斗争到底，不雌雄，不显男儿本色。”当知道王凤起有出狱后出国经商的消极想法时，宋绮云即对王说：“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你为什么不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假如你能在打倒蒋介石的正义战争中做出贡献，其价值比随波逐流花天酒地不知要好多少倍！”王凤起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按他的指导行动。他们获释出狱时，宋绮云满怀深情以诗相赠，鼓励他们为国为民坚持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给王凤起的诗曰：“羨君壮志凤凌云，运筹帷幄实惊人。英雄当为正义战，闯墙幸勿助波尘。”给梅含章赠了一首激动人心的长诗——《送含章同学赴金

陵》，表达了他自己一生信仰马列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坚信共产主义必胜，蒋介石国民党必败的信念，并希望他们出狱后为了真理，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投向人民。他在长诗的“序”中写道：“社会进化，自有其伟大之动律，一、二人之喜怒，何与于奔腾澎湃之潮流乎？！一人之利害得失，从自我立场观之，固不为不大，如从整个历史进程观之，直如沧海之一粟，诚渺乎小哉！昔司马公所谓之‘天’，即今之所谓社会也。从整体言之，人类之残害倾轧，无不足以促进社会之进化，是个人之利害得失，有助于人类社会也不亦大乎？！西谚有言：‘最后笑者，乃善笑之人’，至哉言也！含章之行也，余既为诗以留纪念，复为文以壮行色，固不禁抚髀雀跃，更为之歌曰：

青山葱葱，  
绿水泱泱，  
今日之别，  
敢云忧伤？  
日之升矣，  
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

寥寥数语，道出了宋绮云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这些青年军官为了报答宋绮云的真情厚意，表示出狱后要尽力活动搭救他出狱，宋绮云笑着说：“我是不能出狱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他是一个心毒手狠的家伙，对他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要人民的解放事业得以胜利，我就会高兴的。”王凤起等对宋绮云怀着深深地感激和惜

别之情，回赠诗一首：

牢里相处亲又亲，  
共话肺腑期有成。  
临别千里铭座右，  
誓将热血报知音。

出狱以后，他们利用其特殊身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王凤起和夫人富平成为我地下工作者，一九四八年五月在沈阳成功地策动了新一军新五十三师和沈阳第二守备总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梅含章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协助策动江阴要塞起义，打破了匪首汤恩伯吹嘘的所谓攻不破的长江防线，迎接百万雄师横渡天险，解放南京。宋绮云虽身在狱中，但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梅含章在解放后缅怀宋绮云烈士时曾说过：“我之所以能够转变立场，投向人民，在解放战争中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一些贡献，完全是绮云烈士对我启发教育的结果。他是我走向革命的指路人，是我的启蒙之师，我走向革命，完全是他长期地耐心细致地循循善诱对我进行教育的结果。”<sup>①</sup>

一九四九年九月，胜利的曙光已经映红了天际，新中国即将诞生了。但是，雾都重庆仍处在黎明前的极端黑暗之中。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垂死挣扎，终于对杨虎城将军，对革命志士下毒手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宋绮云同杨虎城和其他难友一起惨遭杀害。

---

<sup>①</sup>以上根据王凤起、梅含章回忆材料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的第二天，即查找到他们的遗体。重庆军管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大殓仪式和追悼会，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共一千余人参加追悼，表示了对烈士的深切悼念。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阅了米暂沉、曹冷泉、武志平、匡厚生、蒋听松、童陆生、徐彬如等的文章和回忆材料；郭子刚、丁毅忱、李觉民、王廷升、王风起、梅含章、韩子栋等的回忆材料；烈士的部分遗文；烈士亲属宋振平、宋振西、宋振镛、宋振苏、宋振华、宋振亚等的回忆文章；还参阅了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地质学院党史教研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所提供的资料。

# 白 求 恩

贺洪中 吴振丞

诺尔曼·白求恩 (Dr. Norman Bethune)，加拿大人，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一九三九年在中国的抗日前线以身殉职，终年五十岁。

## (一)

一八九〇年三月三日，诺尔曼·白求恩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柯尔逊·白求恩是一个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是一个美国家俱师的女儿。这是一对虔诚的长老会信徒。他们共养育了三个孩子。白求恩的祖父是当地的一个著名医生，给白求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选择从医的职业就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白求恩小时候是个性格倔强的孩子，充满了好奇心，人小富有主见。七岁时，他跟着妈妈出去买东西，转眼间不见了。后来警察把他送回家。在大人焦灼的目光下，他笑嘻嘻地说：“迷路真好玩。”原来，他是为了“尝尝迷路的味道”而故意走失的。后来，他冒险爬山，摔断了腿；可是，腿好了后他照样去爬山。他想象父亲那样横渡乔治亚海湾，但他的游泳技能差，差一点淹死。被淹的第二年他学会了长距离游泳，实现了横

渡的愿望。达尔文的进化论使白求恩入迷，却使信教的母亲深深不安。她把宗教的书籍偷偷夹在儿子的教科书里，想借此抵消那本亵渎上帝的《物种起源论》。而白求恩却用一个小小的玩笑作为回答，他把《物种起源论》悄悄放到妈妈的枕头底下。

白求恩的童少年是无忧无虑的，幸福的。他从公塞·凯采私立学校和俄昂峡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专攻生物学。尽管家里生活还算富裕，但要供一个大学生，高昂、繁杂的费用仍然是一个沉重负担。后来弟弟也进入了大学攻读，家庭经济状况就愈加拮据。为了凑足学费，他送过报，在大学食堂当过侍者，后来又“五大湖”轮船上当过一夏天锅炉工，还在温莎当过一阵新闻记者。一九一一年，白求恩二十一岁的时候，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习，到安大略省北部林区去挣钱。那里有个“边疆学院”，为波兰、德国、俄国的移民补习英语和文化知识。他白天同伐木工人一起劳动，晚上教书，同工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他很为自己有这样一段生活而骄傲，常说：“幸亏我没有钱，才结识了他们。”白求恩这一时期的经历，使他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对劳动人民增进了了解，也丰富了他的阅历。

一九一四年，白求恩再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正当他潜心攻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年轻的白求恩还看不透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他只感到新鲜、刺激，所以，当政府征兵时，他踊跃参加，是多伦多市第十个报名者。他被分到加拿大皇家陆军第一师战地医疗队，担任担架员，越过大西洋随军东进，转战英国、法国、比利时，在易普尔被一颗榴霰弹炸断了左小腿。在法国、英国的医院里治疗了六个月，伤愈回国，

进多伦多大学继续求学。

一九一七年，白求恩再次应征入伍，参加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在一艘“飞马号”军舰上当副医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六个月，他被调到加拿大皇家空军担任同样职务。一九一八年，战争结束，白求恩在英国退役。这时，他已经二十八岁了。生活的航船驶向何方？自己的事业从哪儿开始？他心里并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萌生了一种向往新事物的感觉。他不知道这是幻觉还是理想。

白求恩并没有停步。战争使他荒废了学业，他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偿回来。他带着不多的一点军饷来到伦敦，开始了学业上的求索。五年里，他先后在四个英国医院里实习外科，跑遍西欧六国。不管走到哪里，他的宿舍里总是堆满了真的骨骼和石膏做成的心、肺模型。他自己说“象个血淋淋的肉铺子”。当时，白求恩的精力十分充沛，他象个刚刚走出沙漠，渴得要发疯的流浪者，拚命地吸吮着知识的玉液琼浆。他不仅进修外科，还研究文学、作诗、绘画、雕刻、统计，涉猎很广。

一九二三年一月，他在英国爱丁堡参加了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的考试，二月三日即被入选，成为这个很有名望的学会的一分子。就在这儿，他结识了爱丁堡一位有名的法庭会计的独养女儿——弗朗希丝·坎贝尔·彭尼。她温柔、羞怯，对生活还存有种种浪漫的幻想。白求恩却是举止豪迈，豁达坦率，对事业有一种执著的追求。两个人在性情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互相钟情。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三日，二十二岁的弗朗希丝成了白求恩的妻子。

婚后，白求恩和妻子去巴黎、维也纳、柏林度蜜月。在此期间，他仍不放弃探求新知的机会，观摩了欧洲著名的外科医生的



手术。此后，他还先后去过意大利和瑞士。白求恩想找个工作。但战后的欧洲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他失望了，只好与弗朗希丝一起返回加拿大。

## (二)

故乡并没有给白求恩多少慰藉。加拿大也没有安置他的空位置。一九二四年冬天，白求恩只好跑到美国密执安州的底特律城，在凯斯街和塞尔登街的拐角处，租了一层小公寓，挂起了祖父的行医招牌，开始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私人行医。

开业行医的一年中，白求恩的事业并不顺利。这个地区虽然车水马龙，繁华热闹，但他的诊所门前却冷冷清清。原因也很简单：阔人嫌他的诊所鄙陋，怕失身份；穷人出不起诊费，只是在病情严重恶化，万不得已时才来求治。白求恩没有挣下多少钱，却认清了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最需要医疗的恰恰正是最出不起诊费的人。他开始把医疗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不久，白求恩在一家州立医院弄到一个兼职。他的才华被当地一个名医发现。经这位名医的推荐、介绍，有钱有势的人开始涌向白求恩诊所，其他医生也效法那位名医，纷纷把外科病人转送给他。白求恩声名大噪，业务兴隆，一扫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许多阔人愿出很高的诊金让他看病。他摆脱了穷窘，他阔绰了，搬到了头等住宅区一所极讲究的住房里，诊所也装璜一新。

但他并没有忘掉穷人。穷人请他看病，有求必应。这时，

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为什么还是自己这双手，昨天受穷，今天却致富了呢？他渐渐找到了答案：昨天来治病的是穷人，今天来就诊的是富人。他对自己这种赚钱方法憎恶起来，普通医生给他介绍病人，他按这些阔人的经济状况尽量多收费，然后把“利润”分出去。他说：从前我一文不收救了一条命，现在只给病人一剂简单的补药，敲一大笔竹杠，反而成了名人。他又陷入深深的苦闷，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同行，常常公开地指责他们，大叫大嚷：“首先把他们淘汰掉一半，让他们去站柜台，然后我一定让其余的人明白：他们是医生，不是商人！”

一九二六年九月，X光片上显示出他的左肺有几块阴影。这证实了他的判断：自己得了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几乎还是不治之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在当地医院治疗了几个星期，后来转到家乡的格雷文赫斯特的克里多疗养院。在这以前，他和妻子离了婚。“我是完了——你还有整整的一生。”他这样劝说苦苦哀求留下来的弗朗希丝。一个月后，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又进入条件更好些的纽约州萨拉拿湖特鲁多疗养院继续治疗。次年夏天，他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肺结核外科疗法》。他被吸引住了，产生了研究肺结核的愿望。他埋头深入研究，战胜肺结核恢复健康的信心越来越强，他决定采用一种危险的“人工气胸疗法”，向自己的肺病宣战。疗养院的医生们比他更清楚这种疗法的危险，劝他放弃这种打算。白求恩拍着胸膛回答：“诸位，我欢迎危险！”他认为，即使成为这种疗法的牺牲品，也比现在活着更有价值！

“人工气胸疗法”效果惊人。两个月后，白求恩的肺病竟奇迹般痊愈了。他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了。出院后，他踏着路上“吱吱”响的积雪，脑里产生了一个新的宏愿：献身于根除肺结核

的工作。回到底特律，白求恩拒绝了同行的挽留，来到赖布鲁克的纽约州立结核医院工作。两年中，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压缩细菌实验，进修了细菌学。一九二八年九月，白求恩来到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创造性和献身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医疗器械的发明家。他设计的“气胸器”、“铁的实习医生——牵引器”、“剥离器”等二十多种器械，受到外科医生们的欢迎，而其中的“白求恩肋骨剪”直到现在还在制造使用。因此，专门经营医疗器械的毕林父子公司还同他签定了合同，取得了制造和出售他发明的器械的专利权。

他是一个著作家。他为医学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如《为肺结核早期压缩呼吁》、《肺压缩技术员工作纲要》、《一千例胸外科手术中的一些技术偏差和诊断错误》等等，介绍新的外科手术和他的研究成果。

他是一个创新者。在医疗中，他不因循守旧，而总是大胆实践，采用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办法，取得了惊人效果，受到同行们赞赏。象为了在肺和胸部诱起粘连的“白求恩镍粉法”，象那标新立异的“蛆虫疗法”，更是引起人们惊叹！

然而，更可贵的是他那为了医学、为了病人奋不顾身的精神。任何在病人身上的试验他都愿意先用在自己身上。为了使一个重病人得到一点人世间的温暖，他不怕传染吻了他。为了证明一个死因不明的病人肺里的奇怪东西是不是结核菌，在化验和给兔子注射都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他往自己的耳朵上抹了点，把大家吓坏了。几天后，他兴冲冲地宣布：“屁事没有！不是结核菌。”

这一切成就，使白求恩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学识渊博、技术

高超的外科大夫。从美国和加拿大其他省份，许多人赶来观摩他的手术。

一九三三年春天，他到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底特律赫曼·济费医院任代理外科主任，同时还在诺维尔的麦拔利医院和美国退伍军人会医院兼职。

这一年，白求恩与弗朗希丝“重圆的破镜”第二次破裂了。他们是一九二九年夏天复婚的。白求恩在事业上非常热情，弗朗希丝却感到他对自己缺乏应有的温存，简直连他的病人都不如。客观地说，这是真实的。她受不了，他们只好分道扬镳。

就个人的成就来说，白求恩实现了从特鲁多疗养院“赦放”出来时立下的誓愿。他的声望越来越高，两次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理事，是五人执委之一。他还被聘为联邦政府以及若干州的卫生顾问。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却远非如此。他发现，外科疗法使许多被“判处死刑”的人又可以享受到阳光和空气。可是，疗法越进步，医院里接受的肺结核病人就越多。进一步研究更使他吃惊：生活水平最低的魁北克州，肺结核的发病率最高；很多人为治疗而倾家荡产，出院后又复发了；医生医好一个病人又会产生十个新患者。这是为什么？顽强的探索精神驱使他去寻找答案。他把目光转向社会：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让棉田荒芜；几千万人饿肚子，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蒙特利尔工人区的孩子因患软骨病腿弯了，而美国南部却把橘子成车地毁掉，巴西把咖啡倒进大海……。他愤怒了，在报上写文章控诉：“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穷人死亡。这个很简明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关系……在人们身上产生肺结核的情况正在

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中待下去，那一定会死！”从此，他分出一部分精力钻研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著作，逐步认识到，医疗问题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它同社会有着密切关系。为了表示自己对社会的不平和反抗，他在蒙特利尔凡尔登郊区设立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免费诊所，每星期六中午给付不起医疗费的人看病。他还跑到失业者协会，要求为他们免费治病，表示和他们站在一起。

白求恩的思想面临着一个转折，一次飞跃、升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道它通向哪里？”苏联之行使他找到了答案。

一九三五年八月，他参加了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他是正式代表，可心思并没有放在开会上，只听了巴甫洛夫的一次报告。他到处去问、去看，从胸外科角度搜集了不少材料。革命后的苏联和沙俄时代在防治结核病上的对比是异常鲜明的，不需要分析、推理，一目了然。他从这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后，毫不顾忌地称赞苏联的社会主义，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白求恩经过苦闷、痛苦、愤恨，几经彷徨、徘徊、探索、追求，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三)

白求恩这时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果说，他那精湛的业务能力可以使他的解剖刀游刃有余，那么，当装备上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后，他指向社会的解剖刀，更

能击中要害。在讨论会上，在报刊上，在一切可以宣传的场合，他呼吁，他呐喊：“我们必须把医学看做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基础，叫做资本主义，它的根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和私人利润上面的。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正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一种致命的、需要全身医疗的疾病。”他指出：“保护人民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他痛心疾首地强调：“在现代医学界里，我们宁肯少来几个内外科名医，而需要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他无限深情地说：“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他请求同行：“不要多说那些有趣的病例，而经常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学和国家的关系，医务对人民的责任，以及我们生活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铸模。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我们精确含义上的技术和科学问题。”

一九三六年七月，白求恩为了实现自己那个“医疗社会化”的计划，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一个保障人民健康委员会，这是加拿大医务人员发起的第一个促进医疗社会化的团体。他自任委员会书记，亲自签发了“宣言”，声明其宗旨是使最需要医疗的人得到适当的照顾。这显示了白求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就在白求恩热心于自己的医疗社会化计划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马德里电台播出了政变消息，叛军佛朗哥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军事政权支持下，进攻马德里了。人民奋起还击！战争爆发了。飞机、坦克、军事人员

从德国、意大利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府却装模作样地宣布“不干涉、不介入”，他们实际上是想借希特勒、佛朗哥之手，把新生的人民阵线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全世界人民愤怒谴责德、意法西斯及其仆从这一卑劣的侵略行径。以苏联为首的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奔赴西班牙，拿起武器，同西班牙人民一起，保卫马德里，保卫西班牙人民阵线政权，保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加拿大的进步人士也成立了支援西班牙民主委员会，一千二百名加拿大儿女组成“麦克泊泊”营，开赴西班牙前线。设在多伦多的委员会又组织了一个医疗队，人员基本定了，就是缺一个队长。委员会考虑再三，选中了白求恩。他的学识、技术、才能、声望，他的勇气、胆量、献身精神，更重要的还有他那世人皆知的“红色思想”，一切都说明，白求恩是个不可多得理想人选。他们打电话通知了他。

西班牙的炮火使白求恩感到震怒。他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不过，接到支援西班牙委员会的电话，他并没有马上答应。他要考虑一下。这里还有许多事情，他心爱的胸外科专业刚刚起步，他还有宏伟的计划，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去探索；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委员会的工作刚刚开始，社会保健宣言书正在付印，一系列组织工作等待他拿出计划。此外，他想结束自己的独身生活，正好也有一个女人追求他。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如果动身去西班牙，这一切自然都得推后。怎么办？

最后，他还是决定接受支援西班牙委员会的建议，就任医疗队的队长。他在日记中写道：“时代强迫着我们做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他对人们说：“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们在

德国、在日本、现在在西班牙都已经动手了。他们正到处公开地活动起来。如果我们不乘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座屠宰场。”说干就干是他可贵的品格。他料理了一切有关事情，立下了遗嘱，告别了亲人，整装待发。

#### （四）

十月二十四日，白求恩率领加拿大医疗队，登上“英国皇后号”邮船，启程了。

十一月三日，白求恩一行到达了正遭受敌人猛烈轰炸的马德里。当时，驻马德里的外交使团已经开始撤离，新闻记者已经准备抢发马德里陷落的头条消息。但是，马德里人民没有后退。他们前仆后继，誓与马德里共存亡。

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同马德里人民站在一起。他经过在前线调查研究，主张建立流动输血站，把血直接送往前线，拯救那些因负伤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的战士。好多人认为这是冒险。白求恩却以他一贯的方式开始了行动。他飞抵巴黎购买了器械，跑到伦敦向一位输血专家请教了有关专业问题。他满载而归，带回了一辆运输车和一个加拿大助手。

使他担心的血源问题却意外地得到圆满解决。马德里的老人、小孩、妇女，听到献血的消息，蜂拥而至，许多人还把发给的营养补助证当场撕掉了。白求恩很受感动。

就这样，在提出流动输血站建议的第四十二天，流动输血站就开始活跃在前线。鲜血救活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受伤战士，人们欢呼：“输血万岁！”从这天起，在马德里、



亚拉玛、马拉加、瓜达拉加拉、巴塞罗拿，凡是战斗激烈的地方，都会有白求恩流动输血站出现。

白求恩的这一创举轰动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连国外电台、报纸也争相报道。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双方都采用了他的方法。他的流动输血站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期军事医学上最伟大的创造。

佛朗哥攻不下马德里，改变了战略，先进攻马拉加等沿海城市，企图切断人民阵线同外界的联系。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白求恩在前往马拉加前线的路上，得知马拉加已经沦陷。再往前走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一路，他遇到了四万难民，他和他的输血站于是开始了运送难民的工作，帮助那些无法继续前进的人向阿尔梅里亚转移。一连四天四夜，白求恩时而扶老携幼同大家一起赶路，时而帮助返回的车辆挑选一批新难民。然而，敌人罪恶的炸弹也投向了阿尔梅里亚。对于法西斯这种蓄意轰炸难民的行为，白求恩终生难忘。他在给弗朗希丝的信中说，“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疤”。这就使他更加认清了自己的责任：不消灭法西斯，人民没有安全可言。回到巴伦西亚，他把日记改写成：《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用英、西文铅印成册，控诉法西斯，激发人民更加无畏地投入战斗。

可是，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人民阵线的阵地逐渐缩小。白求恩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将会前功尽弃。西班牙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血，更需要武器。他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建议，准备回北美洲去讲演和募捐。临行之前，他从巴黎请了一个摄影师，拍了部电影：《西班牙的心脏》，以备讲演时使用。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白求恩回到蒙特利尔时，受到几

千人的欢迎。两天后，他在皇山竞技场发表了第一次演说，听众达一万五千人。他说：“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外科医生。我不是一个政客。但是，我到西班牙去，却是因为政客们出卖了西班牙，并且企图使我们大家也都陷入他们出卖的阴谋。政客们用不同的声调和不同程度的虚伪裁决了民主西班牙必须死亡。而我一直相信，现在更坚决地相信，民主西班牙必须生存！”两天后，他来到多伦多。从这里开始，他用四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加拿大和美国各地，讲演，座谈，放映《西班牙的心脏》。效果是明显的，许多人觉醒了，许多人慷慨解囊，许多人奔向西班牙前线。他走到哪里，便在哪里掀起一股热浪。本来，他计划一俟募捐、讲演结束，马上返回自己的战斗岗位。可是，在那个多事之秋，远东中国发生的事件，使他改变了主意。

就在白求恩四处奔波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国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他的关注，这是又一个西班牙！他在讲演中又增添了有关中国的新内容。看到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消息，他高兴得大叫大喊：“他们堵住了！”读过斯诺《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后，他对中国发生的革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心开始向远东转移。这时他也看到，西班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援助，而对中国的援助仅仅刚抬起脚，第一步还没跨出去。最后他决定了：到中国去！他说：“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起来加以反抗。我拒绝以默认和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而无厌的人们向其他的人们发动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是因为我觉得那是

最迫切需要去的地方，那是我能够更有用的地方。”

他找到加拿大共产党负责人，请求带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去。加拿大共产党刚刚援助了西班牙，没有更多的经费。他们和美国共产党联系，美国共产党同意拿出一部分钱，医疗队就作为两党派遣。白求恩又和刚在美国成立不久的援华委员会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还募捐了一部分款项。到十一月，他开始物色人员和购买医药器械。几经反复，人员定了，共两个：一个是美国外科医生帕尔森斯，另一位是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后者几年前在中国山东工作过，这一点使他很满意。因为这不仅使他们的医疗队有了一个翻译，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对中国的无知。他们还购买了价值五千美元的医药器械，他把这当作他们“作战”的“武器弹药”。

一切就绪后，白求恩前往多伦多向亲人告别——这是他一年多来第二次向亲人告别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白求恩等登上“亚洲皇后号”邮船，迎着太平洋的风浪，开始了前往中国的历程。

## （五）

“亚洲皇后号”邮船航行了十三个昼夜，驶到了它的目的地——香港。白求恩等在香港停留了三天，经过和史沫特莱电报联系，乘飞机来到当时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

在机场，他们受到史沫特莱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欢迎。白求恩急于奔赴前线，在美国主教鲁茨家里住下后，便前往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周恩来接待了白求恩，并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介

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动民众，英勇抗战的情况；还讲了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最后，建议他先在后方参观一些医疗机关，尔后去延安。

白求恩急于动身，并且要求直赴抗日前线。周恩来还是希望他们先去延安，说那里有边区医院，有卫生学校，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到了那里也许更能施展他的才能。再说，日军正从华北向南推进，若从武汉直接上前线，有诸多危险，不好安排。

但是，白求恩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周恩来只好表示，联系联系再说。此后有一天，周恩来到鲁茨家里去看望白求恩和其他两个队员。白求恩重申他的要求。由于考虑到安全等许多因素，安排一个外国医疗队应特别慎重，因此，周恩来当时只能对白求恩说：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然而对于去向问题，医疗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白求恩认为自己的任务十分明确，那就是帮助在前线抗日的八路军。而帕尔森斯则认为，他是到中国帮助军队的，既然武汉有伤兵，敌机又常来轰炸，留在武汉是理所当然的。就在白求恩拒绝了国民党的挽留、急切要求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帕尔森斯却接受了国民党的安排。他们的分歧日渐明显，裂痕越来越大。

白求恩在等待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期间，曾到江北一家医院工作过，到一座国民党陆军医院去看了看，还会见了前来武汉办事的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听了姜齐贤关于八路军医疗卫生情况的介绍后，他了解到前方药品不足，器材短缺，便决心再补充一些药品器械，带往前线。

到武汉将近一个月了。等得心急火燎的白求恩，终于盼来了可以北上的通知，要他们先到设在临汾的八路军总部前线卫

生部报到。因为这时北线形势很危急，周恩来特意派警卫员护送他们。白求恩对此很感动，很高兴。可是，帕尔森斯同他的彻底决裂又令他十分不快。更使他气愤的是，帕尔森斯竟然挥霍了他们带来的经费——寄托着大洋彼岸千百万人希望的捐款。白求恩给美国援华委员会拍了电报，报告了帕尔森斯的怯懦和不道德行为，请求他们再汇一笔钱，并且再派人到中国来。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白求恩北上，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何况他现在并不是一个人，还有琼·尤恩；他还说服了一个在武汉公理化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青年医生，尽管他不能同他们一起出发，也只答应工作三个月，但就他们的队伍来说，仍然是三个人，不多不少。

二月二十二日，白求恩、尤恩，还有护送的警卫员，一起出发了。这时，敌人已经占领了离郑州不足百里的新乡市，局势更加恶化了。发车才十三个小时，他们就闻到了火药味，前面车站刚刚遭到敌机轰炸，正在抢修。六七个小时后，他们才能继续赶路。经郑州折向西行时，车上的旅客明显减少。当 they 们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北去的客车已经取消——敌人正沿同蒲路向潼关进犯。他们总算搭上了一列货车到达临汾。

好不容易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白求恩正想松一口气，新的消息又使他紧张起来：八路军总部和设在临汾的兵站已经转移，敌人已经离这儿不远，几小时之后，这个小城就可能陷落。他们只好把东西搬到一列即将南行的货车上，准备由原路折回潼关，再作打算。

祸不单行。夜里三点钟，他被冻醒了，发现他们乘坐的那节车皮被甩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的一个叫膏腴的小站上。此时，南

行的列车已经不会再有，回返的希望完全断绝。他们象一条条被风浪抛上岸的鲸鱼，进不能，退不得。而敌人，却在步步逼近。

天亮以后，敌人的飞机又开始轰炸，车站上有的群众受了伤。正当白求恩为受伤者包扎的时候，被八路军临汾兵站民运科李科长一把拉住了。原来，总部撤离临汾前曾关照过部队，说有一个外国医疗队正在途中，要大家发现后负责护送。李科长这天正在车站上组织人力搬运丢在车上的大米，看到这两个正在为群众包扎伤口的外国人，猜想肯定是总部关照过的外国医疗队，便主动上前接头了。

白求恩终于找到自己的同志了。他喜出望外，顿时产生了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李科长耐心地向他解释，前线是去不成了，已不存在什么“前线”。八路军已插入敌后。要护送他们两个人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敌后去也很困难，况且还有那么多东西呢？白求恩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听从李科长安排。

李科长动员了四十二辆大车，装上白求恩带来的医药器械和遗弃在车站上的大米，急急忙忙出发了。他的计划是，把白求恩、尤恩送到西安，再由那儿乘车去延安。

路上有一件事给白求恩的印象很深。那是他们刚出发不久，敌机发现了这支队伍，开始俯冲投弹。结果，四人受伤，十五头骡子炸死，十二头骡子炸伤，车辆损坏了一半。李科长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每头一百块银洋。白求恩发现这是八路军良好的纪律：从人民那里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他开始用自己的目光印证在斯诺、史沫特莱的书上领会到的红军——八路军形象了。他那敏锐的目光第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他们和敌人一前一后争相向前赶。白求恩在日记中多次写

道：“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离开绛州的时候，听说日军离那儿只有二十五哩，他们的骑兵离得更近。”“我们与追随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阻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听说日军离这儿只有十哩了。”“我听说日军在我们离开河津一天以后就到了那儿。我们算是赶在他们的前面走了。”……就这样，他们渡汾河，过绛州，宿稷山，到河津，在禹门口渡过冰块撞击的黄河。渡河入陕的第二天，他又冒着对岸日军的炮火，和大家一起搬运东西，然后来到韩城。一路上，白求恩吃小米，睡土炕，钻山洞，跋山，涉水，步行，顶风冒雨，千辛万苦，但始终精神饱满，兴致勃勃。

在韩城住了七天，等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汽车。这期间，白求恩在一个军队后方医院里工作了几天，使得那个医院的外科主任和全体看护员都想跟他到延安去。

三月十九日，汽车到了。两天后，他们来到西安。在这儿，他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又见到了史沫特莱。他们正为他的杳无音讯而担心，因为“白求恩被日军俘虏”的消息已经开始传播。他们请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浴室去。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愉快——这是我一个月来第一次洗澡！”<sup>①</sup>

## （六）

三月底，白求恩到达延安，受到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和

---

<sup>①</sup>白求恩 1938 年 3 月 23 日的日记。

国际友人马海德等的欢迎。一两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和尤恩，进行了通宵达旦的谈话。毛泽东对世界事物的广泛了解、精辟见解和他那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给白求恩的印象很深。谈话之后，白求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sup>①</sup>

白求恩到延安就忙起来：参观边区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给东北干训团和抗大的学员作报告，为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检查身体，在边区医院动手术，还在延安的墙上留下了一幅宣传画。延安给他的印象是新鲜的，他憧憬过的许多事物正在这里变成现实。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这里正是自己的理想之所在。他说：“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她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sup>②</sup>尤其后者，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吗？医疗社会化，他曾在自己的国土上苦心经营，但却处处碰壁，只有在这里才真正成了人民群众的福音。

延安有他干不完的工作，有他施展才能的舞台，有他留恋的新事物，他打心底里爱上了延安。但是，他还要走——到前线去，“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他这样宣称。可是，对他的要求迟迟没有答复，因为领导和各界人士意见不一。有人说：“这里需要他。”有人说：“敌后太艰苦，他吃不消。”也有

---

①白求恩 1938 年 3 月底的日记。

②白求恩 1938 年 4 月的日记。



人强调：“把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专家送往前线，部队很难照顾好。”总之，越研究越复杂，一时难以决定。白求恩等得颇不耐烦。一次，他又听到“照顾”之类的意见，勃然大怒，抄起一把圈椅向窗户砸去，“乒”然一声，椅子破窗而出，落在院子里。只听他大声嚷道：“我不是为享受而来的！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复杂的问题一下子简单了，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事后，白求恩说：“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应该向那些残废的同志道歉。”

四月二十日，他派尤恩去西安取X光机和医疗器材，八天过去了，东西到了，人却还没回来。他急了，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又过了两天，还不见踪影。他实在等不下去了，便带上刚赶来不久的理查德·布朗——那位武汉公理化教会医院的青年医生，在姜齐贤的陪同下，上路了。他留话说：让尤恩随后赶上。实际上尤恩始终没赶上，尤恩在岚县一二〇师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八月就随一支医疗队到新四军去了。

他们乘“道奇”牌卡车离开延安，经过延川、清涧，到绥德后改为骑马，继续向北行进。沿路他还负有视察八路军卫生单位的任务，所以，几天后，他们在黄河边上的神木县贺家川医院停了下来。这是白求恩接触到的八路军的第一个前方医院。这里医药器械的缺乏使他吃惊。他在后来写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里一口气列举了十五个“没有”，即是有的东西也是可怜的一点点，而这个医院却要承担一百七十五个伤病员的治疗任务。照西方的标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到贺家川医院的当天下午，白求恩匆匆忙忙吃了点饭，没有休息就到病房检查伤员去了，一直忙到很晚。第二天动手术，他每做完一个伤员，就赠送一件连夜翻找出来的衣服：上

肢伤的送一件下衣，下肢伤的送一件上衣；有的手术后还没醒过来，他就帮助穿上。大家劝他留着自己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给八路军伤员动手术，作个纪念吧！”

几天后，白求恩一行由贺家川附近东渡黄河。黄河水流湍急，过河时，白求恩怕船上的药品器械不安全，舍弃了为他准备的那条船，而同运输队的同志坐在一起，双手扶着装载药品的箱子，以防颠簸翻倒。大家劝他，这船装的东西太多，危险！他不听，扶着药箱，一直渡到东岸。

五月底六月初，白求恩巡视了兴县医院以后，来到岚县。一二〇师就驻扎在这里，贺龙看望了他。他到医院视察，提建议，动手术，日程排得满满的，还抽空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干部检查了身体。有一件事，很能说明白求恩的认真精神。他在为战地服务团检查身体时，发现一个女干部的身体不适于再到前线工作，便建议让她留在后方休养。可是，当天晚上，这个女同志却跟着服务团开拔了。白求恩半夜得知这个情况，一定要马上去找贺龙汇报，以便把这个女同志追回来。别人说，明天再找也不迟。可他等不得，硬是把贺龙叫醒了，并且一直等到看着派人去追才离开。白求恩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连放茶杯盖时口要向上，他都考虑到了，并要大家养成习惯，他说，这样不致沾染细菌。

在岚县，白求恩向毛泽东写了第一个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贺家川医院的情况，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建议。最后，他说：“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们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兽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

视察任务完成了。在部队护送下，白求恩穿过同蒲路封锁线，翻过崇山峻岭，直赴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山。

## (七)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下午，白求恩到达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在这里，他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卫生部长叶青山等的欢迎。聂荣臻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没等翻译译完，白求恩就一口答应下来。

白求恩听说军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驻在六十里外的河北村，当天就要赶赴他的战斗岗位。经大家劝说，他才留了一宿。他把大家劝他休整几天的话用一句玩笑驳回：“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便起床上路了。

一到河北村，白求恩就问：“伤员呢？”当他听说伤员分散在老乡家里时，转身就要去看望。有人拉住他，说：马上就开饭了。他犹豫了一下，问：“马上？！多少时间？”“二十分钟！”他摇摇头，还是走了。

从这一刻起，白求恩开始了他那台风式的工作。第一周，他检查了住在河北村、松岩口、河西村三个村庄的五百二十一名伤病员。此后，连续四周动手术，做了一百四十七次。这样的数字比例，即使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也是惊人的！白求恩的工作效率、干劲、精神，无须赘述，数字就显示了一切。

夜深了，白求恩的住房里还亮着灯光。他要听取各科医生、护士的汇报，了解每个伤病员的情况；他要为明天的讲课准备教案；他要制订一些必要的条令、条例，例如《松岩口医院遇敌机空袭时应遵守的纪律条例》等；他要向加拿大共产党、美国援华委员会报告工作，请求给予新的援助……。有

时，他屋里的灯光也会移到外面，那是他提着自己带来的汽灯去查病房。他安慰伤员，进行复诊，盖被子，端水，甚至倒屎倒尿。在他的眼里，不存在大专家和小护理（员）的界限，只要是病人需要的，他都乐于去做。查完病房回来，他的屋里常常又会响起“咔哒、咔哒”的打字声。他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深夜的打字声就是他与时间赛跑的匆匆脚步。

一切卫生医疗方面的事情都在白求恩的考虑之内。他看到伤病员的饭菜没什么变化，就找到管理员，让他调查伤病员的情况，订出具体计划，配合医疗，搞好伙食。他看到医院缺乏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治愈率低，“床”压时间长，就满腔热情地帮助建立。而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医院的条件。到达晋察冀后，他在贺家川医院就产生的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贺家川医院的简陋是出乎他意料的，而这儿的后方医院也是如此。伤员有的住在群众家的土炕上，有的住在古庙里用门板搭起的通铺上；没有正规的手术室，没有一套完整的手术器械，更不用说X光机和显微镜了；纱布、绷带用过了洗一洗，消消毒，还得再用；刀子、钳子、镊子等一般的外科器械大多是自制的；……他不相信一个堂堂的军区后方医院就只是这些“家当”，以至刚来时还发生了一场误会。那是他让院长带自己去看看手术室。看过那些设备器械后，他摇摇头，认为向他隐瞒了什么。直到别人证明确实如此，才打消了他的疑问。白求恩一方面钦佩八路军医务人员在这种条件下创造了奇迹，一方面又为存在的问题、治疗上承受的巨大压力而焦灼。所以，来到不久，他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正规化的医院，目标是使它“成为八路军的最好医院”。他要把伤病员从老乡家里集中起来，固定床位，分科管理；他要建手术室、洗漱室、消毒

房、储藏室、办公室，甚至还要“建筑一浴室”。他想以此为开端，改进医务工作，培训医务人员，树立一个示范性的榜样。

白求恩的动机是高尚的，具体计划也无可厚非。但是，他毕竟对八路军抗日斗争的形式和特点缺乏足够的感受，对晋察冀根据地面临的形势也了解不够。实践——这个伟大的教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补课。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但那是阵地战，同这里的情况不一样。军区卫生部的领导同志看到他那个计划后，颇为踌躇。起初，他们婉转地告诉他目前的困难，白求恩说：“困难，困难，我们这么大个军区，没有一所正规的医院，简直难以想象！”他们向他解释，这里是无所谓前方后方的，敌人随时可能来，我们随时准备走。他不相信：“四周都是一两千米的大山，既没公路，又没铁路，日本强盗未必来得了！”

说服他是困难的。再说，他的计划也有可取之处。卫生部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请示军区领导后，决定尽力支持他，开始先搞得小点，好点。军区也派了人到平津一带敌占城市采购必要的器材和医药用品。

七月五日，根据白求恩拟定的计划，模范医院——实际上是“模范病室”，在松岩口的古庙里动工了。白求恩兴致勃勃，指导铁匠打托马式夹板，和锡匠一起打探针、镊子、钳子，有时又出现在木工身边。当别人称赞他什么都懂时，他笑着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应该是一个好的木匠、铁匠、缝纫和理发匠。”

白求恩更忙了，更加不注意休息。聂荣臻不得不干予。八月十一日，毛泽东也打来电报，指示军区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津

贴。白求恩既拒绝了聂荣臻的劝告，也拒绝了一百元津贴。第二天，他复电毛泽东，说：“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一个月后，他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进一步申明：“在其他大夫每月只拿一元，而司令员自己每月只拿五元这样一笔‘巨’款的时候，如果认为我能接受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他解释说：“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能和这样一些以共产主义方式生活的同志们工作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他们的共产主义既简单，又深刻，象叩诊锤敲击膝关节引起抖动一样自然，象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象心脏跳动一样出于自动。”<sup>①</sup>

九月十五日，模范医院竣工了。在隆重的落成典礼上，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由他做了战地救护、伤员分类和手术示范表演。边区军民送给他四面锦旗，那上面的题词既是对他近三个月工作的评价，也充分、准确地表达了对他的爱戴、敬重之情。四面锦旗上的题词分别是：

“白求恩，我们的同志！”

“白求恩，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我们的模范！”

“白求恩，我们的榜样！”

## (八)

正当大家还沉浸在模范医院落成的喜悦中，正当白求恩又在孕育着新的计划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调集了三个

---

<sup>①</sup>白求恩 1938 年 9 月 13 日的日记。

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共五万多人，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开始秋季“大扫荡”，其中，以步、骑、炮兵两万三千人，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进攻我军区腹地五台山地区。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向河北省平山县转移。

军区决定的通知送到卫生部和后方医院的时候，白求恩默然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并不因缺乏公路和铁路而减弱。他开始认真考虑当初的争论了。落成典礼十天后的，他怀着复杂的心情，随着最后一批伤员，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松岩口。

随后六天，他们爬山越岭，与敌人周旋。走到哪里，救护站就设在哪里，先后医治了一百四十二个伤员，手术一百零五次。使白求恩感受最深的是，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边区军民镇定自若，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想起马拉加公路上的四万难民，想起法西斯炸弹下难民的呼号，那是苦难，是他“心上的一个伤痕”。现在呢？他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当他听说，他们撤离不久，八路军就在附近的石盆口打了一个胜仗，歼敌七、八百人的时候，他开始理解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这种同法西斯斗争方式的含义。生活处处启示人们，他感到很幸运。

十月十八日，当他赶到平山县洪子店村时，那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白求恩为没能参加这场战斗而遗憾。洪子店是平山县的一个小镇，是县委所在地，人称小“瑞金”。敌人洗劫了它，烧光了房屋，但县委还在。当晚，他完成手术后，应邀参加了县委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会上的热烈气氛、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必胜信念，使他受到强烈感染。他同大家一起引吭高歌。

十月底，白求恩回到平山秋卜洞、花墓、车前岭等地，看到模范医院还保留着过去的一套章程，很高兴，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听说模范医院的院址被烧毁了，他很痛心。在聂荣臻请

他吃饭的时候，他坦率地检查了自己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的残暴。聂荣臻则充分肯定了模范医院在建立制度、制作器械、培训人材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宝贵经验，并向他介绍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概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白求恩感到很有启发。接着，他向司令员提出，要率领一个医疗队到前线去，参加火线救护工作。聂荣臻答应了。

随后，白求恩前往一分区。他于十一月六日离开崞峪，十九日到下关，三五九旅卫生部就在这里。二十日，白求恩就赶往河渐村，黄昏到达，未吃饭就检查了三十多个伤员，动手术至午夜十二点。当他听说曲回寺还有一部分伤员时，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起床上路，天亮赶到那里，一个上午检查了一百多伤员，下午动手术直至傍晚。二十二日，他又是凌晨四点起床，奔赴另一个村庄。这一天，从涞源以北下来了三十五个伤员，由于路上三天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处理，伤势有所恶化。白求恩连夜动手术，并对三五九旅发生的这个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怒”。王震旅长亲自做了处理，当夜还一直在手术室里陪着他。两个人从此结下了友谊。白求恩希望王震给他一次参加战斗的机会。

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一封急信送到杨家庄。三五九旅将在广灵公路上打一场伏击战。白求恩闻讯，立刻起床。两小时后，即二十九日凌晨时分，医疗队便出发了。朔风凛冽，搅得山上的积雪漫天飞舞，扑面而来，打得人睁不开眼。杨家庄离前线一百二十里，白求恩唯恐路上耽误又失去一次参战机会。因此，一路上马不停蹄，中午也只向老乡要了点开水，吃了一点点干粮。当



天晚上十一点，医疗队终于赶到旅司令部，王震旅长正等着他们。

第二天，他们在离前线很近的一座小庙里设立了急救站，手术台旁燃起了熊熊的炭火。下午五点，第一批伤员到了。白求恩开始了紧张的手术。

战斗打得很激烈，敌机在天上盘旋、投弹，把小庙的一堵后墙也震塌了。白求恩不为所动，一直工作不停。手术一个，又一个；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白求恩接连做了七十一个手术，坚持了两天两夜，整整四十小时！累得他胸部发闷，两耳轰鸣，全身酸痛，嘴唇干裂得渗血，眼里布满了红丝。等到江一真率领医疗队赶来时，他几乎都站不稳了，在旅卫生部，竟靠在土墙上睡着了。

后来，白求恩又到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手术后的伤员。他惊喜地发现：由于战士们负伤后七个小时就得到处理，三分之一没有感染，三分之一轻度感染，三分之一一般感染，只有一人死亡。这个治愈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场。时间赢得了生命！他立刻把这个工作结果报告了毛泽东和聂荣臻，并说道：“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还感慨地说：“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是的，白求恩确实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经过这一时期的转战，他终于找到了游击战中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的正确途径。

回到杨家庄后，白求恩总在想如何把这次战场救护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他提出：“每一个旅都应该有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归自己调动的流动医疗队，它是前方部队的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桥梁。”为了培训和提高医务人员在前线处理伤员的能力

力，他决定创办一所特种外科医院，并在医院里举办特种外科实习周。所谓“特种外科”，也就是指游击战中火线救护的一些特定战伤的诊断治疗。

对特种外科医院，白求恩还决定建立一种新的管理机构——院务委员会。他亲自起草了章程，提出由医生、护士、伤员、驻地群众参加医院管理，院务委员会的委员由选举产生。他曾说过：“毛泽东主席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提议建立的院务委员会就是一次实践！三个月来，他亲眼看到，医务工作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象对待儿女一样关怀伤病员。村村都可以当医院，家家都可以当病房，人人都可以当护士，这是他得出的结论。过去的忧虑是多余的。不！不是把伤病员从群众家里搬出来，而是要更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医疗的权力还给人民。院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那是一个雪花飞舞的夜晚，翻译刚刚给他读完《抗敌三日刊》，一个医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一名刚送来的伤员股动脉出血了。白求恩急忙跑去，经过初步诊断处理，需要输血！情况很危急，白求恩以自己是O型——万能输血者为理由，再一次献了三百毫升——第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二日，为一个截肢伤员输的。白求恩输血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群众要求献血。可是，这里不是西班牙，没有冷藏设备，无法收集血液。还是群众想出了办法，先把献血者的血型化验出来，登记造册，一旦需要，随叫随到。就这样，在院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一个“志愿输血队”成立了。白求恩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在连绵起伏的深山里，群众自己动手办起了另一所‘模范医院’，而且做了符合实际的更新。这使我兴奋得都不知该怎么向你转达

我的心情。毛泽东同志是那样信赖他的人民，我现在更加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他和他们。”——这也是白求恩所说的“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的证明！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白求恩的扁桃腺发炎了，但他坚持特种外科实习周按时开课。二十多个分区、旅卫生部长、科长和医生参加了学习。他把大家按卫生员、护士、医生分成三个组，轮流以不同的身份到病房实习。他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每动一次手术，都让大家开十个处方，由他一一修改，然后再对照他开的十个处方，组织学员讨论研究。短短七天，大家在技术操作和理论上都有长足进步，都很满意。唯有白求恩对自己不满意；实习周刚开始时，他断然拒绝三五九旅医务主任潘世征参加。现在，他痛苦地认识到，这太武断了，自己误解了一位好同志。为此，他给王震写了封信，作了检查。白求恩批评人是毫不留情的，就是对自己，也绝不含糊。他说：“为了真理，为了事业，我不怕把面子丢光！”

## （九）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此后，日本侵略军向我敌后解放区发动了连续“扫荡”，冀中军区医院受到严重破坏，一二〇师在通过封锁线时，医疗器械有很大损失。那里战斗频繁，伤员增多，急须加强救护力量。

白求恩得知以上情况后，主动请求带一个医疗队到冀中去。军区领导不无顾虑：那里终究不象山区回旋余地大，安全很难保障。但白求恩一再请求，也就答应了。

一九三九年春节过后，由十八人组成的东征医疗队出发

了。二月十八日晚到达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唐县宋家庄，准备第二天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冲过平汉路封锁线。可是，上午有一个团长来找白求恩，说他的头部在长征路上负过伤，至今还有一块弹片，工作一累就痛，请白大夫帮助治一治。白求恩二话没说，吩咐打开早已捆绑在牲口驮子上的器械，亲自动手术为这位团长取出了弹片。事后他说：“这样一位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财富。我们麻烦点，帮他治好病，让他更好地工作，这很有意义。”就这样，他把休息变成了工作。

医疗队在部队护送下，从清风店附近冲过封锁线，二十二日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驻地河间县东湾里，见到了吕正操司令员。当晚，吕正操请白求恩吃饭。他抱怨肉太多，饭太好。

“上帝啊，但愿我们尝到一份汉堡牛排夹肉面包。”<sup>①</sup>他有过这样的欲望。可是，当给他端上一盘牛肉时，他面有愠色，左盘右问，直到弄清并非特意为他准备的时，他才肯吃。他也并不缺乏水果、罐头和糖，指战员们常给他送一些，但他把大部分又送给了伤病员。“他们比我更需要。”他这样解释。小米饭，土豆蘸盐面，这是家常便饭；穿草鞋，着布衣，他安之若素。这样，他还常常不安地说：我过着国王一样的生活！

到冀中后，困惑他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山区，我们的伤病员可以在部队掩护和群众支援下，避开敌人。在平原，随时遭遇，跑不了，躲不开，怎么办？——人民，是人民用热爱子弟兵的胸怀把伤病员庇护下来。伤病员穿上了老百姓的服装，同老百姓住在一起，并得到他们的精心照顾，敌人来了，他们“变成”老百姓的儿子、丈夫、亲戚朋友，为了保护他

---

<sup>①</sup>白求恩 1938 年 5 月 23 日写给加拿大友人的信。

们，人民群众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四公村发生的事使他感受尤深。四月中旬，白求恩听说离河间四十里的四公村隐蔽着几十个伤员，执意要去。那里离河间任丘公路很近，敌人经常出动，比较危险。一二〇师贺龙师长拗不过他，派了一个排护送。医疗队在四公村忙了一天，准备第二天继续做手术。当夜，为了预防万一，人不脱衣，马不卸鞍。果然，早晨五点钟左右，日军四百多人扑来了。幸亏早起拾粪的一位老乡灵机一动，故意指错了路，这样赢得了时间，使他们安全转移。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也无一损失。白求恩说：“八路军真象海里的游鱼！”……人民是山！人民是海！白求恩赞叹道：“他们是伟大的人民！”“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了他们……。”

白求恩在冀中医院工作了半月左右，就到一二〇师去了。为了便于活动，更有效地开展救护，他把东征医疗队一分为二。在这段工作期间，他发明了一种叫“毕普”的药膏，用来涂在伤口上，一可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和恶化，二可润滑伤口，换药时就不至于疼得伤员吸冷气——这也是他受不了的。他还改进了“换药篮子”，比过去更便于伪装——盖上一块土布就行，更便于携带、使用，走东家串西家换药更方便和省力气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芦沟桥药驮子”。在冀中，必须随时准备走路。可是，他们的药驮子很伤脑筋，打开费事，装运更费事，有时还损坏药品，甚至延误部队行动。他从群众的粪驮子上受到启发，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药驮子”。

打开，可以当手术台；收起，往马背上一放就可以走；里面的各个抽屉方格里可以携带一个手术室、一个包扎室和一个药房的全部必需品，足够施行一百次手术、五百次包扎之用。同志们称赞说：“我们真变成马背上医院了！”尽管这样的发明创造算不上“伟大”，但是，它是适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些发明创造上，看到了白求恩思想的轨迹：从他刚到晋察冀时要救护汽车，抱怨伤病员的食品“既无牛肉、又无鸡蛋、更无牛乳”，到他在马背上作文章，前后不满一年，他已经走了模范医院——特种外科医院——“马背医院”，这么长的一段路程。从接触、熟悉这场战争，到了解它，驾驭它，其中的甘苦，不难想象！

四月二十三日，白求恩参加了齐会战斗。在这以前，他参加过留韩战斗和大团汀战斗；二十多天以后，他又参加了宋家庄战斗。不过，在这些战斗中，齐会战斗最激烈。一二〇师开到冀中后，东西征战，捷报频传，冀中军民士气大振。敌人则恼羞成怒，调来了王牌军“渡佳行联队”吉田大队，要与一二〇师决一死战。二十三日凌晨，八百敌人突然包围了驻扎在齐会的三营。正在大珠村开会的贺龙师长马上调集七个团，又把敌人团团围住。激战开始了。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齐会东北七里的屯庄，在一个小庙里为伤员作手术。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白求恩也忙了三天三夜。在六十九个小时中，他和医疗队给一百一十五名伤员施行了手术，打破了广灵伏击战手术四十个小时的纪录。这六十九个小时，炮弹打在庙外的空场上，他没有片刻停顿；同志们要把他换下去休息一下，他没有理会，……整整在手术台边和病房度过了六十九个小时！

最难令人忘怀的是他对三营徐连长的抢救和护理。徐连长

为了抢占桥头阵地，身负重伤，肠子裸露，竟有十个裂隙和穿孔。白求恩精心为他进行了手术；后来，见他呼吸不畅，又亲自为他做了床挡，使他可以依靠；还亲自给他做流食，并一匙一匙地喂他。白求恩关心伤病员的事迹到处传诵：他为伤病员端屎端尿；他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伤病员盖；他动手术不是考虑省事，而是为伤员的今后着想，截肢的想到将来给他装个假腿，手伤的想着多留点肌肉，少切除点，以便将来能够生活自理；他甚至连从伤病员面前走路的姿势也有要求：谦和、亲切，使伤病员感到温暖，不要两眼朝天，旁若无人，冷冰冰的。他常常这样问伤病员：“我的孩子，你感到怎么样？”伤病员说一声“好”，他会高兴得象孩子一样笑起来。伤病员无不感动地说：“做白大夫的病人是幸福的！”他真正实践了自己在“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大会上讲过的话：“一个医生、一个看护、一个招呼员的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兄弟、父亲还要亲切些——他们是你的同志。……你不把他们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从事卫生事业，也简直不配在八路军工作。”

白求恩对病人的深厚感情使他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在冀中后期竟给十五个伤员在无麻醉情况下动了手术。伤员紧紧抓住手术台的手象揪住他的心。他头上的汗水比手术者更多，他喃喃自语：“孩子，好了，很快……。”回到宿舍他精疲力尽，与其说是由于体力上的消耗，倒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折磨！他暴跳如雷：“我是医生，不是屠夫！”他决心和新西兰传教士荷尔女士一起到平津买药。荷尔女士就是经他动员为八路军买过许

多药品，还从北平的医院给边区带来了几位护士。可是，敌人现在严密封锁，教会医院买的药也一一登记，还要去查，她也无能为力了。但是白求恩又说服她和他一起再闯一趟。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他取消计划。他已准备好了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而且，还偷偷跑到县政府要了大车。

就在这时，聂荣臻给白求恩拍来急电，要他速回军区。原来同志们将这事报告了司令员。等他返回平山县蛟潭庄时，适逢召开边区党代表大会，聂荣臻请他列席了会议，并请他发了言。他很高兴，还提议给加拿大共产党发一电报，告诉他们：加拿大共产党的代表在中国抗日前线参加了党代表大会。

聂荣臻命令白求恩取消那个计划，白求恩服从了。会后，他回到冀中。不久——一九三九年六月底，又返回冀西，结束了历时四个月的东征。

## (十)

白求恩一到边区就致力于培训八路军医务人员。在松岩口的时候，他就经常给医务人员讲课。而且，他创办模范医院的目的，就有培训医务人员的任务。从松岩口撤出后，他走到哪里，课也讲到哪里。那一年年底，他创办的特种外科医院，举办的实习周，目的也很明确。到冀中，尽管工作比过去繁忙，形势比山区危险，他培养医务人员，照样毫不懈怠。一年来，他还编著了近二十种教材，如《战地救护须知》、《战伤治疗技术》、《初步疗伤》、《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步》等等。看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他心急如焚，恨不得一夜间让八路军的医务人员赶



上他，超过他。这个时期他主要想的是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以便减少伤病员的痛苦，抢救更多的生命。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从冀中返回冀西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有了新的进展。他认为，光靠现有的医务人员不行，必须培养更多的医务人员。二十万军队，医院里经常有两千五百名伤员，一年中发生一千次以上的战斗，而与此相对照的，“却只是很少的中国医科学校毕业的医生、几十名未受过医科学校训练的医生和一个外国人来作这一切工作”<sup>①</sup>，不成比例！他很吃惊！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培养本地区的医生和护士”，并认为“这是任何外国医疗队的主要任务”。他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组织一个（外国）医疗队独立地做自己所能做的工作，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一个医疗队纵然能做出很多的事情，……但他们一旦移动，而八路军医务人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感到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外国医疗队不仅只直接运用技术工作，而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人材，这样纵然离开，他们自己也能担负起来。”他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他又“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他向军区提出了创办一所卫生学校的建议：“此地有设立一所完善的医校的必要。”恰好，这时军区领导和卫生部也正酝酿此事，他的建议被采纳了。

作为一个卫生顾问，白求恩的目光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卫生工作上。他建议利用我们治愈的日军战俘积极开展对敌宣传<sup>②</sup>；

---

<sup>①</sup>白求恩 1939 年 7 月 1 日给毛泽东、聂荣臻的工作报告。

<sup>②</sup>1938 年 11 月 2 日白求恩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信。

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委员会，撰写文章，拍摄照片，向国内外报刊提供稿件，把解放区正在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告诉全世界”，阐述八路军的主张，扩大影响，争取同情和支持。他身体力行，亲自负责英文组，并且写了《创伤》、《一发未爆炸的炮弹》等文章，拍了许多照片，寄往美国、加拿大发表<sup>①</sup>；他建议给八路军战士及其家属颁发袖章、徽章、荣誉状等，以鼓励参军，提高士气<sup>②</sup>。总之，凡是于抗日有利的，都在他的“顾问”之内。

七月中旬，军区开始抽调干部，筹建学校，白求恩则忙着编写教材。

缺书，是办医校的根本性的困难。白求恩想到，即使有书，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也未必适应边区的情况。他决心根据自己十八个月的工作经验和红军传下来的十年宝贵的经验，写一本新的书，定名为《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術》。

七月溽暑。那一年雨水又很多，天象打开了的水龙头，足足下了两个月，又热又闷又湿。他在完县神北村的一间草房里，开始了编写工作，“咔哒、咔哒”的打字声从早响到晚。实在太疲累了，他使用冷水冲冲头，然后又坐到打字机前。有时已经上床睡觉了，突然又跳下来，点着蜡烛，戴上眼镜，坐下来打几行，或描绘一幅示意图。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本书中了，就连吃饭也谈论一些与此书有关的问题。有一次，他的右手中指生了瘰疽，十指连心，一打字就钻心般疼。不得已，他只好让翻译在瘰疽患处切开一个十字口排脓。休息了两天，伤口还

---

① 1938年8月23日白求恩给聂荣臻的报告和同年9月30日给马海德的信。

② 1938年10月22日给聂荣臻的信。

没好利落，打字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就这样，白求恩夜以继日，奋战半个月，一本长达十四万字、附有一百一十九幅插图的书完成了。平均每天要写下一万字、描绘近十幅插图。速度惊人！

如果我们稍稍浏览一下书的内容，那对白求恩就会了解得更深些。书中选用的战例，是他一年来亲身经历的；书中介绍的方法，都可立即应用：木锯可以作离断刀，丝线可以代替羊肠线，木棍、鞋、秫秸可以当夹板，做麻醉口罩可以用纱布和硬纸板，这些不见经传的土办法，在他的书里专辟一章，郑重其事地加以介绍。从一个医院的组织方案到一根橡皮管的煮沸晾晒，一招一式，一点一滴，他都想到了，写上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仅写了技术、医务，在书中还强调卫生部门必须“直属于师、团的领导和总卫生部”，一个领导人“不管是否懂得技术”，但一定要“懂得军事，特别是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他嘱咐道：“可以借用老百姓的门板或木板作担架，但用毕一定退还”，还强调说：“记住，把手术中取出的弹片、子弹要交给受伤者本人！”白求恩已经注意到把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政治工作融汇到医务工作中了。白求恩一生有许多著作，也写过诗、小说，而这部不平常的书，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

办学校缺书，也需要一笔经费，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器材。白求恩深知边区经济困难，他一再要求国外多汇些钱来，多支援些东西。可是，他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报，结果只收到二百元钱和三封信，最后一封是七个月以前收到的，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从纽约寄来的。白求恩对国外这种状况大为不满，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说：“国际援华委员会对他们身居前线的代表似乎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使我对美国的发

展情况，钱、物资供应等等完全处于无知的状况。”“那个该死的美国的委员会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白求恩决定回国！他认为，“应该努力向国外多募捐些钱来，……设法能每月有一千元美金，供这个医学校使用。除了我亲自出去募款，再没有其他的合适的人或好的方法。因为我在边区工作十五个月之久了，了解真正需要的情况。”

军区同意了他的计划。

八月十六日，他请延安信托委员会打电报给美国援华委员会，把他的路费汇往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会，他将于明年一月初拿这笔款子。他开始了回国的准备。

#### (十一)

白求恩并不急于马上动身。他有个打算：走之前把军区的二十所医院迅速检阅一遍。一是可以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这也是他回去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二是可以给每所医院一些忠告，解决一些疑难，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走了。尽管他只准备回去“逗留三、四个月，明年夏天就回来”，但这半年多也是空白。他已和这儿溶为一体了。他宣称：“这儿将是‘我的’生活领域”。如果不是出现那些始料不及的情况，他本来可以避免再奔波一次的。但是，回去一趟也是值得的。当前，首先需要把巡视搞完。他预定十一月初结束，然后离开这里。

九月二十五日，军区卫生巡视团从花盆村出发，前往巡视途中的第一站——三分区于家寨二所。当时，疟疾流行。二所还有不少人患肠炎、痢疾、感冒。上午，白求恩查病房，动手术；下午，召集医护人员，为大家讲述治疗这四种常见疾病的

方法；晚上，伏在老乡的小柜上，就着昏暗跳动的灯光编写防治提纲。

有一天深夜，秋虫低吟，凉风习习，山村沉浸在梦乡中。突然，翻译被叫醒了，只见白求恩披着衣服站在床边，正侧耳细听什么。这位翻译略一定神，发现白求恩是在倾听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一阵阵悲切的哭声。大概他在睡梦中被吵醒了。

“走，看看去！”白求恩拉起翻译，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循着哭声来到一位老乡家里。他温和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老乡指着炕上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说：“病死了”。白求恩连连责备这位老乡不把孩子送到医院。半夜哭声也能牵动他的心思，引起他严重关切——他对人民总是那样一往情深！在这以前，从冀中返回通过封锁线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硬是为一个患脓胸肿的老乡开了刀；他发现一个玩耍的小孩是豁子嘴，亲自抱回去进行了缝合；他见一个老乡左臂肿胀，愁容满面，主动询问，帮他做了治疗。至于老乡们找上门来，他从不推诿，热情相待，精心诊治，常常废寝忘食。“人民——他心目中的上帝！”他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群众出于感激，免不了送些鸡蛋、瓜果梨枣之类的礼品，白求恩都谢绝了。他恳切地说：“不要感谢我，感谢八路军才对！”

离开于家寨，他们先后巡视了二团卫生队各营卫生所、二十四团、三分区休养所、骑兵营、一支队、老姑医院、冀中军区后方卫生部、后方医院二所等单位。走路，工作；工作，走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精确的安排，都有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一天只睡五六个钟头。他当年的一位战友曾这样说过：

“和白大夫一块工作累死了！但想到人家是一个外国人，自己是中国人；人家那么六岁数，自己年轻力壮；人家是主刀，费

心费力，自己是助手，轻松多了，自己还有什么话说呢?!”如果说作为他的病人是幸福的，那么，作为他的同事则是艰难的。不仅仅是累和忙，他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说是严厉，容不得半点玩忽职守和敷衍应付。一次，一位医生在手术间隙削梨吃，他怒冲冲地抓过来扔到门外。还有比这更不客气和令人难堪的：有位医生忘了给伤员上夹板——这会造残废，结果，结结实实地挨了他一巴掌!

十月中、下旬，他们到达一分区司令部驻地易县管头。军分区杨成武司令员告诉他，敌人施放了毒瓦斯。当夜十二点，白求恩跑去找杨成武，告诉这位司令员应当通知部队用石灰和纱布做防毒口罩。

就在他们紧张检查工作的时候，敌人开始了冬季大“扫荡”。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一分区司令部通知巡视团，从摩天岭前线下来了四十几个伤员，正绕过敌人据点王安镇向这儿送来，请白求恩做初步疗伤。白求恩带着医疗队来到涞源孙家庄，在半山坡上的一座破庙里布置了临时手术站。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机枪声在山谷回荡，大路上不断有担架过来。白求恩连忙打开手术器械箱，穿上白围裙，叫几个医生到山坡下的大路上去，凡是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一律拦住检查，伤势轻的，上药包扎，然后送到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治疗；伤势重的，不管多少，全部送到庙里由他抢救，然后再送往一所。

战斗很激烈，白求恩顾不得吃，顾不得睡，一直动手术。第二天下午六点，司令部紧急通知，说日军分几路以孙家庄为中心包围过来，让他们立即转移。不一会儿，哨兵就看到了日军，枪声也离得很近了。这时，外面还有十个重伤员。大家催促白求恩先撤离，他却说，来得及，抓紧时间做完。哨兵又报

告道，敌人正从对面山上走下来。同志们又劝他快走，由他们处理这几个伤员。白求恩说，一起做吧！他吩咐再添两张手术台。敌人离这儿越来越近，枪声好象在耳边爆响。小庙里却静极了。只听见手术器械的叮当声和人们急促的呼吸。“糟糕！”白求恩喊了声，他的左手中指被刀尖刺破了。他示意大家不要理会，继续工作，把手指放在消毒液里浸了一会儿，又俯下身去。二十分钟后，只剩下一个腿部受伤的青年。哨兵第三次报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医务科长也拉着白求恩，说：“我来接替你……”。青年战士在手术台上也恳求道：“白大夫，你快走吧！我的伤不重，把我留下、带走都行。”白求恩安慰他：“我的孩子，来得及的，你放心吧！”他一直坚持把手术做完。当他们刚刚钻进山沟，敌人便冲进了村子。

他们连夜行军。深秋，寒气逼人。白求恩感冒了，仍跟着队伍长途跋涉，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达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他的手指已轻度肿胀。大家劝他休息一下，他毫不在意。也许因为以往多次感染，从没有出过什么事，使得他也没有把这次小小的事故放在心上。他又忙碌了两天：第一天，检查了二百名伤员；第二天，动手术十三个，还举办了两次现场讲课。

十一月一日，他们准备前往完县史家庄后方医院继续完成巡视任务。早饭后，一切就绪，大家在村边等着出发。白求恩却要最后巡视一次病房再走。在一个病房里发现了一名颈部丹毒的伤员，合并头部蜂窝织炎，头部肿得很大，生命垂危。白求恩详细检查后，决定手术，不放过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命令把手术器械再卸下来，亲自操刀，纵横切开。谁知，就在这次手术中，可怕的细菌侵入了他的伤口。

白求恩的生命受到了致命威胁，他的不平凡的一生中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让我们列个时间表，逐天看看他的活动吧：

十一月一日，下午手术后出发。天异常阴冷，路又很难走。白求恩身患感冒，手指发炎，仍然急匆匆去执行巡视任务。途中滴水未进，又冷又饿。行军七十里赶到史家庄医院，极度疲乏，病情加重，夜里几次惊醒。

十一月二日，五时起床。检查了二百多个伤员。而他自己既有伤，又有病，却没有抽出时间休息休息，诊治一下。

十一月三日，手术十三个。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当晚，卫生部长叶青山赶来，劝他休息几天，抓紧时间治疗。他却仍然念念不忘巡视工作，提出到曲阳县康家圩三分区三所去。

十一月四日，同志们千方百计封锁有关伤员和前线消息，连哄带劝，“强制”他休息。休息——白求恩的字典里好象没有这两个字。他靠在床上起草巡视团的工作报告，这是他每月，或者一项大的活动之后的例行工作。这一天，他还写了一份关于疟疾的讲课提纲。

十一月五日，“封锁”失败。白求恩听到炮声，坚决要求上前线。他冲出房门，在风天雪地里，步履蹒跚。路上遇到前线下来的伤员，他连连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而此时，体温计显示出他的体温是：三十九度六！

十一月六日，白求恩行军七十里，赶到离火线十里的三团卫生队驻地王家台。病情进一步严重。

十一月七日，白求恩左肘发生转移性脓疡，体温高达四十度。他让翻译派通讯员通知各部队，把伤员送到这里来！服药后他睡了几个小时，感觉略好些，下午就去主持医疗队的初步疗伤



工作，终究不支，昏倒。但仍断断续续地命令道：凡是头部、腹部、胸部的伤员，一定要抬给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

十一月八日，病情恶化。整天有难以抵抗的恶寒战栗和高烧。卧床，体温总在三十九度六上下。

十一月九日，割开左肘转移性脓疡，精神稍好些。下午，体温又升高。军区首长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为白求恩治疗！大家劝他到后方去，他不肯！

十一月十日，组织上派季团长来看望他，再一次请他回花盆村后方医院，并说敌人正从五亩地、王家庄袭来，部队马上也要转移，他才答应走。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离开王家台。途中，他连连喊冷，呕吐几次，说话已没条理了。下午三时，到达唐县黄石口，离后方医院还有十几里，他坚决不走了。

附近的人得知白求恩生病的消息，纷纷赶来探望。人们伏在院墙上，注视着翻译和医生，忧虑重重，一动不动，一声不响。……

军区和卫生部都派了人来。

十一月十一日，白求恩给前任翻译写信，仍然念念不忘伤员和工作。他在信上说：“林大夫应该带领一个手术队，即刻北上，协助工作。到昨天为止，共有伤员三百名。……我为伤员们感到焦虑，假若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还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信，最后一次尽了他一个卫生顾问的职责。他建议：“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千万别再往

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他想得何等周到、细致！

最后，白求恩立下了遗嘱：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赠给周围的同志，并注明，“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他谆谆嘱咐同志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白求恩想到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五时二十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一、国外部分

1. 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著：《手术刀就是武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2. 加拿大“白求恩故居”纪念馆部分资料。

##### 二、国内部分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纪念馆”保存的白求恩的书信、日记、文章、工作报告等资料。
2.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5 年 6 月第 1 版。
3. 《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第 2 版。
4.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5. 笔者采访叶青山、游胜华、董越千、林金亮、何自新、陈其源、王道建、马海德等的记录。

# 柯 棣 华

方一星 盛贤功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Dwarkanath Shantaram Kotnis)。柯棣是姓，为了表示援华抗日的决心，他在柯棣的后面加了一个“华”字——即柯棣华。

这位印度大夫，在他从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毕业后二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志愿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后，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所感召、吸引，毅然选择了去革命圣地延安的道路。他在延安、华北等地工作达四年之久，曾担任晋察冀军区规模最大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并于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不但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服务，而且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中印友好活动家，一位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积极实践者。他不避艰险，不辞辛劳，奋不顾身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由于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影响了他的健康，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因癫痫突然发作，经救治无效，逝世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终年仅三十二岁。

## 革命思想的萌芽

一九一〇年十月九日，当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

斯在印度的原属孟买省的绍拉普尔降生时，这里还只是一个普通村镇，还保留着封建农村的各种特点。地主阶级依然是农村经济的统治者，集市上以物易物仍是主要的交换手段。随着柯棣华年龄的增长，栉次鳞毗的厂房渐渐吞噬了绿荫遮覆的庄田。以火与剑为先导的英国纺织资本家，看中了这个小镇的“地利”：这里有丰富的棉花资源，交通方便，距印度最大港口——孟买还不到三百公里。因此英国资本家争相投资，不到三十年，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镇，竟成了印度西海岸颇有名气的纺织业中心。殖民主义工业的大量入侵，扼杀了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使绍拉普尔人戴着封建主义枷锁的颈上又套上了殖民主义的枷锁。

在绍拉普尔度过少年时代的柯棣华，受到他父亲桑塔拉姆先生的严格教育和良好影响。桑塔拉姆虽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办事处主任，但要照顾一个失去听力的妻子和抚养八个儿女，生活仍是困难的。桑塔拉姆是一位通晓大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他积极支援本国纺织业，抵制殖民主义者经营的纺织业。他甚至在抵制英货的高潮中，带着两个儿子——孟凯什和柯棣华去参加焚烧进口棉布的篝火集会。他原寄希望于柯棣华医学院毕业后能自行开业，摆脱债务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当柯棣华决定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时，他还是积极支持了儿子的正义行动，并帮助柯棣华说服了援华委员会。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怀着深情厚谊的老人。

年轻幼稚而又向往民族独立的柯棣华，为了解除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他和父辈一样，努力探索拯救民族的道路。那时的印度到处传诵着日本“明治维新”、“民壮而国强”的时兴口

号。柯棣华和他的同学们，包括他的父亲在内，都轻信了当时日本和印度的有些史学家，认为“明治维新”的决定因素是“新医学”。于是柯棣华走上了医学救国的道路。

一九三〇年五月，在柯棣华进入孟买卡瓦亨达斯·森德多斯医学院不久，他的家乡绍拉普尔就发生了工人志愿队的武装暴动。工人们放火烧毁了一处军火库、六个警察局和英国人的一些办事处。起义者向英国驻军开枪射击，并宣布成立自己的政权，拒绝执行殖民当局的一切法令。历时一周的工人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领导人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起义事件的革命行动却鼓舞了柯棣华。一九三二年，当第二次反英高潮掀起时，柯棣华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他勇敢地走上街头，以激烈的言词抨击殖民主义政策，因而遭到殖民当局的监禁。为了营救宣传民族独立而被捕的教务长，他当面痛斥当局新委任的教务长是恶魔，并带领同学高呼“恶魔教务长滚回去”等口号。营救活动持续一个多月未能成功，柯棣华因此被开除学籍。

迫害不能使他屈服。柯棣华在以同等学历考入孟买格兰特医学院后，更加认真地思索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一九三六年，他在格兰特医学院结束了学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并因成绩优秀而留校担任生理学助教。一九三七年又获得住院大夫的职称。柯棣华在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医学这个观察社会的窗口，看到了在病态社会中两个典型的症状：一是因为花天酒地而患病的富人，一是因为饥饿寒冷而死亡的穷人。这些问题决不是医学所能救治的。医学救国的理想破灭了。柯棣华重新陷入了探索真理的苦闷之中。

后来，他在自传中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写道：“我在十岁

时，就是一九二〇年反英运动最激烈时，印度政府采取了野蛮手段，为了镇压此运动，引起了我的革命思想。从那时起，我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了，特别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反英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时到了最高点。”当时主张暴力的激烈派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宣传相继出现，印度政治思潮就象发了水的恒河一样，回转着一个又一个的旋涡，他自己就陷在各种思想的旋涡里。他参加过甘地号召举行的罢课运动，也参加过社会主义革命原理的讨论。他象一头初生的牛犊，在生活道路上东碰西撞，摸索前进。

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我的革命思想已经启发了，但是，关于革命的方法还没有确实的了解。”

### 人生道路上的转机

为了探索革命的方法，柯棣华的政治视野已经越出印度国境。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华很快被吸引了。

由于中印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由于自十六世纪中叶两大民族同时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共同命运，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极为同情。抗日战争爆发后，印度许多著名社团领袖纷纷发表演说，谴责日本对华侵略罪行；在各大城市还普遍组织了以捐献物资为内容的“援华日”。印度统一战线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举行的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指出：“对于中国人民在反对残酷而野蛮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双苦，表示无限同情。”“为援助中国人民，允许派遣医疗队去

中国。”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印度国民大会中的左派，包括印共在内，都积极从事援华活动，如组织学生讲演，市民募金，文艺界义演和商业界义卖等等。这股潮流不仅深入到街头巷尾，更深入人们的心里。富于正义感的柯棣华自然而然地卷入了这股潮流。

日本侵华战争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怒，也改变了印度知识界对日本基本国策的看法。因为日本曾经是亚洲唯一能够与英帝国主义匹敌的工业大国，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印度知识界不能不重新评价这个亚洲的经济之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狂轰滥炸的罪行，激起了印度人民更大的愤慨，在广大青年中反应尤为强烈。数以千计的学生反复向国民大会和援华委员会提出要求，志愿和中国兄弟并肩战斗。他们大声疾呼：“中国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打击，就是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打击。他们的斗争也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要用我们的血，用我们的汗，用我们仅有的一点金钱去支援他们。”这股援华热浪甚至波及到侨居国外的印度人中。关于组织援华医疗队的建议，就是由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爱德首先在伦敦的一次印度人集会上提出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国内的响应，国民大会遂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为医疗队筹集资金和招募医生。在这样一个举国上下的“援华热”中，二十八岁的柯棣华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作出了决定——到中国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即孟买“援华日”，柯棣华正式向援华委员会提出参加医疗队的申请。柯棣华的入选是困难的，首先因为他缺乏医疗队员所必须具备的外科经验。其次，他的父亲对国大党的成见和对殖民当局能否支持医疗队在

华长期工作抱有怀疑。但柯棣华毫不气馁。他中断了为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学业准备，想方设法直接同委员会主席见面，以使用当面的恳求来弥补他资格上的不足。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主席接见了。他这种不顾一切的心情充分表达在他同年七月五日给父亲的信中：“委员会主席向我指出了事情的阴暗面，这是指妨碍深造，以及失去将来可能得到的工作等。因此，我断然表示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并真诚的希望被录取。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我的这个新的狂热的行为。但是，我确实希望您能用直到如今对我的那种宽容，允许我获得一生仅有的机会”。在这封信中，他郑重地告诉父亲：“我将这个决定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转机”。

他的诚挚，特别是他父亲的支持，使援华委员会放宽了条件。八月底，柯棣华终于加入了由爱德任队长，卓克任副队长，他和巴苏、木克为队员的五人援华医疗队。

援华医疗队受到印度人民的一致赞扬。当医疗队在孟买集中准备出发的前夕，印度各社团领袖，各界代表以及在印华侨，中国驻印外交官员的代表，都纷纷赶到孟买为他们送行，欢送的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孟买国大党委员会和孟买劳工组织还召集了群众大会，印度国大党领袖、著名诗人索罗吉尼·奈都夫人在会上以富有诗意的语言，称赞医疗队员们是“无任命的驻华大使——人民大使”。她说：“印度人民的心一直向往着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国兄弟”。她甚至预言，“医疗队当中某个人将为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同情的伟大事业而献身”。在集会上，一些大学生跑到主席台上，向医疗队表示致敬，把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队员柯棣华、木克、巴苏包围起来，称他们为光荣代表。更动人的是，帕里尔的纺织工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手



擎红旗，高唱反法西斯歌曲，高呼“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徒步五公里赶来参加这次集会，表示人们对医疗队的全力支持。在人民的热烈欢呼声中，柯棣华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 重庆与延安之间的选择

带着印度人民的友好情谊，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乘英国邮船拉吉普塔纳号离开孟买。在远航中，柯棣华认识了两位从海外回国的中国人，一个是工程师，另一个是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出于青年人的求知欲望，他每天缠住这两个中国朋友询问中国的各种情况，向他们学习中国话，学唱中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闲暇时，柯棣华最喜爱阅读埃德加·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等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他知道了英雄的中国红军史诗般的长征，知道了抗日根据地这些崭新的字眼，知道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的名字。

九月十七日轮船到达广州码头，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席宋庆龄，第一个上船来热情地向印度友人致意并表示欢迎。五位印度大夫在欢迎声中，踏上了他们向往已久的中国大地。

凡是在中国人民抗战时期前来援华的外国朋友，几乎无一例外要同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最先相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却同被国民党人百般丑化的中国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

柯棣华等原先认为，到了中国，就可以为援助中华民族而大显身手了。然而，没过多少日子，他们就发现这种想法是幼

稚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印度医疗队到达中国之前，上海、南京已经失守，日寇正向武汉、广州、长沙长驱进犯。九月二十五日，医疗队随军到达长沙。没几天，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武汉、长沙，向宜昌转移。不久，又决定由宜昌撤退到大后方——重庆。在撤退途中，他们曾一度在国民党一所医院工作，目睹了国民党军队从前线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混乱局面，和国民党政府贪污自肥，置人民与士兵生命于不顾的腐败现象，人人气愤难平。柯棣华说：“仗已经打起来了，国民党居然不加抵抗，拚命向后方跑，真是使人伤心失望。”

就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敌占区人民沿街乞讨的时候，国民党的官僚们却躲到大后方，过着燕窝鱼翅、花天酒地的生活。通过一次又一次接见、宴会、访问和实际工作的接触，柯棣华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看清了国民党老爷们的“抗战”真象。他愤慨地对巴苏说：“假如我们要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我们的失败是肯定了。”他还不止一次催问爱德队长：“我们为什么不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我们为什么不请八路军办事处帮忙？”

在武汉期间，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代表董必武、叶剑英于九月三十日在四川饭店举行宴会，欢迎援华医疗队。柯棣华非常重视和共产党代表的第一次会面。这次宴会家常便饭，没有舞会和娇滴滴的小姐作陪，但主人的情操和风度却给医疗队很深的印象。在宴会上，大家一次又一次为印度独立祝酒，一起用中文和法文、俄文唱歌，离席时，每一个人都为这次会见所感动。巴苏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真正的国际性聚会，我们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充满着这样精神聚会的，语言肤色的不同，一点也没有影响心的贴近和建立亲密的感情，这与我们

所经历的和国民党之间的气氛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比啊……。”在回公寓的路上，五位印度大夫兴致勃勃，年轻的柯棣华向巴斯第一次表示了他埋藏在心里好多天的心愿：“如果能跟这些出色的八路军一起工作，该多好啊。”

第二天中午，医疗队再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和工作人员一起共进午餐，每人只花了八分钱菜金。使柯棣华赞叹不已的是：在花红酒绿的武汉，从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到每个战士，都毫无怨言地吃这八分钱的标准。他再次感动了。在告别的时候，他禁不住紧紧地拥抱了八路军的同志们。

十月七日下午，周恩来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亲切会见了医疗队，象拉家常一样和他们谈起了中国和印度，谈起了喜马拉雅山的峡谷及其高度……。当爱德队长表示要到八路军工作的愿望时，周恩来紧紧握着爱德的手说：“谢谢你们！八路军、新四军确实很困难，很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欢迎你们到八路军、新四军里去工作。但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研究，你们是不是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

柯棣华不懂，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八路军那里去呢？直到以后他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这正是周恩来高瞻远瞩伟大之处。

十月底，五位印度大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向国民党卫生总署再次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医疗队的主动，打破了国民党老爷们的回避政策。在所谓国际影响的幌子下，最早露面劝说他们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他装着一副佛学家的模样“开导”来自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人，极力劝阻医疗队留在重庆才是佛家的真谛。他诬蔑说：“共产党不知伦理，不要纲常。正人君子应洁身自好，决不可与之共事。”

戴季陶的“劝说”碰壁以后，重庆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死

心。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亲自出面接见印度大夫。在一般性的寒暄之后，孔祥熙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几位想去延安？”“延安除了荒山野岭什么也没有，除了山就是雪，担心你们这些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哇。”“重庆虽然雾大一点，可是山川秀丽，风景宜人，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比延安好得多，否则政府就不会将重庆作为陪都啦。”“前线危险，无法保障安全，一旦不幸，无法向印度人民交待。”又是引诱，又是恐吓，孔祥熙耍尽了花招。

柯棣华一直盯着这张冷漠而狡猾的脸孔，心里很憎恶。他有理有节地反驳道：“我们不是来参观访问的，印度人民派我们来，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既是战争就难免有牺牲，这一点，我国人民是会理解的。”孔祥熙默然无语，只是一个劲地抽烟。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狠狠地将烟蒂一摔，怒气冲冲地走了。作为政府的首脑，竟连起码的外交礼节也不顾，一场“隆重”的接见，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经过一番曲折，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踏上了奔向延安的道路。为了医疗队的安全，八路军办事处请来了在中国工作多年，恰好要到榆林去视察“中国工业合作组织”的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要他陪同医疗队到延安去。在向延安出发的前夕，柯棣华给父亲写信说：“我们就要到延安去了。……我希望这次北方之行，将使我能够亲眼看看，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主义。”但就在这时，柯棣华接到他哥哥从印度发出的信，告诉他“父亲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年轻的柯棣华以沉重的打击。他呆坐在火炉旁，想到父亲为全家的生活，为自己的求学

和后来开业行医购买医疗器械，一直负债在身的情况；想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坚定支持；想到离家来中国前一天晚上同父亲的彻夜长谈；想到父亲的谆谆嘱咐：“到中国后，好好干，不要三心二意，中国是我们苦难的兄弟，我期望你成功。”这一切都使他万分悲痛，禁不住泪流满面。

同伴们知道了这个不幸消息后，都劝他回国料理一下家务。他拒绝了。他说：“父亲是如此尊重我从事的事业，甚至为此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除了为这个事业献身之外，没有其它道路可走。”

当天晚上，在油灯下，他忍住眼泪，给兄妹们以及亲友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忍受这个噩耗在我并不困难”，因为“就在昨天，这个城市遭受了轰炸，死亡五十多人。我目睹男人、女人，以及无辜婴儿的尸体从瓦砾堆中拉出来，他们有何罪过，竟遭到这样悲惨的死亡呢？……”上帝解救不了人类的苦难，人民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他再次表示，“在我未能履行我向国大党提出的至少要在中国工作一年的诺言之前，我不能回国。”他嘱咐哥哥承担家务，照顾妈妈和年幼的弟妹，以便使他能继续留在中国帮助抗战。

爱和恨交织在一起产生的巨大力量，帮助柯棣华从悲愤的重压下撑起了身子。他擦干眼泪，重新回到同伴们中间，为医疗队明天出发收拾和检查准备带走的药品。他一声不响地紧张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整整一个晚上，他和巴苏华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清晨，五位印度大夫离开了阴雾弥漫的重庆。巴苏华在日记中写道：“柯棣华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印度医疗队经过长途跋涉，跨过

风雪迷漫的山山水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二月十四日，延安各界代表齐集在八路军卫生部大礼堂，为印度五位大夫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出席了这个欢迎会，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致意，并招呼柯棣华等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身着带补丁的灰色棉制服，脚上穿一双八路军战士的棉鞋，说话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给柯棣华等留下很深的印象。

晚会上的节目是抗大同学自编自演的。其中有一个节目最受欢迎，演的是医疗队和中国同志一道上前线，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五位大夫心情激动地应邀上台，用中文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完歌，柯棣华又用中国话高呼口号：“印中两大民族团结起来，打倒世界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随之高呼，喊声雷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群众一起鼓掌、欢笑，表示赞扬印度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

十五日，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窑洞内亲切接见医疗队成员，询问了一些有关印度工人、农民生活状况，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形势以及印度各政党的主张等。毛泽东对印度友人说：“中印两国人民都遭受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压迫，有许多共同点，应当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希望在工作中，不仅对医生、护士，而且对领导人要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中午，毛泽东请医疗队全体共进午餐。当医疗队离别毛泽东回到住处后，巴苏华兴奋地说：“我感到很骄傲，我见到了一位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引以为自豪的领袖。”

医疗队的五位医生，又用了几天时间，参观了延安的部队、机关、医院、学校、工厂和农村。然后，根据他们的请求

被分配到设在离延安三十五里地的拐岭村的八路军总院，担任外科军医。柯棣华除了积极热情为伤病员治疗外，还特别注意观察自己周围的许多新鲜事物。他看到这里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新型关系：医生护士把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为了治愈伤病员而废寝忘食；伤病员对医护人员非常尊重和信赖，听从安排，主动合作。他也看到这里的领导、士兵、院长、医生、护士都彼此同志相称，平等相待，经常在一起开会，自由交谈，互相征求意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看到边区军民，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干部、士兵、勤务员，都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一个士兵每月收入折合三个卢比，而总司令和边区主席的收入也只有五个卢比。他深深感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理想和高尚的生活目的。

在延安期间，柯棣华结识了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接触到许多医务人员。他经常听他们介绍红军的艰苦长征，根据地建设，党的光荣传统以及陕甘宁边区的现状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一切，使年青的印度朋友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了解，更加亲近。他回忆在国民党区域内工作的那段经历，十分感慨地说：“国民党把伤员当作‘罪人’，漠不关心，百般打骂，草菅人命。”可是延安却是另外一种情景，“这同国民党官僚富翁们所统治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多么不同啊！这是全世界罕有的新事物和新制度啊！”

### 晋东南前线的普通一兵

一九三九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突变。德国法西斯军队闪击波兰，华沙陷落；英法对德宣战，飞机袭击柏林……欧洲战

争全面爆发了。在新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策略也作了相应变更：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极力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根据地则实行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他们调动侵华主要兵力，采用“分进合击”、“梳篦清剿”和“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进行“扫荡”。八路军同敌人进行着决死斗争。

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柯棣华和他的同伴们，再一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到前线去工作的要求。柯棣华向有关领导同志说：

“我来中国的目的是要直接为抗日的军民服务，我是个外科医生，也要象白求恩那样，到前方去为受伤的战士动手术。”

为了做好开赴敌后前线的准备工作，柯棣华学着八路军的样子，穿着草鞋，背着背包，戴着草帽，全副武装练习爬山。他在给印度家人的信中说：“我们等待任何时候下达行军的命令……我们已经开始吃士兵的伙食——一天三顿，每顿是小米饭或小米粥。”

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一间明净的窑洞里再次接见了柯棣华等，同时转达了朱德总司令从晋东南发出的“欢迎印度大夫到晋东南根据地去”的电报。毛泽东还亲切地叮嘱印度大夫，希望他们到了前线，要做好医务工作，要学习政治，要宣传抗日和国际主义。

印度大夫被批准上前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卫生部门，也传遍了延安。十一月二日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宴会，为印度友人饯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使印度友人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三日，拐峁医院全体同志也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柯棣华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到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命运和共同斗争，讲到在延安



受到的教育和启示，讲到和中国同志在共同战斗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他特别讲到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的眼睛湿润了，心情无比激动。最后，他满怀深情地说：“同志们请相信，我们决不辜负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望。”

十一月四日早晨，中央卫生部指定寒冰为翻译，并派八名警卫人员，护送医疗队踏上通向晋东南前线的路程。由于黄河东岸受到日寇不断进犯，道路被封锁，因此，医疗队只得南下西安，经潼关和渑池，再向北进入晋东南。

黄河两岸，景况截然不同。北岸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气勃勃，奋发向上，军民团结奋战，充满胜利希望；南岸是河南国民党统治区，腐朽没落，悲观绝望，到处充满着妥协、倒退、投降的气氛。一水之隔，却鲜明地呈现出抗日战争的两种方针和两种前途。

柯棣华一行从渑池渡过黄河之后，在向晋东南的二十多天的漫长的行军中，虽然有部队护送，群众欢迎，兵站接待以及当地村民提供敌情，但也要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多次碰上“遭遇战”。这对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柯棣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考验。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在一间设备十分简朴的民房里，朱德亲切热情地接见了医疗队的全体成员。室内小桌上有几本书和一盏煤油灯，墙壁上挂满了华北、中国、亚洲和世界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插着许多不同颜色的小旗，标示着抗日战争的敌我形势。

柯棣华坐在炕沿上，用诧异、新奇的目光倾听着朱德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敌后战场的概况和八路军游击战的主要经验

……。朱德还亲自为医疗队在晋东南的活动拟订了一个详细计划，并组织他们学习、了解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军民关系和医疗卫生等情况。虽然柯棣华当时还不完全理解这一切，但他意识到这是值得探索的真理。

朱德在向医疗队介绍了白求恩医生在中国的感人事迹后，说：“他热爱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做了很大贡献。”“他牺牲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临牺牲时，他还满怀信心地祝愿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否则，我们便对不起白求恩和你们这些热情帮助我们的同志。”

一九四〇年初，日寇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在晋西北发动反共高潮的时机，集结重兵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扫荡”。一场激烈的“反扫荡”战斗打响了。柯棣华等立即要求随部队进行战地救护。朱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将他们安排在一二九师陈赓领导的一〇七团里。一二九师是一支作战勇敢、威名远扬、使敌人丧胆的战斗部队。柯棣华、巴苏华来到团里，受到热烈欢迎。不久，他们随团参加了激烈的张店战斗。他们同这个团的指战员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学习，一起行军，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二十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为了能及时抢救伤员，他们把临时手术站设在前沿阵地。这是柯棣华的建议，也是白求恩的经验。战斗打响后，手术站就忙得不可开交了。任它枪林弹雨，任它疲劳饥饿，柯棣华顽强地一直连续工作了四十六个小时。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同志们为了他的安全，劝他和伤员一起撤下去，他认为这是看不起他，他发火了，嚷道：“为什么叫我下去？不行，假使我不能和你们同生共死，我就不配在八路军工作。”战斗

中，他亲眼看到有的战士奋不顾身，为保护阶级兄弟和首长而牺牲自己，有的战士多次负伤不下火线的感人情景。一次，他给一位老战士治疗，只见这位身上除新伤口外，还有六、七处旧伤疤的老战士，非但没有丝毫忧伤，还自豪地向他诉说着每一处伤疤的来历，使他十分敬佩。

在战斗空隙，柯棣华同战士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各种会议；夜间，又与战士们一起围在篝火旁，倾听团首长讲该团的光荣历史和作战故事。一个晚上，他参加了一个班、排的总结分析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研究班、排在作战中的配合问题，客观地分析了连、营、团领导在指挥上的优缺点，然后提出了今后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柯棣华对官兵之间的这种亲密融洽关系倍加赞扬。

使柯棣华感触最深的，是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部队只要发现乡亲们遭受敌人烧杀抢掠，不管多大艰险，都要全力以赴前去营救。柯棣华随军到过许多乡村、城镇，到处看到群众积极支持八路军，纷纷踊跃参军的动人情景。在每次大的战役中，只要八路军一动员，成百辆小车，成百副担架，很快就集中起来，浩浩荡荡，支援前线，往往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伤员们从战场上抬下来，把火线上急需的弹药运上去。

“这是多么生气勃勃的局面，多么巨大的力量的源泉。”

柯棣华还发现，这支部队无论是向老乡们买东西，还是办其他事情，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十多天的战斗生活，两位印度友人同这个团的战友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巴苏华在回顾这段难忘的经历时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团的经历……从最高指挥员到普通战士，他们都象亲密的朋友和同志一样地帮助我们。”他在寄给当时印度一家报馆

的文章中写道：“八路军战士，真配称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任何艰苦战斗中，都是英勇卓绝、奋不顾身的。”

柯棣华呢？在这短短的战斗历程中，给他留下的印象也是永远磨灭不了的。它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战争的本质的认识，还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八路军指战员的亲切感情，从而鼓舞着他在实际行动上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给他妹妹写了一封热情赞扬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合作，克服困难，共同抗日的信件。他还在小本子上写了许多感想，而且不止一次地对陪同他的翻译说：“我虽然没有上过抗大，但这一次也可以算是参加了一所新型的战斗大学了。”他还高兴地对巴苏华说：“这一次，可以说我们真正成为前线的普通一兵了。”

### 在白求恩战斗过的岗位上

一九四〇年三月末，柯棣华、巴苏华两位印度大夫，告别了朱德总司令，走向了新的战场——晋察冀根据地。

他们从晋东南出发，跨越太行山，穿过冀西，进入了烽火连天的冀南根据地。接着又越过冀中平原，来到晋察冀和平西一带。他们迂回转战，东至运河，北抵长城，纵横驰骋数千里。在途中，他们参加了一个支队伏击敌人军用列车的战斗，和战士们一起拔道钉、拆枕木、割电线。柯棣华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他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又惊讶又振奋，内心充满了愉快和骄傲。

几个月的生活，紧张而又丰富。他和广大的军民一起，穿过崇山峻岭，越过广阔平原，闯过了一道一道封锁线，参加了

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抢救和治愈了无数的伤病员。有许多英雄人物的战斗事迹，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坎上。从此，柯棣华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六月二十一日，在河北唐县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陵墓落成举行揭幕式，八路军指战员和四乡的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环立在白求恩墓旁，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聂荣臻司令员特地邀请柯棣华代表印度医疗队参加。他默默地走上前去，把一个写着“印度援华医疗队敬挽”的花圈，双手敬献到白求恩大夫的墓前。揭幕式上，聂荣臻简要的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光辉事迹，高度评价了白求恩大夫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热情赞扬了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柯棣华听了十分激动，他暗暗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向白求恩大夫学习。”

柯棣华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这时，印度政府来电催促他回国。他必须在回国和留下之间进行选择。柯棣华认为，在这场关系着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命运的斗争中，这里就是自己的战斗岗位。他写信给印度援华委员会表示：“不必理睬他们，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工作并没有违背他们当初派我们出来的宗旨。”“至于电报中提出的护照和将来的职业和前途问题，我认为这已经算不了什么。”他诚恳地对一位边区领导同志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太伟大了！我爱上了你们的事业和你们的敌后根据地，我要和你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八月十七日，唐县葛公村的群众终于盼来了柯棣华和巴苏华两位大夫。热情的葛公村人民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一群青年把柯棣华簇拥着走上主席台，在热烈掌声中，他宣誓似地

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同志们，乡亲们，我和巴苏华同志衷心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欢迎！我们知道这里曾是白求恩同志工作过的地方，而且军区今年二月曾将你们的学校和医院以白求恩这个光荣的名字而命名。我要说的是，我们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也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们要象他一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

在这里——白求恩战斗过的岗位上，柯棣华决心踏着白求恩的足迹，用自己的行动，谱写新的篇章。

九月，根据地的战争形势紧张起来，晋察冀的南线、北线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柯棣华和巴苏华立即提出申请，要以白求恩为榜样，组织医疗队到前线去救治伤员。军区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两位大夫分别参加了三分区和四分区的救护工作。他俩分手时，还提出了工作竞赛的条件：（一）及时地对伤员施行治疗；（二）不在火线上丢掉一个伤员；（三）节省医疗用品。

柯棣华随军奔赴南线——河北省涞源县一带。他坚持按照白求恩的作法，把手术室设在离前线一二里地远的地方。在为时十三天的激烈战斗中，他接收了八百多名伤病员，为其中做手术者五百五十八人次。由于伤员不分昼夜地运来，他有三天三夜未曾休息。他用最大的热情，完成了救治伤员的任务。

百团大战之后，巴苏华大夫奉命返回延安。爱德华、木克华、卓克华三位大夫也因身体状况不佳先后返回印度。柯棣华决心只身留职晋察冀前线。他担任了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外科教员，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对工作的责任心，他的治学精神，他的教学艺术，特别是他和边区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博得了一致的好评，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一九四〇年春，为纪念白求恩逝世，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被

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九四一年一月，卫生学校校长江一真传达了聂荣臻的命令，任命柯棣华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随后，江一真也给他介绍了一些管理医院的切身体会，送给他一本油印小册子《怎样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并再三叮嘱，希望他成为第二个白求恩。送走江一真，柯棣华思索着这句话的份量，深感担子太重了。那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新上任的柯棣华院长，决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踏着白求恩的足迹前进。他认真地向同白求恩一道工作过的同志们请教，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为医院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战争环境的规章制度。这套制度，既有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又有白求恩办模范医院时积累的经验，如休养员班、排组织制度，领导干部轮流查房制度，医院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意见征询会议制度，医生、护士每周一次的工作汇报制度等等。

柯棣华遵照白求恩“大夫不能等待伤员前来，而必须去到伤员那里”的遗言，坚持把医疗队设在前线近处，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前线去抢救伤员。

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热爱伤员，无微不至地关怀伤员，把救护和治疗伤员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行军途中，他总是随着担架走，与伤员形影不离，遇有危险，他挺身而出。他亲自给伤员喂饭，把自己的被褥衣服给伤员用，马给伤员骑，细粮给伤员吃。他经常对医务人员说：“一个医生，只要活着，就不能忘记伤病员。”

他同群众血肉相连，把为群众服务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发现老乡得病，便毫不迟疑，立刻赶

去治疗。老乡有病找上门，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村里的老乡和医院部分工伤人员，都亲切地称呼他：“贴心大夫”、“黑妈妈”。

柯棣华处处以八路军一个普通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言必行，错必改，严于律己，模范地执行他自己参与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他除了担任院长职务，还负责给卫生学校讲课和指导学员实习。在教学和医疗工作中，他发扬白求恩大夫“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教学质量，还经常带领学员查房，给学员做示范。大量平凡而细致的工作，使他成了医院里最忙的人。在困难面前，他从不叫苦，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九四二年一月，柯棣华愉快地给在延安的巴苏华写信，汇报了自己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收获。他在信中说：

“我在此间虽然过着一种从所未有的艰苦生活，但我觉得我充满了活力和愉快。我热爱中国，热爱正以无穷威力摧毁法西斯暴行的英勇抗战的军民。

“我的医务工作，包括治疗外科伤员，手术开刀，帮助学员在手术室作实际操作。每天平均有三次手术，而医院中病人的流动是很频繁的。去年一年内，我们大约作了四百五十多个外科手术。

“关于学习，我在中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能够在几乎不用字典的情况下阅读中国革命史一类的书报。我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令我满意。

“然而，我在去年的巨大收获，是性格方面有了显著的转变。你很了解，在没到延安之前，我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落后，



我的头脑里虽然有些民族意识，但却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而关于革命方法的概念又极模糊。去年，在这里的一年多时间，过着一个八路军战士的生活，经常接受同志们在会议上和私下交谈中对我的帮助，使我在性格、思想等方面经历着显著的转变。”

这是一封真挚的、充满着革命情谊的信。的确，一九四一年是柯棣华“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不论在工作上的贡献，或是学习上的收获，思想上的提高，都比这短短的信中所写的要大得多。

八年抗战，晋察冀边区人民吃尽了千辛万苦，而最艰苦的还是一九四二年。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和“铁壁合围”，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在葛公村张各庄召开了军民誓约大会。柯棣华在会上用中文发表了长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正当我们抗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边区缩小了，我们军队减少了，我们的斗争越发困难了。但是，这能吓倒我们吗？不，不能，绝对不能！不管敌人是‘扫荡’还是‘蚕食’，搞‘三光’还是搞可笑的‘自首’阴谋，这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发誓和你们并肩战斗，直到打败法西斯主义！”

由于敌人频繁的“扫荡”，他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忍痛放弃亲手建立的医院和学校，打起背包和敌人周旋于丛山峻岭之中。

这年初夏，敌人对冀中平原发动了抗战史上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加上天灾和敌人的层层封锁，群众没有吃的，军队给养也很困难，有时一天两顿喝点干菜汤。就这样还要天天爬山、行军、作战。

在战斗频繁而又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医院既要对付“扫荡”，又要坚持医疗，还要开展大生产运动，经常有人因为饥饿疲劳而晕倒。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柯棣华特别关心。在大家眼里，柯棣华既是他们医院的院长，还是一位国际友人，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减轻他的负担并给予可能的生活照顾。但是柯棣华始终坚持和大家一样，劳动生产积极带头，穿越敌占区背粮争着去，生活上和战士一样吃黑豆、野菜，拒绝接受对他个人的任何特殊照顾。有一次全校改善伙食，小灶吃大米饭，一般灶吃小米饭，这是一年之中难得的一次。通讯员给柯棣华打了一份大米饭，他一看就火了，把大米饭送回小灶。后来，他真挚地恳求说：“请同志们一定不要把我当成外国人。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时候，把我从战士行列中拉出来，我是十分难过的。”“我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但我来中国是为革命，为消灭法西斯，不是为吃穿、图享受的！”

柯棣华按照一个普通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常对同志们说：“一个革命者不应当把困难挂在嘴上，再苦再累还比得上长征吗？”他对领导特意照顾他身体的战利品、滋补品一律拒绝接受或转送给重伤员。有时老乡为了感谢他的精心治疗，特地送来土特产和鸡蛋表示心意。他总是和蔼地婉言谢绝：“我是八路军，不能接受老乡的礼物。”“只要你能参加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日，那就是对八路军最好的感谢。”

严酷的考验，使柯棣华更加坚强，特别是经过党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使他更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

一九四二年六月九日，他在给巴苏华的信中再次谈到他当时的思想变化。他说：“我有一件事很高兴，就是，在我个人

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我所有的那些坏习惯，我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被我抛弃掉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五周年的日子里，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组织上把接受他入党的决定通知他时，他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在鲜红的党旗下，他庄严地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宣誓为反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我要将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

### 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

在艰苦频繁的战斗岁月里，在共同的教学工作中，柯棣华和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互相帮助，密切配合，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特别是柯棣华患病时，郭庆兰总是亲自照料。同志们看到这两位不同国籍的革命战友，在艰苦的斗争中凝聚的纯贞爱情，感到格外高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经组织上批准，柯棣华和郭庆兰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操办了喜事。婚礼是简朴的，但是充满了幸福。江一真校长和其他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婚礼，勉励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并肩战斗，取得更大的成绩。村子里的老乡们闻讯，按中国的习惯送来了花生、红枣、核桃、鸡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葛公村又传出喜讯：郭庆兰分娩了，生了一个和柯棣华一样面孔黧黑、眼窝深凹的儿子。同志们和村里的老乡们都纷纷前来祝贺。聂荣臻知道了，也非常高兴，亲自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印华”。

工作之余，柯棣华经常抱着印华，在村子里散步。他指着印华对同志们说：“这是中印友谊的结合呀！我们是为下代的幸福而战斗，未来是他们的。”在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照料下，柯棣华一家的生活是非常和谐愉快的。

可是，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任务，特别是他身上顽固的疾病，却不断侵扰着这个幸福的家庭。从一九四二年起，柯棣华由绦虫病引起的癫痫病再次发作。癫痫病属于神经系统的疾病，患有这种病的人，长期的兴奋或抑制都会引起突然发作。为了不给领导和同志们增添麻烦，他经常在病发预感时悄悄地隐藏起来，独自忍受抽搐的痛苦。聂荣臻听到柯棣华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消息，非常关心，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香港或者回国治疗。柯棣华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每当我看到一个个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就觉得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我一分钟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六月、九月、十一月连续癫痫病大发作之后，他似乎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要和生命争时间，《外科总论》编完了，又开始了《外科各论》的编写。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四时四十五分，他在主持了医院例行的工作会议后，回到宿舍继续编写《外科各论》讲义。他急促地在稿纸的边角上填上了新一页的编号：第一百七十七页……突然一切都停止了，笔在纸上划了一道长长的横线，这是柯棣华癫痫病的第五次大发作，昏迷与痉挛整整持续了十分钟。校长、政委闻讯赶来，紧紧握着柯棣华的手，示意要他安静。柯棣华望着领导同志，望着周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有多少心里话要说！但张张嘴又说不出话来。

从晚上十一点到次日清晨六时十五分，柯棣华的病每十至十五分钟发作一次。一切可能采取的治疗措施都用过了，抢救无效，在反复的抽搐下，病魔终于夺走了三十二岁的柯棣华的宝贵生命。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党员柯棣华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

对于他的死，中国人民极为悲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延安各界召开了柯棣华同志的追悼大会。我党主要领导同志分别题词、撰文和给他的家属致函，高度评价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惋惜“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毛泽东挽词）。称颂他“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朱德题词）。赞颂他“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黠武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周恩来给柯棣华家属的信）。

柯棣华的逝世是中印两大民族的共同损失，他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亦成为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供后人瞻仰学习，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他生前工作过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建立了永久性的柯棣华纪念馆；在安葬他的华北烈士陵园重新建立了他的陵墓和雄伟的塑像。在印度成立了以他当年在医疗队的同伴巴苏华为主席的柯棣华纪念委员会。四十年来，中印两国人民在柯棣华国际主义精神鼓舞下，对中印两大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友谊有了进一步的促进和发展。

柯棣华短暂的一生，闪烁着国际主义战士的灿烂光辉。

岁月流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忘记他吗？不会的。“后世将比今天对他更崇敬——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为未

来而献身的”（宋庆龄给柯棣华家属的唁电）。

柯棣华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巴苏：《中国之行》，存柯棣华纪念馆。
2. 柯棣华：《柯棣华书信》，存柯棣华纪念馆。
3. 高粱：《柯棣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版。
4. 盛贤功等：《柯棣华大夫》，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
5. 阿巴斯：《还有一个没回来》，印度1944年出版。
6. 孟凯什：《回忆弟弟德瓦卡》，存柯棣华纪念馆。
7. 曼诺拉玛：《关于〈柯棣华大夫〉的通讯》，存外文出版社。
8. 王炳南：《忆柯棣华大夫》，载1943年3月22日《新华日报》。
9. 饶正锡：《忆柯棣华同志》，载1942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
10. 马寒冰：《永恒的记忆》，载1942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
11. 访问江一真、郭庆兰、陈洪源、王彬、张录增、康克、邢竹林、王阳雪等的记录。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01

---

定 价： 1.15 元